

## 导 言

### 宗教的内涵与转型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曾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庄严肃穆的殿堂、香烟缭绕的寺院、栩栩如生又形态各异的罗汉雕塑或使徒画像，以及虔诚不渝的皈依和祈祷，念念有词的颂经或悦耳动人又音调呆板的音乐……。谈起宗教来，许多人常常会泛起无尽的遐思。宗教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超人的、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的境界，主宰着社会和自然，因而对它信仰、膜拜或敬畏。

历史表明，人类最初时期并无宗教，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宗教的产生、衍化、传播和嬗变，同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不同国家的国情都息息相关。宗教生活必然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影响。任何宗教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概不例外。

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人类进入文明历史以来，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从来没有过宗教信仰的。宗教信仰同阶级结构、民族习俗有关，但又并非等同。有全民族信奉同一宗教的，也有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的；同一个民族有的最初信奉一种宗教，后来却又改信了另一种宗教……

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宗教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甚至人们的心态、习俗……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所造成的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宗教一方面被统治阶级作为麻痹人民意

志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被压迫者对现实苦难的叹息和对未来的向往。人们有时在宗教领域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有时也能利用宗教展开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社会当中，上层和下层群众，有的所信宗教一致，也有的迥然有别。总之，大千世界里，宗教情况异样纷呈，各有特色。但是有一个基本点是相通的，即：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它历史地出现和传播，也将历史地最终消亡，它受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支配。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现象，属于文化范畴当中的一部分。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偶然因素能使人们膜拜和传播开来的。从宗教的变异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化和民族发展的轨迹；从不同社会形态里宗教的转型，可以辨析出不同历史阶段宗教性质的必然变化。宗教的作用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人们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甚至绘画雕塑作品里，常常有着宗教的烙印。由于宗教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传播广、影响大，因而研究、评析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

怎样看待宗教？如何评析人们对宗教的膜拜、以及宗教的传播现象呢？这是一个十分现实、又非常敏感的可得重视的问题。

是否随着科学的普及、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宗教意识必然削弱呢？否！

很重要的例证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教徒的人数并未减少，反而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据美国《教会研究国际公报》1993年第1期中的统计，全世界5 575 954 000人中，佛教徒是334 002 000人、伊斯兰教徒为1 014 372 000人。而基督教徒则是1 869 751 000人，占全世界总人口的33.5%，亦即大约每3个人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有些国家教徒众多，如印度的印度教徒计7亿多人。全世界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的人数，据不完全的统计，仅11亿人左右，只约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宗教的历史作用如何？它一向都是起坏作用吗？对此，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经常利用宗教去

欺骗和麻痹人民，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确有官方宗教维护剥削制度。但是，对它还应全面、具体地评析。例如，中世纪初期基督教曾促进了西欧封建制的形成，伊斯兰教推动过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宗教和教会既束缚过文化的正常启动，也保存过文化遗产。对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宗教确曾起过的衍射作用，切不可抹煞或低估。社会经济形态有过曲折和转型过程，宗教当然也有衍射和转型问题。不同历史阶段中，因宗教的传播渠道有别，其作用不同则是必然的。

基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人们的宗教观从来有别。有人把宗教视为神灵启示而不可侵犯；也有人把宗教看成迷信荒诞而不愿沾上。宗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吗？仅仅是虚幻的观念吗？否！各个宗教都有固定的经典、组织团体和不同的教义、学说，每个宗教都有专职的教务人员、教阶体制和专门节日，也都有聚集的场所、仪式和信仰，特别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典籍汗牛充栋，用唯物史观和正确视角对宗教加以剖析，开展研究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由于宗教信仰有着跨阶级、跨国别的背景，有着与民族、政治经常交织在一起的特点，每个宗教的教义信条、神学理论和礼仪习俗以及宗教组织的形式互异，不同教派林立，各执一说。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的过渡时期，宗教亦处于转型阶段。例如在基督教中，天主教与新教有别，新教中还有路德教、加尔文教和安立甘教等的区分，不同教派的阶级性有异，作用亦不同。因此，对待宗教问题必须运用复杂辩证的思维和审慎的逻辑方法。

### 基督教的兴起和走向世界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是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各个教派的总称。它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方正教及其它一些较小的教派，起源于公元 1 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逐渐流传到罗马帝国所属的欧洲和北非以及世界各地。

基督教最初是犹太教中的一个下层派别，其信徒多是贫苦人民和奴隶。他们反对罗马暴政，反对残酷剥削，具有平等平均思想。信仰上帝（天主）是人类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们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犯了罪，并在罪中受苦难，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救；认为人们一方面要忍受人间痛苦，争取死后过天国；另一方面深感无力改变现状，而寄希望于基督再临世上，以便伸张正义。

早期基督教承袭了犹太教的“至高一神”“救世主”的观念，但对犹太教有所超越和变化。主张：第一，上帝惠顾一切人类，打破了犹太教中“选民”说的狭隘性；第二，信仰依靠基督救赎的“因信得救”说，弘扬耶稣的人格魅力；第三，简化了犹太教的繁琐仪式；第四，提倡虔诚、克己和博爱，反对冷酷、报复和自私，从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早期基督教会的特点是：1. 尚无本身独立的教义和经典；2. 礼仪简单，只行洗礼和圣餐礼，提倡禁欲清苦和捐献济贫；3. 组织形式简单，活动地点不定，尚无教堂。公推管理人，2 世纪以后才建立主教制。

公元 2 世纪、3 世纪后，随着有产阶层加入基督教和取得领导权，基督教渐失被压迫者宗教的性质，而逐渐转变为剥削阶级的工具，竭力博取、顺从统治者。与此同时，基督教创立了以神学信条为核心的基本教义，主要信条是：“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论”、“上帝二位一体说”、“天国地狱说”、“灵魂不灭与世界末日说”。基督教的基本经典是《圣经》，即《新旧约全书》，包括《旧约全书》（继承犹太教经典，含《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部分，39 卷）和《新约全书》（含《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共 27 卷）。

公元 3 世纪末和 4 世纪初，罗马帝国迫于内外交困，对基督教的政策也从迫害逐步改变为利用，通过《宽容敕令》、《米兰敕令》的颁布和《尼西亚信经》的形成，最后在公元 392 年，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地位最终确立，教会体制和教阶制度亦逐



渐形成。

由于政治、经济的矛盾、行政区划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基督教在发展、传播过程中，曾衍生为西、东两大派系。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在中国称天主教），保留了较多的罗马文化传统，通用拉丁语，故习惯上称为拉丁教会。公元 4 世纪和 5 世纪时，主要传播于罗马帝国西部，即意大利，法国、北非迦太基一带及其以西地区。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正统教会意，亦称东正教），保留了较多的希腊文化传统，通行希腊语，又称为希腊教会，据有马其顿、希腊半岛至埃及以及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东西两派教会之间长期有着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及斗争，对教会的活动影响至大。

西罗马帝国灭亡（476 年）后，欧洲由奴隶制社会过渡为封建制社会，基督教会亦随之从为奴隶主服务，转型成为封建社会的支柱。欧洲中世纪时，基督教占统治地位，教会本身是最大的封建主，把意识形态置于神学的统治之下。他们依靠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利用“异端法庭”（“宗教裁判所”）等等机构，残酷镇压进步事业和人民群众。在中世纪，一部分贫苦的农民、平民和市民也经常利用基督教异端教派的各种形式作为旗帜，发动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在基督教会发展的过程中，西欧罗马教皇制确立起来，并与世俗王权进行了长期的“政教之争”。1054 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以后，再未能整合统一。以后，东西教会各自形成了本身的宗教体系。

天主教的历史上，在内部出现了众多的修道院和不同类型的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他们或隐修于修道院之中；或以“托钵”形式深入民间活动；或远赴海外传教。这些修会的共同特点是：1. 经教皇批准，受罗马教廷控制；2. 有各自的组织、会规和任务；3. 培养专门的神职人员，为各教区、教堂提供神父、主教；4. 兴办慈善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各修会及传教士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包括中国），产生过不同的历史作

用。

自 1517 年起，在德国首先爆发了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继而瑞士、法、英等欧洲各国也出现了反对罗马教皇专制统治的宗教改革。在欧洲陆续产生了脱离天主教的路德教、加尔文教等“新教”。而天主教在反对新教宗教改革运动中也产生了维护天主教宗旨的耶稣会，同时也巩固和改进了各个修会的组织与活动，尤其是向欧洲以外的传教。基督新教伴随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成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进入近代以后，基督教不论新教或旧教，都面临变化和转型，它从欧洲进一步广泛而向世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统治人民以及推行殖民扩张的侵略工具。旧教（天主教）和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都相应地作了调整。基督新教否认教皇权威，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体制，实行廉俭的礼仪，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准则，制度较灵活，组织较民主。基督新教自形成以来，虽然宗派林立，种类繁多，但六大宗派是主流宗派。即：1. 路德宗（信义宗）；2. 加尔文宗（长老宗、归正宗）；3. 安立甘宗（圣公宗）；4. 公理宗；5. 浸礼宗；6. 卫斯理宗（循道宗）。

现当代以来，基督教的嬗变有着新趋势和新特点。这就是：1. 基督教的日趋世俗化和现实主义。随着当代经济与科技大潮的兴起，基督教的意识、行为和价值取向亦有明显衍变。从传统的定位观念转向适应世俗化，在神学理论上，从向往未来天国转移到追求现实，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彼岸的善恶赏罚，而是现世的利害苦乐。2. 基督教传教手段的现代化。例如，灵活选定布道场所，宗教活动中结合科普知识的传授，影视歌舞的穿插以及医药生活咨询的安排，注意了生动活泼性。3. 基督教参政议政倾向加强。二战后，各国许多宗教名义的政党相继成立，或在野或执政，其政治要求与宗教利益常交织在一起。4. 基督教领域的多元化。随着世界政治结构多中心的形成，基督教的各种思潮、学说和流派日益增多，教派组织林立各地，例如迄今仅基督新教便有 90 多个

宗派，近 2 万个独立的教会团体，且不限于欧美，在广大亚非拉澳地区基督教传播甚广，教徒亦日增。

### 基督教在中华和北京的传播

基督教在中国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基督教自唐朝以来，曾四次传入中国。第一次传教的主要目标是唐都长安（西安）；第二三次的主要目标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时的首都北京。第四次，北京仍是传教的重点城市之一。

基督教各派中最先传入中国的一个支派是 聶斯托利派。时间是公元 635 年（唐贞观九年）。聶斯托利派原属东方基督教会，因与尼西亚正统观点相抵触，而被宣布为“异端”，后由波斯经西域来到中国长安传教。因逢唐代盛世，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从而打开局面，被称为“景教”，在唐朝共传播 210 年。因 845 年，唐武宗下诏灭佛，景教同时被禁。这段历史从 1625 年发掘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实物碑铭得到证实。第一次传入中国虽时间不算短，又在近百座城镇中建过景教寺，但地区局限于长安、洛阳、当时的两京及陕、川和扬州以南，因受佛、道两教的排挤，传播的规模和进展均不大。

第二次传入是在元代的 13 世纪。在中国中断了 400 年之久的基督教，有两支来华。一支是继续流传于中亚、蒙古诸地的唐代通称的景教；另一支是罗马天主教会遣华传教的方济各会教士，都向大都（北京）汇集而来。元朝蒙古人统称其为“也里可温教”（亦称“阿勒可温”或“十字教”，意为“长老”，“有福缘之人”，乃尊称）。因蒙元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政策，甚至对传入的基督教常特降诏免租税、除徭役，因而元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均超过唐代。

由于在元代，天主教和 聶斯托利派双方互相攻讦，矛盾重重，更加上 1368 年元朝灭亡，基督教依附于蒙元政治，教徒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在汉人中很少传播，因而基督教在中国没有扎下

根，当时对中国文化没有多大影响，故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再次中断。

第三次传入是明末清初。中国虽然处于明清王朝更迭、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但基督教的活动非但没有中断，反而更向纵深发展，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

1582 年，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先后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他们以北京为中心，都是传教的中坚。他们在北京受到中国皇帝优宠，有官衔、居高位，使传教获得空前的成功。这段时间里传教活动的特点是：1. 利用了有利的时机。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上层建筑日趋腐朽，宋明理学不断受到抨击，佛教、道教已呈衰败枯萎之势，为基督教的传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2. 采用了“入乡随俗”方针，教士们提出“耶儒合流互补论”，他们穿儒服，说汉语，诵诗文，将天主教义与孔孟之道相融合；3. 依靠皇帝，结交宫廷并以向达官贵人传教交友为重点，得到了中国一批官员教友的鼎力支持和誓死庇护；4. 用准确修历为媒介，以介绍科学知识为手段，以督造枪炮为特长，博得朝野的验证和信任，扩大了天主教在华的影响。

在清朝的准许和优惠下，东正教第一届传教士团于 1716 年抵北京。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长期实际是沙俄驻北京的外交机构。东正教传教士的官方身份是天主教教士们所不具有的。

基督教第四次大规模传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是从 1807 年英国伦敦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教士马礼逊抵达中国开始的，直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继马礼逊之后，英、美、俄、德、法……等国各个教派的传教士陆续来华。这次传教的特点是：1. 基督教传播与殖民侵略结合，同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同步进行；2. 传教士在各侵华国家的政府直接支持下，以炮舰和不平等条约为依托，不限于传播宗教，而且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欺压中国人民；3. 基督教传教活动以北京等地为传播重点，规模大、教派多，高潮持续时间长。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各差会都



派大批教士来华。基督教会势力显著膨胀，基督徒人数激增；4. 基督教的侵华活动同中国人民大众的反侵略斗争，教会、教士、教民同中国人民群众的矛盾冲突日益激烈，教案迭起，一些反洋教的斗争具有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5. 20世纪以来，基督教和教会一方面“一手捧圣经、一手捧四书”加紧进行中国化的传教活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传播科技，以之作为间接传教的活动方式。一些教会主办的大学和医院，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

基督教在北京的传播过程，便是北京城一些人们对十字架的膜拜过程。对基督教和来华传教士应当历史地具体剖析。

首先，明末清初一些传教士从西洋不远数万里来北京传教，当然他们是因忠诚于教会的事业心所驱动，忍辱含辛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人同帝国主义阶段来华的传教士是有明显区别的。19世纪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因政治和文化背景复杂，不应笼统而论。极少数人热衷于侵略，他们手上确实沾有中国人民的鲜血；多数教士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过殖民活动；也有一些教士对中国人并无敌意，仅执着于传教。不少教士在传播西方文化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其次，要辩证地评论基督教在北京的功能和作用。基督教本身提倡的忍耐、苦修和服从，以及它的社会整合功能，曾维护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旧北京、旧秩序的稳定，这一点毋庸置疑是消极的。但基督教的文化功能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曾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包容性和摄取性所形成的综合文化，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对人类文化宝库有着巨大贡献。北京的基督教文化有过许多建树和宝贵遗产。

最后，应当指出：旧中国、旧北京曾是基督教外国差会最大的传教区之一。由于组织上、经济上依附于外国各差会，因而中国基督徒受“洋教”的奴化思想确实较深，不能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在旧北京，基督教会的自立和“本色化”难以实现。但是，



中国基督徒中的绝大多数人具有爱国传统和民族观念，这些是中国的国情，是中国基督徒的可贵的政治品质。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从此以后，为中国和北京的基督教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的著名人士吴耀宗等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重要宣言。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破坏，宣言中号召各基督教会和全体教徒，拥护我国的《共同纲领》，投入建设祖国，并庄严地宣布了中国基督教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方针。北京的基督徒在各白的岗位上，为了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并积极投入了各项政治活动。1950年10月，北京基督教界成立了北京市基督教抗美援朝分会。1953年5月该分会撤销的同时，新成立了北京市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委员会。该会组织北京市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学习时事政治和开展工作。自1956年起，北京市基督教各派别逐渐实现联合，根据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章程，由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统一管理并协调各派的经济、教产、人事以及各项活动。北京市基督教界随中国基督教代表团于1961年出席过世界基督教和平大会。1965年出版过《北京市基督教史料选辑》，记述了北京市基督教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史实。此外，还印发过一些参考资料，交流信息。“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基督教会的宗教活动全部被迫停止。

1979年3月后，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恢复工作，先后举办过一系列活动和会议，并定期召开各届代表会议。各基督教堂陆续修缮和开放，并接待外国基督徒参加宗教活动。根据政府的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北京市的基督教既自主地恢复和开展宗教活动，又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十几年来，新成立了基督教的神学院，也增加了一些教堂，年轻的神职人员有所扩大，宗教事业后继有人。

宗教工作任重道远。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目前北京市基督

教正在开创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主要研讨和阐述的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基督教会在北京发展史的要略。

## 第一章

### 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与 元代汗八里的“也里可温”

在本书导言中曾述及过，基督教传入中华已有 1360 多年，自中国唐朝起，先后传入中国共历四次。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各科宗教的互相影响，以及彼此消长、衍变的关系，曾为国人所瞩目。但记述情况和传说纷纭。必须以史料为根据，以史实为准绳详加论证。

#### 一、景教在唐代之传入中国

关于中国基督教会最早的记录，在公元 3 世纪时阿诺皮乌斯曾撰文叙述过，他称教会之成就，不论“在印度，在‘丝国’，人、波斯人或在阿拉伯、埃及、叙利亚及马其顿人中，……在每一岛每一省，凡日出日落，光芒所及之地皆是”，又写道：“虽人人皆受罗马王之艺术及迷信习俗之影响，但不加迟疑，立奉基督之真理，而摒弃其固有之一切。”<sup>①</sup> 这里所谓的基督福音早在 3 世纪已传入中国并无证据，仅是一种想当然的传说而已。

再者，关于耶稣圣徒圣·多默曾亲到中国传过教之说，并不可靠，亦乃传闻。

<sup>①</sup> 原载《阿诺皮乌斯反异教论集》八卷，1542 年罗马版，转引自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412 页。

根据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基督教史学家阿·克里斯托芬·穆尔的考证和论析，以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原碑文的重要物证，公元 635 年景教开始传入中国之说，可作为基督教首次来华之可靠的记载。

景教，原名聶斯托利派，是聶斯托利所创。此即狭义的景教。中国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皆自称为“景教后学”。

聶斯托利（380 年—451 年），生于叙利亚，原为安条克城修道院院长，428 年—431 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对耶稣本人是神还是人的问题发表过个人的见解。他主张“道成肉身”的耶稣，具有真正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神性和人性在他身上的统一，乃精神上的统一，并非物体上的统一。他认为童贞女玛利亚是耶稣的人身之母，并非“上帝之母”。具体说来，即：耶稣是玛利亚生的普通的人，以后才开始“道”与人结合，才成为神的。431 年，在以弗所<sup>①</sup>宗教会议上，他受到亚历山大主教西巴尔等人的谴责。聶斯托利的学说被论敌斥为“双重位格”论，即基督二性分立论。在宗教大会上，他被判为“异端”，旋被开除教籍，遭到放逐。聶斯托利的观点，同当时东方教会中许多神学家的观点相仿，但为西方教会所不容。此后，聶斯托利及他的追随者被迫逃往波斯，同那里早在 424 年已脱离拜占廷教会而存在的古代东方教会相结合。于 484 年建立起独立的东方教会。这一新教会便称之为聶斯托利派。4 年后，聶斯托利本人虽去世，但此教派在波斯因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优待而长期存在。教士们作为教师和医生而地位较高，长期活跃于波斯宫廷并向外传教。540 年，东方教会进行改革后，传教活动进一步扩大。他们的传教士从两河流域向东远达印度和中国新疆等地。在 7 世纪中叶的 635 年，此派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称之为景教。

<sup>①</sup> 小亚爱琴海边城市。

### （一）现存于中国的唐宋景教之文献

直至 17 世纪以前，关于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人们并不很明确。1625 年（明朝熹宗天启五年）3 月初，在陕西西安城西南的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碑文中人们知道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确在 635 年（唐贞观九年）来到中国。景教碑是 781 年（唐德宗建中二年）阴历正月初七日（阳历 2 月 4 日）所立。根据此碑及有关史料可以清楚地了解 635 年—781 年期间景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此碑是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最重要最有力的物证。

此黑色石碑，大体完好，刻字清晰，初出土时移立到西安距西安门外大街约 5 里之崇仁寺内，1907 年 10 月 2 日移到西安南门内的碑林（现为陕西省博物馆）之内。碑高 2.36 米、宽 0.86 米、厚 0.25 米，重约 2 吨。碑头上端刻有飞云和莲花烘托的一个十字架，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名“螭”，左右配有百合花。碑的正面刻有 32 行（每行 62 个）汉字，正书，总共 1780 个字。碑背面无字。碑下面和左右两侧都有用叙利亚文刻的 170 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职称。这些人名，除 8 人外，都是叙利亚文和汉文相对照，据碑文记载，碑文作者乃大秦寺僧景净，刻写人是吕秀岩。碑文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序文较长，第二部分是颂词。碑文中简略地叙述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较详地记述了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带经典抵长安后，受到唐太宗以下六代皇帝优待的经过。颂词是用韵文表述的。

景教碑出土后近 300 年，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又发现了有关唐朝景教经文等重要文献。计有：

1.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写本，共 309 字。“三威”乃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严上帝，“蒙度”是得到救赎之意。译自叙利亚文，全经分为“赞文”、“尊经”、“按语”三个部分。“尊经”在天主“三威”之后列举了 31 位法王（圣徒）的名字，分



列汉译景教经典 35 种，在附记中记叙了自阿罗本入华后的译经情况，是珍贵的教史资料。

2. 《一神论》写本，由三个小卷，共计 7025 字合成。分为：(1)《一神论第一》，94 日，60 行，1045 字；(2)《喻第二》，217 日，142 行，2620 字；(3)《世尊布施论第三》，262 日，187 行，3360 字。主要是阐述万物一神所造，引用了《新约》中《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约成书于 641 年。

3. 《序听迷诗所经》，又称《移鼠迷诗诃经》（即耶稣弥赛亚经）写本，全经分为两部分，前部叙述教理，后部为耶稣一生行迹，约成于 635 年—638 年之间，共 11 节，160 行，2830 字。估计是传教初期所作，文字晦涩聱牙。

4. 《志玄安乐经》，写本。为晚唐所抄。是“天上一尊际施诃”（基督）对岑稳僧伽的说教，是问答对话形式，体裁仿佛经，夹杂一些道教用语，是景教传华后受佛、道教影响之故，原本 159 行，共 2600 余字。

5.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写本，共 18 行，153 字。卷末署“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还注明“唐玄宗开元八年五月二日”（720 年），这是关于耶稣登上高山在门徒面前变形显圣的颂词。

6.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写本。现仅存前 10 行与后 30 行，共 632 字，卷后注明“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717 年）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与“大圣通真归法赞”同一寺之中。

7. 景教祈祷书断片，20 世纪初在新疆高昌故城遗址发现，共 4 页，前 3 页为叙利亚文，后 1 页为叙利亚文拼写的粟特文，为 10 世纪晚唐至五代的遗物。

此外，还有景教画像，乃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中发现，人物之胸部和额上都有十字架。现藏于不列颠博物院内。

汉文典籍中有关景教记述的甚多。正史类中如新、旧唐书，编年类如通鑑、续通鑑；诏令奏议类如大唐诏令集；地理类如两京

新记、长安志；政书类如通典、唐会要等；金石类则有石墨镌华、金石萃编；子部杂家类中如能改斋漫录、西溪丛话；释家类中如僧史略、佛门正统、佛祖统纪、佛祖通载、宋高僧传、贞元续开元释教录；集部诗类如杜甫石笋行诗注、苏轼游大秦寺诗注；文类如舒元舆重岩寺碑、李德裕贺废毁佛寺德音表等等。

## （二）景教在唐代传播的经过

中国唐代前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唐太宗等执行对外友好、对各种宗教兼收并容的方针。首都长安成为对外经济文化交往非常活跃的国际性都市。中国除流行较久的道教、佛教外，631年，唐太宗敕令在长安崇化坊建立袄教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635年，景教传入了中国。在中国同阿拉伯正式缔交的651年（唐永徽二年）8月，伊斯兰教正式传进中国。675年，波斯的摩尼教<sup>①</sup>传入中国。694年（唐延载元年）波斯拂多诞<sup>②</sup>密乌没斯<sup>③</sup>持《二宗经》<sup>④</sup>来华，此后在侨民中流传。

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大秦僧侣阿罗本带经籍抵达唐朝京都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从西部迎入宫内。阿罗本向皇帝呈上景教经典并解释教义。房玄龄和魏徵曾帮助阿罗本“宣译奏言”。

三年后，638年，唐太宗通过对已翻译的“圣经”的了解和直接询问福音的道理之后，他认为：“深知内真”乃“特令传授”。唐太宗下诏道：“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

① 又称牟尼教、明教、明尊教等。

② 摩尼教中低于慕国的宗教僧侣职位。

③ 人名。

④ 摩尼教的基本经典。

僧二十一人。”<sup>①</sup>此诏合于景教碑的碑文记载大体相同。碑文中称阿罗本为“大秦国大德”，而在《唐会要》中则称他为“波斯僧”。古代史官对景教不太了解，误以为都是波斯人的宗教，泛称为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实际上公元 7 世纪从波斯先后传入中国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以及从阿拉伯传来的伊斯兰教并非同一种宗教。

在义宁坊<sup>②</sup>的景教寺建成之后，唐太宗还下令将他的画像送到寺中绘于壁上，藉以表示对外来宗教的优渥。据分析，阿罗本在 635 年入长安以前，已在中国甘肃、新疆一带有过活动。

唐高宗时期（650 年—683 年）景教发展迅速。高宗继续执行太宗对各个宗教兼容、利用的政策，仍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据景教碑所记，“于诸州各置景寺”。唐代全国分为十道，碑文夸耀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虽未必询如其言，但可以证明绝非局限于西北一隅了。677 年（仪凤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请在长安酸泉坊十字街南之东建置波斯寺，景龙中迁到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碑文记载圣历元年、二年（698 年—699 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这是洛阳已有景教寺之证明。除长安、洛阳外，懿、灵武、成都、扬州等地景教寺的规模均不小。

从武则天当政称制到唐睿宗逊位（683 年—712 年）期间，因武则天崇佛，景教先后在洛阳和长安受到佛教僧侣和儒生的攻击和诽谤，也失去宫廷的支持，因而一度衰落。唐玄宗即位（712 年）之初，景教又受攻击，全靠“僧首罗含、大德及烈”等人“共振玄纲，俱维绝组”。据载，714 年（唐开元二年）“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sup>③</sup>，力图取得唐玄宗的欢心。景教还不断派教士来华朝贡并在王公显贵宦宦之间活动，还以修整文物、行医、研讨学术等名义扩大传教。732 年（开元二十年），波斯王派遣首领

① 《唐会要》卷四十九。

② 原名熙光坊，唐义宁元年改名。后来改称崇圣寺、崇仁寺、金胜寺。

③ 《册府元龟》卷五四六。

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到中国。唐玄宗授予潘那密以果毅职（从四品郎将），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sup>①</sup> 740年（开元二十八年）冬，唐玄宗之兄患病，为他诊治疾病的便是景教中精于医术的崇一教士。据景教碑载，唐玄宗曾命其兄弟宁国等五王至景教寺“建立坛场”，修复损坏的旧建筑物。742年，唐玄宗派内侍大将军高力士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在寺内妥予安置，还“赐绢百匹”。744年，大秦国景教大德僧佶和来华。玄宗命景教僧罗含、普伦等 17 人与玄宗一起到兴庆宫“修功德”（即作弥撒）。翌年，玄宗亲自为景教寺题了匾额，还下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居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通过此诏和将景教寺更改名称看来，由于大德僧佶和的来唐，使玄宗对景教的源流更为了解，景教不再与传自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混同，也完全摆脱了依附佛教的地位，这是景教在唐传播深入的反映，这时是景教传教活动的高潮时期。大秦寺由于有了“天题寺榜，额载龙书”的御题匾额，地位较前更有提高。

唐朝安史之乱（755年—763年）时，玄宗仓惶逃蜀，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称肃宗。肃宗（756年—762年）在平息安史之乱过程中，大食、回纥率军入援，景教僧伊斯来到灵武宫廷中充当幕僚和通译，他还供职于唐朝中书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麾下“作军耳目”，肃宗任命他为同朔方节度副使，因参加对平定安史之乱有功，鉴于旧建景寺毁于战乱，乃决定在灵武等五郡重建景寺，伊斯出力甚多。伊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受赐紫袈裟。景教僧伊斯“能散禄赐，不积于家”，“依仁施利”，“虔事精供”；他每年能集合五郡的教士于灵武，奉行宗教礼仪，举办慈善活动，使景教在陇右、河西一带得到重振。

<sup>①</sup>果毅，即果毅郎将，从四品，乃武官职衔。

唐代宗李豫时期（762年—779年），“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饌以光景众”。巴格达景教总主教蒂摩太（778年—824年）曾颁文书任命大卫为中国景教大主教。唐德宗（780年—805年）对景教的事业也很支持。

景教徒对景教僧伊斯在唐肃宗、代宗和德宗时期传播景教的贡献十分赞扬，“愿刻洪碑，以扬休烈”。因而于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景教徒建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中先叙基督教大义，次叙自635年—781年间唐初景教在中国流传146年的情况，碑上列出70多位景教士的叙利亚文姓名，最后特别赞颂了伊斯的业绩和作用。景教僧景净还将30部景教经典译成汉文，他译的几部汉文经典后世于敦煌石室中发现。

景教碑建立后，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个朝代，景教已处于逐渐衰落时期。公元824年（穆宗长庆四年），在舒元舆所作的《重岩寺碑序》中道：“合天下（大秦、袄教、摩尼）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sup>①</sup>由此可见，基于佛教、道教的竞争，景教的传教活动未能充分展开。

公元9世纪，景教更日趋衰落。唐武宗时听信了道士赵归真的话，在845年（会昌五年）8月下诏灭佛，景教亦同时被株连遭禁。据诏所述，“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僧尼耗蠹天下”，使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诏令下达以后，“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sup>②</sup>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袄<sup>③</sup>二千余人。”<sup>④</sup>在诏令中还提道：“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sup>⑤</sup>意思是说，外来的宗教不应扰乱中国传统的礼教纲常。同年七月，中书门下条奏，针对“大秦、

① 《全唐文》卷七二七。

② 唐朝寺庙，官府赐额者为寺，私自建造者称招提、兰若。

③ 穆护是唐代史籍对袄教祭司之称谓。穆护、袄乃祭司和袄教教徒。

④⑤ 《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穆护等祠”指出：“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下令将大秦、穆护各祠一律废除，其人勒令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sup>①</sup>收管。八月，“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sup>②</sup>大约就在这时，景教碑被埋入地下。武宗灭佛令颁布后一年便逝世。继位的是其叔父唐宣宗。847年（唐宣宗大中元年），唐宣宗废止了“灭教”令，佛教再度复兴，但景教经这次严重打击，便一蹶不振，在内地几无信徒。只在北方草原和南方沿海港口等处还有流传。据记载，878年（唐僖宗乾符五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侨寓城内的穆斯林、袄教徒、犹太人、景教徒均遭驱杀。<sup>③</sup>从此以后，中国五代和宋朝的史籍再无关于景教情况的记述。

980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景教教士伊本·奈迪木奉教会之命与另5名教士同来中国拟整顿和传播教务。他发现在西域景教仍存在，回鹘西迁后接受了景教，用回鹘文译出一些景教经典（福音书、殉难记等），但在中国内地景教已绝迹。他987年在巴格达道：“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被毁。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归回也。”景教在中国前后活跃了200余年，以845年唐武宗的“灭佛”令为断限，受到严重牵连。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传播活动以失败而告一段落。

### （三）景教教名、教理、教仪、教规及组织

景教源出自基督教中的一个重要派别。但景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并未介绍景教与基督教之间有何歧异。现存的汉文景教文献中，亦见不到景教与基督教有何差别。这类似明末清初天主教教士绝口不提欧洲基督新教及新说一样。景教的名称，在阿罗本抵长安的初期并未使用。公元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的诏令

<sup>①</sup>指其本国意。

<sup>②</sup>《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sup>③</sup>10世纪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哈桑所著《东游记》一书记述。

中，对景教称之为“经教”。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的诏令中称景教为“波斯经教”。唐代还流行称为“大秦教”和“弥施诃教”。被基督教正统派斥之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在传入中国以后，自称为景教，其意是光明正人之教。“景教”这个名称在文献或碑铭中最早是出现于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的景教碑中。碑文曰：“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从这里可看出，“景教”是景教徒们对基督教的“强称”。可以判断出“景教”这个名称是出现在745年、即唐玄宗下诏将景教寺由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之后，景教碑中对唐玄宗尊崇之极，碑文称玄宗“宠贲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

从景教碑的碑文中得知，所提“经留二十七部”与天主教现用的新约卷数相符。聂斯托利派亦设圣像。景教碑中述及贞观诏所提：“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证明了这一点。

景教经典传世者甚少。景教碑中有“翻经书殿”、“翻经建寺”诸语，说明当时译经之盛。《三威蒙度赞》之“尊经”部分，列经35种，目录后有按语道：“谨按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诸经均晦涩难解。在景教经典所阐发的教义中，叙述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如：上帝造人，人有原罪之说，上帝派遣圣灵降孕于玛利亚，救世主耶稣的降生及为拯救人类而最后献出生命等。从《尊经》的按语中可知，迄唐朝建中年间，至少已有三十部中文的景教经在中国流传了。

从史料中，可知景教教规、教仪的内容。教士概应落发留须，不积货财，不蓄奴婢。每7日作礼拜一次，每日为存亡诵经7次；行礼必向东方，击木为号。行洗礼，敬十字。教士分为“清节达婆”和“白衣景士”两类，前者是按规应常居修道院中的修士；后者即今称之为“在俗司铎”者。景教的礼仪除落发礼为其独有外，其它均与天主教的礼仪类似。景教的主教与司铎，似皆有自己的家室

景教教士除宗教业务功课外，亦举办教育和慈善事业，此即景教碑上所写的“馁者米而饭之，寒者米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在杜环的《经行记》中曾记载道：“拂林国<sup>①</sup>有大食法、有大秦法……，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大秦医生治愈过唐高宗的目疾，据载：“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乃刺百会、脑户二穴。上曰：五月似明矣。”<sup>②</sup>景教碑上叙利亚文之“博士”，应译为史官或译作教师，似当时设有学校或修道院。碑上叙文题及“六品修士长”二人，乃聶斯托利派主教以下的最高职，专掌司仪礼，指派序次，解决纷争，兼管捐施等事。所述僧人及烈能“造奇器异巧”<sup>③</sup>亦利于传教活动。

唐代中国景教教会的组织状况，在景教碑中亦有叙述。撰述景教碑碑文的景净，汉文仅称其为“僧”，叙利亚文则称其为“省主教兼中国总监督亚当司铎”，亚当是景净原名。景净是中国北部教会的领袖，其地位仅是省主教兼司铎。在省主教之上还有宗主教，在景教碑之末载称为“法主僧宁恕”，此人虽有汉名，但并未抵华。叙利亚文称作“时众司铎之司铎，河南耶稣任加特力宗主教也。”

景教中与景净并称为省主教者，还有行通、业利和景通，都兼司铎。行通是已故吐火罗、大夏城司铎老弥利斯之子；业利原名戈布利尔、是司铎、六品修士长兼长安教会长。景教中称主教者一人，汉名曜轮。“六品修士长”除业利外，还有一人，名玄览。“六品修士”只一人，乃行通之子，他的叙利亚名字与景净同，没有汉名。称“司祭”的一人，名惠通。称“司铎”者三十一人，名不备录。称“修士”（又译书记）者四人，名崇敬、延和，另二人

① 中国史籍中对拜占廷帝国之称谓。“拂林”一名，始见于《隋书·裴矩传》。

② 《资治通鉴》唐纪十九，弘道元年（683年）条记述。

③ 《册府元龟》卷五四六。

无汉名。“博士”一人即僧玄览。唐代中国景教的组织状况，完全是仿效叙利亚教会的体制。

从景教碑文内汉文名衔的尊称中可考见出的是：“上德”及“大德”一人，即阿罗本，“大德”一人（及烈）；“僧”及“大德”一人，是佶和；“僧”及“僧首”一人是罗含。“法主僧”一人（宁恕）；“寺主僧”一人（业利）；其余统称为“僧”，碑侧题名有耶俱摩，称为“老宿”。赐予紫袈裟者二人（伊斯、业利）。景教僧中有明确官衔的二人，伊斯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业利为试太常卿。汉名之称号并非景教中的品级。在碑中所述的叙利亚名教士共 77 人，仅 10 人无汉名。而阿罗本、罗含、佶和、伊斯、普论等 5 人并无叙利亚原名。共计有名可稽之教士计 82 人，叙利亚文题名中有 4 人称“司铎兼修士”，其余皆为“在俗司铎”。当时唐代在华景教的教职人员似皆有家室，如景教碑中即明示行通乃司铎弥利斯之子，行通之子任“六品修士”。

#### （四）景教传播活动的特点及唐宋之间景教的衰落

唐代景教的传播活动，有明显的三个特点。

首先是，唐代景教与政治的因缘至深，紧紧依附于唐朝的帝王将相，随其政策而转移。

景教在最初传入阶段，阿罗本入京，太宗使宰臣郊迎；入宫召见，在大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佶和之来，入觐至尊，及烈亦以朝贡之名而来中国。其传教乃奉特诏允许。长安义宁坊之波斯寺，即出于敕建。高宗于各州设置景寺，武则天当政时，在洛阳督造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肃宗曾在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朝廷还命在寺壁摹绘帝像。玄宗曾令宁国等五王（即帝之一兄及四弟）亲诣教堂行礼。天宝初年，又令大将军高力士以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帝之写真、送寺高悬。景教僧中一些人直接受到皇封。如阿罗本被封为“镇国大法主”；伊斯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业利被封为

“试太常卿”亦赐紫袈裟。天宝初年，帝赐教堂绢百匹；代宗每於“降诞之辰”或称“耶稣圣诞”、“帝之诞辰”则赐天香，颁御饌。寺额亦以御题为荣。教士还奉旨于兴庆宫中举行仪式，作弥撒。历代的景教僧常以其在天文、医学等方面的技艺为朝廷效力，并进奉奇器异巧以取悦宫廷。不仅在政治上依附所在国之政权，景教之东来，亦仰恃当地的政权支持。阿罗本是随于阗侍子入朝的、及烈乃 732 年 9 月由波斯王派遣与首领潘那密同时进贡来的。<sup>①</sup> 据记载，拂林王遣吐火罗人首领向唐献狮子、羚羊各二，几月后又遣大德僧来朝。这些教士来中国都兼有政治上的使命。

景教教士与唐朝高官名流过从亦密。如房玄龄、高力士之与景教；郭子仪同伊斯相善，伊斯参戎事又任翻译；房玄龄与魏徵曾为阿罗本译奏本。唐太宗敕修终屋大秦寺时，魏徵、尉迟恭曾监修。上述几例亦景教与政治关系之证。

其次，唐代景教对其它宗教平和相处，关系融洽。景教受佛教、道教之影响颇多。

景教教士之汉名，除阿罗本、耶俱摩二人之外，均为两字，不冠汉姓，佛教之色彩甚浓。景教之《尊经》目录，乍见时，多被误以为是《释典》（佛经）。各经中用字多为佛经中常见之词。在《序听迷诗所经》中袭用佛教名词更多，甚至以“佛”称天主。景教的景净曾助译过佛教经典亦属事实。整屋大秦寺有塔，在志中称为镇仙宝塔，七级八稜，其形式与长安的大雁塔颇相似。在敦煌千佛洞中发现之景教人物画像，倘不是因为额上和胸部绘有景教碑式之十字，很可能将其视为地藏王菩萨。景教教士常称为僧，这些都是佛教的影响所致。

景教和摩尼、祆教同称为“三夷寺”。景教碑后所题的“大耀森文日”，即是摩尼教译名。耀森文是曜森勿之异译，乃七曜中之日曜日（即礼拜天）是也。《三威蒙度赞》尊经目录中之《三际

<sup>①</sup>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经》和《宁思经》均为摩尼教经名。《四门经》是印度占星术之书。在景教《志玄安乐经》中的一系列名词，如：“无欲”、“无为”、“无德”、“无闻”、“无证”……等都是道教中惯用之词。在景教的《序听迷诗所经》与一神论中称天主为“天尊”的提法，亦是仿道教之名词。因唐朝中国宗教活动繁多，教士、僧人在各地往来不绝，互有影响。基督教初传中国，受佛教、道教之影响较多，亦合乎情理。阿罗本东来之前六年（629年）正是玄奘“西行取经”之时，这并非巧合而是历史的潮流所致。

最后，唐代景教虽有所传播，但长期具有外国色彩，未能“中国化”，其教义、礼仪等同中国的习俗和传统文化相距甚远，故很难广为流传。

景教的经典多晦涩难懂，而信奉者又以西域及中亚各地人士为主。在旧唐书中称其为“显明外国之教”。它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同，也与佛教认同中国文化、扎根于中国民间，其僧尼已逾数十万有别。因而随着景教传教母国的被征服、唐末中国内乱迭起，以及吐蕃侵据安西北庭河陇、中西交通受阻，特别是唐朝武宗后宗教政策的改变，景教乃受到致命的打击，它在唐末已趋明显衰落。

宋代景教的寺院仍然存在，这可从宋代人宋敏求的《长安志》一文得到旁证。宋敏求写道：“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此段未提更改寺名，亦未言被毁或作他用。所述阿罗斯，即“阿罗本”之误。但宋代景教口衰的状况，可由整屋大秦寺之易主变化得出证明。苏东坡的《五郡》诗及子由和诗写出大秦寺的主权已由景教改易至道教手中。苏东坡诗云：“古观正依林麓断，居民来就水泉甘。……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蚕。汝师岂解言符命，白鬼何知托老聃。”而子由和诗之末云：“独有道人迎客笑，白髯黄袖岂非聃。”上述诗中的“古观”、“羽客”、“符命”、“老聃”、“黄袖”等都明显的是讲观主乃道教人士。

1062年（宋仁宗嘉祐七年）2月，苏东坡游长安南山，与太平宫道士赵宗共食，又作诗，题为《大秦寺》，子由和诗中曰：“大秦遥可说，高处见秦川。”此中“大秦遥可说”即指的是“大秦寺”的故址。

再一百余年后，1199年—1201年间（南宋宁宗庆元五年至宁宗嘉泰元年）金朝杨云翼任陕西东路兵马总管制而驻长安时，他曾亲赴盘屋参谒大秦寺，杨云翼作诗曰：“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说明原来的大秦寺这时已成为废墟。宋朝时，中国的景教实际已湮灭无闻，传教活动以失败告终。

## 二、元代汗八里的“也里可温”

13世纪，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原名铁木真）统一了大漠南北的蒙古族各部，于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国家。在以后的数十年间，蒙古贵族对中亚、东欧和西亚地区曾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侵（1218年—1227年；1236年—1241年；1253年—1258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率军攻占中国中原各地，1260年称大汗，建都开平，1267年把统治中心迁至燕京（蒙古人称“汗八里”，即“汗城”意，后称为元之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中国。

唐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后曾受到过几次挫折。唐武宗（841年—846年在位）推行“崇道废佛”政策时，景教也受到牵连而处于低潮。11世纪后半叶，由于中国辽代统治者的允许，基督教在中国的西北部得以留存和活动。元代时，基督教再度复兴和得到传播，但同唐代的景教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元代入华的基督教分为两大支。一派即流行于中亚、蒙古诸地内被唐代习称的景教，属于基督教聃斯托利派的东方教会；另一派则是罗马天主教会派遣

来华传教的方济各会。<sup>①</sup>

元代统治者对基督教的各派不加区别，统称之为“也里可温”教。据元代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所载，“也里可温，教名也”。对其教士和教徒，亦称“也里可温”。因基督教的两派都尊奉十字架，故又称之为“十字教”，对基督教的教堂称为“十字寺”。蒙古人在进入大都（今北京）以前，对基督教称为“迭屑”。“迭屑”一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敬畏神的人”或“虔诚的人”。自元世祖忽必烈时起，对“迭屑”一词不再沿用。在文献和碑铭中，都改用“也里可温”。

关于蒙古语的“也里可温”一词有各种解释，其原意是福分人或有缘人。多桑<sup>②</sup>认为蒙古人称基督教为 Arcoun，唐景教之阿罗本或即“也里可温”之古音。在清代洪钧著的《元史译文之补》一书内有《元世各教名考》，其中道：“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冈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又写道：“多桑译著旭烈兀传，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刺伯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我国学者陈垣引用清代的《敕定辽金元史语解》认为按蒙古语，应作“伊噜勒昆”，“伊噜勒”，福分也；而“昆”，则人也。“也里可温”原意是有福缘的人，或指信奉福音的人，即专指信基督的教徒。学者张星烺认为，“伊噜勒昆”同“也里可温”二者的读音并不相近，故判断为同一词则不妥。另引用屠寄著的《蒙兀儿史记·乃颜传》也里可温注，分析其似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阿罗诃”的转音。阿罗诃是佛经中阿罗汉的别译，唐朝景教徒供

<sup>①</sup>方济各会，又译法兰西斯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中主要派别之一。1209年由意大利人方济各创立。1210年获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会士广泛参加社会生活，举办慈善事业，扩大影响。起初会士标榜节欲、安贫，不久其上层积累了大量财富。13世纪末、14世纪初派会士到中国北京、泉州等地传教，也助教皇镇压“异端”。

<sup>②</sup>《多桑蒙古史》的作者。

川为叙利亚文“埃洛赫”(ELOH,即希伯来文 Elohim)的译音,其原意乃“上帝”,因而,也里可温是指“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之意。从元代的碑铭和史籍中看,也里可温一词常同和尚、先生、答失蛮并列,而和尚是佛教徒、先生是道士、答失蛮乃伊斯兰教徒,也里可温便是对基督教徒的尊称,本是教士、长老之意。

### (一)元代的景教

蒙古人兴起前后,下述部落是全体或一部分成员信奉景教的。即:

(1) 客烈亦惕部<sup>①</sup>: 驻地在上拉河与鄂尔浑河两河沿岸,乃突厥语系部族之一支。约 11 世纪使皈依了景教。

(2) 乃蛮部: 分布于阿尔泰山附近,在客烈亦惕部以西,亦突厥语系部族,军队庞大而精良。

(3) 汪古惕部: 在大漠以南,阴山以北的黑水附近。属突厥语族。

(4) 蔑尔乞惕族: 在鄂尔浑河、色楞格河下游一带,北临贝加尔湖,属蒙古语族。

此外,13 世纪时畏吾儿人中很大一批人已从摩尼教改宗景教。

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徒,初期的信奉者多为蒙古贵族、诸王公近侍、官吏、御医以及入华的中亚色目人。

乃蛮部因畏吾儿人的文化程度较高,故很早便任用畏吾儿官员,使用畏吾儿文字(特尔赛文)记事,并信奉景教。据叙利亚基督教作者艾布·法朗基斯的记载,客烈亦惕部的酋长早在 1001 年—1012 年间便率部众约 20 万人皈依景教,还邀请巴格达东方教会派教士去该部,此事发生在北宋初年,是辽国统治漠北之时。

<sup>①</sup>按拉施特主编:《史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的译名叙述。

元初著名儒家学者马祖常，属汪古惕部，其先祖和禄采思便是西域景教贵族，在辽道宗咸雍年间（1065年—1074年）迁入内地，定居甘肃临洮。马祖常的曾祖帖穆尔越哥曾任金朝马步军指挥使，故得名为马氏。马氏宗族世代均为景教徒。同马祖常齐名的赵世延也出自汪古惕部，同为辽代迁居内地的景教世家。元定宗贵山登位时，亚美尼亚国王遣专使去往和林祝贺，专使返回后报告道：“当今大汗之祖未生时，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由此可见，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西北草原业已流传。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建立蒙古国家后，同客列亦惕等部联婚，各部王公妻女多被纳为后妃，在贵戚侍臣和将相中，原属景教徒者甚多。如成吉思汗的第九后，即蔑儿乞惕部将之女，第十后原是乃蛮部酋长之妻。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太子的王妃使出自客列亦惕部。成吉思汗的第四子睿宗拖雷的庄圣皇后唆鲁禾帖尼，便是客列亦惕部酋长的侄女、她就是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等人的生母别吉太后。因为别吉太后原是景教徒，所以她死后她的灵柩停在甘州（今甘肃张掖）的十字寺之内。

这一情况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述。据《元史》卷三十八，《顺帝本记》中载：“至元元年（1264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在《甘州志》卷二中写道：“初世祖定甘州，太后与在军中。后没，世祖使于十字寺祀之。至是岁久，祀事不肃，故议定之。”在《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记》中又载：“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此处所称之佛事，实乃基督教的作弥撒。此外，还有太宗窝谿台的皇后、即定宗贵由的生母脱列哥那，是客列亦惕部的乃马真人，原系蔑儿乞惕部首领之妻，成吉思汗灭该部俘之，赐给窝谿台为妾，她也是景教徒。在贵戚当中，如汪古惕部首领阿剌兀思、别吉忽里家族，都是景教徒。在大臣当中，著名的景教徒有：太宗和定宗朝的中书右丞相、客列亦惕部（一说为畏兀儿）人镇海，及宪宗时，掌



管文书和朝内外闻奏诸事的字鲁欢。太宗朝的元帅按竺迩，世祖朝的礼部尚书月合乃等人，都是汪古部的景教徒。按竺迩之孙赵世延，月合乃之曾孙马祖常，在元代时被并称为两大文豪。

元世祖继承了成吉思汗的方针。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的“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政策。忽必烈以大都为京城，灭南宋后，将臣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实行公开的种族压迫。但他们对汉人、南人中流行的佛教、道教等则予以宽人对待。景教历来是在一部分蒙古贵族和色目人当中流传，所以也受到优待，故而元代景教在中原各地得到传播。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过：“……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做他们的偶像中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位尊者给我帮助。”<sup>①</sup>元代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和利用基督教等各种宗教，是因为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宣扬对阶级统治和民族压迫应当逆来顺受，有利于巩固其封建统治。

元朝建立后，景教在中国各地流传很快。1253年，法国方济各会会士卢白鲁克<sup>②</sup>抵达和林后，曾在中国北部游历，共两年，著有《东行记》。他记载道：“契丹(中国北部)有15个城市内住着景教徒，大主教驻地在西京大同。13世纪中叶，景教各教区主教的驻地共约25处。西自亚美尼亚和波斯湾，东至唐兀(西夏)和汗八里(汴城，即今北京)均属景教传教范围。据《东行记》所载，中国境内的主教区共四处：

(1) 秦尼<sup>③</sup>系第11区，主教座堂在大同，包括客列、汪古等

<sup>①</sup>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sup>②</sup> 卢白鲁克，即法国佛兰德斯省卢白鲁克村的吉尧姆(约1215年—1270年)，1253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往蒙古，谒见蒙哥汗，1255年返回。他记述了景教在汗八里等地的概况。

<sup>③</sup> 即中国。秦尼主教区指中国西北部。

部，乃景教盛行地区。

(2) 喀什噶尔，第 19 区（今喀什）。这里景教徒按自己的教规生活，在本教堂做礼拜。景教徒在教堂内使用畏吾儿文字。莎车、钦赤塔拉斯等地也有景教徒。

(3) 汗八里，第 23 区（即大都，北京）。这里是景教都主教马聂斯托的驻地。汗八里的著名景教徒、畏吾儿人巴尔扫马<sup>①</sup>，约 1230 年生于汗八里，其父是 13 世纪初来汗八里任景教教会巡察使的西班牙。<sup>②</sup>巴尔扫马自幼从汗八里都主教马贵哇桂斯受洗，30 岁入修道院隐修。其友（马·雅巴拉哈）是山西霍山东胜的畏吾儿人，马可之父裴尼尔曾任景教大主教。马可在汗八里从都主教马聂斯托利受洗，与巴尔扫马为挚友。约 1278 年，两人结伴离汗八里前往耶路撒冷朝拜圣地。1280 年，景教宗主教马屯哈任命马可为契丹大主教，任命巴尔扫马为巡察总监。1281 年马屯哈去世，马可于 11 月 2 日被推选升任景教宗主教（称马·雅巴拉哈三世），驻巴格达，兼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sup>③</sup>两城的教务。1287 年，巴尔扫马奉伊儿汗国君主之命出使欧洲。他先后拜见东罗马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克二世、法王腓力四世及英王爱德华一世，并到罗马晋见教皇尼古拉四世。罗马教皇邀巴尔扫马按景教的礼仪主领圣餐，他还参加了教皇主持的弥撒。这是在西亚和欧洲共负盛名的两位汗八里的中国景教徒。

(4) 唐古忒<sup>④</sup>，第 24 区，统辖陕甘宁等西夏旧地，驻地在甘州（张掖），该城有雄壮的景教教堂。此外，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凉州（武威）和申州（西宁）都有景教徒。

<sup>①</sup> 在巴尔·赫布若斯和河姆鲁斯的著作及阿鲁浑工和罗马教皇的书信中均有此人之名。

<sup>②</sup> 其妻名夸姆塔，年迈时得子，细心培养。

<sup>③</sup> 均两河流域古城。底格里斯河西岸为塞琉西亚，东岸为泰西封，隔岸相望。泰西封乃帕提亚王国行都和波斯萨廷王朝的首都。在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约 30 公里处。

<sup>④</sup> 唐古忒是元时蒙古人对西夏地区的称呼。

有关元代汗八里等地景教的文物遗迹，经考证分析，摘要述之。

1919年在北京市房山县（汗八里范围之内）发现过一处景教十字寺遗迹，有元顺帝敕赐十字碑记，碑上有古叙利亚文。另在河北涿县琉璃河附近山中，发现两块刻花的十字碑，十字的四角有叙利亚文“信之”、“仰之”两句。经分析考证，这是始建于唐代（960年）的十字寺，后经过代修建过，元代（1365年）又加以重修。在张家口西北的石柱子梁也发现过三块带有景教十字的墓碑。元世祖时期，1289年，起兵反叛忽必烈大帝的宗王乃颜便是受过洗礼的景教徒。他的战旗上加有十字架的记号，10万部众中有不少人是信奉景教的。当忽必烈平叛胜利后，他对嘲笑和羞辱景教徒的人，给予严厉的谴责。忽必烈说道：“基督教的十字架没有证实对乃颜有利，……基督教的十字架不能给这种恶人以庇护。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能冤屈基督教徒的上帝。”<sup>①</sup>

再者，北京（汗八里）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sup>②</sup>有重要价值。

现将抄本中的一部分咏歌歌词摘录于下<sup>③</sup>。

—

将我们的祈祷作为香火。愿光荣属于主。

主是真实的存在，主不会舍弃你们的努力，尔等殉教者啊。君王基督对于你们这些在中国国土上受到敬爱的人们，不会遗忘不顾。你们的遗体被收藏在生命之书中，并发出余光。…

①《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

②此抄本原藏于北京清内阁档案库。宣统元年修缮库房，始由学部设立京师图书馆以移藏库书，其档案移置午门城楼，散乱之余，一部分由北京大学接管。此抄本即于北大整理残存档案时发现。全文8页16面，经考证乃元代也里可温遗书。

③摘自阿·克·穆尔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2页~354页。

## 二

信仰的导师、神圣的殉教者啊。祈求在天地万物之中都有和平安泰吧。祈求在我们之间停止战争，变斗争为和平。让神的教会使其儿女——信徒们高唱光荣之歌吧！

这些殉教者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巡回各国。然而，他们都没有离开主。

## 四

.....

祈求保有光荣 祈求那些蕴藏在神圣的遗体中的精力保有光荣。它的声音响彻五湖四海。他们的遗体安葬在教堂之中，从其遗体涌现出一切功德，并且由于他们强有力的语言，使真理昭示于世。

## 五

主若赐与美好的物品，我们的国家就会生产出产品。我们祈求，我们这些曾经流过殉教者之血的国家将生产出三十倍、六十倍、甚至一百倍的物产。

圣父、圣子和圣灵通过殉教者的祷告保护你的崇拜者。

赞美和崇敬你那永远光荣的三位一体的圣名。

## 七

喂，让我们曲膝跪在圣子面前吧。在黎明，让我们献上感谢吧。让我们崇拜神的独生圣子吧，圣子怜爱我们，亲自取得和我们同样的人性，拯救我们免于死亡，并且使我们和圣子一起升天。成群的天使叩拜全智全能的神的圣子。

## 八

.....

基督啊，你是全人类的首领，你洞悉我们的痛苦。愿你在审判之日赐给我们信心。

我们黎明时用歌唱赞美你，天使的首领加百利高举耶稣用十字架赢得的旗帜，合着角笛和喇叭的声音，在全人类面前进军。

我黎明时赞美你——在日出时，天使颂扬万物崇拜的独一无二真神，我们在地上颂扬你的仁慈，因为你赦免了我们的罪。

元朝由汗八里的礼部掌握国内的各种宗教。礼部之下，宣政院管佛教，集贤院管道教，又特置崇福司以管理也里可温教。当时杨暗普任江南佛教总管，设崇福司就是根据他的奏章而办。据《元史》卷八九，《百官志》所载：“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马尔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置，延祐二年（1315年）改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1320年）复为司。”这段记述的意思是：“马尔”乃叙利亚文 Mar 的译音，意为主教，在唐代称为“大德”；“哈昔”是圣徒或修士；“列班”是叙利亚之 Rabban 之音译，其意是长老、法师。“七十二所掌教司”，即 72 所教堂。元朝主持崇福司官员的品级稍低于管理佛教的宣政院的官员。

关于元代景教徒的人数很难统计。从《至顺镇江志》的户口类看，至顺年间（1330年—1332年）镇江共有侨寓户（外来户，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及北方汉人）共 3845 户，其中也里可温 23 户，在 10550 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温 106 人，在 2948 个寄居者之中有也里可温 109 人。从镇江一区讲，167 户中有 1 户也里可温。在 63 人中有一个也里可温教徒。

元代时，也里可温受到了照顾。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世祖曾诏敕也里可温可依僧例给粮，即教士可食官禄。有些地区



的也里可温还免服军役和免纳赋税。据《元通制条格·僧道词讼门》记载，崇福司官员道：“如今四海之人，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

## （二）元代的天主教

基督教的另外一支，即罗马天主教的正式传入中国，比景教传入的时间晚得多。天主教首次传教抵达中国的时间，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这以罗马教皇派遣的传教使节方济各会的会士约翰·孟高维诺（1247年—1328年）抵达元都汗八里（今北京）为标志。

在此以前东西方间的联系交往情况现作一简述。

由于蒙古西征，根据军事和政治上利害得失的考虑，罗马教皇同蒙古大汗之间的联系早已开始。13世纪初，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势力已进行过四次十字军东侵，目的是企图征服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教国家。罗马教皇和西欧的世俗政权，为了阻止蒙古的西征，乃先后派出使节前往蒙古帝国。

与此同时，在欧洲也流传着有关“长老约翰王”的传说。当时西欧各基督教国家，盼望东方有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能配合十字军东征，进攻伊斯兰教各国，以便收复“圣地”。约1145年，叙利亚加伯拉地方主教奉亚美尼亚国王之命，出使罗马教廷晋见教皇尤金三世，趁机宣传远东有虔信基督教（景教）的“长老约翰王”，曾出征波斯、米底诸国，攻占过爱克巴塔那（今伊朗哈马丹），准备进占耶路撒冷，因在底格里斯河受阻而归。在欧洲盛传东方有个强盛的“约翰长老国”，其实这个国家在12世纪是指西辽，在13世纪时乃指客列部。到14世纪初，意大利人方济各会

会士鄂多立克(1265年—1331年)<sup>①</sup>,又把汪古部称为“约翰长老国”,他称汪古部首领景教徒汪罕为“长老约翰王”。这个传说反映出在东方景教势力之大。

1245年夏,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俗名西尼巴尔多·戴菲埃斯基,1243年—1254年在位)时期教权达于顶峰。他继承英诺森三世的方针,除继续同神圣罗马帝国对抗外,决意遣使前往蒙古。他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贝鲁齐亚人柏朗·嘉宾为使团首领,带着教皇劝告蒙古大汗放弃向欧洲进攻,停止杀掠基督教徒的信件自里昂出发东行。经过长途跋涉,他们于1246年7月22日到达蒙古上都和林。当时适逢窝阔台去世,8月,贵由继位为大汗。不久,他们受到窝阔台长子贵由大汗的召见,呈上罗马教皇的信。教皇在信中指责蒙古入侵基督教国家,“所过杀戮,千里为墟,血流盈壑”,还询问蒙古大汗以后的意向。柏朗·嘉宾逗留四个月后,带了一封贵由敦促教皇归降入贡的回信。贵由汗在信中写道:“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有势者,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贵由对罗马教皇的指责,回答道:“尔等居住于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sup>②</sup>

这次的交涉活动并没能达到教皇的目的。柏朗·嘉宾等人于1246年11月离开蒙古返欧。贵由大汗之母因是景教徒,她热情地在柏朗·嘉宾等人临行前,赐给每人以貂皮缎袍。柏朗·嘉宾返欧向教皇复命之后,他著有《蒙古史》一书,使欧洲人了解了东方的一些景观和民俗。

<sup>①</sup>又译名为和德里,他赴东方旅行,曾在汗八里(北京)居留三年。1330年,返意大利后对旅行情况的记述十分丰富,被称为中世纪欧洲旅行家之一,其名著《东游录》影响颇广。

<sup>②</sup>转引自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1247年，罗马教皇又派多明我会<sup>①</sup>修士、意大利伦巴底人阿西林出使蒙古，谒见蒙古第二次西征的统帅拔都，无结果而回。1249年，法王路易九世在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侵（1248年—1254年）之初，再造多明我会修士、法国人安德烈、朗久木前往蒙古。朗久木一行抵达额敏河（阿拉湖附近）贵由行宫时，正值贵由逝世，皇后海迷失摄政。皇后接见并复信要求西方称臣朝贡。朗久木未能收效而于1251年返回。

路易九世在1253年春又派法国方济各会修士卢白鲁克的纪尧姆东来，先后晋见了拔都和大汗蒙哥等人。据他在其所著的《东行记》中所述，他在大汗蒙哥面前，曾与中国的佛、道诸教论战，且在辩论中得胜，从而得到过大汗和皇后对基督教的好感。皇后常到教堂中做礼拜，纪尧姆也为他们诵经祈祷过。后来，修士纪尧姆并未完成任务，而是带着蒙哥敦促西方的严厉的劝降书而返回。

13世纪时，威尼斯因其在地中海的地位和同东方的频繁贸易而富甲于欧洲。1266年，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马飞奥·波罗兄弟抵达蒙古首都开平<sup>②</sup>，受到大汗忽必烈的亲切接见。大汗殷勤地垂询西方各地的风土民情以及皇帝和君主怎样治国、立法和指挥军事等，他尤其关心教皇的起居和工作状况，以及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忽必烈请求罗马教皇选派100名既精通基督教义，又熟谙“七艺”（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和地理），并且道行高深、能弘扬教义教理的教士东

<sup>①</sup> 多明我会，又译多米尼克会，或称布道兄弟会。系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乃西班牙人多明我（1170年—1221年）于1215年创立，1216年获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且属罗马教廷。该会传播经院哲学，控制大学的神学讲坛，积极参与对亚、非、美洲的传教活动。

<sup>②</sup> 忽必烈即元世祖（1215年—1294年），1260年在开平（今多伦附近，在内蒙古正蓝旗东20公里、闪电河北岸）即大汗位，1263年称开平为“上都”。1271年（至元八年）才定国号为元。当时尚未迁都汴八里，忽必烈接见波罗兄弟之地不在和林。

来。<sup>①</sup>大汗还希望能从耶稣基督圣像的长明灯上，带一点圣油来蒙古，以为纪念。大汗用 鞑靼王的名义，修一封鞑靼文的御书交波罗兄弟携带代呈罗马教皇，还赐给他们顺利通行的金牌。

1269 年，波罗兄弟返抵欧洲后，受到新任教皇格利哥里十世的接见。新教皇委派传教士尼古拉和威廉带有教皇授予的权力证书（有权代表教皇，派主教、委神父和行赦免罪），随波罗兄弟偕马可·波罗经过三年半的艰苦跋涉，于 1275 年复抵达中国，他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很隆重而热情的礼遇。

马可·波罗在元朝留居中国生活 17 年，深得忽必烈的信任。1295 年，马可·波罗返抵威尼斯以后，因《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而驰名于世。此书成为享誉全球的名著之一。

教皇尼古拉四世（1288 年—1292 年在位）任职的第二年—1289 年，便任命方济各会会上、意大利萨勒诺人约翰·孟高维诺持教皇致伊儿汗国王阿鲁浑、致大汗忽必烈的信件前往东方传教。他路过波斯、印度时各逗留了一段时间，于 1293 年在泉州登陆，再北上汗八里（元时的大都）。就传教而言，孟高维诺是天主教在中国正式传教、开辟教区的第一人。

1294 年，孟高维诺泛舟抵大都（汗八里）后，元世祖逝世，由新即位不久的元成宗（1295 年—1307 年）接见了。允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他在大都皇宫附近兴建了一所大教堂，可容纳 200 人。并首先在信奉景教的蒙古贵族中进行劝化，成功地使汪古部的大贵族高唐王 瀚里吉思<sup>②</sup>放弃景教的信仰而率部众改宗天主教。但由于瀚里吉思在 1299 年对海都作战中被俘死去，嗣子术安（是约翰·孟高维诺取名的“约翰”的音译）年幼，瀚里吉思之弟术忽难又率部民奉行景教。瀚里吉思曾资助过孟高维诺，并在其领地内建造了一座教堂，命名为“罗马教堂”。

<sup>①</sup>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 页~7 页。

<sup>②</sup> 又名先治，是成宗的近亲，封地在今晋西北。

孟高维诺在汗八里（大都）等地传教 30 余年的活动概况，可从他寄往欧洲的信札中有个人致的了解。他共有三封寄往欧洲的信传世，其中有两封是在 1305 年和 1306 年发自大都的。他在 1305 年的信中道：

“余于京城汗八里筑教堂一所，六年前（1299 年）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自抵此以来，共计受洗者达六千余人。

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齡，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教堂轮流服务。余蒞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

孟高维诺在 1306 年的第二封信中又写道：

“1305 年，余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宫仅一街之隔。两处相去不过一箭耳。鲁喀龙哥<sup>①</sup>人彼得者，笃信基督圣教，善营商。当余由讨来思<sup>②</sup>起程时，彼即伴余东来。新教堂地基，即彼购置，捐助与余，以礼敬天主……”

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边耳<sup>③</sup>半，盖汗八里城之大，莫与比拟也。余将所收幼童，分成两队。一队在第一教堂，他队则在第二教堂，各自举行祭务。余为两堂住持。每星期轮流至一堂，指导奠祭”。

孟高维诺在大都（汗八里）传教期间曾将圣经《新约》及

<sup>①</sup>鲁喀龙哥，乃意大利地名。

<sup>②</sup>讨来思，是波斯地名，即今伊朗的大不里士。

<sup>③</sup>边耳是古代罗马量距离之单位，英国袭用，今译为英里（哩），但实际距离并不相同。



《旧约·诗篇》译为蒙文。当时，大都的天主教和景教两个教派互相排挤。景教在元朝势力颇大，而罗马天主教将景教视为“异端”。孟高维诺曾经“费尽苦心，欲使聂斯托利派教徒改宗罗马教会，明告彼等，若不改宗，则彼等之灵魂，将不能拯救矣。”（《大可汗国记》）因此，景教对孟高维诺恨之入骨，对他进行各种打击。孟高维诺自述道：

“聂斯托利派徒众，名为崇奉基督，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之教堂，亦不许建设，稍与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东方诸国，自昔圣徒绝迹。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况，各极残酷。其人造作诈语，谓余乃侦探匪徒，而非由教皇派遣。稍后，其人又伪造证据，谓教皇实有大使派来东方，赠礼物甚伙，彼至印度时，余暗杀大使，而窃其物也。阴谋诽谤不止者凡五年。余尝受法庭传审，几受死刑。最后乃得天主怜悯，有某君作证，启发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实冤枉无罪，告者诬妄。大汗将诬告者及其妻妾儿女，悉放逐之。

由于元成宗的信任，孟高维诺在元宫廷中有职位，可定时入宫，并在宫中有专座，地位在各宗教主管长官之上。孟高维诺专门绘制了六幅《圣经》图像，附有拉丁、特尔赛<sup>①</sup>和波斯文的说明，供传教使用。

罗马教皇法国人克莱门特五世（1305年—1314年在位）得知孟高维诺传教活动成绩显著，1307年将孟高维诺封为汗八里总主教兼东方宗总主教，又再派方济各会教士七人为副主教来华相助。

<sup>①</sup>特尔赛是波斯语称基督教徒之译音。特尔赛文便是景教徒所用的叙利亚文，或用叙利亚字母的畏吾儿文。

七人中，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和安德烈三人在 1313 年抵华。<sup>①</sup>自此，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从大都向各地进一步扩展。同年，在当时中国南方最大商埠刺桐（今泉州），创设了主教区，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以后由比列格林和安德烈先后继任。另在杭州、扬州及山东临清等地都设了教堂和修院。据礼德贤著《中国天主教发展史》所记，当时北京和泉州等教区内，教徒几十年间已发展至 30 000 余人。这时是天主教在华传教以来的“黄金鼎盛”时期。

1313 年，泉州有一位亚美尼亚贵妇人，出资在城内新建了一所华丽的教堂，由孟高维诺指定为主教座堂。贵妇人还捐资作为维持费用，她在临终遗嘱中将教堂归给格拉德主教使用。格拉德死后由比列格林继任泉州主教。此时，安德烈在泉州附近小林中修建了一所小教堂。比列格林于 1323 年去世后，安德烈乃移居城内继任大教堂的主教。

1326 年，安德烈在寄往欧洲的信中谈到他在泉州传教的情况，提及他们的经济状况以及传教的经济来源。他写道：

“（在汗八里居留五年期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阿拉伯语）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者、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

孟高维诺任汗八里总主教的最后几年中，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鄂多立克，1321 年由印度东行，历南海诸国后于 1322 年抵广州。再由广州前往泉州，会见主教安德烈，至杭州寄寓方济各会教堂，并同灵隐寺佛僧辩论生死轮回之说。他经扬州，循运河北上。约在 1325 年到达大都。谒见元泰定帝。鄂多立克言道：“据他所见，在大都宫廷内担任要职的萨克森人（指阿拉伯、中亚

<sup>①</sup>另四人中有三名死于印度，一名返回意大利。

人)、鞑靼人和佛教徒，都是改宗基督教的，孟高维诺很受元朝皇帝信任，声望甚高。他见孟高维诺的年事已高，必须请罗马教廷加派修士来华协助传教。鄂多立克 1328 年（在大都住三年）从陆路西行，他经呼罗珊至大不里士，返回威尼斯。1330 年，鄂多立克到阿维农，晋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准备率 50 名修士前往中国，但他因病于 1331 年去世致使计划未果。鄂多立克在他讲述的亲身经历的游记中，关于行在（杭州）及大都城内的青山（万寿山）和湖（北海）以及中国分省置驿站的情况，大体是准确的。

1333 年，孟高维诺逝世五年后，教皇才得知他病逝的消息，乃委派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继任为汗八里总主教职。次年，尼古拉偕 26 人来华，抵达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伊犁河畔水定镇西北），受到察合台汗的欢迎。但这一行人此后途中去向不明，再无记述。

1336 年，元顺帝派遣一个 16 人的使团，由泉州主教安德烈等人带领前往罗马。使团还携带由元帝侍臣阿兰人<sup>①</sup>贵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致教皇的信札。元顺帝在致教皇的信中请他代为祈福，并希得到西方的良马和珍奇之物。而阿兰人贵族的信札则中述自八年前孟高维诺逝世后，再无继任者。这使教徒们“行动无所依，精神无所寄”，因而请求速向中国派来新的总主教。元朝的使团在 1338 年抵阿维农，受到教皇本笃十二世（1334 年—1342 年在位）的接待。教皇接受元朝使团的要求，委派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等四人为专使携复信和礼物同元朝使团一道东行。同行者共 32 人，于 1342 年 8 月 19 日抵达汗

① 法国南部小城。法王腓力四世（1285 年—1314 年）同教皇卜居法八世经激烈斗争后，法国获胜，支持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大主教当选教皇，并将罗马教廷从梵蒂冈迁至阿维农，教皇受法王控制达 70 年之久（1308 年—1378 年），史称之为“阿维农之囚”，此间七位教皇都是法国人。

② 孟高维诺曾报道过在大都的阿兰人约有 30000 人。阿兰即《元史》中以骁勇见称的阿速浑人，他们是蒙古西征时从高加索迁来的。马可波罗曾写道：“诸阿兰皆基督教徒。”孟高维诺曾为他们宣道。

八里。马黎诺里等人进汗八里城时，元朝安排了隆重的迎接仪式。马黎诺里向元顺帝进呈了教皇复函，并奉赠骏马一匹。据马黎诺里记载道：“汗八里都城内，小级僧人（低级教士）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宫。宫内有总主教寓所，颇为壮丽。城内他处，尚有教堂数所，各有警钟。教士衣食费用，皆由大汗供给，至为丰足。”马黎诺里在大都停留期间，“常与犹太人及他派教人，讨论宗教上之正义，皆能辩胜之。又感化彼邦人士，使之崇奉基督教正宗。因之拯救灵魂于地狱苦境者不少也。”使团在汗八里的四年间颇受优厚礼遇。他们于 1346 年启程经泉州循海路西归。当使团离华时，元顺帝嘱咐请罗马教皇再派马黎诺里或红衣主教级别的人来汗八里当总主教。但是，当马黎诺里返抵阿维农时，罗马教廷陷于分裂。1352 年，他虽向刚即位的教皇英诺森六世（1352 年—1362 年在位）复了命，由于元末政权已处于岌岌可危局面，因而基督教在中国和大都的传教活动渐从衰弱而中止。

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在汗八里随着蒙元帝国的兴盛而一度传播和得到发展，在统治者的支持和宗教宽容政策下，基督教依附于蒙元的政治势力，而有相当的影响。但由于教徒大都不是汉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内并未扎下根，故而随着元帝国的覆灭，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 第二章

###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 北京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的元朝在 1368 年被明朝所取代。明朝最初定都南京。经“靖难之役”后，明成祖于 1421 年（永乐十九年）将首都迁到北京。明朝末年，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发展的晚期，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突出，宋明理学不断受到冲击，佛教和道教日渐衰败。元朝以后，中国基督教在中原停止活动 200 多年而销声匿迹。基督教在中国长期失传的原因，除了因为欧洲封建制解体、教权衰落，以及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以后，教会本身分裂加剧的原因之外，在欧亚的“丝绸之路”上，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称雄、战乱不断，以致陆路交通受阻。奥斯曼·土耳其灭亡拜占廷的前、后，东部地中海的航路和商路，实际上也被垄断而不能畅通。加之明朝实行的闭关政策，都是明朝基督教失传的重要原因。

16 世纪时，西欧由于资本主义萌芽，通往美洲、亚洲“新航路”的开辟和基督教新教教会的建立，罗马天主教会更加失势，天主教除了同新教对抗外，乃企图向亚洲和美洲加紧传播与扩展教区。

新航路开辟后，根据罗马教皇的仲裁，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 1494 年 6 月 7 日签订了托尔德西里雅斯条约。两国同意在绿岛



群岛以西 370 里加<sup>①</sup> 处划出分界线，线以东新“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线以西的“版图”属西班牙，此即著名的“教皇子午线”。1529 年，西葡两国又补订萨拉奇哥撒新条约，在摩鹿加群岛以东 17 度处再划一新界线。此线以西属葡萄牙，以东属西班牙。根据这两次协议，西班牙几乎独占了美洲，葡萄牙则将亚洲与非洲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因而，葡萄牙享有对东方的传教权。

明朝末年，随着西欧老牌殖民国家葡萄牙势力的东来，天主教在中国又逐渐得到了重新传教的机会。基督教（景教）在唐代的传入中国是第一次在华的传播；基督教在元代景教和天主教的相继传入，并且以首都北京为主要基地的传播是属于第二次传教。而明末以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天主教会在华的传播，则是第三次。这次天主教中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相继传入，其中势力和影响最大、收效最显著的是耶稣会。

## 一、耶稣会与利玛窦来北京传教

### （一）利玛窦来北京之前

西班牙贵族伊格那提·德·罗耀拉(1491 年—1556 年)是耶稣会的创立者。这个会的活动，实际上从 1534 年已经开始。但耶稣会是 1540 年才被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批准。它始终同罗马教廷保持紧密的联系。为了效忠罗马教皇达到巩固天主教会统治的目的，耶稣会内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他们的格言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耶稣会士不穿僧衣，不必住教堂和修道院，要与俗人多自由交往。耶稣会士的活动不限于欧洲，还深入到美洲、亚洲和非洲。他们传教情况不一。有些会士远涉重洋到外地传播科技、天文历法和文化交流，或开办学校、医院等，同时广泛传播天主教；

<sup>①</sup> 约相当于西经 46 度，按罗马制，里加等于 5.92 公里。

有些人结交上层权贵，经常出入宫廷，甚至担任高级官职；也有一些人跻身贸易公司，或披着宗教外衣而从事殖民掠夺活动，不可一概而论。

第一位到东方传教的是耶稣会的创办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1506年—1552年)，他在1540年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以教皇宗座钦使的名义前往东方传教。沙勿略于1542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抵达印度的果阿，以后在马六甲和日本等地传教。在日本时，他知道了日本奉行的佛教和儒学以及各种文化习俗多半来自中国，因而决定先到中国传教。他认为：把天主教传入中国，“使中国人能从迷信中皈依。做到了这一点，他便更容易争取日本人，并把福音从中国带给他们了。”(利玛窦：《中国札记》)沙勿略曾偕同一名中国水手，在1551年和1552年两次到达广东珠江口外的上川岛，终因中国明朝的海禁太严，他未能进入内地传教，在1552年末病死于该岛上。随后，各教派的教士中有些人也来中国，企图传教。1557年葡萄牙强占澳门后，一些教士准备以澳门作为对中国传教的据点，但是由于中国执行闭关政策，封锁中国大陆，不准传教士进入内地，因而传教士们不能如愿，他们只能望着边界上的石山叹息道：“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吾主啊！”约三十年后，1575年担任耶稣会远东巡视员的范礼安总结了历史经验，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国家，对中国的传教方针必须调整，不能沿用强制推广西方习俗和使用拉丁语的做法，而应当重视儒家学说，学习中国语言、习俗，结合中国固有国情的实际而传教。

继沙勿略之后，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为来华传教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传教活动计划。

著名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1552年—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安科纳省的玛赛拉达城，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2年他曾就学于罗马学院，熟谙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应用数学、几何、地理以及音乐、透视学等。此外，还随枢机主教

贝拉明学习演讲，这为他以后进入中国传播“西学”创造了条件。1577年，经耶稣会会长批准，利玛窦参加了耶稣会派往印度传教的教团，同年出发去葡萄牙，在科英布拉大学专修一年，这所大学是山葡王若望三世和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联合建立，是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一个学术中心。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从里斯本乘船前往东方，于同年9月13日到达葡萄牙当时在东方殖民活动的主要据点——印度果阿。利玛窦在果阿居留四年，完成了他专攻神学的课程并从事传教工作，这期间他被晋升为司铎。

1582年8月7日，利玛窦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之命抵达澳门，在那里着手研习汉语。这时，利玛窦的愿望是：“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sup>①</sup>第二年9月10日，他与耶稣会士罗明坚等一起到达明代广东的首府肇庆。他们向知府王泮自称是来自天竺国的僧人，一向仰慕中国，请求自建教堂，事奉天主，绝不过问澳门事务。他们还献上白鸣钟等礼物，终于在澳门择地建立了在中国领土上的第一所教堂，取得了传教事业的立足点。1588年11月，罗明坚为了联系传教事宜返回意大利<sup>②</sup>，因故再未回中国。于是创建中国耶稣会的工作，就留给了利玛窦。

利玛窦见多识广，不断结交各级官员和文人雅士。为了适应中国的环境，他开始试行他的知识传教法，如开放教堂的图书馆让人参观，1584年刻印自绘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展览各种天文仪器等。利玛窦穿中国僧服，讲华语，将西洋的白鸣钟、三棱镜……等物供人观看，终于使中国许多学者第一次接触到五大洲的地理概念，利玛窦因而也声名远扬。他深得当地士绅

<sup>①</sup>裴化行：《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3册，第1页，转引自陈卫平著：《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sup>②</sup>罗明坚企图说服罗马教廷向中国通使以便谋得合法的传教地位，但不巧，这时（1590年）正逢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逝世后，教皇乌尔班七世、格利哥里十四世和英诺森九世等一年内频繁更迭，未能成功。罗明坚于1607年逝世于罗马。

的尊重，几年间发展了约七八十名教徒。1589年，利玛窦从肇庆迁居韶州<sup>①</sup>，在那里他结交了原礼部尚书之子中国儒生、官员瞿太素。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他接受了瞿太素的建议，鉴于在中国和尚的地位不及儒生，因而脱去僧服改作儒生打扮，蓄发留须，穿丝服。他攻读儒家经典，请师讲授《四书》，并将《四书》译成拉丁文，还加以注解<sup>②</sup>，这便是中国《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利玛窦在序言中称颂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将其与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加以对比。

利玛窦认识到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要想在中国扩大天主教的传教，必须争取得到皇帝的恩准，于是他决心前往北京。1595年，利玛窦身穿儒服，跟随奉召前往朝鲜带兵的侍郎自韶州北上，于1595年5月31日到达南京，希图再北行未果，只得退居江西南昌，在那里居住三年，并结交了众多朋友，其中有建安王朱多煊、乐安王朱多煊、江西巡抚陆万垓、理学名儒章潢、南昌知府王佐及文学家李日华等。到他离开南昌时，他的朋友已遍布当时明朝十五个省中的十省。应江西巡抚的要求，利玛窦撰写《西国记法》一书，讲述西方的记忆方法。利玛窦对建安王格外重视，他向建安王赠送了极丰厚的礼物，其中有卧式时钟、天文仪器、玻璃、书籍等，还有《世界图志》。利玛窦应建安王朱多煊之请著有《交友论》，书中引述了亚里斯多德、西塞罗、塞涅卡、奥古斯丁等人的重要格言百则，影响极大，他的声名大震。他成为皇戚王府的贵宾，受到建安王的最高款待。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卷一中记载了他与利玛窦的交游：“玛窦紫须碧眼，面色桃花，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余丁酉秋（一五九

<sup>①</sup>因新任两个总督刘继文排斥教会，利玛窦等被迫移迁。

<sup>②</sup>利玛窦于1591年开始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完成后寄回意大利，时间是1593年。在费赖之著的《来华耶稣会士列传·利玛窦传》中说：“1593年曾将中国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注释。”强调“这对于本会诸教友，未始没有用处……，书中有精微卓绝的、阐明伦理的章句。”

七) 遇之豫章。”李日华还赠诗利玛窦曰：“云海荡朝日，乘流倍彩霞。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 (二) 利玛窦在北京的活动及其影响

1597年，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指令他要以北京作为永久驻地。又替他筹办了一批贡品。

1598年，利玛窦以协助修订历法、进贡方物为理由，随晋北京复职的礼部尚书王弘海北上，于9月初抵北京。时值日本再次侵朝、壬辰援朝战争正酣，利玛窦无法进谒明神宗，而且明朝对外国人是否间谍怀有戒心，不便在北京长停，利玛窦在北京居两个月便南返，至临清，运河道冰封，利玛窦改由陆路，于次年(1599年)1月抵苏州。他把苏州比做“威尼斯”，甚为赞赏。<sup>①</sup>他在苏州寻访旧友瞿太素。2月6日返抵南京，从此定居于南京。这时外患虽已削弱，但内忧却接踵而至。因宫监出领矿使，恣行暴虐，在全国后果严重。利玛窦对“贪婪之心甚于虎狼”的矿使给予披露，这表明他对误国宦侍的痛恨。

南京是明朝的陪都，经济发达，人才荟萃。利玛窦目睹南京的雄伟壮丽，惊叹之余，曾描述道：南京“正当全国的中枢，是中国的钥匙和心脏，……许多规模宏大的公私华夏，到处可见，寺院浮屠也不少，桥梁多得不可胜计，田地肥沃，气候温和，人物高尚，举止文雅……，在东方各国中也应站在前列。”<sup>②</sup>利玛窦在南京期间同许多王公、显官和社会名流交友，进步思想家李贽极

<sup>①</sup> 原文见：葛拉盖：《利玛窦日记》，纽约蓝顿出版社1953年英文版，第317页。转引自李中、何高济：《利玛窦与中国》，载于《世界历史》1985年第3期，第27页。利氏称在苏州市场上“几乎没有购买不到的东西”，苏州的水是“清洁和明澈的。”

<sup>②</sup> 葛拉盖：《利玛窦日记》纽约蓝顿出版社1953年英文版，转引自李中、何高济：《利玛窦与中国》，载于《世界历史》1985年第3期第27页。



其赞崇利玛窦,说他“是一极标致人也”;“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聩聩者,皆让之矣。”<sup>①</sup>李贽还赠扇给利玛窦,上题《赠利西泰》,诗道:“逍遥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利标百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sup>②</sup>利玛窦在南京广泛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他收了三名学生。在这三名学生的具体帮助下,利玛窦在南京制造了许多天文仪器,其中有日晷、浑天仪、地球仪等,他还参观了鸡鸣山上的观象台,对其中四大天文仪器作详细的记载。<sup>③</sup>

随着利玛窦筹备齐各种贡物,以及赴北京条件的成熟,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5月,利玛窦由耶稣会会友庞迪我等人陪同,从南京启程再次赴北京。沿途“诸当道款待以礼”。7月,他们到达临清。因为贡品等问题与驻临清的督税矿使太监马堂发生争执,利玛窦被马堂囚禁殆半年之久。<sup>④</sup>1601年1月8日(明万历二十八年12月5日)明神宗的诏书下,“上令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sup>⑤</sup>这时运河的河道冰封,天津官府乃派8匹马,13名马夫护送他们。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8人抵达北京。三天后,他上奏疏并进贡方物。据奏疏所述,贡物有七物8件。但据《熙朝崇正集》的记载,有十九物31件。<sup>⑥</sup>此外,因为万历皇帝神宗特别欣赏自鸣钟,为了便于修理,特允利玛窦留居首都北京。从此,利玛窦便在北京传教,一直到1610年他去世为止,十年间再

①李贽:《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中华书局1975年。

②李贽:《续焚书》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

③《利玛窦日记》第329页—331页。参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60页~464页。

④《利玛窦年谱》。

⑤《神宗实录》,卷三五四,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甲戌。

⑥计有:时画天主圣像1幅,古画天主圣母像1幅;时画天主圣母像1幅;天主教经1部;圣人遗物、各色玻璃;镶嵌十字架1座;万国图1册;自鸣钟大小两架;映五彩玻璃石二方;大西洋琴1张;玻璃镜及玻璃瓶大小共8器;犀角1个;沙刻漏工具;乾隆经1个;大西洋各色锁袂共4匹;大西洋布及葛共5匹;大西洋行仗大银钱4个等。

未离开北京。利玛窦在进贡品时，又自陈道：“夙闻贵国政治昌明，私心倾慕，所以不辞跋涉，远道而来，欲承皇上隆恩，准赐终身寄居贵国，以便奉事天主”。神宗听后大为欢心，同时利氏为了让明神宗对西欧国王的仪容、服饰以及皇宫的建筑等能有个具体的形象了解，还敬献了三幅画：一幅是罗马的圣·马克教堂画；一幅是威尼斯广场画；还有一幅是西班牙皇宫画（此画被宫监扣留，没有送上）。神宗对欧洲的风土民俗特感兴趣。神宗通过内侍向利玛窦广泛问询了欧洲的建筑风格、服装式样、婚姻、葬礼等习俗，甚至连土地的肥瘠以及神父们的生活细节亦注意了解。神宗见到贡物大悦，对利玛窦“令礼部宾之”。而礼部官员最初对利玛窦“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赏给”；深为不满。他们以大明会典中的有关规定为由，提出了“给与利玛窦冠带回还，勿令潜往两京”。<sup>①</sup>礼部尚书朱国祚为此事连上四疏，均被神宗所否认。这事同当时的“国本”之争也有些关系。在“国本”争斗中，拥郑贵妃生子朱常洵（福王）为太子的一派，得到神宗支持；而拥王恭妃生子朱常洛为太子的一派，受到神宗的排斥，朱国祚和东林党人即属这一派。朱国祚上疏反对利玛窦定居北京之际，正是他们拥立朱常洛最火之时。利玛窦进贡同建储册封恰好同时交织到一起。由于明神宗的态度坚决，最后，朱国祚对待利玛窦也不得不改变初衷，不仅同意利氏留居北京，而且还提出应厚给廪饩。他在上第五疏中写道，让利玛窦自行在北京城内挑选他认为最适合的地方，租房以居。每五天发一次供应，有米、肉、盐、酒、蔬菜和烧柴，由四名差役送往，另配一名佣人由他使用。此疏立即得到神宗的批复：“钦赐大西洋利玛窦等安居顺天府，禁绝一切遣回南方和大西洋之言。”<sup>②</sup>“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

<sup>①</sup> 《神宗实录》卷三五六，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

<sup>②</sup> 《利玛窦日记》，第 387 页—389 页。

无不延颈愿望见焉。”<sup>①</sup>北京的许多达官贵人、入仕的知识阶层，对利玛窦的学识谈吐颇多赞美，利氏交友甚广。据记载，利氏每天接待来访的客人不下二十批，每逢节日访者更多，达百人以上。利玛窦认为：这是一条极其有效的途径，无需我们离开教会房子，就能够向那些异教徒传播福音。

利玛窦在北京的十年间，根据自己来华多年的经验，他在传教中竭力适应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习俗，将基督教思想与汉文化结合起来，这是他传教思想的基本特点。他本人熟知儒家经典，他在传教的著述中，大量引用中国的古籍典故，糅合孔孟之道和敬天祭祖思想。从许多方面论证天主教教义同儒学的一致。例如，他在向神宗皇帝说教中谈到：上帝就是你们所谓的天，他曾经启示过你们的孔丘、孟轲和许多古昔的君主。我们的来到，不是否定你们的圣经贤传，只是作出一些补充而已。1603年，利玛窦最著名的宗教著作《天学实义》（一名《天主实义》）在北京刻印成书。书中援引中国的古籍经典来阐述天主教教义，称中国古籍中的“天”或“上帝”，就是西方崇奉的“天主”，他所传播的便是自古便有的“天教”或“天学”。此书后来被多次翻刻，影响很大。他强调中国的祭祖祀孔并不具有宗教性质，因而与天主教礼仪并无抵触。这样一来，许多士大夫、学者乃对天主教的传教表示友好，有些人还相继受洗入教。如任光禄寺少卿的进士李之藻（1569年—1630年）任监察御史的进士杨廷筠（1557年—1627年）以及明代著名科学家大学士尚书徐光启（1562年—1633年）等人。徐、李、杨三个著名人物被人们称为明末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三大柱石”。此外，明末还有许多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人物，如王微、瞿式耜、孙元化、韩霖等。在这些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天主教在明末曾有较大的发展。据统计，明末士大夫中的教徒计有：一品官员 14 人，进士 10 人，举人 7 人，秀才 300 人，皇室成员约 140

<sup>①</sup>《徐光启集》上册，第 87 页，上海民辑校，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人，内侍 40 名。<sup>①</sup>迄 1610 年利玛窦逝世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共有 2500 多名了。

1610 年，是利玛窦平生最为繁忙、紧张的一年。他说：“这一年来访人之多确实使我应接不暇。……从各地进京朝觐的官员达五千多人，又恰逢会试时间，……每科只取三百名，但进京应试的考生却有五千之多。这两件大事，大大增加了我的工作量。”<sup>②</sup>他还说道：“全国各地给我寄来了许多信件，有的我熟悉，有许多不熟悉，他们向我询问基督的各种教律，……我一一给予回信。”<sup>③</sup>传播西学、介绍和输入西方的科技文化，是利玛窦传教的主要方法之一。当时因为社会动荡，许多人反对空谈，提倡“实学”，故利玛窦深受欢迎，繁忙工作使利玛窦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得了周期性偏头痛，京城名医诊治无效，终于在 1610 年 5 月 11 日病逝北京，享年仅 58 岁。利玛窦在晚年更加努力地于传教事业，他亲自督理北京天主教大教堂（南堂）的建筑，1605 年南堂建成，又于 1609 年在北京创立了天主堂，逝世前完成了他的夙愿。利玛窦病故后，经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的上奏申请，“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瘞。”<sup>④</sup>在利氏好友、大学士叶向高的帮助下，明神宗下令“以陪臣礼葬于阜城门外，二里沟嘉兴观之右”。神宗赐给利玛窦于滕公柩（今二里沟）一块墓地<sup>⑤</sup>，利玛窦墓成为明末和清代许多士人参观、瞻仰之地，清人姚燮曾作《阜城门外利玛窦坟》诗云：“一天开别致，八万里流民。学乃儒之墨，臣为帝也宾。窆幽元象秘，木槁悍狮驯，寄语邱良厚，朝华已不春（邱良厚传其教者。玛窦紫髯碧眼，面

① 引自阿兰：《在京廷的耶稣会士》，英文版，第 115 页，转摘自《历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第 30 页～31 页。

②③ 《利玛窦日记》，第 561 页、560 页。

④ 艾儒略著《大西两泰利先生行迹》上智编译馆，民国 36 年版。

⑤ 王应麟：《钦教大西洋国土葬地居会碑文》，见《大西两泰利先生行迹》。

如朝华)。<sup>①</sup> 利玛窦墓被捣毁过几次，均已修复。现今的螭首方座碑是后来补立的。现墓高 1.50 米、长 2.40 米、宽 1.30 米，墓前立有“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耶稣会上利公之墓”碑(高 2.70 米、宽 0.94 米、碑座高 0.60 米、宽 1.20 米)。

利玛窦是第一位进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地位的耶稣会传教士，他的主要意图是传教，想使中国皈依罗马天主教会，但在传教中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对沟通东西方文化作出重要贡献。利玛窦来华后遵循着一条特殊的相当明智的知识传教路线。他努力学习汉语，研读儒家经典；介绍西方科学，引进西洋奇器，翻译宗教和科学书籍、著书立说。利玛窦所介绍和输入的西方科技与文化，主要如下：

### 1. 天文学

明末利玛窦传入中国最重要的是天文学知识，计有“九重天说”，“四元行说”，“地圆学说”，“日体大于地、地体大于月说”，同时还有各种天文仪器。利氏的地圆说，吸收了新航路开辟和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成果。由利玛窦传来的天文学以及他用“地圆说”所绘制的地图，使当时中国学者耳目一新。自利玛窦来华，便开始了中国天文学接受西方天文学的新阶段。<sup>②</sup> 此后，中国一些士大夫将视线投向西方，主张采用西洋历法，西洋历法后来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历算方法，成为中国历法计算的基础。

### 2. 地理学

利玛窦是西方新地理知识传入中国的始祖。<sup>③</sup> 这些新知识集中体现在他绘制的各种世界地图中。内容有：实地测量的经纬度；地名的译定；欧洲地理学界的新发现；世界地图的认识；五大洲

<sup>①</sup>姚燮：《复庄诗问》卷十，大梅山馆藏版，道光 26 年，转引自：《历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第 81 页。

<sup>②</sup>参见陈遵妣芬：《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第 5 页、第 15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sup>③</sup>陈观胜：《论利玛窦之万国全图》，载《禹贡》第一卷，第 7 期。



观念；地球五带的分法；地圆说的论述等。这些地图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再梓行。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囊括苞举六合”，“上应极星，下穷地纪，仰观俯察，几乎至矣。”<sup>①</sup> 由于利氏地图的影响，清初我国的地图学有了很快的发展，康熙年间绘制的《皇輿全图》，就是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 3. 数学

利玛窦传入的数学知识是西洋科学的中心。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前六卷)和《同文算指》。《几何原本》(前六卷)是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平面几何学的系统著作，利玛窦、徐光启把《几何原本》译成中文，使几何学第一次传到了我国，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一部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它对我国几何学的发展以至整个数学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同文算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书中讲述了自然数、小数的算术四则运算和用笔算解比例、开方、级数、方程等问题，并系统介绍了西洋的笔算，如加、减、乘等，补充了中国珠算等之不足。其中“所述比例、级数，皆前此中上所未有闻”。<sup>②</sup> 利玛窦在北京又著《测量法义》，将几何学原理应用到测量学上，广泛运用于建筑业和水利工程上。他的另一部几何著作《圆容较义》，引中《几何原本》之义，专论圆之内外接定理。他还有《乾坤体义》和《勾股义》两部几何学的著作，是论述“以边线，面积，平面，椭圆互相容较的关系和几何学上的勾股定理的书。

天启年间罗雅谷写的《测量全义》和崇祯年间邓玉函撰写的《大测》、《割圆八线》则介绍了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

在这种西方数学的影响下，明末的中国学者把中西数学融会贯通，使数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直延展到清代中

<sup>①</sup>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禹贡学会影印本，1933年。

<sup>②</sup>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叶。

#### 4. 艺术和语言

西洋油画及其绘画原理，是随利玛窦的贡物三幅西洋圣像画而传入中国的。从前中国画只画阳，不画阴，无凹凸相，而西洋画“黑白尽阴阳之理，虚实显凹凸之形。西洋画重视的①“自远而近，由大及小”的透视学原理，亦从这时为中国人所应用。利玛窦进贡的方物中有一件是西琴（铜弦琴），抚之音各异，利氏作过《西琴八曲》，深得中国一些士大夫的高度评价。利玛窦首创用拉丁字母（罗马字）注汉字语言。他著的《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是中国第一部用拉丁文字母注汉字语言的专著。他把向来被人们看成繁难的“反切”变简，为中国的音韵学开辟了一条新路。

#### 5. 中学西渐的关键人

利玛窦在华期间，撰写和翻译的汉文著作共 19 种，其中入《明史·艺文志》有 6 种，在《四库》中收录或存目的有 13 种。②他是欧洲汉学的鼻祖之一。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的一位奇人，一位卓有建树的中西文化沟通者。他的宗教的和科学文化的思想及其活动，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首先，赞扬儒教，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利氏的传教，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强调儒家与基督教思想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而且主张儒教是学派，儒教没有偶像崇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教崇拜的最高神明是皇帝的象征。儒教的祭天、祀孔、拜祖并不构成对基督的亵渎，无碍基督教信仰。③明末一些士大夫对利氏的观点颇能接受。他们认为利玛窦的著述“其言多

①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1955 年重印本。

②张星娘：《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转引自《历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第 35 页。

③《利玛窦日记》，第 95 页—98 页。

与孔孟相合，又明辩氏之不正”，故抄本风行。大学士叶何高赞利玛窦“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甚至东林党人邹元标也说利氏是“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

其次，利玛窦采取了联合儒家反对佛教，援引先儒反对今儒，对佛教和宋明理学进行了抨击。他公开攻击佛教崇拜偶像，“专以辟佛为事，见诸经像及诸鬼神像，辄劝人毁裂”（《蒿庵闲话》）。他吸收的是先儒孔孟之道，对后儒宋明理学则取批评态度。利玛窦所著的《大学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二十五言》等，都是诠释儒家经典，用以反对佛教、排斥空谈明心见性的后儒。说它是“别立门户”，“虽自曰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乱，上者凌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满世皆诈谄诞，而无复真心。”<sup>①</sup>

再次，反对空谈，主张“实学”，提倡议、学、传、用西法的经世致用之风。徐光启认为秦西诸子“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评论利氏言道言理，“皆返本黜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湖广金事冯应京也说利氏“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谈空之误。”<sup>②</sup>“乐夫人之谭实也”<sup>③</sup>。

最后，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是以皇帝的支持为依托，通过广交皇族、官员、名士和儒生为联系手段，以翻译、著述书籍，传播西方科技文化的方法而广泛展开的。利氏在华近 30 年，他的

① 《畸人十篇》，第二篇。

②③ 冯应京：《六主实义》序，《大学初函》本。

著作、译著特丰。<sup>①</sup>他为以后传教士在北京的活动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利氏以后的诸多传教士如龙华民、庞迪我、熊三拔、汤若望……，每个人都有著名的著作问世，传播西方科技与传教结合进行。

## 二、明末天主教会在北京和徐光启等

1610年，利玛窦逝世后，意大利西西里人龙华民（1559年或1565年—1654年）继主中国天主教教务。龙华民字精华，1582年入耶稣会，1592年来中国，先在韶州传教，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入北京。1636年以前，他主要在北京传教。此后，经常在山东济南、泰安、青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龙华民曾着力审定中国教民所用之经文，汇编为《圣教日课》，初刻本于1602年问世，后有1638年（崇祯十一年）本。他的《地震解》一书于1626年（天启六年）刊行，用的是问答体裁，内分为：震有何故？震发有几等？震因何地？震之声响，震几许大？震发有时。震几许久？震之预兆？震之诸征等九节。龙华民初译的一些经文多出自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之手，此后陆续增加。迄1755年，有《总牍汇要》问世。他所著的《灵魂道体说》，在20世纪初（1918年）马相伯先生曾为之作序由上海付印发行。

与龙华民同时在华的著名传教士还有：庞迪我、熊三拔、阳

<sup>①</sup>利玛窦的著译中，影响重大的计有：1.《山海舆地图》，校阅增补后，以《坤舆万国全图》之名多次刊印；2.利氏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3.利氏口授，徐光启笔述《测量法义》；4.利氏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5.《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著作，乃李之藻整理；6.《辩证遗疑》反对宋明理学；7.《交友论》（利氏手笔，献给建安王）；8.《乾坤体义》李之藻录，天体数学；9.《勾股义》几何学著作，徐光启笔录；10.《二十五言》，反对空谈明心见性；11.《天学实义》（又名天主教义）；12.《同容较义》，天体数学著作，李之藻笔录；13.《西字奇迹》利玛窦著，以拉丁文字母为汉字注音，乃语言学著作；14.《西琴曲意》，利玛窦著，宗教赞美诗乐曲及歌词意译，等等。

玛诺、王牛肃（后改名为高一志）、邓玉函、汤若望等人。

西班牙人庞迪我（或作迪峨、迪襄，号顺阳，1571年—1618年），1599年来华。利玛窦向明神宗进献方物时，他同往觐见。庞迪我华语流畅，思维清晰，深谙历法，是利玛窦的得力助手。利氏逝后，他同熊三拔同请明帝敕赐墓葬之地。庞迪我曾写作《七克大全》，其中推论人性“下份”的私欲七罪，即：为傲、为妬、为贪、为忿、为饕、为淫、为怠，又论述了人性的“上份”的七德，即：以谦伏傲、以仁平妬、以施解贪、以忍息忿、以淡塞饕、以贞防淫，以勤策怠，书中庞氏痛言七罪之丑恶，复感陈七德之美好，用七德克七罪，故称《七克》。此书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北京初刻七卷本，在1629年（崇祯二年）收入李之藻所编的《天学所函》。庞迪我还著有《庞子遗论》，四卷本及《受难始末》一卷，为早年教徒中流行之本，庞氏还传授了西欧炼制药汁的方法给徐光启，在徐光启1604年（万历四十一年）的“家书”中有过记述。

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字有纲（1575年—1620年），1606年来华，居北京，他参加修历甚早（1611年）。曾写作比较在欢洲、印度和中国推算日蚀之结果，还测定北京之纬度及广州至北京的纬度。熊氏现存的汉文著作共三种：（一）《简平仪说》（1611年刻本）一卷，李之藻收入《天学初函》、《四库全书》收入到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二）《泰西水法》六卷（1612年成书），亦收入《天学初函》及《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在卷四专论“药露”中，记述了泰西炼制药水方法；（三）《表度说》，一卷，1614年成书，收入情况与《泰西水法》概同。熊氏45岁时，卒于澳门。

葡萄牙籍神父阳玛诺，字演西（1574年—1659年），1610年来华。曾译《遵主圣范》（又名《师主篇》）原书最早抄本出现于15世纪，在教会中极受重视，仅次于圣经。中文译本约有20种。阳玛诺在华长达50年之久。南京教难时，他一度被逐去澳门。1621年（明熹宗天启元年）住北京。1623年，任中国区耶稣会副区长，



后相继驻于南京、松江、上海、杭州等地，曾赴宁波开辟教务。阳玛诺的著作有：《轻世全书》、《圣经直解》，北京刻本十四卷（1636年）《天主圣教十诫直译》二卷，《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论》一卷，1644年刻于杭州。《天问略》一卷，1615年刻于北京。他85岁逝世，遗墓在杭州。

龙华民主持中国教务期间，持严厉政策。他对于利玛窦认为无关紧要的，如祀天、祭祖、拜孔等仪式，均视为迷信，禁止教徒参加。龙氏所为，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不合，行之稍久，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之反感，反教风潮乃起，终在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爆发了南京教案。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5月、8月、12月。南京礼部侍郎乌程人沈灌，向明神宗三次上疏，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之禁为由，力排天主教。综其所言，大抵认为西士散处中国各地，时有窥伺之举，当禁者一；西士劝人只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名教，当禁者二；西士私习历法，有乖律例私习天文之禁，恐创为邪说，淆乱听闻，当禁者三；西士劝人信夷教，擦圣油，洒圣水，聚男女于一室，败风俗，乱纲纪，当禁者四。（均见《南宮署牒。三参远夷疏》）沈灌上疏之后，南都许多大臣，如晏文辉、余懋孳、徐如珂……等都起而附和。士大夫们也纷纷著书撰文斥责天主教“伤王化”、“妄先师”、“妖言惑人”。如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的《诛夷论略》、钟始声的《天学初征》和《天学再征》、许大受的《圣朝佐辞》、邹维璉的《辟邪管见录》、李生光著《儒教辨正》等，于是非教、反教之声甚高，在南京出现了教难风潮。

同年（1616年）7月，徐光启在北京上《辩学疏》，竭力为天主教和传教士辩护，疏见《正教奉褒》一书，其中一段道：

“……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指西方传教士言）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其

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历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向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亦见《徐文定公集》卷五）

此外，李之藻在高邮、杨廷筠在杭州，都致书南京官员请求“保教”。因当时沈灌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方从哲过从甚密，7月21日乃令巡城御史孙光裕逮捕了南京的外籍传教士。如王丰肃、谢务禄被用囚笼囚三十日押解出境，同时还捕华人教徒24人。8月14日又逮捕钟明礼、张宗等8人。沈灌的两次逮捕，均未奉朝廷明令，乃两具疏重新奏请，促使皇帝在同年（万历四十四年）12月28日颁下了禁教之令，迫令外国传教士回国。次年，西方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被捕押解去澳门。其余教士多隐形遁迹避祸。庞迪我和熊三拔于1618年和1620年相继卒于澳门。1621年，山东白莲教起义，沈灌已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勾结魏忠贤等人，第二次掀起“南京教难”，指斥天主教即为白莲教，在南京等地再度逮捕教徒。传教士们多到杭州杨廷筠和上海徐光启家中避难。1623年，沈灌被首辅叶向高排挤，两次“南京教难”才告一段落。西士王丰肃于1624年改名为高一志，潜入山西绛州、蒲州再“传福音”，后人称他为山西开教之祖，西士谢务禄改名曾德昭则到陕西等地传教。

龙华民在北京主持天主教教务期间，为了扩大耶稣会的影响，乃派遣西方传教士金尼阁（1577年—1629年）于1613年回欧洲向罗马教皇汇报中国教务。金尼阁除了在罗马将利玛窦著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一书加以整理，译为拉丁文付梓出版外，请求

罗马教廷批准中国自成一个传教省区<sup>①</sup>，还要求增派传教士。因当时西方教士在华不到 20 人，会所仅北京、南京、肇庆、韶州、南昌 5 处，同日本乃合属一个省区，经申请之后，只改划为副省区。此后虽准用汉语在华举行弥撒和念经，但并未立即实行。金尼阁在欧洲各处游说，为中国天主教会募捐并组织传教士赴华。金氏在意、法、德、比等国共募得书籍约 7000 余册。1618 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尼阁偕 22 位传教士来华，并带来大批书籍。1620 年 7 月 20 日抵澳门时，仅有 5 位传教士到达，其中包括著名的优秀天文学家 and 数学家：邓玉函、罗雅各和汤若望。这三人都都是“灵采研究院”的院士。邓玉函（1576 年—1630 年），1611 年进耶稣会，来华前已名满日耳曼，精通医学、数学、哲学及多国语言，是伽里略的挚友，他主要在广州、杭州等地从事传教和译著书的工作。他的《远西奇器图说》专门介绍了简单机械的构造和物理学中的比重、重心、杠杆、滑车等原理。罗雅各（1590 年或 1593 年—1638 年）号味韶，意大利人，1616 年入耶稣会，1622 年抵澳门，在山西传教多年。1630 年奉召至北京与汤若望等继邓玉函修订历法，编成《崇禎历书》，还曾与龙华民、邓玉函合译《人身图说》，此乃介绍人体生理构造之书。著译尚有：《哀矜行论》、《测量全义》等。死于北京。汤若望长年在北京，明末清初，他在传教和文化交流上作用甚大，后面再专题详述。

明末，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发展较快，而非教风潮也连绵不断。有“西来孔子”之称的意大利的传教士艾儒略（1582 年—1649 年），字思及。他 1600 年入耶稣会，1610 年抵澳门，1613 年起在江苏、陕西、山西和浙江等地传教。1625 年（明熹宗天启五年）艾儒略入闽传教，引起一系列非教论著问世。计有：施邦曜著《示禁传教》、黄问道著《辟邪解》、陈候光著《辨学刍言》、李

<sup>①</sup>金尼阁又加两章，记述利氏逝世及殡葬情况，书名为《基督教运传中国记》，可称为第一部“汉学”著作，1615 年 2 月出版。

维垣著《上蒋德璟公揭》、黄贞著《请颜茂猷辟天主教书》、《不忍不言》等。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儒学盛行的中国屡屡受阻，明末不断出现教难，但传教事业仍能立足坚持，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曰，历法失修，推验多误，朝议修改，需要借助西方传教士精于天文历算的力量。

历代王朝均将颁布历法列为国家大事之一。皇帝每年向黎民告谕全年的星象节气、吉凶口等。只有朝廷的钦天监有权测定天象历法，而民间严禁私下传习。明朝依据的本是大统、回回两种天文推算方法。迄明末，这两种方法已陈旧失修，对日月蚀常推测不准。明末，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的大力推荐下，崇祯二年（1629年）在北京宣武门内首善书院旧址设历局，由徐光启统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和汤若望等先后参与工作，以西法参同修改历法。迄崇祯末年，十多年来中外学者一道翻译辑录了同天文、历法、数学等有关的书籍共 136 卷，名为《崇祯历书》。从这时起，西方传教士们以精通天文历法而闻名中国，为他们的留居和传教带来了便利。

二曰，满族崛起，边防危急，明朝依赖西方教士协造火炮和西式火器。

清太祖努尔哈赤自 1618 年占抚顺后，连年进击明边境。明皇在徐光启的建议下，派人去澳门购火炮。1621 年 3 月，因清军连克沈阳、辽阳，形势严峻，明熹宗乃召西方传教士进京协造火炮。后来汤若望口述，由焦勗整理出的《火攻摺要》一书，便是铸造西式火器的重要著作。西方传教士由是得到留用。

三曰，一些西方教士笃信天主、博学多才，坚韧不拔的传教精神和中国天主教士及上层人士对他们的庇护和大力支持。

西方的一些教士万里迢迢来华后，宁肯吃苦受罪，习俗迥异，而矢志赴各地传教。他们当中多数人口说汉语，人人有中国姓名，身穿儒服，传播科技、历法新说，展示奇器、谈经论史，博得了一部分中国上层人士的赞许。在非教高潮时，挺身而出上奏并保

护教上。其中以徐光启等人最为突出。

明末在中国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代表人物计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他们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三大柱石”。徐、李、杨之序是按信教受洗的先后排列，若按年龄则是杨、徐、李。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1596年从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处开始得知天主教教理和西洋科学。1600年认识利玛窦，1603年1月由罗儒望神父领洗入教，圣名保罗。徐光启42岁时在北京考中进士(1604年)后在翰林院任职。1608年，邀郭居静神父到上海传教。徐光启跟随利玛窦等热心于学习、翻译和传播西方科学著作。从1604年起，他先后翻译了《几何原本》，编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古算器释》，他想以数学为基础，以解决水利、屯田和改良兵器。他还写了一本《甘薯疏》。徐光启为了改进水利灌溉的方法和工具在1612年，还与熊三拔合作译出了《泰西水法》(六卷)，次年，他在天津开辟水田，试验在北方栽种水稻和水利灌溉，还试种药草、花草、甘薯等。

徐光启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很强，从1618年—1621年，他担任练兵和保卫京师任务时，曾著有《徐氏炮言》与《选练条格》两本书。

在徐光启的著述中最杰出的享誉中外的是他的宏著《农政全书》，1621年—1628年写成初稿，后经他的学生陈子龙、谢廷楨等加以补充、修订。全书60卷，12大目，约50多万字。徐光启逝世后于1639年公开刊行。《农政全书》记述了历代有关农业生产、农业政策的经史典故和诸家论议，论述了王祯、贾思勰等古代农学家和他本人对古代田制的论述，收集了自古以来各种耕作方法及农业季节、气候知识，还用图谱介绍了各种农具、水利灌溉机械，甚至考察了对野生植物的利用。这部书引用古代著作和文献300多种，集中了古代农书的精华，学术思想上反对保守，是一部综合性的农业科学著作，对后世影响特大。徐光启修正历法



贡献突出，迄 1633 年他逝世前，在他领导下，完成了《崇祯历书》。

徐光启对传播天主教的教务尤为热心，除 1616 年“南京教难”时上《辨学章疏》外，他对教士的关心散见于他的各封“家书”中。徐光启在崇祯朝时期（1632 年）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修历时初邀邓玉函、龙华民两教士相助，后又邀罗雅各、汤若望等工作。1633 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

李之藻（1569 年—1630 年），字我存，又字振之，浙江杭州人。号凉菴居士，又称为“存园寄叟”。他 1594 年为举人，1598 年中进士，1599 年抵北京。李之藻所学颇广，对天文、地理、军事、水利、数理化、音乐、哲学、宗教均有研究。约在 1601 年认识了利玛窦，从利氏学西方科学，研讨天主教问题。利玛窦的《天学实义》（《天主实义》（1603 年），其中便有同李之藻论道的内容。李之藻在 1610 年 2 月在北京患病，因利玛窦的劝说，乃受洗入天主教。翌年（1611 年）奔父丧回乡途中，在南京邀西士郭居静、金尼阁二神父和钟鸣仁修士到杭州开教。1613 年，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上《请译西泽历法等书疏》，实际是申请明廷全面输入西学，疏中道：“其书非特历术，又有水法之书，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形体血脉之故，有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但系有益世用者，渐次广译，其于鼓吹休明，观文成化，不无裨补。”<sup>①</sup> 1615 年，李迁高邮制使。1616 年南京教难时，李与杨廷筠等全力保教。1621 年，因辽沈失陷明廷急于守战需制炮术，经徐光启推荐，任监督军需光禄寺少卿兼管工部都水清吏司事，效力军防，又

<sup>①</sup>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19 页。

在澳门召募葡兵，自造枪炮，会勘京师敌台。1629年，明廷开设历局，李与徐光启同为监督，和龙华民、汤若望等教士译书修历。李对1623年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作过最早的考证。

李之藻的著译甚丰。他重刻《利玛窦万国全图》并作跋（1602年）编出《浑盖通宪图说》（1605年—1607年）在利玛窦口授基础上编成《圆容较义》（1608年）译出《同文算指前编》（1613年），李在序末写道：“至于缘数寻理，载在几何、本本元元，具存实义诸书。如第谓艺数云尔，则非利公九万里来苦心也。”李深知利玛窦等西士的苦心在于传教，他与傅汎际（葡籍教士）合译过《寰宇图》（1623年），四年后又译出《名理探》，此乃西方逻辑学最早的译本。李之藻1630年到京历局上任不久，于十一月病逝。卒前一年，李编刻了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名为《天学初函》，共52卷。李对中国初期天主教会的贡献甚大。

杨廷筠（1557年—1627年），字仲坚，号淇园。又号井寒子、郑圃居士、泌园居士。杭州仁和人。1579年成举人，1592年中进士，知江西安福县事。1598年擢监察御史，又任顺天府少京兆、江苏学政等官职。杨与徐光启、李之藻交友，结识西士金尼阁、郭居静等。杨廷筠本信佛，1611年6月，在金、郭迁入杨府后，受李之藻劝，乃改信天主教，领洗圣名弥额尔（从葡文音译）、号弥格了（从拉丁文音），积极传教。1614年，曾为庞迪我的《七克大全》作序，称伏傲、熄忿、解贪、防淫、远妬、清饮食，迷醒懈惰等七端“与吾儒闾然为已之旨，脉脉同符”。<sup>①</sup>1616年，南京教难期间，杨撰鸱鸢不并鸣说，剖辨天主教与白莲、无为教不同，凡举十四点。又著《圣水纪言》一书，亦为辨道之内容。多名教士隐居于杭州杨宅，避当局之逐。1617年献家宅作为圣堂。1621年著有护教的《代疑篇》，流传于浙闽等地。1622年，又献杭州大方

<sup>①</sup>摘自：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0页。

井祖莹为教士墓地，许多西士，如罗儒望、金尼阁、郭居静、阳玛诺、卫匡国等均先后葬该地。杨廷筠在逝世前，曾捐资办学校一所，筑华丽教堂、修道院及西士住宅各一处。所著之书，教理方面的尚有《西释辨明》、《西学十诫注解》等。

明末还有一些著名人物在北京相继成为天主教信徒。如王微，45岁时(1616年)在北京认识了传教士庞迪我后受了洗。孙元化在其师徐光启的影响下，于1621年受洗于北京，圣名依纳爵，后在家乡嘉定召西士开教。富绅段袞在北京奉教，圣名斯德望。归乡山西绛州后，热心开展教务活动。在上述这些信徒们的大力支持下，天主教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末皇室官员信奉天主教的人很多。《正教奉褒》一书中说，崇祯末年，宗室信奉天主教的有114人，内宫奉教者有40人。到1636年，已经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中有40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有80人信奉天主教。到1648年(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桂王朱由榔的嫡母王太后奉教，教名赫助纳；生母马太后的教名亚纳；皇太子慈烺的教名为公斯当定，付洗的传教士是耶稣会上罗安德。此外，宫中还有50人领先。太后曾遣使到澳门献祭，并遣使致书罗马教皇。明末，中国的天主教徒人数也增长甚快，参见下表：

年 代	受洗人数	年 代	受洗人数
1583年 (明万历十一年)	1	1605	1 000
1584年	2	1608	2 000
1585	20	1610	2500 以上
1586	40	(利玛窦逝世)	
1589	80	1615	约 5 000
1596	100	1617	13 000
1603	500	1636	38 000

以上都是耶稣会系统领洗的教徒数字。据统计，1624年(明

熹宗天启四年)耶稣会在华之重要教会已有六处。自 1620 年—1629 年间,耶稣会教士来华布道者计 19 人。

除耶稣会之外,天主教的方济各会(即“法兰西斯派”)、多明我会(又译“多米尼克派”)等亦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1590 年,罗马教皇西克斯图五世曾派遣方济各会教士四人前往中国。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父于 1619 年、1626 年先后在中国台湾北部的基隆(旧名鸡笼)、淡水、宜兰、三貂角等地展开传教活动。1630 年,多明我会教士数人谋自台湾入福建传教,渡海途中遇劫,只有教士古奎一人至福建登陆。古奎在闽数年,得教徒数人,且与耶稣会士艾儒略互有往还。至 1633 年,罗马教皇允许其它修会与耶稣会同享在中国布教之权,自此耶稣会士在华独享之传教权乃不存在。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但应予以指出的是,明清交替之际,在南明宫廷中活跃的教士毕方济等人,以及在清廷中备受重用的汤若望等仍是耶稣会中人。

### 三、汤若望与清初北京的天主教

德国北部最大的城市科隆城,在古朴雄伟的阿波斯特教堂的右侧,400 多年前在一座贵族邸宅里,诞生过一位曾蜚声中国和德国的著名人物,他的全名是约翰·亚当·沙尔·封·贝尔,这就是博学多才、传播西学的教士汤若望。他是继利玛窦之后,清初在华、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中最负盛名者。

#### (一)明末汤若望来华后的活动

汤若望(1592 年—1666 年)号道味。来华后,以亚当的汉译音为姓,以约翰的汉译音为名,故中国名字称为汤若望。他中学毕业后被选送入德意志学院,这是一所“忠于教会的贵族子弟”学校。1608 年,在仆人护送下到罗马城就读,他修完三年哲学课后,在 1611 年加入耶稣会,又专修神学和数学四年。在华传教士金尼

阁于 1614 年底返回向罗马教廷述职时，“亚当·沙尔”正在罗马。金尼阁对中国情况的精彩介绍和对沙尔的去华邀请，使沙尔对地大物博的礼义之邦——中国，怀有极大的兴趣和好感。1616 年，沙尔向耶稣会总会长白愿中请前往中国传教。

1618 年，亚当·沙尔随金尼阁自里斯本启航，一路历经颶风、浪、海盗、瘟疫等艰辛和危难，1620 年 7 月抵澳门时，许多同行的教士都丧失了生命，仅沙尔与邓玉函等少数教士安全到达。汤若望辗转广东、江西、杭州后，于 1623 年抵北京学习汉语，后又被派往西安传教。汤若望在传教的同时，潜心钻研天文、历法，观测星象，研究日月蚀以及兵器制造。当时，明朝礼部尚书、大学者徐光启的建议被崇祯皇帝采纳，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正历法，举荐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参与其事，不久邓玉函病危，经徐光启的推荐，传教士罗雅各和汤若望先后从开封、西安调进北京，供职修历局。

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历算的研究本已取得辉煌成就。元代郭守敬（1231 年—1316 年）所编的《授时历》比现代所用的公历约早 300 年，当时本属于世界第一流的历法。它与公历所计算的周期相仿。但此后长期以来，我国在修历、制历上并无进展，明初所用的《大统历》较《授时历》相差无几，已相对落后。汤若望在历局中以其认真、勤勉的工作，得到明朝及同行的信任。当罗雅各神甫去世后，历局中的天算与技术工作，全部由汤若望负总责。汤若望在翻译大量欧洲天文典籍的基础上，他和以徐光启为首的中国学者一道概演算术、修历制历，终于在 1634 年完成了《崇祯历书》（后称为《新法历书》）。

除天文观测和推算之外，汤若望还制造多种天文仪器，如日晷、小型天体仪。特别是他仿造了望远镜<sup>①</sup>，向明朝朝廷进呈，深

<sup>①</sup>过去有人认为是利玛窦制造，与史实不符。因伽利略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的时间是 1609 年，身在中国的利玛窦在 1610 年已逝世。



受皇帝赏识。他还将望远镜的构造、使用方法及原理，在刻印的《远镜说》（1630年）一书中有过深入浅出的说明。此书前有汤若望白序，附图多幅。

汤若望利用给太监讲解天文历法的机会，在宫廷中积极进行传教活动，由他领洗入教的便有御马太监庞天寿，圣名为亚基斐。

明末，因边疆地区战火频起，朝廷急于制造火炮御敌，崇祯皇帝派人查访到汤若望懂造炮知识后，便降旨要汤若望督造战炮，汤若望再三推辞未成，乃带领一批人遵旨设厂造炮，1636年—1638年，共铸成“无问大将军”炮20门，经检验试用，确属优质，崇祯皇帝下令再铸500门。据载，在汤若望的督造下，前后造出大小炮共520门，轻的仅100斤，重炮达1200斤。<sup>①</sup>汤若望因造炮立功，1642年崇祯皇帝赐他金匾两块以资表扬。汤若望著有一本很有应用价值的书——《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此书由汤氏口授，经焦勛记录整理成书。书分三卷，介绍了火炮等火器的图样、制造和应用。上卷主要是铸造各种火攻器具的比例图解；中卷述说各种火药的性能配方，下卷着重介绍攻城、水战时利用火攻的方式。

由于汤若望的尽心竭力，他“累年著成新历书一百四十余本，日晷星晷星球星屏窥箱诸器，多历家所未发。”<sup>②</sup>因修历等成绩显著，受到崇祯皇帝的褒奖，获御题匾额“钦褒天学”四字。礼部也赠他金匾，上书“功堪义利”。汤若望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乃制匾分送各地的天主教堂悬挂。

明末，在徐光启及其继任者李天经的主持与合作下，汤若望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和著述。由汤若望主译的《矿冶全书》（亦称

<sup>①</sup> 说法不一，有的书上讲共造炮40门。本文数字转引自：李兰琴：《汤若望简论》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第90页，原出处为：德国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藏：《1581年—1669年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史》累根斯堡1672年印，第62页。

<sup>②</sup> 《正教奉褒》，上海慈母堂，光绪三十年甲辰孟秋，第三次排印稿。转引自：李兰琴《汤若望简论》，《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88页。

《坤輿格致》)共 12 卷本,是欧洲当时采矿、冶金技术的综合性巨著,李天经主张译出该书,正是希望中国明朝“开采矿业,大裕国储”,据载,这部书约在 1640 年译完,对当时中国的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崇祯帝曾御批将汤氏主译的初稿“留览”。汤若望与人合著的《主制群征》一书,论及自然界及动植物。书中涉及人体内腔、血液功能等,科学性强,属于“西医东渐”性的书。在汤氏的天文历法类译著的 30 多部书中,以《古今交食表》、《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最为著名。在传播天主教和西学方面,汤若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二)清世祖优宠下,汤若望等在北京传教活动的逐步扩大

崇祯朝期间,汤若望制历造炮,忠于明廷,劳绩卓著。1644 年(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义兵陷西安至山西,朝令辅臣李建泰督师进剿,令汤若望随行,修火攻利器。未几,义兵进京畿,李建泰入保定,败走。3 月,李自成义军入北京,崇祯殒死。4 月,清兵陷北京,辅臣李建泰降清,召为内院大学士,汤若望亦随侍至京附清。

清兵入北京之初,驻居城内,房少不敷安置,乃令城内居民,限三日内移居外城。汤若望为保全历书和教堂的经典礼器,上疏陈请,略谓构堂居京,朝夕虔修,已有年所。且前朝故帝,令于其他修改历法,著有历书多种,付工镌版,堆积累累,搬运非易。堂中又别贮供像礼器,传教经典,及修历所用书籍,测量天象所用仪器,件数甚夥,易致损毁,请仍准在原处居住,不必他迁。清摄政王多尔袞特许保护其地,不准士兵滋扰。自是汤若望安居于京。

1644 年 6 月,汤若望进呈予推 8 月朔日食分秒时刻及起复方位。深得摄政王嘉许。7 月,又进呈所制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及輿地屏图等物。并上书言授民时历编造之宜,且进呈新编历书一册。8 月朔(初一),日食,汤氏携窥远镜诸器与监官同赴

观象台测验，所测俱同前所呈者吻合，而汤氏所制仪器也精密可用。于是清廷愈信西法可用。此后，汤若望受到清朝信任，与传教士龙华民一起，奉命“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订历法，以便颁行天下。11月，清廷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印信，一切占候事宜，悉归其掌握，历局并入钦天监。1645年11月，汤若望以修补新历全书告成，进呈御览，汤氏原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顺治帝亲批定名为《时宪历》，汤若望被敕封为钦天监监正，他是出任此职的第一名外国人。1646年6月，又加汤若望太常寺少卿等衔。特准他可以随时呈递有关各种重要自然现象的奏折。汤若望还亲自为顺治帝讲解过关于日月蚀和星辰变化等现象。1651年（顺治八年）1月，清世祖顺治亲政以后，他与汤若望之间过从甚密，超过一般右臣。据记载，由于汤“为人敦厚而受到中华帝国显要人物的尊重”“顺治皇帝对他格外宠信”。<sup>①</sup>而汤氏对清世祖顺治也是“事君尽职”“像敬爱一切伟大人物一样敬爱皇帝”。<sup>②</sup>顺治帝对汤若望宠幸有加，常召入宫咨询，称他为“玛法”（满语，意为：“长者、老人”）。8月，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封其祖父与父为通奉大夫，祖母与母为二品夫人。“敕谕命缙轴，邮寄西国，给若望家属祇领。”<sup>③</sup>以后又不断擢升和褒奖他。1653年，赐号“通玄教师”，加俸一倍，并在敕谕中对他作了很高评价：“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实不及尔……”。<sup>④</sup>顺治对汤若望很是信任，有一次谴责清廷官员时说道：“只有汤若望的行动才是出于纯真的目的。每次我阅读他的奏折，就被感动得要掉下眼泪。”顺治帝从汤若望所呈的300多封奏折和禀帖中，选择了一批，“收藏在书房的

① 《天主教在中华帝国传教史》，维也纳1845年版，第61页。

② 《汤若望信札与回忆录》天津，1942年版，第200页。

③ “诰封敕谕”，现存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国家图书馆。

④ 《清史稿》卷272，列传59。

单独一栏中,准备在出宫狩猎时随身携带,经常阅读。”<sup>①</sup> 据载,顺治帝除在皇宫中召见汤氏外,“竟有二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作较长晤谈……”。<sup>②</sup> 汤若望对顺治的优宠也感激万分,表示要“听夕输诚,仰图报答”。

汤若望身为耶稣会北京会长,虽然他很多时间曾用在传播西方科技,对“西学东渐”贡献突出,他本人涉及天主教教理的著述不算太多,计有《主教缘起》、《主制群征》和《真福训注》、《进呈书像》、《崇一堂日记随笔》、《哀矜行途》、《灵魂道体说》及《圣母堂记》等八种,以《主制群征》和《主教缘起》为他的名著。<sup>③</sup> 但他对天主教信仰虔诚,为了传教,万里跋涉来华 40 余年,那时由于欧洲爆发了以德国国土为主要战场的三十年战争(1618 年—1648 年),汤若望同家乡的联系经常断绝。据说汤氏布道时常感叹涕泣唏嘘,表现出他对宗教的笃信投入,也流露出他对故土的思念。传说,汤若望为了“解救苦难的教友”,有时甚至乔装炭贩,面涂黑色,背驮炭篓,入狱探视和宽慰他认为受到冤屈的教徒,且为临刑者作神事。在汤若望本人看来,传教使命是最为重要的。他在 1645 年接受清廷钦天监监正职务时便提出过一个附带条件,那就是要求此职长期由教士担任。随着汤若望政治地位的上升,北京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也逐步得到发展。据统计,1650 年(清顺治七年),耶稣会教徒在华人数约达 15 万人。<sup>④</sup>

1650 年,顺治赏赐汤若望在北京宣武门内原天主堂旁空地一块,重建新教堂。清皇太后为修建教堂也赏赐银两。1652 年,新教堂落成时,顺治帝亲题“钦崇天道”的匾额。1654 年,顺治又赐给汤若望地亩田产,地点在北京阜城门外利玛窦墓旁,汤若望在其地建造圣母堂一座。1657 年,顺治亲笔题写“通玄佳境”四

① 魏特:《汤若望传》科隆 1933 年版,第 192 页。

② 魏特:《汤若望传》中译本第 2 册,商务印书馆,1949 年版,第 277 页。

③ 李兰琴著《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34 页。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 1957 年版,第 974 页。

字作为宣武门教堂堂额，并命在天主教堂前立一座碑，御制碑记中称赞汤若望“敬慎黜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朕甚嘉之”。<sup>①</sup>此后，汤若望先后获准邀请传教士约 20 人分批到全国各地公开传教。汤若望对清廷殚心尽职的同时，本来企图使大清天子也皈依天主教，但未能奏效。顺治表示：“除尧舜周孔之道”以外，对其它的茫然。“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乌能知其说哉。”<sup>②</sup>

新历法推行之后，汤若望等教士受到清朝宠信，维护“明人统历”、“回回历”及“东局历法”<sup>③</sup>者，渐增怨意，对汤氏起而攻击。在 1657 年的 4 月和 7 月，革职的回回科官员吴明烜两次上书，诬揭汤若望推算舛谬。朝遣大臣测验，证明吴明烜所言多不符实，部议吴氏诈妄而下狱。同年 10 月，朝授汤若望为通政使司通政使，晋一品。次年（1658 年）1 月，复诰授汤若望为光禄大夫，并恩赏其先世三代一品封典。对汤若望，清世祖顺治帝有过总的评价，他说道：“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书，迄今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閎诸人，不既优乎……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sup>④</sup>

汤若望堪称为传教士中的第二个利玛窦，他在北京的传教，继承了利玛窦的“入境随俗”、“自我儒化”的方法，而且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汤若望本来已掌握多种外语，他对当时教士必备的葡语十分娴熟，能用法语记日记、写信，他的拉丁文水平甚高，不仅能译书，还能写散文诗，还掌握荷兰语、意大利文及西

①《正教奉褒》，第 32 张。

②魏特：《汤若望传》科隆 1933 年版，第 316 页。

③明末清人布衣魏文奎著《历元》、《历测》二书，攻击徐光启和传教士根据西洋历法修订新历。1634 年（崇祯七年）魏文奎入京创设历局，为有别于徐光启等所组建的“西局”，他们自称“东局”，清初仍沿用。

④《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65



班牙语。他通晓满语，可用满语同幼年的清世祖彻夜交谈。特别是汤若望的汉文水平尤为突出。他的大批奏折和著作都是用精炼的汉语、甚至是准确的古汉语写成的。汤氏能用熟练的汉语讲话和交际，增加了传教的功效。当时有的文人曾写过小诗赞赏泰西诸教士，诗道：“著书多格言，结交皆贤士，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sup>①</sup>

汤若望同利玛窦一样，与徐光启是信念志趣相同的挚友。因为徐比汤氏年长 30 岁，两人可称之为“忘年交”。徐对汤氏十分爱护、提携，也很信任、尊重。天文、历法的计算和制表等工作，多是他们共同的成果。在汉语文字、中国文化与习俗方面，徐光启是汤氏诲人不倦的先生。汤若望的《交食考》完成后，徐令以上好的纸张刻印，又将一部书亲送礼部，因而汤氏的著作才受到重视，把汤若望推荐给明朝皇帝的也是徐光启。徐病重期间，汤多次前往探望，对徐临终后钦天监及徐个人诸事的安排，多听取汤氏的意见。<sup>②</sup>

清代画家兼诗人吴渔山（墨井道人）曾是汤若望的道友。曾在钦天监任职的许之渐同汤氏共过患难。康熙初，杨光先图谋陷害汤若望时，杨曾怂恿许揭发攻击汤若望，但许之渐置之不理，最后虽被冤案株连仍不悔，直到汤氏冤情昭雪后，许才官复原职。足证与汤友情之深。汤若望利用在清廷的地位及友人众多，他在教会内部也深得多数耶稣会上和教徒的拥戴，被称为“中国传教会的柱石之一”，他在华四十余年间，天主教堂和教徒人数大增。由汤若望陆续领洗 40 人，皇宫内为汤氏特设的一所圣堂内，先后受洗者约达 540 人之多。<sup>③</sup>

① 《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专辑）》第 126 页。

② 《1581 年—1669 年耶稣会上在华传教史说》第 17 页～18 页。

③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 (三)杨光先与钦天监教案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天主教过程中，虽然为了适应中国习俗而在传教内容和方式上有一些改变，但中国人排斥天主教的事件屡见不鲜。1616年，明末沈灌发动过“南京教难”。清初最大的一次教案是1664年由杨光先发动的。

清初这次教案，表面上是围绕历法之争，实际是攻击天主教传教活动和政治陷害的一场争夺钦天监控制权的斗争。早在吴明炬疏劾汤若望时，徽州新安卫杨光先便起而响应。他以知历法为标榜，于1659年写出《辟邪论》、《距西集》、《摘谬十论》等文攻击西洋历法。1660年12月，杨又上书礼部，言汤若望所造的《时宪书》，在封面上刻印的“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是暗窃正朔<sup>①</sup>之权以予西洋。疏上未准。1661年1月，清顺治帝病逝，康熙帝以冲龄继位，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握实权。鳌拜等守旧势力，一向反对西方教士，杨光先乃加紧活动。

康熙初年，教徒李祖白著《天学传概》一书，侍御许之渐为之作开言，书传播甚广。杨光先深为痛恨。在1664年3月，杨致书许之渐痛述其为李祖白书作序之非。7月，又具《请诛邪教疏》呈礼部，公开诬告汤若望为“谋为不轨”造反的“主谋者”。在奏疏中说：

“西洋人汤若望，本如德业国谋反正法贼首耶稣遗孽，明季不奉彼国朝贡，私渡来京。邦臣徐光启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之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历官李祖白，造《天学传概》妖书，谓东西万国，皆是邪教之子孙，来中华者如伏羲氏，《五经》、《四书》，尽是邪教之法语微言，岂非明背本国，明从他国乎？如此妖书，罪在不赦。主谋者汤若望，……。又布邪党于济南、……并京师三十堂。香山嶼

<sup>①</sup>正朔乃指农历正月初一。通指由帝王颁布新历法和帝王修订、颁布历法之权。

（即澳门）盈万人，据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视朝廷机密。若非内外勾连，谋为不轨，何故布党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种种逆谋，非一朝夕，若不速行翦除，实为养虎贻患。”<sup>①</sup>

从杨光先的上疏中可以看出，清初顺治朝时的天主教传播情况比明末崇祯时已有所发展。杨光先的卫道防夷说，打动了清廷。8月，礼部提审汤若望。72岁（1644年）的汤若望因患痰厥，肢体痿痹近于瘫痪而不能答话。10月，被控“首犯”汤若望与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四名传教士被捕入狱不久，议处汤若望革职监候绞，押入刑部大牢内。杨光先趁机又著《西法十谬》、《逸择议》两书，一再指责西方传教士，修历不辨吉凶，故清世祖幼子荣亲王出生刚三个月便夭亡，钦天监对殡葬时刻挑选不当，汤若望误用《洪范》五行，以致连累其母和顺治而死。1665年3月，礼、刑两部以弑逆罪判处汤若望凌迟处死。而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等七人皆同罪凌迟。处汤若望义子潘尽孝和李祖白子李实、宋可成子宋哲等俱斩立决。在钦天监中任职的30多人或处斩、或革职、或被流徙。信教或与教会有联系者，如御史许之渐、臬台许纘曾、抚台佟国器均被免职。以上的处理定案，都是在辅政大臣鳌拜主持下作出的。当时恰逢北京城连续地震五天，因请顺治生母太皇太后定处，在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干预下，念及汤若望年老病重，又效力前帝，得以免死，许多教士开释。汤若望被限居于北京八面槽的东堂内。汤氏因心情异常抑郁，于1666年7月5日病故于北京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在钦天监教案（又称“历狱”）期间，各省拘捕教士，押解至北京31人，其中耶稣会25人，多明我会4人，方济各会2人，后来其中25人被解送广州，圈禁于耶稣会教堂内，不准传教。

钦天监教案中，西洋新法被废，复用了大统、回回历法。杨

<sup>①</sup>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34页~135页。

光先补为钦天监副，旋升为监正。而监副一职，则由吴明炬充任。其实，杨、吴不学无术，并不懂历法，洋相百出。现举一例，窃据钦天监监正之职的杨光先，在 1667 年（丁未年）曾宣布次年“戊申岁当闰十二月”，而且次年的历书业已颁布，再一测算，不对了。只好下一道诏令称次年“停止闰月”，真是滑天下大稽的丑闻。杨光先的主张是：“西法即使准矣，而大清卧榻之内，岂惯谋夺人国之西洋人鼾睡地哉？”他宣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sup>①</sup> 杨吴主持钦天监后，因旧法乖疏，他们的测算，多与天行不合。1668 年 11 月，康熙决定亲理此案。他命杨光先、吴明炬等与西士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等各据所学，同测正午日影，又赴观象台当众实测星象并质辩。南怀仁等测算分毫无误，杨光先等误差不断。而杨光先却强辩说：“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且中国以百刻推算，若用西洋历，必至国祚短促，不利子孙。”但是康熙以实测为准，以诬妄罪先后革除杨光先和吴明炬的官职，废人统、回历，复用《时宪历》。起用南怀仁为钦天监副，掌监事。1669 年，清朝康熙除掉鳌拜集团使杨光先等人失掉赖以支撑的后台之后<sup>②</sup>，南怀仁等上疏申冤，经朝廷议处杨光先死刑，妻子流徙，后因年老免死，遣归故里徽州（今安徽歙县），途经山东德州病死。汤若望得复原有职衔和“通微教师”（顺治亲政后，1653 年曾赐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以为褒奖。因康熙帝名为玄烨，避讳将“玄”改为“微”）并补行葬礼。李祖白等俱照原官恩恤，其流徙之家属返回北京。其余被革之人，如许之渐、许纘曾等则官复原职。而解送广州的传教士，1670 年 12 月尽行开释。通晓历法的西

<sup>①</sup>杨光先：《不得已》卷下，南京国学图书馆新印本。

<sup>②</sup>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0 页。

士恩理格、闵明我取送来北京治历，其余送归原来各省的本堂居住。康熙还亲书“奉旨归堂”四字分谕各个教士。这时原来押送去广州的 25 名教士中，6 人已去世，被释的仅 19 人而已。

汤若望等人的冤案平反昭雪时，1669 年末，康熙帝曾亲为汤若望撰写祭文，文中说，对这位在华“鞠躬尽瘁的臣子”应“特加恩恤”，“遣官致祭”，这篇祭文后来镌刻到墓碑上，至今隐隐可见。当时在北京，允许南怀仁等数人可照常传教，在北京的南、东两个教堂可以恢复宗教生活，但在地方各省中的政策是，为了防止教民建立教堂，发展教徒，颁布告示，限定只准在洋人中传教，严禁向中国人发展教徒。这时清廷对天主教的政策自相矛盾，既允西方传教士各个“奉旨归堂”，又禁止他们传教，是很难做到的。

## 四、南怀仁及 17 世纪末北京天主教的重振

### （一）南怀仁与康熙

利玛窦、汤若望与南怀仁被称为北京西方传教士的三大柱石。

南怀仁(1623 年—1688 年)号敦伯，比利时人。1641 年入比利时耶稣会学院学习、入耶稣会。后在鲁汶学习两年，又在科尔特莱和布鲁塞尔从政 5 年。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通晓数学、历法、水利、机械工程和制造火炮。在 1658 年，他与柏应理、殷铎泽、陆安德等耶稣会上自里斯本出发经澳门，于 1659 年(清顺治十六年)抵中国内地。曾被派往西安当传教士。1660 年奉召至北京，任汤若望的助理，参与纂修历法。后因钦天监教案与汤若望一道下狱。被释放后幽居北京。1668 年被起用。1669 年，康熙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掌钦天监监务。他在为汤若望冤案的辩护中起了重大作用。南怀仁因才学出众，颇受康熙重用。康熙曾命他负责勘测北京万泉河引水工程，用西洋滑车牵引大石料过卢沟桥，并奉旨监造各种天文仪器。1674 年，南怀仁负责制成一套大规模的观象台天文仪器共六件，即：天球仪、赤道经纬仪、黄



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象限仪、纪限仪，还撰著出《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四卷，附有绘画解说。同年，南怀仁升任钦天监监正，加封太常寺少卿衔。1678年，南怀仁著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他又被加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

自1673年11月起，吴三桂等反清的“三藩之乱”爆发。反清战争发展迅速，因南方山高水多，对擅长在平原马上作战的旗兵十分不便，康熙乃降旨命南怀仁督造新式轻便火器。南怀仁先后督造出神武炮大、小炮320门，有的小炮可放置在马背上携带。康熙曾亲临卢沟桥炮场验查试炮，颇为赞许，1682年加封南怀仁以二品工部右侍郎衔。

在审理钦天监教案过程中，康熙亲自接触到西方的科学，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下令钦天监的官员必须学用西方历法才能升用，他还亲召南怀仁、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1645年—1708年）等人入宫进讲天文、地理、数学、音律、医学、拉丁文等多科知识。康熙本人甚至演算习题，深夜用功，康熙去关东等地巡幸时，也常命南怀仁等教士为扈从。由于南怀仁受康熙帝重用，使耶稣会的传教事业有了保障。1870年，获开释被扣押在广州的传教士上谕后准允他们各归本堂，并谕其中通晓历法者，来京帮助修历。于是格里玛、恩理格、徐日昇等三人一同来京修历。康熙帝经常和南怀仁、徐日昇、闵明我等人讲求西学。1682年，秉承康熙的旨意，南怀仁向欧洲致函，邀请有科学知识的传教士来华。南氏的声望也有助于天主教在各地的重振。一段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常常借助于本人是工部右侍郎的“亲属”或借口“有事”、“上书”等名义进入中国。自南怀仁于1676年出任中国耶稣会传教会副会长以后，平均每年约有30名传教士来华，耶稣会教徒的人数增长迅速。据记载，1650年（顺治七年）时，中国的教徒约15万人，1664年（康熙三年）教徒为164400人，当时因钦天监教案的影响，传教活动大受阻。迄1667年（康熙六年）中国耶稣会属下的教徒已增达256880人，教士驻在处共41处，教堂增为159

处。而 1670 年（康熙九年）在中国天主教各教派所属下的教徒共达 273 780 人之多。

南怀仁 1688 年病逝于北京。他的著作还有：《赤道南北星图》、《仪象图》、《康熙永年历法》、《坤輿全图》、《理推各国说》、《教要序论》等书。在南怀仁病重期间，康熙不断派遣太医前往诊治，派人问询关照。南怀仁逝世后，康熙钦赐葬地、葬银，又派国舅亲往墓地致祭，葬礼隆重。康熙赐谥号“勤敏”。在所有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享有中国皇帝追封谥号的人。

## （二）法国耶稣会上张诚、白晋等人来北京

最早前来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是金尼阁。他的重要贡献是：1. 1614 年底返抵罗马后，申请准以汉文举行弥撒圣祭、诵经等在 1615 年 3 月得到教皇保罗五世的批准；2. 将利玛窦撰写的意文《中国传教史》译为拉丁文，并补入两章，在 1615 年 2 月 15 日出版；3. 遍历意、法、德、比等国募集图书约七千余册陆续运至中国，金尼阁返华时还偕来汤若望等著名传教士兼学者。金尼阁 1628 年逝于杭州。金尼阁著有：《西儒耳目资》、《况义一卷》（即《伊索寓言》）等。金氏因长期在江西、河南、西安、杭州等地传教，而在北京地区的影响不大。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 年—1715 年），人称“太阳王”，实行君主专制统治。1685 年，他废除《南特敕令》，在国内迫害新教徒；在国外，为了扩大法国天主教在东方的势力以抗葡萄牙，于 1687 年乃首次派遣出耶稣会士中第一流的科学家张诚、白晋等 5 人来华传教。这 5 人没有走葡人控制下的澳门，而是在宁波登陆。重病中的南怀仁，向康熙帝推荐了他们，康熙对他们也给予重视。

法国耶稣会士来华的 5 人是：

张诚（1654 年—1707 年）号实斋。生于法国凡尔登。1670 年入耶稣会，精通科学和懂多种外语。

白晋（1656 年—1730 年）号明远。生于法国芒市。1678 年入

耶稣会，是法国科学院院士。

另三人是李明、洪若翰和刘应。他们都深谙天文、历算、地理和医学，携带不少天文仪器抵达北京。这些人与法国新成立的科学院有联系，来华除传播天主教外，也是为了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生物、医学以及工艺美术、习俗和文物，以便定期向国内报告。这 5 名法国传教士经在钦天监中任职的葡萄牙教士徐日昇的引见后，张诚、白晋奉旨留在北京，其他三人往各省传教。

1689 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张诚和徐日昇奉旨随同前往，参加中俄谈判，担任拉丁文翻译的译员工作。在谈判过程中，张、徐二人未辱使命。《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康熙对传教士们的工作满意。自 1690 年起，张诚、白晋担任了宫廷教师。他们把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几何学译成满文给康熙帝进讲；并先后向康熙讲授了天文学、数学、测量、静力学、医学、解剖学等课程，还在宫中设置了实验室。康熙因对西洋科学感兴趣和看重有学问的传教士，在 1690 年曾用西洋笔写下“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康熙因对传教士的信任，因而对天主教也渐趋宽容，他题写了“万有真原”的匾额，令悬挂在天主教堂内。康熙又题过“敬天”之匾，还解释说“敬天”亦即敬天主意。康熙患症疾病时，宫内太医束手无策，张诚、白晋以他们所带来的奎宁药进呈，康熙恢复健康后对传教士更增好感。

1692 年初，多明我会教士在浙江新建教堂被浙江巡抚严禁。徐日昇、张诚等上奏历述传教士为清制造火炮、办理外交、传播科学等功绩，请求皇帝废除传教禁令。康熙终于在是年 3 月 22 日颁谕，准许天主教在中国人中传播，这便是为西方称颂的“1692 年康熙保教令”。谕旨称：“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数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乱恶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

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各省可也。”

康熙不仅颁谕解禁，还在皇城內赐地，准由张城等筹修一座天主教堂，即北堂，这就是北京著名的西什库天主堂。

1697年，康熙命传教士白晋携带康熙馈赠法国国王的书籍49册，出使法国，以招聘更多的博学教士来华。1699年，白晋带领法王派遣来华的雷孝思、马若瑟、巴多明等第二批10名传教士兼科学家抵达北京。1708年，白晋奉康熙之命，与杜德美（1668年—1720年）、雷孝思（1663年—1738年）等传教士赴中国各地测量绘制《皇舆全览图》，共历9年终于完成。

教士张诚著有《满文字典》4卷，为康熙帝用汉文、满文编译过天文、哲学、几何、三角等多种教本。白晋奉康熙之命研究《易经》，他著有《易经总旨》；撰有《康熙帝传》等，逝于北京。

康熙执政的17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受重用的同时，天主教得到重振，传教活动发展迅速。据统计，从1664年—1701年的37年间，在中国受洗的教徒几乎增多了1倍。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计有传教士117人，大小教堂共250所，教徒约30万人。中国已有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个主教区。在北京，天主教的南堂（1605年建立）、东堂（1655年建立）和北堂（1703年建成）成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中心。

南怀仁去世后，闵明我继其职任钦天监监正。1707年，闵明我去世，由纪理安补钦天监。在这以前，张诚、徐日昇也已去世。在北京的传教士有白晋、巴多明、冯秉正、雷孝思等人。

从顺治初年至道光七年的近200年间，先后有16位西洋人在钦天监任职。京师观象台的很多观测仪器，皆由中西学者合作主持制造。除南怀仁主持的一套大型的天文仪器外，乾隆年间，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德国人戴进贤和监副南斯拉夫人刘松龄，会同中国天算家何国宗（字翰如）、明安图，修订《灵台仪象志》，由乾

隆命名为《仪象考成》。其中，星表增添 1614 颗新星，比原表所载旧星总数还多。

## 五、“礼仪之争”和传教活动的衰落

“礼仪之争”是明清之际天主教关于中国礼仪习俗的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主教在北京和中国的传播，要不要适应中国文化？怎样对待中国人传统的祀天、祭孔、拜祖的礼俗？这场争论最初在来华传教士之间进行，后来扩大到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的直接冲突，争论长达百余年，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 （一）“礼仪之争”的背景和实质

16 世纪 80 年代以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天主教时，屡遭失败。其原因有二，一是明朝执行闭关海禁政策，不允西方传教士前往内陆各地，二是葡、西在中国沿海传教时，完全脱离中国国情，传教士们要求受洗的中国教徒必须照搬西洋人的习俗，必须采用西方的姓名，这对拥有几千年悠久文化的中国人民来讲，是无法接受的。中国人把入教者看成“替洋人服务”或“数典忘祖”的人。较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官民的反对和抵制，以致西方传教士在华无立足之地。

利玛窦来华后，为了开展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经过一段摸索后从瞿太素之说，选定“耶儒合流”、利用儒学经典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融合中西文化作为传教手段。从理论上宣传儒家学说同天主教义不悖且“同条共贯”、“互为补充”（参见花之安：《自西徂东》《自序》），提出了儒家所讲的“天”，即是基督教中所称的“天主”。他们准许中国教徒继续敬天、祀孔、拜祖（见利玛窦：《天学实义》上卷，二篇）利玛窦等人的具体解释是：郊天之礼，并非祀苍苍有形之天，乃是敬天地万物之原。祭孔非崇拜幽灵偶像，乃景仰其人格和思想。设立祖先牌位，乃孝敬之思、亲爱之



义，子孙藉以纾怀，表达思念之情，与强调祖先灵魂至上、拜偶像有别。利玛窦和耶稣会内大部分支持利玛窦的观点和作法的传教士，因为尊重中国的礼仪习俗，受到了清朝顺治和康熙皇帝的赞许，把这些传教士的观点和作法，称之为“利玛窦的规矩”。

对“利玛窦的规矩”，在耶稣会内部一开始在 16 世纪末就有一部分传教士反对，如龙华民、庞迪我等。他们反对天主教中国化的方针。1610 年 5 月利玛窦逝世后，龙华民继任中国耶稣会的会长，他力图改变利玛窦的作法。龙华民禁止中国教徒祭孔拜祖，反对称天主为“天”或“上帝”。龙华民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关于“造物主”的译词的争论，再一是中国的祭孔拜祖礼俗的争议，向耶稣会的中国日本省区致函，表述他的观点（按：这时中国同日本合属一个省区。1613 年传教士金尼阁回欧向教皇汇报中国教务时，曾请求教廷批准中国自成一个传教省区并未成，只将中国划为副省区），1611 年龙华民的上书，正式挑起了“礼仪之争”。

17 世纪初至 1630 年，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士中，多数人支持利玛窦的主张。1621 年在澳门、1627 年 12 月至 1628 年 1 月在嘉定，耶稣会士们曾先后召开会议。虽然在对于“造物主”的译名问题上意见分歧，但在关于中国教徒的祀孔、敬天和拜祖问题上，多数人认为不宜干涉，以免激起中国人的反感，尤其是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基础刚定，未便改动既定方针。罗马教廷也因东方教区初辟，诸待草创，传教方法应让教士自由决定。因而教士同教廷之间亦相安无事，在华耶稣会内的争论并不激烈。1633 年，在华耶稣会议定，继续沿用利玛窦的作法，允许自由采用译名，允许中国教徒保留本国传统礼仪。这时耶稣会已设立中国省，省区决定烧毁龙华民攻击利玛窦的文章，不得认为中国教徒保持中国礼仪是违犯教义、是异端。在华耶稣会著名教士中，支持利玛窦的有：汤若望、王丰肃（即高一志）、徐日昇、张诚等；同意龙华民观点的有庞迪我、利类思、傅泛际等人。

1630 年以后，“礼仪之争”逐渐激化。表面看是在对待中国教

徒固有的礼仪、习俗问题上的分歧，实际则有更为深刻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和 17 世纪后各国教士，尤其是西班牙、法国同葡萄牙以及天主教内部其它教派同耶稣会之间争夺在华传教权的斗争密不可分。由于 17 世纪以后，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一些国家如西、法传教士的活动，直接受本国政府的指挥或操纵，不再绝对服从耶稣会，甚至葡萄牙等国与罗马教廷之间亦发生了矛盾。特别是因为葡、西、法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海外殖民争夺过程中，争夺对华传教权亦是争夺的内容之一。围绕“礼仪之争”矛盾加剧的具体原因则是：

一为在华耶稣会教士内部矛盾的激化。他们之间既有认识上的分歧，更同是否受到清廷皇帝的优宠、是在北京传教还是在外地传教有关。一般说来，维护天主教中国化的方针，为中国礼仪作辩护的核心人物，大多数是在北京教区的传教并受到清廷重视的教士。绝大部分是在葡属耶稣会属下活动，维护葡萄牙的保教权。

二为西班牙教派同耶稣会士冲突的加剧。

自 1630 年以后，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传教士先后从菲律宾前来中国的福建传教。他们同在华已握保教特权的葡萄牙势力，互相嫉视和排斥。耶稣会上对西班牙教士排挤甚力，1644 年，西班牙教士居于澳门未他去者，多被葡人所杀。而西班牙教士对耶稣会上的宣教方式，尤其是容忍中国教徒祀孔拜祖，认为严重违背基督教义而竭力攻击，礼仪之争渐趋复杂。

三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宗教势力进入中国后，积极展开了传教的争夺。1653 年在两名法国主教的发起之下，成立了以对外传教为宗旨的修会组织，称为巴黎外方传教会。1658 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实行宗座代牧制，使某些地区具有正式教区之权，由教皇委派主教或神父代管该地区教务。外方传教会会上对耶稣会士的地位和传教方针深为不满，法国传教活动直接听命于法王，且与法国的海外扩张相结合，他们攻击葡萄牙和中国“礼仪”亦甚

坚决。

四是罗马教廷对东方传教活动的加强控制及教廷前后“部令”的不一致，使教士无可适从，“礼仪之争”长期拖延下去。

教廷过去对葡萄牙保护下的传教活动比较放任，以致葡通令凡前往东方传教者，必须从葡都里斯本出发，先抵澳门并誓言服从葡之保护权。葡又将中国各地全划归葡管下的北京、南京和澳门三大主教区之内。造成了教廷遣华的主教无立足用权之地。教廷同葡萄牙之间的矛盾渐渐激化。1696年，教廷明令缩小葡辖下的主教区域，在中国的闽、浙、赣、川、黔、滇、晋、陕及湖广诸省内，新辟创八个主教区，每个教区由教廷派一副主教，负责监督巡视，又颁令凡传教的规定和仪式等不得违背教廷的命令，不准擅自宽容无约束，于是教廷与耶稣会，甚至与多明我会之间的齟齬加深，康熙年间围绕“礼仪之争”矛盾日趋复杂和尖锐化。

五乃“中国礼仪之争”的长期继续，表现出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之间是出自各种原因和目的。欧西诸国利用“护教”为藉口，实质是政治权利的争夺。这一斗争的最后结局是罗马教皇蔑视中国人当时的习俗，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而康熙皇帝维护国家主权，采取了坚决的果断措施，结束了“礼仪之争”。

## （二）“礼仪之争”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

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之争，从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龙华民继任利玛窦的工作，并上书反对中国教徒保留传统礼仪习俗的1611年算起，到康熙逝世、雍正元年（1723年）12月清世宗公布禁教令，放逐天主教传教士止，共进行一百余年。从不同时期的内容和特点看来，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礼仪之争”的第一阶段，是从1611年—1633年。这时主要是在耶稣会内部争议。对立的双方当中，多数教士维护利玛窦的观点和作法。他们坚持中国经书中的“天”、“天主”和“上帝”同拉丁文“造物主”一词是同意，中国的敬天祀孔祭祖的礼俗并非

拜偶像；而少数教士却主张中国教徒的祀礼祭祖是天主教的异端，他们根据日本耶稣会的报告，称日本人按朱熹的学说评价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一书，认为“天”与“上帝”不能代表创万物的“造世主”。这一阶段的争议，基本上是围绕译名和中国礼俗的性质问题，且局限于耶稣会士的范围之内，到 1633 年在华耶稣会作出决定，允许中国教徒保留传统礼仪而告一段落。罗马教廷没有插手，也未重视。

“礼仪之争”的第二阶段是从 1633 年—1693 年。这一阶段里，天主教的其他会派参与了争论，罗马教廷出面干预，时间长，范围广，从中国国内扩大到西方社会各个阶层。罗马教廷的决定，前后有变，表现出争议的背景复杂化。

1633 年，西属多明我会的教士黎玉范（又译名为摩拉尔）和方济各会的黎安当先后从菲律宾来到福建传教，他们为了从葡萄牙手中夺取对华传教的控制权，竭力攻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保留祭孔拜祖等礼仪，争论重新展开。他们同耶稣会士辩论数次并无结果。1643 年，黎玉范返欧洲，专程前往罗马教廷传信部，以询问中国礼仪为名，对中国耶稣会传教会提出 17 条指控，进一步在教廷中挑起争论。如：

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礼，及举行其他祀祖之仪式？

在对中国人举行洗礼之先，应否告其天主教之教义，如绝对禁止敬拜偶像，及举行其他祭典？

中国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圣”字？

中国信徒在其会堂中所悬匾额，对于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

应否允许中国信徒向社会祭神典礼捐献财物？可否参加政府当局所举行之必要祭典？

中国信徒如放债时，是否允其征收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如系以放债为生，在其皈信天主之后，是否还允其继续此种营业？等

等。

罗马教廷传信部为了破除葡萄牙对中国传教的控制权，在 1643 年任命黎玉范和黎安当二人为葡萄牙保教权之外的中国传教区监牧。教皇英诺森十世（1644 年—1655 年在位）根据多明我会提供的材料，在 1645 年颁布禁令，禁止中国教徒继续祭孔拜祖的礼俗。

在华耶稣会教士闻讯后，委派正在布鲁塞尔的耶稣会士卫匡国等前往罗马向教皇报告教务，申辩本会观点。1654 年，卫匡国向教廷圣职部申明，在中国，祀孔、祭祖是社会礼仪，不是迷信活动。拜祖是敬死如生，传统孝情，并非视死者为神灵，不属于偶像崇拜。祭孔礼仪是民间尊师礼节，是社会习俗，属于中国国情和文化制度问题，不是异端宗教的性质。经过五个多月的辩论，耶稣会在罗马获胜。1656 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1655 年—1667 年在位）重作裁决，同意耶稣会继续利玛窦时期在华的传教方针，并批准卫匡国的报告，又颁布一道法令，宣布“按所叙实况，中国教徒在不妨害根本信仰的情况下，可以参加中国的礼仪。”

多明我会反对教皇的这一新决定，1669 年向教廷圣职部提出质询，问 1645 年教廷颁布过的禁令是否还有效？1669 年 11 月，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九世（1667 年—1669 年在位，教皇本人是 1669 年 12 月 9 日逝世）批准由圣职部又发出第三项部令，宣布 1645 年和 1656 年的两项部令均属有效。具体情况由传教士按实际酌情判断和处理。又将此案交异端裁判所再行审议。

罗马教皇通过传信部和圣职部先后颁布下来的三道部令，使在华的传教士们既不知适从，又各采所需，互有所恃，此后二十多年间，传教局面混乱，争论不休。在“钦天监教案”（1664 年—1669 年）期间，在华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教士于 1668 年 1 月曾在广州集会作出过“恪遵罗马教廷 1656 年法令”的决议，在中国的“礼仪”问题上，方济各会教士认同了耶稣会士的观点，但多明我会虽表面默许，实际仍坚决反对。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



士纳瓦雷特逃离会议返回西班牙。1676年，他在马德里出版了《中国历史及宗教风俗概观》第一卷，公开攻击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针，歪曲中国礼俗情况，把“礼仪之争”介绍给了欧洲社会。三年后又出版了第二卷，使争论更加扩大和激化。

罗马教廷久欲打破葡萄牙对东方（包括中国）传教的保教权，因为葡之保教权影响了罗马教廷的权威和统治。早自1576年（明万历三年）1月12日起，中国的天主教会便隶属于澳门主教，而澳门主教则受印度果阿总主教管辖，澳门主教的辖区包括越南、缅甸、柬埔寨、日本等地。因葡有保教权，果阿、澳门主教必由葡政府推荐，必须是葡人，所有传教士前往东方传教必乘葡船，必经里斯本，名义上对教士由葡负责保护、负责交通及资助生活费，实际是控制教务。1658年，罗马教廷在中国推行宗座代牧制，扶持巴黎外方传教会（1653年成立）的教士任宗座代牧。1684年，罗马教廷派法国人陆方济（1625年—1684年）主教为越南宗座代牧并署理中国西南五省教务。葡政府一直反对宗座代牧制。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阎瑄继陆方济之职，他对耶稣会的抨击最为激烈，反对中国礼仪特别坚决，自他上任起，“礼仪之争”更为复杂并走向高层化。

从1693年起，“礼仪之争”进入第二阶段。法国教士阎瑄（又称颜瑄，按其名字的译音为梅古罗特或味名老），1693年任广州主教，兼领福建教区之监督职。他在福建颁布禁令，禁止教徒使用“天”和“上帝”两个称谓，不准教徒祀孔拜祖，教堂内不准挂“敬天”匾额。他认为罗马教廷在1656年颁布的容忍礼仪的指令可不遵守。他甚至发出通令，在所辖教区之教士，凡耶稣会所宽容者，均严格禁止。他又开除了两名耶稣会教士。阎瑄还派两名教士赴罗马，再次把中国礼仪问题提交教皇仲裁。这样一来，激起了耶稣会会众群情激愤，也相应地开展了活动。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在1692年回法国以后，他写了《中国现状新志》和《论中国礼仪》两书，介绍中国的儒家学说，又批评了西方人对东

方文化的无知，于是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扩展到欧洲。1700年，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诸国，争论颇为激烈。在巴黎大学先后举行过约 30 次讨论，在法国天主教会内部，由于巴黎大主教诺阿耶和索邦神学院煽动舆论，因而反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的意见，逐渐成为主导的观点，教士李明的著作也遭到批判并被禁止出版，支持法国教士阎瑯的许多文章相继问世。

“礼仪之争”第三阶段的特点，不仅是争论扩大到欧洲，成为书函往来和激烈争辩的重点，而且演变为争论双方都想取得最上层的权威论据作结论。

在耶稣会教士的请求下，康熙在 1698 年曾作过中国礼仪不是宗教迷信的批示。1699 年 11 月 19 日，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徐日昇、张诚、闵明我、安多等上疏奏请康熙训谕有关中国礼仪之真解。康熙在 1700 年 11 月 30 日作了答复：“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康熙曾明确批示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委派专人把康熙的答复和钦天监官员的证明材料送往罗马教廷。而多明我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反对派则攻击耶稣会教士，认为教内的问题，不请求罗马教廷解决，反而依赖异教皇帝去裁定，实属离经叛道。

1700 年 9 月，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二世（1691 年—1700 年在位）逝世。他本已着手解决的关于中国“礼仪之争”并无结果。继他任教皇的是克莱蒙特十一世（1700 年—1721 年在位），他声称“需料理诸事虽多”，但对于“众西洋人在中国的互相争论，此系我第一件要紧事。”他决定对“有说此有异端之事，也有说此无异端之事”由我自己作出决断。

1701 年，克莱蒙特十一世任命安提阿宗主教铎罗（又译图诺、多罗，1668 年—1710 年）为特使，准备赴华处理传教士之间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并在中国推行和扩大宗座代牧制，以便解除

葡萄牙对华传教的控制权。1704年，克莱蒙特十一世颁布禁令七条，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将“礼仪之争”推向顶点。从此，进入了康熙同罗马教皇及其特使直接斗争的“礼仪之争”的第四阶段（1704年—1723年），亦即最后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罗马教皇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维护了中国的传统礼仪和民族尊严，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 （三）康熙同罗马教皇及其特使的斗争

教皇克莱蒙特十一世在1704年11月20日下达禁令（七条），即：（1）在中国之西洋人及入天主教的中国人不许以“天”或“上帝”称天地万物之主。康熙题写的“敬天”之匾不准悬挂，凡已挂在天主堂中的应取下来。（2）禁止教徒祭孔、拜祖，不许在祭礼处站立，因此与异端相同。（3）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不得入孔庙行礼。（4）教徒不许入祠堂行一切礼。（5）教徒在家中、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均不许行礼。（6）遇别教之人行礼时，教徒只能在旁边站立。（7）教徒不得在家留有写灵位、神主的牌位。还规定，可行或不可行之礼，俱由教皇的特使定夺。

当时在中国的多明我会及外方传教会的教士实很浅薄。他们斥“天”、“上帝”等词不可用，甚至“敬天”之匾不可挂，将祀孔拜祖与拜偶像等同化，不仅是不学之故，实有其排斥中国固有传统的政治用心。教皇要中国政府服从教廷禁令，甚至下令摘下康熙御题之匾实乃狂妄之极。

教皇特使铎罗携禁令，于1705年4月抵广州，12月达北京。当时，康熙的立场和态度是很鲜明的。康熙对“礼仪之争”中的译名等问题并不注意，他所坚持的原则是：一保护为中国积极工作、懂科技的耶稣会士；二是维护中国的传统礼仪。铎罗面对的困难亦有两个。一是葡属耶稣会上对他的反对；二是康熙帝与教皇观点的迥然不同，尤其是康熙对阎当的不满。

阎瑯是一个极端保守和顽固的人，对于传教士须向宗座代牧宣誓服从一事，意大利人伊大仁（方济各会教士，1680年时为陆方济的辅理主教，自1690年4月任北京教区第一任主教）主张可以变通，但阎瑯坚持必须宣誓。阎严禁照顾中国礼仪。阎任福建宗座代牧以来，一再抨击耶稣会士正与康熙袒护耶稣会士之态度相反。这对铎罗的“任务”来说，确是一个难题。

铎罗抵北京后，虽然未交验罗马教廷任命状，仍被康熙召见三次，优礼以待。康熙向他解释了中国人祀礼祭祖的习俗及其意义，希望能派来一位久居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礼仪并熟悉朝廷事务的人担任中国的总主教。铎罗未敢正面与康熙冲突争辩，在1706年2月召阎瑯入京，请求康熙能接见阎瑯，听已在华任职、居住十多年的阎瑯申述情况。阎瑯应召在6月30日抵北京，并去热河行宫觐见康熙。康熙在接见阎瑯时发现阎不仅不懂中国官话（只能讲闽南话），且不太认中国字（阎对御座后边的四个字，仅识一字）。康熙甚怒。对此，康熙曾谕西洋人道：“铎罗来时，误听信教下阎瑯，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且目不识丁，对话须用翻译，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这句中的“目不识丁”在原文似为“字亦不识”。

据阎瑯的法文记载，康熙在1706年8月3日（阴历6月25日）还对铎罗谕示过：

“朕所欲发旨意者，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得教皇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光明白晓谕，命后来之人谨守法度，不能稍违方好。以后凡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之人，许他内地居住，若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许他住。此等人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况且多事。更有做生意买卖之人，益不可留住。凡各国各会，皆以敬天主，何得论彼此，一概同居同住，则永无争竞矣。”康熙所

言“立一规矩”其意即限制反对耶稣会的教士之来华。叫后来人“谨守法度”，即不准干涉中国国内事务。

1706 年轻罗在京期间，康熙不仅态度坚决，又主动派教士法国人白晋为钦差大臣携礼物前往罗马教廷，希望调和关系，行至广州，因故未成行返北京。铎罗在北京时没有向康熙公开教皇的禁令，因而这时康熙主要是迁怒于阎瑯。1706 年 12 月，铎罗辞行离京，康熙派官将铎罗于 12 月 17 日护送至南京，并予以监视。康熙随即谕令阎瑯及其秘书出境，又惩其数名党羽。

教皇特使铎罗在南京时知康熙意坚不能改变，闻听康熙将颁谕旨规定在华传教士必须持有准予传教的印票和遵守中国礼仪，又念及本身的主要“使命”，乃于 1707 年 1 月 25 日在南京的天主教堂中，以自己致在华传教士公函的名义，将教皇克莱蒙特十一世的七条禁令摘要公布（铎罗并未公布禁令，直到 1720 年另一特使嘉乐至华时才呈上禁令）。铎罗在函中强调的是，不准教士用“天”和“上帝”的称谓，不许教徒祭孔拜祖，违者开除教籍。康熙闻讯后大怒。3 月，康熙重申：今后，遵“利玛窦的规矩”者，可继续在华传教，否则一律驱逐出境。下令，凡尊重中国法律和礼仪习俗的教士，都要向内务府去领取准予传教的“永居票”。在“永居票”上除姓名、年龄，抵华日期等项之外，还要注明长期居留。领到“永居票”的教士同中国人一样合法居住。教士中不领票者不许留居。同时，康熙派耶稣会法国人教士艾若瑟（1626 年—1720 年）专程前往罗马教廷协商与核对铎罗所述内情的真伪。康熙在召回铎罗回谕时说过：你铎罗写给教皇的信，柔草参差，断然使不得。你所提供的教皇来示，必定是假的。朕派艾若瑟前往罗马教廷回来之后朕方能信，信后再定夺。康熙命将铎罗押解去澳门交澳门总督看管，在那里听候罗马教廷之命。铎罗实处于葡人软禁之中，1710 年 6 月病故。

自铎罗的公函和康熙谕令下达以后，在华的传教士开始分化。在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大部分多明我会教士和极少数方济



各会教士恐犯教规、服从禁令，拒领传教印票（“永居票”）而开始被逐出境，而耶稣会教士和一部分方济各会教士、奥斯定会（又译奥古斯丁会，1256 年成为托钵修会之一）的教士则申领“永居票”，恐失在华传教的机会。也有不少教士隐居内地，观风行事。至 1717 年，外国传教士中共有 47 位领了“永居”的传教印票。“礼仪之争”仍潜行于各地。

法籍耶稣会上艾若瑟奉康熙之派于 1707 年底至澳门，1708 年 7 月到欧洲，1709 年 2 月才抵罗马觐见教皇，报告铎罗使华情况。但教皇不为所动。1710 年，教皇重申铎罗禁令各项，北京耶稣会士上书罗马教廷，恳请暂时收回成命，但教皇置之不理。

1715 年 3 月，教皇发布《自登极之日》通谕（即《禁约》），宣布在华传教士必须宣誓遵守 1704 年教廷之前禁，不准重提中国礼仪问题，违者与异端同罪。康熙震怒，认为这是教皇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在 1717 年 4 月 16 日降旨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为了挽救传教局面，罗马教皇再派亚历山大宗主教嘉乐为特使，于 1720 年 12 月抵北京，企图说服康熙同意接受教皇禁令。康熙耐心地先后接见嘉乐 13 次之多，反复阐明中国礼仪的传统，无奈嘉乐仍是为贯彻禁令而来，无法沟通。康熙在接见嘉乐的过程中曾反复讲过：“阎瑋原系起事端之人，尔怎不带他同来？”“铎罗、阎瑋等知识偏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铎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阎瑋等不通小人，妄带书信，颠倒是非，委屈当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罗丽山、徐日昇等旧西洋人，行悖教之事；如此妄书妄信，亦当不必再存。”……

康熙对嘉乐呈上的教皇“禁令”全文阅后，严加驳斥道：“朕理事最久，事之是非真假，可以明白，此数条都是阎瑋当日御前讲过使不得的话。他本人不识中国五十个字，轻重不晓，辞穷理屈……不别而逃回西洋，搬斗是非，惑乱众心。乃天主教之大罪，中国之反叛。”还指出：“尔西洋人不解中国字义，如何妄议中国

道理之是非？”教皇的禁令“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皇所可禁止。”并且康熙对教皇的“禁令”作了重要的批示：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嘉乐使命失败，乃于 1721 年离京。他在澳门曾提出过“八项准许”的折衷办法，同意中国教徒在不违禁令的原则下，可举行非宗教性的礼孔祭祖。但同时又宣布“本人不能更动教皇禁令上的一字一文，也不能暂时停止禁令在中国的效力。”这仍是对康熙的挑战，中国对此毫不妥协，康熙逝世（1722 年 11 月），雍正即位后便下令全面禁教，“礼仪之争”乃结束。

康熙为了澄清事实，将嘉乐来华后的言行曾汇总为《嘉乐来朝日记》，将康熙面谕之话整理后朱笔御改过，从而保留了珍贵的史料。

#### （四）雍正、乾隆时期的禁教政策

康熙之后，罗马教皇本笃十四世（1740 年—1758 年在位）在 1742 年 7 月 5 日颁布通谕、宣布废除嘉乐提出的“八项准许”，把禁止中国礼仪作为入天主教的基本条件，严格实行“禁令”。从此，天主教便长期失去在华合法传教的地位。清朝毫不退让，实行严厉禁教政策。

雍正皇帝（1723 年—1735 年）即位之初，闽浙总督满保上奏，“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置澳门，其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整饬。”雍正在 1724 年下令，严行禁教。限各省传教士在半年内离境。各省天主教堂被拆除很多。各省传教士 50 多人，包括耶稣会教士 37 人，连同 5 名主教，均被驱逐出境。中国人也被严禁信仰天主教。1725 年，雍正对前来朝贺的教皇使节说：“天下各教皆以劝善为本，然教之至善，未有善于儒

者”。这便公开表示尊儒，不以天主教为然的态度。1727年，雍正下谕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1726年—1728年，清王室内讦案涉及到葡萄牙传教士及信奉天主教事。宗室苏努全家九人信教，因在皇位继承上襄助过康熙第八子允禩，被雍正处罪，在大臣的议奏中称他家“结党乱政，复私入西洋邪教”应加重惩处。同允禩关系密切的葡籍耶稣会上穆敬远（1681年—1728年）亦被株连并发配西宁中毒身亡。

在雍正禁教高潮中，北京城中的钦天监却有些例外。以监正戴进贤为首的供职传教士 20余人仍被继续留用下来。德国人戴进贤（1680年—1746年）字嘉宾，他 16岁入耶稣会，1716年经里斯本抵澳门。1717年1月，应康熙之召，抵北京后长期佐理历政。1725年任钦天监监正，1731年加二品礼部侍郎衔。1738年（乾隆三年）任耶稣会中国省区副会长。他在钦天监中 29年，贡献甚大。编纂了《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仪象考成》（三十卷）等。他还尽力减轻天主教与佛教间的矛盾，为教会作洗刷，营救过教徒。还与人合著过关于天主教内容的书《睿鉴录》。

北京城内的教堂大减。仅仅保留南堂、北堂、东堂以及雍正时为罗马教廷传信部建造的西堂。北京的传教士，不少人秘密潜入中国内地继续暗中传教，各地秘密的天主教堂仍活动。

乾隆时期（1736年—1795年）继续重申禁教政策，多次搜捕散处内地秘密传教的外国传教士。1747年，在福州处决一名多明我会主教，次年在苏州绞死耶稣会传教士两名。在宁、鄂、川各地不断关押教士。1785年，有 4名方济各会的教士在湖广被捕。这段时间里川、晋、陕、鲁、赣、桂等各省教士不论被捐或自首，一般都押送北京处理。在严格取缔、镇压传教活动的措施之下，据统计，1765年时国内天主教徒已减为 12万人，比 1701年时减少了 60%。

应当指出，在北京长期以来始终准许和任用科技水平较高的

传教士供职。乾隆朝有一位传教士很得重用。他是意大利人郎世宁（1688年—1766年），汉名亦有作士宁或不宁者。他1707年在热那亚入耶稣会，1715年抵北京，在宫廷如意馆中作画40余年，米兰画风极盛，又成为揉合中外绘画艺术的大师。他在雍正时期完成了《聚瑞图》和《百骏图》。郎世宁与他人合作完成的《乾隆战功图》及在天主教南堂中所作的《君士坦丁大帝凯旋图》等壁画，名噪中外。郎世宁还几次恳求乾隆缓和教禁。后来乾隆下谕旨曰：“唯禁本国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得自由信教，天主教非邪教可比”……。乾隆时期西方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中曾修喷水池，他把清朝一统地图制成铜版印刷，教士安泰任御医，林济各修理钟表，罗怀忠充当药剂师，钦天监内教士长期工作。据统计，1733年时北京东、南二堂尚有司铎11人、修士5人，北堂有法籍司铎10人（或12人）、修士1人。到1775年，共约有49名西方传教士还在中国境内活动。

正当中国坚持执行禁教政策之际，由于耶稣会在欧洲树敌过多，与罗马教廷的矛盾日益尖锐，教皇克莱蒙特十四世（1769年—1774年在位）在1773年7月21日正式下令解散耶稣会。两年后，解散令传到北京，规定除供职清廷的耶稣会上不准擅离职守外，其他教士可自由回国。一些耶稣会上愿在北京工作者，则还俗后继续留下来任职。

1783年，罗马教廷派法国遣使会来华接替原耶稣会工作。1785年，遣使会的罗广祥、吉德明、巴茂正等会士抵北京接替了耶稣会上原在钦天监等处的工作。后来，还有一些葡萄牙遣使会的教士来华秘密传教，但整个说来，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清廷实行闭关政策，雍正、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再颁禁教令，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已明显衰落。1805年，传教士德天赐画了一张由河北广平至山东登州，又自山东曲阜至河北省景县的地图，给罗马教会传信部。这幅地图被清廷查获，认为是要寄往英国战舰的地图。不久，一批传教士抵京，立即被拘捕，北京所有

传教士都被严密监视。后来，北京西堂的神父被驱逐，东堂遭火灾，南、北两堂活动凋敝。信奉天主教的人数日益减少，北京有不少教徒和传教士迁往外省。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徒的后裔中仅有一小部分人还保持着天主教信仰，他们在宗教生活方面的处境亦异常困难。毕学源是北京的代理主教，于 1838 年去世，不久南堂也被拆毁。这些主要是由于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后果。

## 六、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西学东渐”主要是耶稣会士承担的，他们又把汉学介绍到西方。虽然他们当中背景不一，但同鸦片战争以后来华传教士相比，其性质与作用则有明显的区别。

### （一）耶稣会士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媒介

在 16 世纪 80 年代至 19 世纪 90 年代的三百年间，有过两次西学输入的运动。第一次是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东来带进了西学；第二次是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方科技的引进。

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是在比较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是伴随着海上贸易和耶稣会教士的传教活动而发其端的。明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展开的第三次传教活动，并非一帆风顺，他们曾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一再改变传教政策，最后终于依靠着汉服、习汉文、说汉语及知识传教的方法叩开了中国的大门，扩展了传教活动。

耶稣会士采用这种对华的传教政策，是当时历史环境和各种力量对比条件决定的。明末清初在当时世界舞台上，中国仍是东方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国，决不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所处的地位。因此殖民者还不致等闲视之。



就欧洲总的实力来看，欧洲资产阶级还未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掌握政权，根本谈不上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还无力征服东方的“强人帝国”。面对紧闭的中国人门，传教士只能从门缝中挤身进来，采取不违背中国法律，尊重民族习尚，小心翼翼地行动，借助于传播西方科学的方法来传教，并使其活动大体局限在传教范围之内，从而作为换取他们在中国居住的权利和自由传教的筹码。

第三次基督教传入中国推行以“知识传教”的路线，采取“以学术为媒介”的方式，不仅是因为必要，而且有其可能性。从耶稣会士的情况看，可谓是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他们本身都是学有专长者。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耶稣会士，都在欧洲受过近代科学启蒙与文艺复兴浪潮的冲击。他们有能力担负起传播西学的任务，力图通过这一方法来完成他们的宗教使命。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传教士的“知识传教”方针看，也是能够接纳甚至是欢迎的。中国古代，颁历权始终是皇权的象征，所以当时官方对于修改历法很有兴趣。在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中，有一批有识之士，出于爱国热忱，极想通过传教士这一传媒，从西方科技那里找到一条富国强兵之路。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基本是欢迎和正确的。

总之，以“知识传教”路线为特征的第三次基督教的传入中国，决定了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成为当时“西学东渐”的传媒。

## （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对当时的科学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造成了中国科学文化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耶稣会上向中国输入西方的奇器异物和科学技术，带来了大量的科学书籍，开展了空前规模的传播西洋文化的工作，开始了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过程，从而打开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为西

学在中国的传播播下了种子。耶稣会士介绍的虽还不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的空白。不少士大夫都认为耶稣会士“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作，多华人所未道”。<sup>①</sup> 介绍西学可以视为明末耶稣会在中国的事业中真正放出异彩的、有价值的部分。

在传教士的影响和帮助下，明末清初涌现了一批既懂科学又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学者。最为典型的是明末的徐光启。他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徐光启自幼深受传统儒学思想的熏陶，但不受旧思想的束缚，学西文、习洋术，不耻下问，向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所学”。<sup>②</sup> 再有康熙年间，像李光地这样的理学家，竟也结交天算学者，所讲“皆欧罗巴之学”。乾隆年间，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在京师常与同年褚寅亮、吴烺等“讲明九章算学及欧罗巴测量弧三角诸法。经学大师戴震，也以“精于推步”首闻于海内学者。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整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遗产，出现了议办“洋务”的端倪，为二百年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的引进，在心理上和知识上作了一定的准备。

耶稣会士翻译和撰写介绍中国文明的著作，从而将我国古代文化和科学传播到西方世界，在“中学西渐”的历史中作出了贡献。这些书籍增进了欧洲人对“神秘的东方”的了解，耶稣会士的媒介，为 18 世纪中国文化大规模传入西欧奠定了基础。

耶稣会士的早期来华也增进了中国和欧洲文人之间的友谊。耶稣会士来华传播西学受到了中国士大夫的欢迎，在科研的合作中，中西科学家结成了亲密的友谊。

① 《明史》，第三二六卷，《意大利传》。

② 《明史》，第二五一卷，《徐光启传》。

## 第三章

### 近代北京基督教的发展

#### 一、基督教第四次大规模传入中国

19 世纪初叶，伴随着英、美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扩张的迅速发展，基督教新教首次传入中国大陆。第一个来华传教的英国传教士是罗伯特·马礼逊。在他之前，有荷兰的基督教传教士随荷兰侵略势力于 1626 年侵占台湾时来到台湾，在台湾传教 20 多年，吸收了上千人入教，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1662 年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基督教在台湾也随之被清除。比马礼逊稍早些时候，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马许孟从印度来到广州传教，把《圣经》译成中文，除此之外，他没有留下什么影响。马礼逊受英国伦敦浸礼会教会的派遣，于 1807 年 9 月 8 日到达广州。当时伦敦教会给马礼逊的任务是：(1) 以讲授数学或英语争取在广州站住脚，(2) 学好汉语，(3) 翻译《圣经》，(4) 编写一本英汉字典。这些他都做到了。他是将全部《新旧约全书》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马礼逊用 7 年时间编著成的《华英字典》，共 6 册，4500 页，成为沟通中英两国语言文化的得力工具。他在广州和澳门呆了 25 年，发展了教徒 18 人。他在华劝化的第一个教徒是印刷工蔡高，1814 年在澳门受洗。1816 年，梁发成为第二名中国信徒，1823 年底由马礼逊立为新教宣教士。他的《劝世良言》一书，对以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影响颇大。

继马礼逊之后，从 1816 年—1839 年，英、美、俄、德、法又

一次增派传教士陆续来华，并想尽办法向内地渗透，以扩大影响。如米怜和他的儿子米威怜（英国）、郭实腊（德国）、裨治文（美国）、卫三畏（美国）、伯驾（美国）等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郭实腊是善于搜集情报的典型，裨治文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他怀着“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的宏愿来到中国，主编《中国丛报》、煽动使用武力叩开中国大门，主张传教士应不顾中国法律深入内地活动等观点。卫三畏进入内地著述《中国总论》、《中国商务指南》，伯驾是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医生。至 1842 年，英、美、荷兰等国共有 7 个差会的 24 名传教士来广州、澳门之间传教。他们搜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鼓吹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和强迫清政府放弃禁教政策；同时着重做文字传教工作，从著书、译经、办报和兴学等方面下功夫，从事在华人规模传教的准备工作。

1840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势力的入侵，不仅新教继续大量传入，天主教亦在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再度复兴。因而出现了基督教第四次大规模地传入中国的热潮。这次基督教来华是指 19 世纪后，以基督教新教各派来华为起点，所开始的是：基督教的各大派，其中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他们以西方侵华政策为后盾，而在华发展的传教活动。因此它是近代中国宗教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近代宗教运动区别于古代宗教运动的重要方面。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种种抹不掉的印迹。其特点有：

首先，基督教第四次大规模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是同步进行的。伴随着欧美主要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列强诸国迫切需要向外寻找商品市场和原料生产地，于是殖民扩张兴起了高潮。因此，基督教为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服务的色彩就更浓了。殖民者纷纷把宗教作为他们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开路者，用传教士来实现其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目的。有许多传教士也往往在本

国政府进行侵略时，帮助进行殖民宣传，搜集情报，甚至直接参与活动，以及穿上军装、拿起屠刀。我国由于战争的失败和受列强的讹诈，从 1842 年到 1900 年的近 60 年中，中国承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 1842 年的《南京条约》、1844 年的《望厦条约》、1858 年的《天津条约》、1860 年的《北京条约》以及 1895 年的《马关条约》和 1901 年的《辛丑条约》。传教士们不仅是这些战争的讹诈者，并且在签订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有的教士参与策划，有的条约文本甚至出自他们的手笔。如《南京条约》签订时，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多次和中国代表举行和谈的预备会议，郭实腊亲自参与了条约的签订。伯驾、裨治文都是美国谈判使团的成员，参与了《望厦条约》的订立，裨治文首先向美国政府建议要求从中国得到最惠国的待遇。郭实腊、卫三畏、丁韪良参与了订立《天津条约》。这些条约明文规定外籍教士可随意在华“开设教堂”，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可“安然入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sup>①</sup>可见传教士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猖狂到了何种程度。

第二，这次对华传教运动和前二次不同。前二次在重新开始传教时，往往一切都要完全从头做起，而且没有可依仗的势力。而这次传教，则能稍稍借助于以前打下的基础，传教士们还能得到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支持，并都受到“自 1842 年以来就络绎不绝的外国军舰的赤裸裸的武力”支持<sup>②</sup>和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的保障。因而，传教士们不必再像以前那样，讲究传教策略，以至于许多传教士因此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他们索还旧堂，霸占寺院民居；袒护不法教民，干涉中国内政；肆恶逞凶，欺压中国人民；刺探情报，直接为殖民侵略事业服务。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除传教一项尚属正当的宗教事务外，其他都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破坏了中国社会生活秩序，有损于中国的

<sup>①</sup>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97 页、107 页。

<sup>②</sup>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



内政和主权。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已成为一股特殊的势力，它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而逐步形成，并随着外国侵略权益的增长而扩张。这些都是在前三次基督教传入中国时所没有的。

第三，第四次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规模之大，教派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差会都派遣了大量传教士来华进行宗教渗透。传教士们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 and 每一个山谷中都设起光辉的十字架”<sup>①</sup>。19世纪下半叶，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新教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欧美各国的各大宗派都以差会的名义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至1860年，在福建、广东、江浙以及华中江西、华北山东等地都有了基督教。传教士大约100多人，教徒2000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1500人，教徒增至8万人。其中英国势力占主导地位，它的传教士占了50%，美国的传教士占了40%。到解放前夕，新教教徒70万人左右，教派70余个，大体分属于121个外国差会，其中美国的差会占一半。当时基督教毫不掩饰它受外国管辖的性质，有的教堂甚至公然挂起“大英国某某会”、“大美国某某会”的招牌。天主教势力也卷土重来。法国与葡萄牙激烈争夺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护权。1838年罗马教廷决定由法国教士孟振生取代葡萄牙派任的主教，就任北京教区的主教。1844年和1846年，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发还了“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天主堂”，天主教再次取得合法传教地位。至1856年，罗马教廷已在辽东、蒙古、云南、贵州、西藏设了代牧区，同时撤消葡萄牙保教权下的北京、南京两个教区，另设直隶北境、直隶西南境、直隶东南境、江南四个代牧区，分别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和1814年恢复的耶稣会管理。仍属葡萄牙澳门教区管辖的两个代牧区，也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署理。天主教以五大商埠和原有传教点为基地，长驱直

<sup>①</sup> 1868年蒲公臣使团在纽约发言，见张力等编著《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进，深入内地，足迹遍及我国城市和乡村。到 1900 年天主教传教士已达 1356 人（其中外国教士 886 人），教徒已达 74 万人。1921 年教徒为 200 余万人，到 1945 年增至 310 万人左右。20 世纪 30 年代天主教到中国的修会已达 100 多个，女修会 80 多个。东正教在沙俄支持下，十月革命前已由北京扩展到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和西北等地；十月革命，由于大批俄国流亡者进入中国，东正教在华仍有发展。据 1925 年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和协进会的调查，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合计，当时在华有外籍传教士共 8639 人，分驻 740 处，华籍教士数量大体相当，教堂 19 231 所，教徒 2 307 445 人。他们想方设法，大量发展教徒。对于下层民众，传教士采取诱惑方式，他们认为“没有褥子的人，愿意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入教”。对于上层士大夫，则一面以“船坚炮利”相炫压，另一方面用西方奇巧物品来利诱。因此，教民的构成存在着严重的不纯现象。虽一部分确是虔诚的信教者，但另一部分则因生活贫困，或者地痞流氓，企图依仗教会势力维护个人或家族的利益。外国传教士又将治外法权扩大到所有华籍教徒，久之，在民众中便激起一种仇教心理。

第四，中国近代史充满着屈辱、血泪和不平等的记载，在这种背景下，依仗着殖民主义的武力为后盾，而又为资本主义侵略开路的基督教在华的活动，必然受到中国民众的抵制。因此这一段历史，也是自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基督教会、教士、教民和中国民众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鸦片战后，西方列强一再用炮舰侵犯中国领土，妄图瓜分中国。各国传教士为其本国侵略势力提供情报、制造借口，出谋献策，充当侵华先锋和助手。他们则仗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纷至沓来，形成了大规模的传教运动。因此教会成了直接伤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恶势力，对我国的半殖民地化起了催化的作用。传教士深入内地，无视中国法律而任意行事，教堂势力深入到穷乡僻壤，并扬言要用基督教征服中国。封建官绅担心基督教的传播会打乱现有统治秩序，引起人心大变。传教士

企图改变中国传统礼俗，反对敬祖、祀天，诋毁佛、道教，干涉民间迎神赛会的旧习俗，因而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信仰、风俗、习惯有着尖锐的矛盾。以上种种，使民教冲突不断发生。基督教会的宗教侵略势力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从南方的滇、黔，到北方的直、鲁，从东海之滨的福建，到喜马拉雅山的西藏，各族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烈火，燃遍城乡，此伏彼起。1861 年贵阳教案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序幕，1870 年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甲午战争之后，山东、广西、四川、湖北等地的人民自发地把反教会侵略和反对列强瓜分结合起来，将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汇入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终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掀起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非基运动”，反映了人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解放，实质是中国人民愤恨欧美资本主义对中国压迫的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民族民主革命的推动和冲击下，使中国基督教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教徒要求成为中国教会主人的意识增强。在风云变幻的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加紧对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另一方面是中国信徒的爱国觉悟逐步增长，这两种力量不断地变化着和消长着。

第五，基督教和教会从事的文化事业，虽以文化扩张和奴化教育为特征，但客观上也在中国传播了科技、医学、哲学、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有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方式。一般说直接布道更符合教义，但往往容易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于是传教士们积极进行探索，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他们竭力做到一手举圣经、一手捧四书，使自己的说教尽可能地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这就是所谓间接传教。主张间接传教的传教士除实施“直接布道”的方法外，还特别重视著书、办报、兴办学校、医院、传授知识等“启迪知识新知”的工作。这种间接传教的方式，在策略上是更高一筹，它是要从心理

上和社会根源上去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心理。间接传教在形式上也更为灵活而成熟。传教士的目的是发展外国在华的教会势力。正如李提摩太所说“每一个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中国所需要的新道德的动力。”<sup>①</sup> 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半个世纪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卜舫济说：我们的学校“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sup>②</sup> 传教士施若瑟强调指出办教育是要“训练青年为基督教服务”。<sup>③</sup> 许多教士曾对此作出了尝试，如花之安、艾约瑟、傅兰雅等人专心著述，李提摩太致力言政，卜舫济、丁韪良长期办学，林乐知则兼而用之。间接传教是义和团运动后出现的一个新的传教活动趋向。传教士注重兴办医院、学校和其他文化慈善事业。1900年前教会所办医院仅百余处，且大多为设在教堂里的诊疗所。1900年后，新建、扩建了大批医院、诊所，至1937年，仅英、美系统的诊所就有300余所。1900年前教会学校有1100余所，主要是小学，中学占10%，很少有教会大学。1900年后教会学校，特别是大学急剧发展。1901年—1918年传教士在中国办起了14所大学，即：东吴大学（190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年）、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南京金陵大学（1911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4年）、长沙湘雅医学专科学校（1914年）、广州岭南大学（1916年）、北京燕京大学（1916年）等。据30年代统计，教会中学有231所，小学有6812所，在校学生达30多万人。此外，还有育婴堂、孤儿院、聋哑学校、婢女学校、妇孺救济会等。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道德和伦理思想等也传进中国。近代来华传教士被卷入了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漩涡，但真正的帝国主义分子毕竟是少数，不少人是不自觉地推行了侵略政策。在教会学校教书或教会

① 《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英文版），第99页。

②③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英文版），第459页、466页。



医院行医的一般人员，多数人对中国并不怀有敌意。两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从事文化教育和出版方面的活动，在近代东西文化交流中起过桥梁作用。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改良派王韬的协助下，把中国儒家的经典几乎全部译成英文，并作了注释和介绍，在西方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用毕生精力，与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等人合作，翻译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中国著名的第一个西医黄宽协助下，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西医和护士。教会学校在中国也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通晓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和教徒，这些人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 二、基督教在北京的扩大传播

### （一）基督教的再次传来北京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天主教主要是处在葡萄牙的所谓“保教权”的保护之下。自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实行禁教以来，除了在京居职的西方天主教士外，其余外国教士不得在中国传教。1838年，钦天监监副、葡国传教士毕学源卒后，朝中无西方传教士居官。但罗马教皇始终不断地派遣传教士潜入中国内地活动。1834年法国天主教士孟振生行抵澳门，后由澳进京，他在途中怕被人发觉，就每天早晨以茶水洗面，装扮成病人。因当时正在禁教时期，他只到北京的法国公墓正福寺，遣使会士韩若瑟神父迎接他。几天后，孟振生就向内蒙西湾子进发。自1811年，嘉庆皇帝下令禁教后，北京的北堂已关闭，西湾子已成为北京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中心。1843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任命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潜居塞北，治理教务。从此“保教权”落入法国殖民势力之手，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同受法国政府的保护。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本拟重新采用他们前辈传教士的利用传播科学的方法打入京城立足，



并在各省恢复原来的天主教据点，但由于道光和咸丰都不准传教士到北京，所以也改变了手法。从 1846 年起，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有三个教区，另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立代牧主教区。天主教耶稣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修会，长期在北京、直隶省的东南部和江南一带活动。

1860 年中法在北京缔结《北京条约》，恭亲王奕訢特聘孟振生进京，充任翻译，以后奕訢“倚任”孟主教，“所言俱从”。<sup>①</sup>《北京条约》重申《天津条约》有关入内地传教的内容，并且还把“又将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校、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劄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的字样写到了条约里去。不仅如此，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竟擅自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上添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白便”的条文。<sup>②</sup>

1860 年 10 月 24 日，英、法公使在侵略军护卫下进驻北京城内。孟振生、董若翰及中国神职人员，也同侵略军一同进城。他们胸前佩带十字架，所乘车上插着法国国旗，充分暴露了他们是帝国主义走卒的真面目。进城的第二天，孟振生拜会了法国侵略军将领孟特班，要他催逼清政府先归还南堂。孟特班还想为以前被扣押死于监狱的议和代表和阵亡的侵略军举行追悼仪式，便向恭亲王提出急速启封南堂交法国公使接管。奕訢即派人将查封了 20 多年的南堂交给孟特班。孟特班派法兵和工役连日修葺。28 日晨，孟振生为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阵亡法军进行追悼弥撒。29 日，孟振生又为侵略军举行庆祝胜利的弥撒。恭亲王奕訢对法国侵略者这一挑衅和示威的行径则熟视无睹，居然认为“此等小事，似不足与之计较”，“该夷前往彼地念经一日，亦尚安静。”<sup>③</sup>与此

①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下篇，第 30 页。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 140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 2542 页。

同时，主教孟振生唆使葛罗向清廷索还盖有中法双方印鉴的北京城区东、西、南、北四堂执照；又将刻印的“通行传教谕单”250份，强迫总理衙门盖上官方印鉴，在京城各处张贴，以壮法国教会声威；还强令东、西、北三处教堂基址住户立即搬迁。四堂基址全部由法国主教孟振生接管。同年12月，他们又接受了城外正福寺墓地。清政府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赔偿给法国的军费中抽款重修了四大教堂。

孟振生得到北京的教产后，将教区托付给副主教司牧灵。他自己回法国，向遣使会和法国政府汇报北京情况。孟振生回国后，曾拜会法国拿破仑三世。法国想奖励他，他把赠品皆给传信会，他答复皇帝说：“陛下，最使我乐意的，是送我及我引领的传教士和修女至天津”。1862年2月20日，孟振生一行乘法国轮船，约4个月抵天津，6月15日抵北京。随他来华的有4位传教士，2位助理修士和14名仁爱会的修女，其中的1名传教士即后来继任了北京主教位置的樊国梁。孟振生把一部分修女安排在天津望海楼，一部分带到北京，安置在北堂。1868年11月30日，孟振生病故。孟振生死后，田嘉璧主教由浙江调任北京于1870年11月抵京。他很重视北京传教事业的建设。他在阜城门外马尾沟栅栏建立一所孤儿院，还创立了若瑟会修女院。1883年6月他委人在北京西北的一个村子建立了杨家坪隐修院。1884年重建东堂。于同年5月24日，田嘉璧病逝。1884年8月5日，教宗诏令将戴济世主教由正定调往北京，戴济世去世后，由正定杜士良主教接任。迁移北堂事宜，戴济世主教委托樊国梁神父办理。杜士良对樊国梁很器重。杜士良主教健康不佳，教廷选择了樊国梁为他的助理主教。1899年杜主教去世，樊国梁任了北京的主教。

天主教在北京除了四大教堂外，在1901年法国创建了圣米厄尔天主教堂。这是天主教在北京修建的最晚的一所教堂。

除法国外，其他国家也在北京先后建立了一些天主教堂。如光绪年间修建的门头沟张家铺天主教堂、通县天主教堂，均属意

大利罗马教会。

基督教新教差会也在北京发展。英国圣公会布道会传教士包尔腾到北京传教，任翻译并兼同文馆第一任英文教习。1865年又派寇林进入北京活动，并开始到北京附近的永清县传教。1863年英国国外福音布道会也派来传教士司悌悌和梅琦。伦敦会派艾约瑟来到北京。美国圣公会的施若瑟等传教士也前来京城活动。1867年，美国耶稣教传入通州。公理会在华北的总部于1864年创立于北京，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已初具规模。1880年5月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于北京举行年会，决定扩大活动范围，增辟张家口和山东庞庄为该会的新的活动基地。同时决定调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来北京，加强北京总部的力量。从1874年到1890年英国圣公会大主教在北京建立神学院，加强对中国布道人员的培训。

从事医药传教的传教士雒魏林1861年曾在北京行医，兼任英国公使馆医师。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英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美国长老会的李佳白都曾长期在北京活动，干涉中国政治，办报著书、兴学校、开医院，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新教在北京建的教堂计有：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于1869年创建的亚斯理教堂，英国在西城建的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和由一美国美以美会等四个差会联合筹建于1921年的珠市口教堂。

不少外国传教士把十字架和强权武力结合起来，参与掠夺中国人民的资财，积极为本国的侵华政策服务。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在索还教会资产的过程中，掠夺北京平民的土地、山林和资财。1866年，北京天主教堂某传教士拿出一张已失效达50年的旧地契，要求“归还”京西罗谷岭道徐山梨树洼一块土地，强索归还土地面积达73亩之多，还外加煤窑一座。而按照旧地契，总理衙门推算只有11亩3分9厘，并且这块地乃是村民陈文林的产业，有道光六年（1826年）税印红契为证。结果经办

此案的地方官吏竟将土地 29 亩、煤窑一座断给天主教堂管业<sup>①</sup>。有些传教士利用《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享有的各通商口岸和内地的房地产租赁权和所有权，采取各种手段，强买勒索，兼并、强占京郊和城内地产。他们“广置地产，经营番息”<sup>②</sup>。据樊国梁的“收租账单”记录统计，仅西单牌楼以南、宣武门内外，就有 130 家店铺房产属于天主教会。他们将房产租给买卖人，收取租金，进行剥削。<sup>③</sup>这些不法行为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而在中国人民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加深了“民”教矛盾。

## （二）干涉中国“大政”的典型人物——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是以鼓吹“西学”而著称的英国传教士。他在中国活动了整整 45 年，教会中人称他为“海外布道英雄”、“道德伟人、博爱君子”、“中华第一良友”；美国大学赠给他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功德”；清朝官僚士大夫也捧他为“豪杰之士”、“西学”权威，清政府还曾赏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这个受中外反动派一致称颂的“上帝义子”，实际上是清末传教士中干涉中国政治的典型代表。

李提摩太（1845 年—1919 年）英国威尔士人。1870 年受浸礼教派的派遣到中国传教，先在山东，1876 年到山西太原，以后到北京直接干涉政治。

他传教有三条基本办法，藉以控制中国的政治。

1. 走上层路线，结交官府，争取封建势力的支持，从社会上层人物入手，即所谓“若引领，寻求出众的人——使他信教，再感动乡人，自然容易有功。”

着重结交官绅，走上层路线，这是李提摩太的基本路线，为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3，第 37 页。

② 《中国教案史》，第 359 页。

③ 樊国梁、林懋德：《信稿录存》，见《中国教案史》，第 362 页。

此，他不愿放弃任何机会，也不惜采用任何手段。

有一回，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烟台和英国领事谈判，随员中有患霍乱和疟疾的。李提摩太听到这个消息，连忙送去一些樟脑油、哥罗颠、金鸡纳霜等药品，李鸿章收下了药品，并写信道谢。这是李提摩太结交权贵的第一次尝试。1876年，山东大旱，1877年和1878年，山西连年大旱，李提摩太抓紧这个时机，大肆活动。一面主办赈济，用募集得来的少许金钱来收买灾民的灵魂；一面以“慈善家”的身份广泛结交各地官绅。他到济南会见了山东巡抚丁宝楨，到太原会见了山西巡抚曾国荃，并和平阳等地的官僚士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办赈结果，平阳县官绅为之立碑表功，曾国荃特赠以“功牌”，称颂李提摩太的劳绩。李提摩太在山东、山西的官绅中赢得好名声。

在结交官绅的过程中，李提摩太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中华良友”，以关心中国命运的姿态积极过问中国的内政外交。他曾向丁宝楨条陈开矿、设纺织厂，向曾国荃条陈开矿、筑路、兴学，撰写《近时要务》、《富晋新规》等分赠官绅士人。1880年，当中俄因伊犁问题关系紧张时，他特地跑到北京，上书总理衙门，条陈不可失和开战。上书后又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约，到天津大发一通“睦外交、兴西学”的议论。这些活动是和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默契配合的。他们曾暗中交换过如何逐步把中国完全纳入殖民地轨道中去的意见，诸如策划派中国官员出洋考察，改组中国海军、开矿、筑铁路、设银行、办邮政，等等。

李提摩太走上层路线极其成功，体现了在中国日渐半殖民地化的条件下，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结合，体现了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封建势力作为侵略工具，而中国封建势力日渐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新的历史特点。如果说利玛窦走上层路线，表现为巴结和投靠；那么，李提摩太就不同了，他是山结交进而影响以至于支配，图谋的是操纵中国的政治。



2. 以学术为媒介，借“西学”“西法”以增身价、提高声誉，吸引官僚士大夫的注意，“用博物、科学方法，表明上帝的恩典。”

李提摩太用科学作为敲门砖，使自己获得影响中国政治的显赫声名。他在太原时，组织了一个演讲社，约请官绅人士参加，每月聚会一次，买些图书仪器，表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大谈“泰西新学之文明”，这番卖弄，使 1882 年继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对李提摩太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曾派人劝请他出任顾问，协助办理“洋务”。1881 年他回国鼓吹派到中国传教的人应该熟悉中国的宗教和历史，并建议在中国各省省城各设高等师范一所。1890 年受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委派，到天津，任英国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时报》的主笔。在该报发表了不少时事论文。1891 年，由英美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在上海设立的文化出版机构——同文书会的第一任总干事韦廉臣逝世，经该会董事长赫德提名，由李提摩太继任总干事。翌年，同文书会改称广学会，在李提摩太主持下，积极扩展业务，出版大量书籍，创刊《万国公报》，除宗教宣传外，还以介绍“西学”为标榜，兼论中国政教，成为外人在华的重要文化机构。在五六年内，李提摩太便出版了大小译著三十多种，有宣传基督教的《救世教益》，科学知识读物《八星之一总论》、《农学新法》，西方经济理论《生利分利之别》，世界历史著作《列国变通兴盛记》、《泰西新政揽要》，以及议论中国时政的《西铎》、《新政策》等。他善于把宗教宣传、知识介绍和西方国家的殖民利益巧妙地揉合起来。他介绍世界知识，竭力夸张基督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富强，宣扬西方殖民主义的“良法美意”，论证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有许多的“好处”。他宣传基督教，既不解说教义，也不阐发神学理论，而是大谈传教士传播“西方文明”的功德和实效，表明传教士到中国来的一片好心。

3. 顺应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使传教活动披上“中国化”的外衣，以便易于被人们接受，“借用中国旧有的话语，发扬基督教

义，以耶稣真理为骨子，妆饰为中国化。”

使传教形式中国化是李提摩太传教手法中的又一特点。他从 1875 年起便头戴假辫，身穿长袍马褂，1878 年和苏格兰长老会女教士马姑娘结婚，夫妇都是华装打扮，把自己变成“假中国人”。李提摩太姓 Richard，一般译为理查，他把理查简化为李目的在于借点中国味。他还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菩岳，有时即以李菩岳的名字发表文章。他引用儒家、佛教和道教经典以解说基督教教义，并力图把儒家、道教和佛教等都置于基督教支配之下。自然，李提摩太本人对于儒、道、佛可以说是幼稚无知的，他援引佛经以印证基督教教义的解说，几乎全是牵强附会，荒诞无稽的。但可看出李提摩太是煞费苦心地在寻找传教和打入中国的方法。同时也反映了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在早期的一种结合，帝国主义文化力图使封建文化屈从于它，为它的传播服务。

李提摩太自 1891 年起任广学会会长，主持广学会工作达 25 年之久，广学会的发展离不开李提摩太。广学会翻译出版了数千种西学书刊，其中包括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和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这两本书最为畅销，先后发行 10 余次。梁启超曾称：“《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作之书也。”<sup>①</sup>《万国公报》在维新运动中，发行量高达 38 000 份，光绪皇帝也成为此报的读者。但这不是我们本题论述的重点。这里需着重讲述的是李提摩太在北京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活动。

早在 1884 年李提摩太就赴北京会见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密议“改革”中国计划。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清军连连败北，秉政者张惶无策，这给李提摩太干涉中国政治提供了良机。1894 年和 1895 年，他先后两次会见了南洋大臣张之洞，向他提出中国应速与日本妥协。他认

<sup>①</sup>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是要传授它所学到的“西法”以“裨助”之。他说：“日本则兼存裨助华民之心。盖其于三十年之间，酷意揣摩西法，起视斯民，不但户口之繁庶已也，又益之以既富且强，遂欲举其所得之法，传诸朝鲜，以及东三省之民人。”听听吧，这是多么离奇和荒谬的逻辑啊！根据这种侵略者的逻辑，“正义”自然是在日本那一边，怎能和日本兵戎相见呢？于是李提摩太向张之洞提出立即向日本投降然后主动接受“西法”的五项建议：“一、速和日本。二、今岁必增订西学课程，嗣后大小考试，凡不知西学之士子，无论其于中华文理若何，悉屏诸孙山之外。三、广筑铁路暨马路车路，创立邮政局，振兴各种新工艺。四、京师阁部府院寺监及外省督抚提镇各衙门各宜聘一声望素著之西人，奉为莲幕上宾，遇有重大事件必就商之。五、凡华人之久居外洋并熟谙西法者亟宜分别录用，力矫昔年外视通才之弊。”这五项建议的基本精神就是对外接受西方国家（当然首先是英国）的监督，建立完全殖民地化的统治秩序。

1895年2月20日，李提摩太致电北洋大臣李鸿章，自称有妙法救中国的目前和将来，只要答应酬银百万，他就献出“妙法”，不成不取。一个灭亡中国的方案，要索中国一百万两的“酬银”，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这样狡黠狠毒、这样卑鄙无耻的例子了。清政府病急乱投医，李提摩太的锦囊妙计，原来是使中国成为英国附属国的“中英同盟”密约草案：英国担保中国的完整，过问并派人襄助中国整顿水师、陆军、学校、赋税，中国给予英国人在华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兴办工厂的特权，并允许考虑增开口岸、调整税收等有利于通商的办法。<sup>①</sup>李鸿章在去日本议和前曾经就这个“妙法”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密谈，欧格纳认为并不现实而没有作出积极反响。因此，李提摩太的百万横财也化为泡影。

<sup>①</sup>《西铎、电拟订立华英相助约》。

1895年9月，李提摩太亲赴北京，密切注意甲午战后中国的形势，他代表着英、美，首先是英国的利益，为了同俄国争夺对清政府的控制权，进一步奋身投入了清朝政局的斗争中。

李提摩太经常会见李鸿章，向其陈说劝皇上能接受英国的“保护”，并不断地刺探宫廷内部的动态和对维新派的反应。由于李鸿章因甲午战败暂时失势不便出面，他向李提摩太建议去见翁同龢，并答应向翁同龢推荐。

李提摩太在北京期间，还经常与英国公使保持联络，“维新运动从英国公使欧格纳爵士处也获得了巨大的鼓励。”<sup>①</sup>他们在一起经常对中国的局势进行研究，认为在中国爱国情绪如此高涨的情况下要强使中国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是不现实的，还不如建议派外国顾问和加入中国内阁更为适当，于是李提摩太拟就了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的所谓“新政策”。

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借呈递《永息教案折》，求见帝党首领、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两人在总理衙门会见，然后由翁同龢带他去同文馆密谈。所呈的《永息教案折》是李提摩太与另外19个英、美传教士联名提出的，内容是：过去一切反洋教案的发生，不是由于外国传教士的为非作歹，而是由于中国士大夫的反洋教宣传，要求清政府下令切实剔除和禁止书籍中的反洋教文字。李提摩太借会见的机会，向翁同龢陈述了一套“改良中国”的政见（即“新政策”的内容），1896年4月在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87册上发表。翁同龢听了后，要他写一份书面的“改革计划”，以便呈献给光绪帝。李提摩太回到寓所立即写就了一份“改革计划”，送给了翁同龢。据李提摩太自述：“我在这份计划书的开头叙述了上帝对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国家，都不存偏爱之心。根据不可改变的‘顺天则兴，逆天则亡’的法则，我向他指出了中国的四大需要，即教育改革、经

<sup>①</sup> 苏慧真：《李提摩太》，第220页。

济改革、国内和国际的和平和精神改革。”

所谓改革中国的“新政策”的具体条目是：一、宜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保十年太平之局。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说明当用英、美两国的人，因为“英美早经立约，虽复失和，绝不开战，公请他国调处，两国皆无忤心，皆不好战，最宜襄助中国。”……其新政应办各事，选定各国专门名家，分任其责，均派中国大臣合办。三、铁路实富强之本源，目前创议兴办，条陈包揽者甚多，应调西人某某到京考校，以资择别，仍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并派中国二大臣与之合办。四、应请西人某某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以中国管理财赋三大臣合办。五、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为皇帝顾问，随时入见，详细奏陈西国各事。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派中国熟悉中西情势之人为主笔。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主持，与中国大臣合办。八、整顿海陆军，应请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材，以备任使。九、应请明发谕旨，将新政有益于国，有益于民，不得不行，不可不行之处，剴切宣示。

李提摩太建议任用的四名外国阁员，经苏慧廉从李提摩太私人信件中查证，他们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汇丰银行大班英国人艾迪斯，前美国国务卿、李鸿章的顾问美国人科士达和天津税务司美国人杜德维；建议的皇帝顾问一是老搭档美国人林乐知，另一个是心照不宣的李提摩太自己。李提摩太所推荐的主持国家日报的人选是德人花之安和美人丁韪良。如这几条“目下应办之事”都实行，英美帝国主义就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内政、外交、财政、交通、教育、文化、军事、国防，中国也就名存而实亡了。翁同龢曾向光绪帝报告他和李提摩太的会谈。光绪准备聘李提摩太担任同文馆总理，但他感到职位太低，坚决辞谢。

在拉拢翁同龢、插足帝党的同时，李提摩太更积极地拉拢康



有为，力图插足于维新派。他和维新运动领袖的接触，是在 1895 年 10 月 17 日与康有为的会晤。据李提摩太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细的计划中了。无怪乎他来访问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虽然如此，他的上皇帝书还缺少一件东西，那就是宽宏，上皇帝书是民族的、地方的，而不是国际的、普世的。”<sup>①</sup>

这封信主要是对康有为的上皇帝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却看出了传教士和维新派之间的原则分歧：前者要求把维新运动引向所谓“国际的、普世的”，也即是引向殖民地化；而后者则是“民族的、地方的”，也就是说爱国的，防止殖民地化的。

李提摩太和康有为会晤后，他在北京逗留期间，就带着“李佳白、白礼仁等经常同维新派一起吃饭，一起讨论进行的计划和办法。”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在北京期间需要一位临时秘书，就来到李提摩太处表示愿意效劳，他也欣然接受了。”<sup>②</sup>不久后，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传教士也都参加了。他们向维新派领袖们指手画脚，竭力施加影响。

李提摩太在北京活动了 5 个月，他刺探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不愿看到光绪势力的膨胀，并且在 1896 年 1 月下令封闭了强学会，于是他决定离开北京。2 月，李提摩太离京前一天，翁同龢特地到他的寓所送行，赠以绸缎、点心。据李提摩太写道：“这是空前未有的举动，一个中国的宰相下一个传教士的寓所来访问”。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翁同龢还想挽留他在北京，他向李提摩太透露了清廷正在考虑恢复强学会，询问李提摩太肯否帮助强学会，李提摩太却说他“没有同纯粹的政治事务搅在一起的愿望。”<sup>③</sup>

① 苏慧廉：《李提摩太》，第 219 页。

② 苏慧廉：《李提摩太》，第 218 页—220 页，《广学会年报》1895 年，第 9 页。

③ 苏慧廉：《李提摩太》，第 223 页—224 页。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幻想取得英国支持的维新派推荐李提摩太当光绪皇帝的顾问。踌躇满志的李提摩太，以为从此可以直接对中国皇帝发号施令了，也顾不得他原来是个传教士的身份，兴冲冲地赴北京走马上任，在9月中旬赶到了北京。他会见了康有为，康对他说局势已危急，他即向康提出一份英日瓜分中国图，要清政府交出全部政权，以解救危急，然后去找孙家鼐，孙告诉他光绪帝决定在9月23日召见他。可是慈禧在9月21日凌晨即发动政变，把光绪软禁起来，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被杀戮，“新政”被取消。李提摩太的皇帝顾问一职又成了幻梦。

政变发生后，李提摩太帮助康有为脱险，康有为逃到天津，搭乘英轮“重庆号”前往上海。船抵吴淞口，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派濮兰德来救，康有为移至英舰逃往香港。英国政府曾怀疑北京政变是俄国策动的，目的是打击亲英势力，加强亲俄派的阵地，所以积极援救维新派首领，希望将来光绪重掌政权、维新派得势之时，能完全控制清廷。李提摩太帮助康有为脱险是符合英国当局政策的。

根据李提摩太在维新运动时期的种种言论和行动，可知传教士已不再对所谓宣传宗教感兴趣，而是企图直接“帮助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了。他们在中国要实施某些“改良”，是企图使中国适应外国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阻力。

义和团爱国运动期间，李提摩太也极为活跃。

1901年5月，李鸿章邀请李提摩太进京会议“教案”的善后事宜。李提摩太到达北京后，他便向李鸿章上了一个条陈，即后来收入《皇朝经世文编新编续集》里的《上合肥傅相书》。在这里，他谈到“安内”和“安外”两大问题，认为“安内”的两大原则：一是“皇太后、皇上必应母子相和”，二是“士大夫守旧与维新亦必相和”即清朝统治阶级的各派系应当赶快团结起来，以防止“变乱”的再次出现。“安外”的办法是“使中国列入万国保护之

国班内”，“从各国招延有大才之人”办理学校、外交、铁路、工矿和财政。李鸿章不久就因病死去，这个条陈起了什么作用，没有材料可以说明，但李提摩太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了。从“妙法”到“新政策”，再到这个“条陈”，每当中国政局发生变动之际，他都没有忘记兜售他那一套灭亡中国的策划。同时，他在北京草拟了一个《办理山西教案章程》，除要求惩“凶”、“赔”产、道歉、为死去的教士立碑、保护教民等外，特别重要的是用“罚款”办学。于是在1902年按照李提摩太的意见办起了山西大学堂。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李提摩太同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有过接触，曾企图劝阻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他认为中国只能走“渐进的改良道路，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为“一般失于激烈，过于急进”，没有用“和缓”的方法开导守旧派。1908年他还曾著文《预筹中国十二年新政策》向皇太后、皇上献策，鼓吹“请外国上等有学问道德的人为顾问官”，向“强大之国”借款兴办新政，使革命“消化于无形”。

辛亥革命严重打击了李提摩太干预中国大政的野心，1915年他返回英国，结束了他在中国呼风唤雨长达45年的罪恶生涯。1916年他在伦敦出版《留华四十五年记》。1919年病逝。

### 三、义和团运动与洋教士的罪行

#### （一）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

鸦片战争以来，教会的侵略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自然直接对准教会和传教士，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19世纪末，反洋教斗争从未间断，前赴后继，大小教案达400余起。这些斗争也必然对北京发生影响。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当时便有人星夜送信到京城，北京居民闻讯亦思行动。据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即西什

库法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的记载:“时有莠民十棍,聚于天主堂前。有代主教权之大司铎狄仁古者,寄信法使,细述情况。星使当即照会恭亲王,请为弹压。恭亲王照覆,谓在京之传教士与仁慈贞女,俱可照常安居,一切事宜,本王大臣一力承管,保无滋闹情事。……恭亲王即命于北天主堂及仁慈堂近处,添派兵丁,昼夜校巡,莠民始畏惧而散”<sup>①</sup>。

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两年,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威震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从根本上来讲,它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是各地人民反对宗教侵略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为捍卫中华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爱国运动,当它发展到1900年夏季时,北京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心。中国人民直接与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相对抗,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中国人民反对瓜分斗争达到的高潮,也是多年来遍及全国反对外国侵略者利用宗教侵华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教案。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先是在山东发动的,在近畿一带的活动也较早。北方民间有习武的传统,也存在着名目繁多的秘密教门,北京又是四方人杂处,有一支庞大的游民无产者队伍,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对清廷卖国的愤恨,使义和团运动在甲午战争后迅速酝酿和发展起来。据《袁昶奏稿》中所言:1895年“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各自四五十人投效”近畿驻军,“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乱民”<sup>②</sup>。1897年夏修建卢汉铁路时,在京南马家堡掘出石碑,碑文刻有“天下红灯照”,“大清归大清,谁是谁的主”等字样。<sup>③</sup>这是义和拳事先埋下的碑文。1899年夏秋之间,直隶南部和山东紧相毗连的故城、景

①《燕京开教略》下篇,第46页~47页。

②《义和团》第4册,第159页。

③《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县、东光、阜城一带的贫苦农民，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受到山东义和团“老团”的影响，建立了很多“拳厂”，展开了打毁外国教堂的斗争。以后向北“铺团”，发展到冀县、深县和河间一带<sup>①</sup>1900年2、3月间，在和清军以及各地教堂武装不断战斗中，义和团控制了清苑（保定），并以此为中心，向北逐步发展到新城、定兴、涞水、易州、固安、涿州一带，向东发展到任丘、文安、霸县等地，积极向北京和天津“铺团”推进。<sup>②</sup>

1900年4月中旬，义和团已有百余人携带兵器到达卢沟桥，散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外国教会的揭帖。从4月下旬起，团众不断进入北京。义和团在北京城内的活动场所，已从原来的僻静处所发展到中心地区。景山后墙外的空地，是当时练拳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1900年4、5月间，义和团托言在北京西郊温泉山煤洞中掘出了明朝刘伯温的预言碑，它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仇恨和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激情，对卖国媚外的官僚也进行了抨击。碑文内容是：庚子之春，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上行下效兮，民冤不伸。中原忍绝兮，羽翼洋人。趋炎附势兮，肆虐同群。……”<sup>③</sup>5月下旬，义和团在直隶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5月27日至29日，先后焚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丰台等车站和丰台的机器制造局，拆毁了卢保线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以北到琉璃河的两段铁路，切断了清军的道路。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斗争的开展，4月间，北京内城出现了第一个义和团坛口。这个坛口设在东单裱糊胡同路北（今23号），这里是民族英雄于谦故居，称于谦祠。这个坛口有团民100多人，属乾字团。他们头包黄巾，裤脚裹黄色布带。这个坛口的团民参加了

<sup>①</sup>《直隶总督裕禄片》（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9页。

<sup>②</sup>支声：《拳匪纪略》，《义和团》第1册，第444页、447页。

<sup>③</sup>佐原笃介：《拳乱记闻》，《义和团》第1册，第112页。



围攻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战斗。5月底、6月初，北京城内义和团的斗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京郊各县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日数十起地进入北京城内。到6月中旬，大批义和团众从京郊各县每日百十起地集中到北京城里，手拿大旗，上面写着“某县某村义和团替天行道”字样，有的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在通衢大道上浩浩荡荡排队巡行。这些团众，多是朴实农民，他们自备伙食日用，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当时城内设坛八百余处，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的也越来越多，其中主要是受压榨和被欺凌的手工业者、苦力、城市贫民等劳动人民。也有一些游民在各庙宇中安坛设团。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压迫，一部分人要求革命，真正拥护义和团，但也有一部分人长期习惯于依靠不正当职业维生，扰乱社会秩序。一些富豪仕宦之家，有的也自行设场，表示信奉义和团，实际是为了保护身家财产，逃避革命群众的打击。王公、贝勒等也有在家设坛的，实质上这些人不能算是义和团的队伍。这时皇宫内的太监，满汉各营的士兵，也有一半以上参加了义和团。其中像守卫京师的神机营，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等，几乎全部都参加了义和团。

义和团开始进攻北京城里的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展开了焚烧教堂、洋房的活动。6月12日(五月十六日)，首先焚毁了东华门外王府井大街天主教堂<sup>①</sup>。6月13日晚，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火起，接着东堂子胡同施医院、椿树胡同堂子、沟栏胡同两教堂、米市路西天主堂所开铺户、四牌楼六条胡同赫德家、日本旧馆，同时八处皆烈煌飞腾，满天通红，付之丙丁矣。<sup>②</sup>6月14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南堂）并施医院两处”<sup>③</sup>6月15日，午前，

①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第145页。

②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第149页、164页。

③ 《庚子记事》，第13页。

烧西单牌楼绒线胡同教堂，午后，烧西交民巷教民房屋”<sup>①</sup>6月16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大药店，大火延烧了广德楼茶园、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廊房头、二、三条、杨梅竹斜街、灯笼胡同、排马胡同、西河沿东北荷包巷、包括正阳门城楼，共计店铺4000余家，火势延烧到次日。6月17日，京师电报局被焚毁。义和团还将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鸡鸣街”，御河桥改名为“断洋桥”。并严密把守各大道街口，不准侵略者逃离北京。他们甚至把一些经过化装、或躲在人衣箱、棺材里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的侵略分子捉拿回来示众。这些都表现了劳动人民质朴的痛恨侵略者的感情，也反映了农民对反帝和笼统排外的界限分不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的阶段。

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刻骨仇恨和力图永远奴役中国人民的强烈欲望，促使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直接出兵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5月30日至6月2日，各国侵略军400多人以保护使馆为名，由天津乘火车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6月10日八国拼凑了2000人，在西摩尔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在清军配合下，用战争这一最高斗争形式狠狠打击了侵略军，取得了廊坊大捷，狙击进犯北京的首批八国联军，迫使西摩尔侵略军于20日退回天津。在北京的列强公使和联军先遣队对西摩尔的失败义气又恼，蓄意扩大侵略战争。他们戕杀义和团民、干涉守城清军、侮辱中国官员、并在使馆区备战。列强以为依靠血腥屠杀能压服中国人民，但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兵民同愤、异口同声”，团结抗敌的反帝形势。6月15日，北京的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了西什库教堂（持续到8月16日）。慈禧太后因帝国主义列强不同意她废立光绪帝而和列强有矛盾，欲对各国公使进行报复。在慈禧和载漪的命令下，于6月20日令荣禄任总指挥，组织清军

<sup>①</sup>《义和团》（上），第186页。

和团民围攻使馆。

攻打西什库教堂开始，正是北京义和团反帝斗争高潮时，它是义和团的一场大规模的“反教灭洋”战斗。6月15日下午7点左右，有10000多团众包围教堂，开始进攻。尽管前锋40余人在枪弹下死去，团众继续进攻。自6月17日起，一些清军也参加了进攻。西什库是华北北部天主教总堂，是帝国主义对华实行文化宗教侵略的总指挥部。堂内驻有法、意官兵、法国教士和中国教徒。义和团和清军的大炮向教堂轰击，钟楼楼顶被掀起，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被打落。义和团制造了一种火箭武器射入教堂，引起燃烧。他们用陶罐装满火药，点好火绳掷入堂内，落地就燃烧起来。使堂内受到最大损失的，是义和团挖地道、埋地雷的战术，先后使仁慈堂的东部、西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爆炸深达7米，宽达40米，守教堂的外国官兵死伤不少，统率法军的军官恩利也被打死。从6月15日到8月16日，义和团把教堂包围了共63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控制和利用，义和团独自展开的围攻教堂的斗争也逐步被纳入了慈禧等人的政治轨道。

1900年6月20日下午3点49分，义和团助清军包围东交民巷使馆。开始进攻，直到8月14日，总共56天，久攻不克。无疑，这次围攻使馆事件，是西方列强频频入侵引起中国人民反抗的一个历史现象。外国公使曾带领“护馆卫队”，直接公开地枪杀义和团民和无辜市民；并擅自圈定使馆禁区，在路口张贴侮辱性告示，禁止中国居民通行等，足以激起义和团和爱国官兵的反抗。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他们在反抗列强入侵暴行的斗争中，发生一些偏激的过火行动，是不难理解的。义和团不畏强暴，英勇冲杀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

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公开降旨令荣禄指挥包围使馆是一个愚蠢的盲目排外的举动。在国际交往中，即使是在双方交战的情况下，也应给予对方的外交人员和侨民以应有的保护，这是国

际惯例，也是中国自古早已奉行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传统。围攻使馆带来了政治上的极大被动，也表现了军事上的无知和盲动。清政府则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斗争，达到了削弱和控制义和团的目的。在这次围攻中被围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人员，除了终日躲在楼里或地下室里的外交人员较少伤亡外，据他们自己的记载，截至 7 月 20 日止，56 名法军中死伤 42 人，54 名德军中死伤 30 人，60 名日军中死伤 45 人，共 117 人<sup>①</sup>。而甘军和武卫中军，据估计“死者无虑 4000 人<sup>②</sup>，义和团的伤亡更重”。

清政府一直玩弄着两面手段，慈禧于 6 月 21 日对外宣战，同时安抚义和团，但 4 天后，他们就向帝国主义求和来剿杀义和团。这给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8 月 14 日，八国侵略军终于攻陷了北京，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把反对利用宗教侵略、反对列强瓜分和抵抗八国联军结合起来而进行的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狠狠地教训了侵略者。为“基督教文明”而战的联军（许多传教士也不例外）在北京的野蛮烧杀掳掠，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西方在华的强力传教与护教军队在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极端痛苦与屈辱，是本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知识界中发生如此广阔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根源之一。

## （二）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

义和团运动期间，传教士在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从干涉、参与武装镇压到抢劫，无恶不作。

19 世纪末到 1900 年春，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和京津迅速发展，帝国主义大为震惊，列强公使纷纷出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

<sup>①</sup>《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二），第 301 页。

<sup>②</sup>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一），第 16 页。

求它严惩义和团，以后又发展成八国联军侵华。洋教士也兴风作浪，推波助澜。

作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他早在山东时就用各种手段抢占房地产，以扩展他的地盘。他以《字林西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大写文章、广造舆论、诬蔑和谩骂，并要求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于 1899 年 12 月 2 日，向驻京美国公使馆发出了下列电报：“拳民叛乱在山东、直隶两省的 20 个县迅速蔓延。枪杀、放火、暗杀之事有增无已，其明显目标在杀害基督教徒，驱逐所有外国人。除非四国公使联合起来，使用压力，则庞庄——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的”。<sup>①</sup>同年《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北方火灾临头》。他疾呼“若不从速扑灭，则全帝国将无外人可居之地，甚至连将来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了”。明恩溥还亲自出面控告鲁西道台吉灿升，平原县令承洵、高唐州知州李恩祥、夏津和县屠乃勋和恩县的秦应举等，“惩办拳民不力”。袁世凯任代理山东巡抚后，他又和袁商讨有关镇压“大刀会”事宜。

李提摩太也竭力参与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义和团的活动。1900 年春，李提摩太到美国出席“环球基督教会议”和“布道差会会议”。在会上，指陈中国局势的严重，预言不久将有“变乱”发生，要求各个传教机构采取共同行动，设法弭止。接着又到波士顿、华盛顿、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政府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返华途中，他听说义和团运动已经由直隶发展到许多省份，便发电给上海英国总领事，转请英国首相要求中国各省督抚对在华英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如有事故发生，惟该督抚是问，提供了“东南互保”思想的端倪。

1900 年 5 月 19 日 樊国梁致函毕盛，因义和团在京师及直隶发展迅猛，请法国武装人员驻北京，“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

<sup>①</sup>麻海如：《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第 64 页。



西”。<sup>①</sup>

1900年5月末，传教士们一再向荣禄、裕禄、顺天府尹和总理衙门发出紧急函件，要求他们迅速镇压义和团，保护洋教势力。樊国梁写信给荣禄说：“……即是保安、安肃、安兴、新城、霸城、霸州等处拳匪日众，凶焰甚炽，眈眈虎视，……本主教目击如此情形，不得不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阁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设法救教民于水火之中也”<sup>②</sup>。“若不作速想法严办”的话，列强将“护教弭乱”，将要“仿效占据胶州之故事”<sup>③</sup>，各国军舰“将銜尾而至”，“数平匪乱”<sup>④</sup>。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7月14日，天津陷落，在准备向北京进军时，联军搜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

樊国梁在给巴黎遣使总会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这是为了提供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法国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sup>⑤</sup>

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压在给天主教在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信中透露：“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sup>⑥</sup>

① 《蓝皮书》，第72页。

②③④ 樊国梁、林懋德：《信稿录存》1900年，《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23页、26页、20页。

⑤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1页～72页。

⑥ 《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

除天主教传教士外，基督教一部分传教士也有人担任情报官的职务，丁韪良、明恩溥等都脱去了道袍，成为翻译官，并拿起了武器。义和团开始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馆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在天津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被英国远征军雇用，任远征军情报处官员，随联军进攻北京，他还带了几名中国教徒充当便衣密探。据他自己说：“情报处负责绘制每天的行军地图，……图上标明每一村庄和道路，以及密探所能获得的其他情报，包括敌方的炮位、炮数和战壕；事实上，这张行军地图对军官们的重要性等于航海图对船长一样。……在我们出发前 5 天，首先派出两名基督徒学生充当密探，……当他们回来向我们报告时，我把他们带到司令部，……将他们提供的全部情报在地图上——标明。……这已成为每天的日常公事”。<sup>①</sup>宝复礼在跟随联军打到北京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据他自己的叙述：“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通常是把他们编成 12 人或 20 人一队去拖船或推车。……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射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这些俘虏，把所得的情报给情报处”。<sup>②</sup>他又说：“8 月 12 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把突纳乐的一封急信出示给我看，……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最适宜的地点，并附有一份作战计划书。……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去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使联军多走三英里路，这将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固得多。我们建议从沙窝门（即广渠门为外城的东门）打进城去。我的意见被采纳。……13 日黄昏，先头部队出发后，我接到命令，叫我次日凌晨两点钟跟随将军率领步兵团出发

① 《传教杂志》 1902 年合订本，第 123 页。

② 《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 80 页～81 页，第 101 页～105 页。

攻城”。<sup>①</sup>实际上宝复礼早在被英军雇用前就已为他们效劳了。1900年7月14日八国侵略军攻陷天津。宝复礼奉命带一名骑兵上尉去搜查总督（裕禄）衙门，把总督留下的一些重要文件带走。

从以上可知，所谓“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已撕去其伪装，成为八国侵略军的一部分，直接参与了武装侵略的行列。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烧杀掳掠，“京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横。”<sup>②</sup>他们在北京下令大杀、大抢、大烧三天，实际上岂止三天。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就连后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也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sup>③</sup>当时各国在北京的传教士，各国公使及其随员，也都趁火打劫，大发横财。

以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下令教徒抢劫，樊国梁自己也参与这一行动，从8月18日始，连续抢劫了8天。1901年樊国梁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时承认了这一事实。他说：“我们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sup>④</sup>樊国梁于是公然出了“布告”下令教徒抢劫，并规定教徒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一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放一处，然后大家均分。命令如下：“（1）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需。（2）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sup>⑤</sup>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

① 《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101页～105页。

② 《义和团》第1册，第90页。

③ 《义和团》第3册，第34页。

④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69页。

⑤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229页～230页。

月9日的报道称樊国梁仅在一处王府立山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100万两银子。樊国梁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抢劫，但他只承认抢劫了“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银两又五十枚”。<sup>①</sup> 八国联军是同天主教传教士一起进行抢劫的。1900年12月14日，法国的《北方醒报》登载了某回国士兵的陈述道：“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天主教的传教士还到各个县去勒索巨额赔款。

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一样疯狂地参与了抢劫的活动。丁越良也是抢东西的强盗。他对当时的北京情况是这样描写的：“有一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于他们仓惶逃跑，他们的衣橱里塞满了值钱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sup>②</sup> 丁越良承认自己“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sup>③</sup> 他还描述了美国公理会都春圃牧师在一处王府抢劫的情况。他说：“美国公理会在一起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通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sup>④</sup>

美国公理会梅子明牧师的抢劫活动更为疯狂，可谓是典型。他在使馆解围前就已动脑筋要抢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后，他就挑选了他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梅子明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200余名教徒占领了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所有

① 《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1页~123页。

②③ 丁越良：《北京被围口击记》，第131页，第135页，第136页~137页。

④ 丁越良：《北京被围口击记》，第131页，第135页，第136页~137页。

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他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围的各个富户家中进行抢劫。他的一部分亲笔信，反映了他当时的强盗行径。如 8 月 20 日从蒙古王府他写的信中称：“由于我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做一个王子对待”。在 8 月 29 日的信中他说：“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们将尽快地把这些财宝全部运到美国大使馆的保险库中去”。9 月 18 日的信说：“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sup>①</sup>。梅子明还将劫物进行公开拍卖，甚至私设公堂审问群众，进行逼供和敲诈勒索，并要他们供出义和团人员的去向。他还不时地跑到乡间去强迫派粮、派食物，要他们运送到侵略军的军营中去……等等。

传教士们还到处任意勒索赔款，“用人头抵人头”杀害无辜农民和索取银两。从 1901 年到 1902 年，仅北京和直隶自筹赔偿给教堂和传教士的银子竟达 11 124 012 两，这些都是签订条约之外的额外勒索。

对于传教士们的强盗行径，李佳白在 1901 年美国出版的《论坛》杂志上，发表题为《抢劫伦理学》一文中却为之辩护。他说：“抢劫是战争的战利品，倘若中国人不愿被抢劫，他们就不应该发起这场战争”“抢劫是一种高级伦理学”。他还对自己未能进行更多的抢劫表示遗憾。可见这位传教士的帝国主义本质。

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对当时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暴行作了义正辞严的谴责。他写了题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长篇文章，发表在 1901 年 2 月出版的《北美评论》上。他首先引用了一段 1900 年 12 月 24 日《纽约太阳报》刊载的该报记者钱伯兰从北京梅子明处直接采访的消息：梅子明“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

<sup>①</sup>博恒理：《梅子明传》，第 190 页～191，195 页～199 页。



索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声称：他所索取的赔款，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还算是适度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一个被害者索取五百两银子”。

接着，马克·吐温评论说：“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文明之福托拉斯，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营，是一个聚宝盆。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戏，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以及更多的别种利益。”马克·吐温的正义谴责击中了要害，使这些干坏事的传教士张惶失措，美国的反动势力也为此慌了手脚。

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为帝国主义强盗设计了义和团运动后如何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方案。

1900年7月14日，李提摩太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参考，重弹他在维新运动期间提出的“国际共管”的老调，其内容如下：“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通过一个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1. 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2. 每个能派遣 10 000 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 2 人为阁员。3. 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 2 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4. 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

一个或儿国的利益；5. 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6. 应组织一个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7. 在过渡时期责成各国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sup>①</sup>

同年7月，丁韪良也草拟出《告基督教世界各国书》，叫嚷：“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的帝国（指中国）瓜分了，使中国跟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出现一个新秩序”。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张，向各国公使提出新的主张。9月15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正式发表了她的“以华制华”的方案。其内容有：“1. 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拟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利；2. 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 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 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丁韪良进一步提出：“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计划可使现有的机器保持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进步，并可获得中国人中间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个选择是推翻清朝，由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包含长时期和痛苦磨擦的过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国可有时间酝酿他们的政策，推动逐步改革，这比公开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不可能达到日的”。<sup>②</sup>

同年9月28日，丁韪良在路经上海的返美途中，在上海的新天安堂（英侨礼拜堂）发表演说，又重申了上述的主张，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即“若能有一个由外国官员组成的强有力的委员会来指导这位年青的皇帝进行治理中国，和平与秩序就

<sup>①</sup> 《李提摩太通信集》，第50号。

<sup>②</sup> 丁韪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45页～147页。

可以恢复。像目前这样的暴乱必须要采取预防的措施。为此目的，就必须解散中国军队，接收所有兵工厂或加以摧毁。当你抓到了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它的牙齿，斩掉它的爪子。……”<sup>①</sup> 这一番话中共狰狞面貌完全暴露无遗。

很显然，丁懋良的新“计划”，是要求由各国组织“联合委员会”，通过扶植傀儡来控制清政府，并实施对中国的“改革计划”，使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共管下的殖民地，而所保留的仅仅是傀儡政权的外壳。

丁懋良后来又写了《北京被围，中国抵抗联军》一书，除了恶毒地攻击义和团外，还为美帝国主义出谋划策。他在提出“以华制华”政策之后，又为美国提出了领土的要求。他说“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拥有发言权。60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并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它所要的是一个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为了取得海南岛而进行谈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

……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位。……我们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将我们的势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国，是由于自然的伸展。……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南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们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

<sup>①</sup> 《北华捷报》 1900年10月3日，第729页--730页。

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sup>①</sup>

丁懋良揭开了“善良的传教士”面纱，显现出了殖民主义者的原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出谋划策。

## 四、北京基督教与“非基运动”

### （一）20 世纪上半叶北京的基督教

义和团运动被某些教会史著作称为“庚子教难”。外国侵略势力及基督教会，在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中受到沉重打击。义和团运动虽被镇压，但侵略者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所震慑。基督教的上层势力一直倾向于中国统治阶层，各派基督教势力都与北京剧烈动荡的政局密切相关。民国政府取代清王朝后，各派教会都竭力笼络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军阀官僚。1912 年 3 月，北京基督教（新教派）会教徒举行盛大礼拜，庆祝袁世凯正式登上大总统宝座。袁总统委派高级官员出席礼拜，参加教会的活动。同年 10 月，罗马教皇本笃十五派天主教北京主教加林向正式登上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呈致敬书。袁总统对天主教在华的活动“备加赞赏”。1916 年 1 月，北京基督教（新）会召开会议，决定“通电全国各教会一体祷告”，庆祝袁世凯称帝。<sup>②</sup>北京天主教徒也举行大规模弥撒。1923 年 10 月，罗马教廷驻华专使刚恒毅觐见贿选总统曹锟，表示支持其当政，曹锟任命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法国传教士富成功为总统顾问。

基督教在努力争取中国当局为传教开辟道路的同时，各派教会也开始注意了传教方式的改变和宗教事业的“中国化运动”。在传教士中，有人对侵略性的传教方法和态度以及充当殖民主义帮凶和工具的角色深为不满。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曾慨而言之：“况传

<sup>①</sup> 丁懋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 152 页～157 页。

<sup>②</sup> 《北京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教）者，皆天之所使，不需世人矜恤之。总之教务一端，不容议在约内，盖立约之事，人事也，行教之事，天事也。”在华的教会为避免反教运动再度发生，便调整了传教政策，意在改善与中国民众关系的基础上，使基督教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英国外交大臣在伦敦布道会演说时，要求传教士今后在中国，“总以谨慎为主”。英国驻印度总督也劝诫英美教会应“慎选教士，传教士要“自爱以防后患”。教会也限制了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训令教士不得介入教徒诉讼事务，要求传教士尊重当地政府和法律。教会还规定传教士不得直接与官府交涉。如确有必要，一定要通过各国驻华使团与中国政府接触。

20世纪初叶，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及军阀混战等一系列大的事件，社会剧烈动荡。基督教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变革，相应地改变了传教的方针和方法，传教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外国教会拨款和利用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兴办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慈善机构，以推动传教工作。因此，教会较19世纪后半叶有很大的发展。据1928年统计，北京地区有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共11094人，占全市居民总数的0.83%。其后又逐年上升，到1935年，全市教徒共15690人，占人口总数的1.1%。到1949年，北京有天主教堂65所，基督教堂72所。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也加快了发展速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新文化、新思潮的传播运动。它给基督教青年和学生以巨大影响。“五四”运动震动京城，许多教会学校的师生投入爱国洪流。从北京派往上海参加组织全国学生理事会的两名代表中，有一位是汇文大学神学院的学生。<sup>①</sup>1920年北京青年基督教徒组成了一个以倡导基督教新思潮为目的的“生命社”，出版《生命》月刊。1923年吴耀宗与燕京大学的吴雷川和刘廷芳等成立了“真理社”，创立了《真理》周刊。

<sup>①</sup>汇文大学：《年度报告》（1918年—1919年），第5页。



在华天主教会严禁教徒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罗马教廷特派教务巡回使光若翰来华，下令“万不可容许天主教公教之男女学生结队游行”“如果违犯，应得神罚。”基督教也阻止教徒的爱国行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抓住“五四”以后民众向往科学与民主的心理，穆德宣讲“基督教与科学”，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后，一些中国牧师也起而效仿，除基督教教理之外，还宣讲一些普通常识及处世之道，亦受到欢迎。

1922年4月4日至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扩大）会议，来自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同中国代表及列席代表550人，一起出席。会议得到北京政府军警的保护，代表受到总统徐世昌的接见。我国基督教学生认为，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有联合必要，提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提案。提案内容是：提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需要和特点——以学生为主体，全国性的，不分宗派，不分男女。提案得到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的赞同。北京青年会学生干事吴耀宗还就此提议作了书面说明。从此出现了“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这一名词。那时的青年会很活跃，男女青年会所属的200多个学校青年会和中华立志传道团的各支团联系着3万多名学生成员。尤其是北京，还成立了北京基督教学生事业联合会。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议题有“基督教与科学”、“基督教与文化”、“基督教与平民运动”等。

会后，穆德在华组建了中华基督教（新）办进会，以中国籍教士诚静怡为总干事，并发表宣言，提出建立“中国本色教会”。所谓“本色教会”，就是力求由中国教徒担负责任，“自养”、“自治”、“自传”；同时，“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西洋的色彩”，以扩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和20年代非基运动的冲击，中国基督教徒的觉悟也不断提高，欲谋求使中国教徒担负责任和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一些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基督教徒也竭力呼吁使教会本色化。于是基督教本色

运动在全国展开，使之从形式上、人事上、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

在天主教中亦有中国化运动。它受到中外宗教势力的联合推动。辛亥革命后，中国爱国天主教教徒反对外国传教士再继续控制中国教会。1912年天主教人士英敛之上书罗马教廷，主张培养中国的传教士。在五四运动中，许多中国天主教徒投身爱国反帝斗争。1919年，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下令要中国各修会尽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采取了在华修会中国化的措施。他强调“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sup>①</sup>。罗马教廷为此特派刚恒毅为驻华专使。他来华后，任命中国籍神甫担任高级教职，培养中国籍神甫、修女，以扩大教会势力。

教会本色运动形成了 20 世纪初叶中国基督教内改革的一股潮流，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影响。

30 年代，基督教在华势力不断发展，其中美国教会势力增长较快。1928 年国民革命军攻占北京，南京政府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权。是年 8 月，罗马教皇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布“特别通谕”，训导其“服从”南京政府。<sup>②</sup>1929 年 6 月刚恒毅主教以教皇特使身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受到蒋介石的接见。1930 年 10 月蒋介石接受基督教（新）牧师江长川的洗礼入教，对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当时在华基督教的各派势力都致力于推动社会改良运动，同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相互呼应，带有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色彩。如 1928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京郊清河设立农村实验站，派学生进行平民教育、社会调查和农业改良，到各乡村建设基地实习。1935 年，洛克菲勒财团在北京建立华北乡村建设委员会，由司徒雷登主持。

<sup>①</sup>戴利亚：《天主教会在中国》，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313 页。

<sup>②</sup>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 120 页。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大批传教士的回国或被俘，经费的短绌，战时的动荡不安，传教士的活动处于低潮，教会势力扩展甚慢。在30年代~4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少数宗教上层人士鼓吹非暴力主义。有不少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抱同情态度，有的甚至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不少教徒更是积极投入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去。年迈的天主教徒、北京辅仁大学教授马相伯积极投入救国运动。他疾书道：“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山河不止”。<sup>①</sup> 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在北京沦陷后，在校内组织炎社，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底和1944年2月，英千里两次被日军逮捕，在酷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被判刑15年。不少教徒都积极投身抗日运动。仅燕京大学学生参加八路军的就约有700人之多。基督教青年会大多数都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宣传抗日，募集资金，救济难民，战区服务，国际求助等做了不少工作。1950年周恩来总理曾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sup>②</sup>

抗日战争结束后，基督教各派教会都制订了庞大的复兴与扩张的计划。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二发出“更加中国化”的指令，以复兴在华天主教势力。1945年圣诞节，田耕莘被升为亚洲第一位红衣主教，蒋介石亲自接见了。1946年4月，他又被教廷宣布为北平总主教，负责主持全国天主教的教务。天主教密切配合着民国政府实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武力统一”政策。基督教的复兴计划也是以扶蒋反共为立足点。1946年7月已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曾一再指示基督教教会公开支持蒋介石发布的“勘乱动员令”。<sup>③</sup>

在天主教中，也有个别人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和反革命

① 北京师范大学编《风云录》，第7页。

② 罗冠宗：《论抗日救国斗争中的一些基督教人士的活动》，载《宗教研究》增刊，上海宗教学会编印（1985年9月）。

③ 《大风》1947年11月15日。

活动。他们控制了宗教的人权、财权和传教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意大利籍神父马迪诺，以传教作掩护，长期进行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活动，他曾协助易县的汉奸成立维持会，刺探八路军军事情报。国民党统治北平时期，他于 1947 年曾充任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为其搜集中国情报。1950 年，在美帝间谍、意大利人李安东、日本籍的山口隆一的策划、指挥下，一批反动分子纠集成反革命集团，并妄图在中国国庆大典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害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这起反革命未遂案破获时，在马迪诺等人家中曾搜查出六〇炮等武器和弹药。又如，“公教青年报国团”是隐藏在天主教中的美国间谍比利时籍神甫雷振达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共同组织的一个反动武装组织。建国前，他们以北平为中心，以华北各地的天主教堂作为依托，利用个别神甫和教徒，搜集我解放区的情报，并进行武装破坏活动，后被我解放军歼灭。

然则中国的教徒已进一步觉醒。在中国共产党宗教自由和爱国一家的政策感召下，1948 年底，基督教领袖吴耀宗抵达北平。他作为宗教界代表当选为新政协常委。而中国东正教会于 1946 年宣布，归属莫斯科牧首区管辖。

## （二）非基运动

20 世纪初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筹备北京大会之际，由北京文化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也蓬勃展开，并波及全国。

1922 年 3 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领导一些爱国学生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并于 3 月 9 日发表宣言。他们通电全国各地，呼吁全国青年起来支持非基运动。上海学生行动马上得到全国青年的支持。首先响应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在校方支持下，出版了《铲除基督教专刊》。北京的学者将运动内容扩大到反对一切宗教，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3 月 16 日，北京《晨报》登载了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通电，宣告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在

宣言里谴责了宗教教导人们服从，认为这是奴隶道德；谴责宗教宣传迷信，认为这违背了科学、束缚了思想、阻碍了对真理的探求。3月21日，他们向全国学生组织发出通电，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主张非基督教运动，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会议。同时广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先驱半月刊》于3月15日第四期刊出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专号全文照登了3月9日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3月10日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和“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三篇文章。宣言愤怒指出：“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良善走狗。”“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历史上曾经制造了许多罪恶”，“世界的资本主义各国，……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拥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在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些经济侵略的先锋队，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之产物”<sup>①</sup>，在清华举行会议。在霰电上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李石曾、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朱执信、吴稚晖、汪精卫、萧子异和戴季陶等79人签名。非宗教大同盟还于4月2日发出电文对其宗旨予以解释。说明其反对的对象是多种宗教。还宣布“凡不迷信宗教或欲扫除宗教之毒害者，即非宗教大同盟之同志”。所以非宗教大同盟没有会员、章程等规定。它并非是一些外国人士与舆论所说的，是又一次排外行动。4月9日，世界基督教同盟大会闭幕之日，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反宗教群众大会，参加者达3000人。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等发表演说，以科学的名义谴责宗教，蔡元培强调教育应与宗教分离。3月底4月初，广东一些报纸也刊登了批判基督教的论述。其后，全国各地的许多学校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支部，展开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演说。全国许多大城市的知识界纷纷发表以非基督教或非宗教

<sup>①</sup>引自《批非基督教言论汇刊》，第17页、19页，中华浸会书局1922年出版。



的文章和小册子。1924年广东的学潮请周恩来、廖仲恺、周佛海等作关于基督教问题的专题报告，深得群众拥护和同情。这场运动，持续数年，形成了一次反对西方宗教文化侵略的爱国运动。到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又一次出现了一些非基督教宣传。大革命失败后，非基督教运动随之低落。

各种社会活动家如李大钊、蔡和森、胡适、梁漱溟、孙科等都参加了非基运动。以在非基运动中极为活跃的少年中国学会为例，该会的总会在北京，南京等地设有分会，并在北京和南京举行过四次宗教问题演讲会。该学会反映了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特点，其成员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如戴季陶和李石曾等国家主义者。在同一次非基运动中，也有各种意见分歧。他们的立论除了普遍都抨击帝国主义侵略外，有的人认为“宗教不是科学家所赞成的；也有人反对教会控制中国的文化教育；还有人出自“国粹主义”的观点。即使是同一个人，其思想前后也有变化。如陈独秀，在1920年的《新青年》2月号上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非常推崇基督教所宣传的“人格”和“情感”，而两年后在非基运动中，他发表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中，却对基督教的“博爱”、“牺牲”作了分析，并提出异议，说：“在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下，我们应该为什么人牺牲，应该爱什么人，都要有所限制才对，盲目的博爱、牺牲反而造成罪孽”。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的出现是殖民侵略在文教领域加深的标志，它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移植，是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附庸的需要。这种文化侵略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而且使中国民族心理上受到创伤。因而20年代在展开非基运动同时中国也兴起了收回教育权的运动。

1924年8月上海教会学校和公私立学校的爱国学生发起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1922年，并且首次提出收回一切外国人在华教育权的正义主张，提出几条最低限度的办法：一是所有外人在华所办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并须经核准；

二是所有课程及编制，须受中国教育机关的支配或取缔；三是凡外国人在华所办的学校，不许其在课程上正式编入、正式教授或宣传宗教，同时也不许其强迫学生到礼拜堂念圣经；四是不许剥夺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1925年恽代英同志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打倒教会教育”一文，中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青年一致奋起声讨帝国主义，收回教育权，取消教会学校。

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渊源，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开会，仅仅是导火的近因。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开始了非基督教和非宗教的思想酝酿。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上提出了以美学代替宗教的口号，主张废弃宗教。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民众中输入的民主思想，复苏了民族自觉意识。基督教作为一种与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活动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洋教”，自然要受到极大的冲击。当时知识界盛行的科学实证思想，对宗教更是一种挑战。知识界强烈呼吁要在中国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本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道德，主张摆脱宗教的束缚。青年们认定宗教与科学不能两立，认为接受科学就得批驳宗教。这反映了人们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思想的大解放。他们反对旧文化、旧礼教，也反对宗教迷信。非基运动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种反映，其实质是愤恨和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的体现。

## 第四章

### 传教士与北京教会的文教活动

#### 一、传教士在北京的文化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传教士除传扬福音外，实际上一直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任务，直接参与了众多的文化事业，在西学东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社会从传统步入近代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他们的活动面很广，涉及到军事、政治，同时在文化、教育、出版和慈善事业等方面也有不少作为。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文教活动则更为活跃和突出。

我们着重评介在北京的几位著名洋教士的情况：

##### （一）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派传教士，曾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先后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工作长达 32 年之久。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

中国官办的洋学堂或称新式学堂是从 1862 年在北京开设京师同文馆肇始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资本主义教育的胚胎，它的创设不仅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是一次冲击，而且为日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时期教育的变革和新式学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但这样官办的新式学堂也受到西方列强的直接干预。60 年代赫德、丁

赍良就设法控制同文馆。同文馆开办时由英国公使馆威妥玛推荐该国通晓汉文的传教士包士腾担任教席。恭亲王奕訢与威妥玛订明，只许包士腾讲授语言文字，“不准传教”，另聘请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包士腾第一年薪金定为 300 两银子，第二年增到 1000 两，而徐树琳则为月银 8 两。英文馆开学后，奕訢等人又积极筹设法文馆、俄文馆。俄国翻译官柏林和法国传教士司默灵分别被聘为俄文和法文教师。后来傅兰雅被聘为英文班教习。傅兰雅是以向中国翻译大量科学技术书刊而著名的英国传教士，他于 1839 年 8 月 3 日出生在英国海德城一个牧师家庭，因受家庭影响，少年时代就渴望到中国。他母亲还经常煮大米饭给他吃，以便他以后能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1863 年，他为了学习北京话，了解京城的政治社会状况，接受了同文馆的邀请去当教习。他在同文馆每天授课两小时，主要教英语，年俸为 1000 两银子。

1865 年丁赍良受聘到同文馆接替了傅兰雅，任英文教习。丁赍良 1827 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一个传教士的家庭，通晓英文。1849 年于新阿尔尼亚神学院毕业后，要求到中国或日本当传教士。1850 年 4 月 10 日，丁赍良等一行抵达香港，先到宁波传教，随后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美国公使利威廉的翻译，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

1862 年丁赍良决定到北京开辟传教基地，设长老传道会，并注意外交问题。到北京后，他先在西郊一个庙宇落脚，不久就在城内离总理衙门不远处，找到一处可供他一家居住和开设学堂之用的地方。丁赍良总结来中国活动的经验是：要想发展美国基督教在华的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他向长老会差会部提交一份建议书，要求在中国创办一所高等学校，以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部分。所以于 1864 年他在北京开设一所走读学校，由学校负担学费、伙食，甚至服装费，招收了 6 名男生，以培养传道人。总税务司赫德答应每年从海关拨给他 1500 两银子作为学校经费。

1865年赫德推荐丁韪良到同文馆讲授英文课，年俸1500两银子，比他在教会拿的工资高出一倍，一天只需上两小时的课，这是个肥缺，丁韪良欣然同意。不久在讲授英文同时，他又任国际公法教习。1869年9月，丁韪良在北京拜望赫德，赫德征询他是否愿担任同文馆的总教习。丁回答：“擦擦灯盏，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供给灯油”。赫德允诺经费不成问题，可以从海关方面拨付，于是丁韪良就出任了同文馆总教习之职。事后，他承认，对同文馆来说，“赫德可算是父亲，而我只是一个保姆而已”。可见，同文馆虽然名义上是山总理衙门具体负责，但实际上却被赫德总税务司操纵。从1869年起到1894年丁韪良一直任同文馆总教习，年薪后来增加到5000两。

丁韪良到同文馆初期工作并不认真。同文馆的名气很大，但初期学生只有10人，都是满族大臣的子弟，像12只调皮贪玩的小猫，外国教习真不想教下去，不过是混日子而已。丁韪良也坦率地说：“我就职以后，就设法把自己的钟点每天只安排两小时”。过了几个月，他向总理衙门提出辞呈，总理衙门连忙派出大臣来挽留，说：“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10个，而且就是这10个学生，他们的前程也是未可限量啊！……他们10个人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的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外语，难道你的学生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sup>①</sup>丁韪良认为“这倒是一句大可注意的预言”。于是他决心牢牢地占领这块阵地。同时利用教学之便传教并灌输奴化思想。丁韪良毫不讳言地说：“我之所以留任，是认为同文馆的影响要远比北京街头的教堂的力量大得多”。

丁韪良上任总教习后，便着手整顿和改造同文馆。同文馆在1867年设立了天文算学馆，但正途投考者寥寥无几。1869年时，天文算学馆的学生除两人在30岁以下，余者都是35岁~50岁的

<sup>①</sup>丁韪良：《花甲忆记》第293页~305页；《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第550页。



中年，根本无心学习。为了迅速摆脱困境，丁韪良果断地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首先裁汰不合格的学生。他对全体学生进行甄别，将 20 余名不堪造就者除名，使学生整体水准符合教学要求。其次，配齐各科教习。以前赫德也曾聘请过化学、天文、法文、英文、军事诸教习，但实际到校授课者仅化学、法文两教习，诸如空缺达 10 年之久的天文教习等职，丁韪良都一一加以补齐。再次，添设若干新兴学科，如解剖生理等等，从而使课程设置渐趋系统完整。

在丁韪良的支持下还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

第一，确立总教习负责制。作为总理衙门的隶属学校，以往同文馆的大政方针、人员聘用及课程设置等事项皆向总理衙门奏请清廷裁定。但清政府对下情不甚了然，且不谙教育事务，时常导致决策失误。而今总教习负责制，使他对学校事务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可独立决定有关专业问题，只在行政上从属于总理衙门并按时奏报详情，从而确保学校有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第二，制定新学制，因人施教。学制分 5 年和 8 年两类。前者不习外语，主修数学、格致及国际法，对象为年龄稍长、无暇学习外文而借助于中译本的学生；后者前 3 年专攻外语，后 5 年始习数学等科。

第三，实行比较科学的择生标准。根据丁韪良的建议，后来主要招收 15 岁以上、25 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的学生。学生素质的改善，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他莅职后，广建馆舍、创办印刷所，添置实验仪器及设备，开设化学、物理实验室，兴建博物馆、天文台，教学活动有了顺利展开的优厚物质条件。

这场“颇为彻底的改组”（丁韪良语）使同文馆发展成一所应用科学课程占相当比重的综合性学府。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及教育体制通过同文馆在近代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它所开设的医学生理、国际公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性质，为国内首创。在教育体制上，同文馆实施了中国教育史上

第一个分年课程制；总教习主管学校则具有近代校长负责制的雏形。同文馆由分馆学习到依年级按班教授，标志着中国教学形式的新阶段，也改变了中国封建教育那种死记硬背、空洞无物的教学方法。同文馆逐步走向近代学校的行列，对当时始兴的西式教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学生从 1871 年以前的 40~50 名增至 100 余名，到 1888 年已达 125 名。学生来源在 1870 年前多为八旗子弟，而到 1893 年时，汉族孩子的入学人数与八旗子弟的比例已为 52 比 48。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官场，从事外交和翻译工作，极少数人从事科技方面的工作。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等都是同文馆的毕业生。同文馆所组织的译员班，在 30 年间也陆续翻译出版了 20 余种书，介绍了一部分西学。正因如此，丁韪良受到清政府的嘉奖，被誉为“较之以前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诸公，倍有光彩”。1885 年总理衙门奏请清廷赏其三品顶戴官衔。

在北京和任同文馆职务期间，丁韪良为了弘扬基督教教义及介绍西学，翻译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著作。他所译的《格物入门》介绍了欧美在数、理、化等方面的成就，后修订成《增订格物入门》，由李鸿章作序，时人誉为“以开学人之心思，以利生民之日用”。1863 年丁韪良在美国公使蒲安臣和总税务司赫德的支持下，在恭亲王奕訢所派的总理衙门章京（官名）陈钦、李常华、方濬师、王鸿图四人的帮助下，翻译了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惠顿为当时国际法的权威，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曾在欧洲任外交官 20 年，1847 年回美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此书出版后第二年就传入日本。《万国公法》的译著，则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指南。他还根据德国马顿斯的《外交指南》翻译了《星招指掌》四卷（1876 年版），根据美国人吴尔玺的《国际法导论》翻译了《公法便览》六卷（1877 年版），根据瑞士人布伦执的《国际法法典》翻译了《公法会通》十卷（1880 年版），根据国际法学会 1880 年编辑的《陆战法规手册》，选译出《陆地战役新选》（1899 年版）。丁韪良还编写了一些著作和办了杂志。1880

年总理衙门给丁韪良以官费出国考察教育的机会使他遍游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1882年回中国后，他用中文写了《西学考略》一书，向总理衙门作汇报。1884年还出版了他编写的《中国古代万国公法》。在1872年8月他与在京传教士艾约瑟合作创办过一份科技杂报，名为《中西见闻录》。这些也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1898年起，丁韪良当上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直到1900年。清政府把他的官衔从三品升为二品顶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于1899年又授予丁韪良以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所聘用的中外教习，几乎都是基督教中的人士。但他却带着外国教习参加祀孔活动，为的是对这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象征，表示他们的敬意。1900年丁韪良回到美国。

1906年丁韪良再次来到北京，除传教外，还应邀到处演讲，撰写书稿。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每周三次到丁韪良处听其讲授国际法、《圣经》和政治经济学的课程。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因患肺炎死于北京，终年89岁，死后葬于北京西门外的外国公墓里。

丁韪良的英文著作主要有：《花甲忆记》、《北京被围目击记》、《中国的觉醒》和《震旦丛论》等书。

### （二）创设“尚贤堂”的李佳白

李佳白（1857年—1927年）是美国传教士，1882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先在山东传教，在烟台、济南一带活动。当他在美国协和神学院读神学时，就认为“中国儒教天人之辨，析入秒忽”。<sup>①</sup>到中国后，他改穿中国服，戴假辫子，“一如华人仪式”，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进行宗教宣传。他认为这样“能

<sup>①</sup>《万国公报》第104册，1897年9月，第3页。

使华人反教仇外之势渐次消灭，且以得着中国许多有势之朋友。”<sup>①</sup> 1894年他不再回山东传教，而是以独立传教士的身份，在赫德和丁韪良的邀请下来到北京，与士大夫、官僚结交。经赫德的介绍，李佳白得以结识李鸿章、翁同龢等清政府的上层官僚。从此他出入王公大人及翰林御史之门，以布道于知识阶层为特点，开始了在上层社会的传教活动。他是当时打入权臣中的少有的西方传教士之一。他常搜集上层人物的情报寄到上海，也经常撰稿，鼓吹“改良”，强调与上层社会结交的重要性，发表于《万国公报》上。后李佳白又得以认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强学会一成立，英国公使欧格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美国传教士林乐和、李佳白等都参加了活动。他们企图影响维新派人士，按照传教士的意图，改革中国的政治。维新运动时期，李佳白会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一起插手干预维新运动。他发表了一系列赞成“变法”的文章。如《探本穷源论》、《改政总便条议》、《东三省边防论》、《新命论》等。他上书清廷，说是“养民、教民、和睦、武备诸大端，各宜变通新法，若犹循途守辙，依样葫芦，非惟无济时艰，更无以观后效”。<sup>②</sup> 说什么“穷必思变，惟从较易者先为之导，……当择最易者力致其行”，提出了“重农以奠民食”、“建学以储人才”、“取才以获实用”、“专任以定趋向”、“制禄以劝官吏”、“设法以励操守”、“举善以公仕路”、“经武以备不虞”等，“皆不伤财不扰民等”八件事。<sup>③</sup> 他更主张中国应以儒教立国，“坏地球，五大洲数十百国……秉历代贤圣师儒之教，民气驯良，惟上所命，问有如中国者乎？无有也”。<sup>④</sup> 因此他竭力推崇孔子是“中国的至圣”，儒家的思想是“教民之本”。

李佳白要把中国“改革”到什么道路上去呢？他“支持”变

① 《万国公报》第5卷，第45号~46号合刊。

② 李佳白：《上中朝政府书》，《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

③ 李佳白：《改政总便条议》，《万国公报》第90卷。

④ 李佳白：《新命论》，《万国公报》，第95页。

法，叫“中国精求他国现行良法”，但是“愿华人明西方之理，不愿华人仿西方之制”，认为中国不能“如泰西君民共主，致多纷更也”，要求清政府“宜用西国大有声名中外推服的人”来坐镇治理中国，仍应继续实行君主专制，“宜尊君权而建皇极”。<sup>①</sup>连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允许在中国实现。李佳白要求清廷与列强各国“讲信修好”，不要反对外来侵略；要中国保持旧礼教、旧制度。他认为中国“广新学”的目的在于“辅旧学”。<sup>②</sup>他们所希望的是由他们控制的腐朽无能的封建政府，以利于帝国主义宰割。

李佳白是提倡帝国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的最活跃的传教士之一。在近代中国，他主要的活动是开设了尚贤堂。

李佳白为了能把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结合起来，反对一切进步思想和革命事业，妄图把中国拉向倒退。他认为有必要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有一个团体。于是他着手酝酿，1897年2月在英美驻华公使窦纳乐、田贝的赞助和李鸿章、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了“尚贤堂”。它以“扩充封建旧识和启迪基督新知”为宗旨，推行文化侵略。所谓以“培养人才，欲俟当局者之采访，因而上达于朝廷”。<sup>③</sup>“尚贤堂”的英文原名是中国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这是对中国上层阶级工作的机构。李佳白白封为尚贤堂院长，把北京一些上层官僚和有势力的士大夫阶层的人物纠集在一起进行活动。这是一个文化侵略的机构。“尚贤堂”并不是基督教差会团体，而是作为“东西人士会合之地”。它从“中西上等人中”吸收成员，让他们“讲一切济世救人之法”，把基督教和儒教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外教民底于和洽”，“趋于国际友善”。

① 李佳白：《新命论》，《万国公报》，第95卷。

② 李佳白：《中国宜广新学以辅旧学说》，1897年尚贤堂刻本。

③ 李佳白：《拟创尚贤堂缘起》，《万国公报》，第102卷。



尚贤堂开列的章程分 3 段 21 条，据李佳白自称是“本堂期于恢拓学士之志量，研炼儒者之才能，俾上行下效，使中人以上之人，智能日增，即资之以变化庸众”；“凡本堂往来交接之人，总以劝善为本，无论砥砺德行，讲求道艺，期乎扩充旧识，启迪新知”；“本堂内拟设一公所，专使中西上等人士，往来会面，缔交既久，情谊亦亲，中外一气，获益良多”。所以他拟先在北京设立一堂，以后若有可能，则向各省推广设立分堂。

李佳白的尚贤堂取得中国官方的批准和各驻华公使的赞助信之后，就把尚贤堂的工作交给丁魁良，自己跑到欧美各国去募捐了。他到美国大吹自己是清政府的高级官僚和维新派领袖的亲密的朋友，仅从摩根和卡内基财团处就得到 15 万美元的捐款。然后他到欧洲去游说，住的是最豪华的旅馆，得到了法、德、英、俄的政府和资本家的赞助。他成了一个典型的借文化敛钱的术士。

之后，李佳白打算回中国后再大干一场。但是当他于 1900 年回到北京时，发现自己从“极乐之山上”一下子“落入绝望的泥坑中”了。<sup>①</sup>因为在义和团的冲击下，他一手经营的尚贤堂被焚毁了。于是他出任八国联军翻译，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

1903 年，他得到了上海各国领事和外商的捐款与支持，在上海重开了尚贤堂，加强了同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联络。尚贤堂出版了《尚贤堂新学月刊》（1897 年 6 月—1898 年 6 月）《尚贤堂纪事月刊》（1910 年出版），宣传殖民主义。1903 年组成了尚贤堂的董事会，聘请吕寰任董事长，并以特别有限公司的名义在香港注册，受到英国政府保护。李佳白还到苏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地演讲“孔子加耶稣”的道理。

进入 20 世纪，以洋儒自诩的李佳白，公然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支持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他认为：“中国之君主政体非专制”，“其精密完备不让于泰西，且更合于中国之情势”，如

<sup>①</sup>李佳白：《三十余年之记述》，《国际公报》，1927 年。

能再搞立宪，使百姓“知其权力乃皇上所赐，有一定之限制”，就能使清朝的政权更加“稳固”。<sup>①</sup>同时他明目张胆地攻击孙中山宣传革命是“舍本求末”，应当对百姓“申之以孝悌之义”，以继续维持封建统治。<sup>②</sup>

辛亥革命后，他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李佳白鼓吹尊孔，为孔教会撑腰。他以洋儒自称，受聘于 1912 年由陈焕章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孔教会，任高级顾问。当然李佳白主要还是推销基督教，但却大放尊孔厥词，主张基督教与孔教“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sup>③</sup>所以“尚贤堂”打着“发明本教，研究他教”的旗号，每周举行例会，邀请“儒、佛、回、道各大教中的名人”轮流到尚贤堂演讲。该堂除举行演讲会外，还附设了教务、商务、教育、妇女等联合会，进行活动，宣传他的关于帝国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以扩大尚贤堂的影响。

他认为袁世凯是“救国惟一之人才”。他发表了一系列反动的言论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如说：“君主民主，不过名目之分，无关宏旨，不论可也”。<sup>④</sup>“中国数千年来安于帝制，乐于尊皇。……今虽改皇帝为总统，易君主为民主，然人民安于习惯，其心理“仍望有天与人归，秉权出治之一人”。<sup>⑤</sup>“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体”<sup>⑥</sup>

1915 年李佳白上书袁世凯，诬称：“中国人未识共和精神”，“多缺乏自由之经验”，为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开道。为此袁嘉奖他，欲给予 3.5 万两白银，可是他空欢喜一场，款未领到，“洪宪皇帝”已垮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7 年初，中国正式宣布与德国断交，李佳白接办了法国人在北京的《北京晚报》，任社长。他在京

①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②③ 李佳白：《筹华刍言》，第 20 页～21 页。

④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⑤⑥ 《尚贤堂纪事》第 5 期，第 1 册。

期间竟公然反对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曾三次去谒见黎元洪总统，表示了这个政治主张，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他还在晚报上发表反对中国参战的言论，触怒了美国及协约诸国公使和侨民，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要求，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该报同时被封。

1917年李佳白回到美国，于1921年他再度来华，决定到北京恢复尚贤堂的活动。他惊呼：余来华四十余年，中国之乱，无时蔑有，而尤以近十余年来为更甚。<sup>①</sup>于是老店新开，并于1922年创刊《国际公报》，1925年五卅运动时组织“中外睦友会”，但响应者寥寥。接着李佳白又成立了“中外教务联合会”，把“孔教会”“救世新教”“道德学社”“洗心社”等团体都拉了进来，而参加的人仍屈指可数。

1926年李佳白再次把尚贤堂从北京搬到上海时，已无人问津了。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死于上海。他的儿子李约翰继承了他的衣钵，但终因门可罗雀，于次年被迫关门大吉。

### （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毛泽东同志对司徒雷登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sup>②</sup>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中国杭州武林门内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的家里，共有兄弟4人，他是老大。他的童年是在杭州度过的，当时他能说一口杭州话。父母常让他们穿上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用杭州话唱圣歌。12岁后被送往美国读书，

<sup>①</sup> 李佳白：《不平安的新安慰》，《国际公报》1927年。

<sup>②</sup>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见《毛泽东选集》，第1491

直到 1902 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1904 年他回到中国，拜高敬甫先生为师，专门学习汉文，诵读经史子集。1906 年他正式开始在杭州传教。1908 年接受南京金陵神学院的邀请，司徒雷登到该校任希腊文《圣经》教员达 11 年之久。同时于 1912 年开始，他还担任美国合众通讯社驻南京的特约记者，搜集南京政府的情报，每日发电讯，报告中国政局的发展。他在南京时编写了《希腊文初阶》、《希华英辞典》、《圣经·启示录新注释》和《四福音注释》等书。

1918 年底，因接受教会派遣司徒雷登到北京燕京大学工作。1919 年 1 月 31 日，他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直到 1941 年 12 月被日本帝国主义监禁，1945 年出狱后继任校务长。1946 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后，表面上辞去了校务长职务，但校董事会仍请他留任。基督教各差会共同选中了他，是因为他多年与中国和美国政界有接触，并熟悉中国的情况。

司徒雷登确定的燕京大学的方针是：燕京大学的成立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的是给教徒的子女提供教育设施。或更多的是为训练教会的工作人员。这种辅助的功能，是他能够提出要求，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校的惟一理由，也是获得财政支援的惟一指望。他写道：“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成为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又不使人们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sup>①</sup>由此可见，司徒雷登办学的目的是为了传教，而后两句话，更反映了燕京大学比其他教会大学更有吸引力，超过其他教会大学的诀窍。

为了贯彻以上方针，司徒雷登从四个方面着手进行工作。

首先，力图达到基督化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不在于强迫学生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而是制造一种气氛，使学生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学生毕业时能成为教徒固然好，但即使没有接受洗礼，也能对教会有好评，对母校有感情。为此，他于 1927 年把原设在燕

<sup>①</sup>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 66 页。

京大学里的宗教学院，在名义上与“燕京”分开。燕京则减少教授宗教课的教员，从占全体教员的 25%（1917 年），减到 20%（1925 年），直到不占 20%。他主要是通过“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基督教青年会燕京大学校会”等组织，以及教员在课堂上和在课外与学生的接触来灌输宗教思想的。

其次，做到提高学校的学术标准，并多开设供就业机会的职业科目。这固然是为了与官立学校竞争，也是为了“燕大”毕业生可在国内一些关键性的部门占有位置，可以“影响中国的政局”。<sup>①</sup>为此，司徒雷登在聘请教师和课程设置上都下了很大的气力。1919 年，“燕大”总共只有 29 名教师，除 4 名中国籍人士外，其余都是外国传教士，有博士学位的只有司徒雷登一人（神学博士）。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一方面到美国去聘请一些教授来执教或来短期讲学。在中国以“高薪”、“学术自由”和“稳定性”为钓饵，延揽各公私大学的著名学者到“燕大”执教或兼课。1922 年，他聘到了前清的一位翰林吴雷川到校任国文教授，1926 年将吴提为副校长，1929 年又任命吴为校长。司徒雷登当校务长，实际是校长的“校长”。而在纽约托事部登记的校长，仍是司徒雷登的名字。1934 年吴雷川正式辞去校长的职务，后由吴洽春代理校长。到 1934 年“燕大”已有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教师队伍，共有 110 名正副教授，其中外籍教授 44 名，中国教授 66 名。其中仅文学院就有教授 64 名（外籍 30 名）。

他在课程设置上也作了精心的安排。1927 年前，“燕大”重点是多开设一些职业科目，如畜牧科、制革科、劳工调查科，提供学生谋生机会，后因纽约“托事部”不同意设置而停办。1927 年后文科就成为重点课程。而在文学院的 10 余个系中，最著名的则是新闻系、社会学系和国文系。司徒雷登曾声称：“我个人特别宠

<sup>①</sup>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 65 页。



爱的，也许要算是新闻事业了”。<sup>①</sup>因为他自己当过新闻记者，晓得“无冕之王”的作用，他也知道培养一批新闻人才，将对中国起什么样的影响。他曾非常得意地讲述自己的成绩，说：“有一度，中国新闻机构派至世界各重要首都的代表，几乎都是我们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在中国各报馆任职的我校毕业生，也毫无愧色”。<sup>②</sup>社会学系是“燕大”第二个较大的系。该系重视农村调查。早在 1928 年就在北京附近清河开设了农村实验站，训练学生进行农村调查，推行平民教育和农业改良等活动。从 1934 年起，该系又增设农村社会学、农村教育、农村合作、现代欧洲农业经济、农村改良运动之比较等课程。1935 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指定由司徒雷登出面组织华北乡村建设委员会，“燕大”的社会学系，也纳入该会组织的活动之中。当时燕大和其他在华的教会大学，都重视中国农村，这并非出自他们对农民关心，而他们主要是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农民的一种手段。在加强国文系和汉学研究的活动中，特别着重要说明的是于 1928 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该社是美国的哈佛大学与设在北京的燕京大学联合创设的汉学研究机构。司徒雷登与哈佛大学协商，确定该社以研究汉学，培养汉学人才为目的。学社每年能获得 8 万~9 万美元的经费，该社设本部于美国哈佛大学，其最高权力机构为托事部，人选由哈佛、燕京和外校代表各出 3 人组成，每年例会 2 次，讨论与审查工作报告和年度预算。学社本部设主任 1 人，由托事部聘任。学社在北京设办事处，设执行干事 1 人，规定只能由美国人担任。该社首要任务为培养汉学（后扩大至东亚学）研究人才，训练研究生。在哈佛设有闻名世界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分别在中美两国出版《燕京学报》和《哈佛东亚学志》（原名《哈佛亚洲学志》）。《燕京学报》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史资料或论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30 年增设“引得编纂处”。该处负责《汉学引得丛刊》

<sup>①②</sup>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 70 页。

的编写，20年间，编成64种81册，为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工具书。学社北京办事处于1951年撤销，但美国的学社机构至今仍存在。

再次，司徒雷登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惟一切实的保证。因此燕大的建筑尽量中国化，它有庙宇式的校门，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并用华表、石狮之类中国式的艺术品装点门面，而且要求学生熟读孔孟之道；但另一方面则要求头脑国际化，要学生“消除种族之间的偏见、文化之隔阂、国际间之不和”的思想。

最后，司徒雷登强调不可使学校的经费来源中断，要使差会和财团满意，要使中国的名流也肯乐意捐输，要收高学费。<sup>①</sup>燕京大学是在教会大学中经费实力最雄厚的。司徒雷登几乎每年都要回美国去要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去世后，有一笔遗产捐作教育基金，“燕大”陆续获得了相当一大笔经费。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经常给“燕大”津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37年，司徒雷登从这两家财团中获得的钱款达400万美元。纽约“托事会”也为“燕大”提供经济援助，国民党政府从1934年到1937年，也每年补助该校6万元，从“庚款”的退款中，每年拨给该校1.5万元。

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燕大”成为旧中国的一所名牌大学。它培养的是侧重教育、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人才。从1917年到1926年共约有1700名毕业生，在教育界工作的约占40%，宗教界占13%，政界在1931年前约占9%，后来逐渐增至占16%，在商界的约为8.5%，新闻界占3%，出国留学或工作的占2%。

司徒雷登有着十分清晰的双重性格。他表面上总是笑眯眯的，经常对“燕大”的师生们讲“我爱美国，也爱中国”，“与其说我

<sup>①</sup>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66页。

是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他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去找各班比较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会的领袖或请他们到家里来谈心，使得学生“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每聘请到一位新教师，总是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使新教师一进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从而竭力尽心地工作。但他赞成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燕大”把培养“第三势力”作为总目标，企图以此与中国共产党抗衡。

#### （四）终身在通州从教的谢卫楼

谢卫楼是美国传教士，自 1869 年来华到 1913 年死于中国，在华 44 年，主要从事教育事业。1869 年在纽约奥伯恩神学院毕业后，谢卫楼就来到中国，在北京东面 20 余公里的通州（今通州区）传教。在 1867 年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娄戴德创办了潞河书院，招收 12 名在街头乞讨的小乞丐进校学习，供给食宿和衣物。谢卫楼夫妇来通州传教并在该校教一些课。在教学中，他用很浅的文言文编写了第一部中文教科书《万国通鉴》。此书包括西方各国简史，对印度、日本等国的历史也略有叙述，而重点是介绍基督教史。此书不仅是教科书，同时也对外销售，所以对当时中国人，包括部分官员，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1889 年他还出版了《教会史记》，1896 年出版了《理财学》，1907 年出版了《心灵学（即心理学）》和《是非要义》（即伦理学）。潞河书院在 1886 年至 1887 年期间，学校已逐步发展，学生共有 30 名，谢卫楼任校长。他把在中国办教育视为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事，已有了较系统的看法。他于 1890 年 2 月 7 日在北京传教协会作了长篇发言，题为《教会教育与其他传教工作分支的关系》。他声称：教育就是传教，因为在华北迄今为止直接传教活动令人失望。他认为传教工作做得太分散，播种神圣的种子因撒得太开所耗去的时间实在太多，以致无法回过头来在种子上浇水、除草和松土，以便使幼苗得以成

长。

谢卫楼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 19 世纪 90 年代在华大部分基督教教士的看法，预示着 20 世纪初大批教会学校将会向更高级发展。

1904 年潞河中学改名为华北协和大学，谢卫楼仍任校长，直到 1909 年卸任回美国休假。后来他又来中国在华北协和大学教书。他信守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我们在中国所要的是献身于为基督服务的力量。1913 年 7 月 1 日，在北戴河休养时，谢卫楼因病去世，终年 72 岁，遗体葬于通州。

除上述 4 名典型人物外，在北京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们还有大量的文化活动。如雒魏林传教士是《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任命的驻华使馆的高级医生，他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同时也给中国人施医济药和传教。他在京活动了 3 年。另如中美两国合办的清华学堂也与传教士明恩溥有关。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办教育的政策，最初是由美国分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向美国政府建议的。由此而出现了清华学堂。

明恩溥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曾出版过多部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著作。他的言论对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曾有影响。根据《辛丑条约》列强向中国勒索 4.5 亿万两白银赔款，其中美国分得约 7%，后来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笔勒索“实属太多”。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向美国务卿提出减收赔款。1905 年—1906 年间，明恩溥等人伺机建议把尚余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实际是把从中国抢去的赔款对中国进行教育投资。这一建议的背景是由于中国出洋学生当时大批涌向日本留学，美国距中国远，留学费用昂贵，美国排外的移民法又对中国学生赴美造成障碍。这一状况使美国不安。为了能控制中国的发展，美国需要培养中国的留美学生。于是在 1908 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退还应得赔款的“余款”的议案，自 1909 年起至 1940 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指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资

助送留学生赴美并在中国北京开设一所预备学校。1909年设游美学务处，先后有四批学生直接派往美国留学。1911年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成立。清初时，现清华大学的工字厅、怡春园一带叫熙春园，道光皇帝把这个园子赐给他的五儿子奕淙，咸丰皇帝为此园取名清华园，又叫“小五爷园”。早在明神宗时，神宗的外祖父李伟的园子就叫清华园。“清华”二字就是由此而来的。清华学堂目的在培养留美预备生，入学者多为12岁—13岁的少年，共修8年，高等科毕业合格者全部留学美国。学校重要事务均须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学校的最高机构为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由美国公使、中国外交部总长、次长3人组成。1925年设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同时停止学生全体留美的做法。学校行政主权也由中国方面为主掌握。1928年设文、理、法3个学院，共14个学系，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这才使清华成为中国自己培养人才的一所重点大学。

1928年，天主教会在北平成立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统一全国天主教教会教育，由教皇驻华代表直接监督，并用汉、拉丁、英、法四种文字出版《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丛刊》。

传教士们还出版了报刊。1872年由教会办的《中西见闻录》（丁道良参加了），是外国人在北京创办的最早中文报刊，为月刊。该刊系仿照西方新闻报而作，主要内容是登载各国“近事”、“商业”消息和新闻评论文章，并介绍天文、地理、格物等科学知识，很少刊登宗教方面的材料。<sup>①</sup>另如《尚贤堂月刊》于1897年6月在北京发行。自第3期起改称《新学月刊》，由丁道良主编。该刊主要内容是介绍科学知识、译著，次为宣传宗教，也有时事评论，共出12期，于1898年停刊。

<sup>①</sup>黄河：《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报刊》，载于《新闻战线》1959年第21期。



## 二、基督教会学校

### (一) 中学及其他学校

创办教会学校是教会在中国进行传教的重要手段。

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分两个系统在北京办学。他们一方面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进行系统教育，另一方面还进行师范、医学及其他专门教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教会就在北京设立了男女学堂，从晚清到民国，共设有大学、中学数十所。现分别介绍如下：

育英中学是基督教在北京办的最早的一所中学。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周以德）创办，地址在灯市口。初为男蒙馆，学生20人~30人。1912年实行小学7年、中学2年制，学生150人。1918年华人李如松任校长，任职30年，于1929年提出“致知力行”为校训。该校前期，宗教色彩浓厚。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人掌握校务，进行改革，逐步摆脱了教会的控制。1952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第二十五中学。

贝满女子学堂是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创始人是俾治文夫人。这是教会在北京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堂。旧址在东城大柵胡同，1926年迁灯市口同福夹道。初为贝满女子小学，平均学生人数只有18人左右，学校免费，并向学生提供食宿。1870年曾停办，1872年恢复。1895年设四年制中学，称贝满女子中学。1923年改为六年制完全中学。1927年称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41年被日伪改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1945年又改为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51年改名为五一女中。该校初期完全由美国传教士主持，学生全是教徒，每个年级只有几人，圣经课等宗教课程为必修课。校纪校规严格，后期取消圣经课，学生增加。该校培养出不少人才。贝满女中自1898年有第一届毕业生到1951年更名，共有51届毕业生。李德全（1915届校友）、谢冰心（1918届校友）

等都是该校毕业生。

崇实馆(1891年定名为崇实中学)是1865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招收城区失学儿童设立的蒙学,讲授基督教义及经学常识,称作崇实馆。1885年由路崇德牧师兼理。1891年增设中学,定名崇实中学。1923年设高初中,1928年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立案,转由中国人管理。

北京慕贞女校 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的学校。前身是美国传教士刘海澜于1869年创建的亚斯立教堂的备馆。1872年美国美以美会派班美班和博慕贞2名女教士来北京办学校,设于崇文门孝顺胡同(今名后沟),二人先后任校长,至1882年离任。初校舍仅2间平房,学生数人,后学生人数扩大。1883年至1888年,由席安娜和满克利2名女教士负责,规定不收缠足和已订婚的妇女,18岁以上的女生不许留校,学生的学、宿费全免。该校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被毁。1903年重建,盖起两幢楼舍。1918年后,改为四年制中学,1923年又改为三二制中学,并附设高小。管理十分严格,强迫学生接受宗教生活,教员最初都为传教士。校纪校规禁锢学生的思想,有“模范监狱”之称。五卅运动后,除英文、宗教课外,其他课可由毕业于教会大学或出国留学的中国人来担任。学生来源于上层家庭和美以美会在北京及四郊办的慕贞小学。该校教学质量较高。解放后改为北京市第一百二十五中学。

通州潞河中学 为教会在中国所办的较早的学校之一。1867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娄戴德创建,设通州(北京市通州区)城内北后街教堂内,初称潞河书院。两年后传教士谢卫楼任校长。书院的目的是训练传教士的助手,侧重学中文,规模很小。1886年—1887年学校有所发展,1893年分为潞河书院和戈登纪念神学院。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被毁。1902年重建,学校升格为“大学”与“中斋”二部,改名为协和书院。以后逐步加强了自然科学的课程。1912年更名为华北协和大学。1917年大学部迁到北

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改名为燕京大学。原中斋部留原址，更名为潞河中学，由传教士田和瑞继任校长。1927年6月华人陈吕祐接任校长，取消办学的宗教内容，成为华北地区很有影响的名牌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强行接管该学校，陈吕祐离开，1943年在西安建校，1946年迁回通州复校。1951年改为河北省通县中学。

**北京汇文中学** 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的学校。前身为1871年设立的蒙学馆，建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1885年更名为怀理书院，设博学、备学、成美和蒙学四馆，其中备学馆相当于中学程度，除国学外，其他课程都用英文教授。1886年增设医学院。1890年校名定为汇文大学，遂成为大学的中学部。1918年正式成立燕京大学，开始设汇文学院，办成三三制中学及大学预科。1926年3月后由高凤山长期任校长，翌年向中国政府立案，改名京师私立汇文中学，学校进行改良。教学质量较高，成绩中等以上者，可直入燕京、齐鲁、东吴等教会大学。解放后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

**北京崇德中学** 1910年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北京设立的学校。校址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圣公会拨款1000英镑，修建3层主楼1座及2层楼2座，还添设小礼拜堂1座，为英式传统建筑风格。该校于1912年10月开学，首任校长为传教士鄂方智，先后继任者为史多玛和纪铎甫牧师。初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三四十人，为四年制中学，并办有3年级—6年级小学。1923年改为三三制中学，时有学生120余人。学生主要为北京教友子弟以及河北农村各教会选送的学生，也有富裕家庭的子弟。1927年向中国政府立案，并由中国教士凌贤扬接任校长。立案前宗教课为必修，管理很严。毕业生中多报考教会大学，未考者被培养为传教士或农村教员。1939年在日军压力下停办。1940年春，经司徒雷登同意，搬入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遭日军关闭，1945年复校。解放后改为北京市第31中学。

辅仁大学附属中学 罗马天主教会在华创办的学校。1929年辅仁大学停办预科，改办设高初中的附属男子中学。由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附属中学的校长。校址在西城什刹海畔，原清代贝勒府。1951年改为北京市第十三中学。

北京圣经学校 1875年创于北京，乃基督教美以美会主办的宗教学校，是教会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圣经学校之一。该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从事初级布道员及教会工作方面的人才。学校只招男生，学生入学时的文化水平不限。学生来自各省。设专职外籍教师4人，中国籍教师7人，主要开设基督教教义和圣经布道等方面的课程。学制三年，每年开课时间为8个月。

华北协和圣经学院 由基督教公理会、伦敦会和北长老会联合在华创办的神学学院性质的学校，1905年成立于北京。目标和北京圣经学校相同，主要是为教会培养中国籍的布道人员和教会工作者。该校由外籍人员充当教员，只招男生。学生入学时文化程度不限，从文盲到大学水平均可，只要求有志于基督教事业者即予以录取。学制5年，以宗教课程为主，每学年开课时间为8个月。

协和妇女传道学校 1914年建于北京，由公理会、伦敦会、北长老会、美以美会女部等4个英美差会在华合办的宗教学校，只招收女生。学生主要来自当地，招收从初小到中学的各种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进行宗教方面的培训。学校规模不大，旨在培养初级布道员。学制三年，每学年上课8个月。以外籍教员为主，也有部分中国教员。

华北协和华语学校 是基督教新教差会及外国在华机构联合设立的语言学校，1913年成立于北京。开始时由伦敦会的传教士里恩初于1910年创建。后由伦敦会、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英国圣公会、基督教青年会、英、美公使馆、华北美国协会、美国商会、中国博医会等合办。这所学校是为来华的外国人学习汉语而设，故以汉语课程为主，也附设有：中国哲学、神

学、中国风俗和中国问题等课程。学制 5 年,每年 3 个学期。1920 年该校作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独立存在。1925 年夏,学校改称燕京大学华文学校。从创办到 1925 年该校共有 24 个国家的学生在此学习过。毕业学生有 1621 人,其中美国学生 1140 人,英国学生 323 人。

**北京美国学校** 1917 年基督教差会联合在北京设立专收外国儿童的学校,由美以美会、母亲会、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苏格兰互助团和基督教青年会联合创办。该校只面向在京的美国学生和欧洲各国的学生,约有半数是外籍传教士的子女。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为学生将来入美国或欧洲的大学作准备。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该校停办。

### (二)教会大学

北京最早的教会大学,大多由小学到中学及书院逐渐发展,经过扩大、合并和改建而成。

**汇文大学** 由怀理书院(即汇文中学前身)发展而来。是北京最早的教会大学。1886 年在怀理书院增设医学馆,1888 年改名为“汇文书院”并由福勒主教与李安德牧师等创设大学部。1890 年该校在纽约的董事会成立,并在纽约立案,有权授予学位。从此北京汇文大学正式成立。1900 年以后更名为北京汇文大学堂,民国时又改名为汇文大学。学校分大、中、小学三部。大学设预科(3 年)、文科(3 年)、神学科(3 年)、医科(5 年)。大学部的学历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承认,毕业后可免试进入该校深造。中外教员并存,校内宗教气氛浓厚。1912 年时有学生 448 人,其中大学部 81 人。学生一半来自基督教家庭。1919 年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预科与中学部改称北京汇文中学(后称汇文中学)。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是基督教新教差会在北京设立的女子高等学校。1904 年由基督教华北教育联合会与贝满女校联合创办。



1905年定名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开始设大学课程。学校规模小，1909年首届毕业生4名。1919年该校并入燕京大学。贝满女子中学仍存。

华北协和大学 由通州潞河书院大学部发展而来。于1912年正式更名为华北协和大学，1917年迁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改名为燕京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前身为1906年成立的北京协和医学堂，1915年正式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基督教新教差会办的著名的教会医科大学。1906年2月英国伦敦会、美国公理会和美国长老会在北京东单北大街一家医疗诊所的旧地办起了医学堂。不久美以美会、圣公会、伦敦教会医学会加入，由英国人担任负责人。医学堂包括护士学校和附属医院。1908年正式开学，学制5年，至1914年共有120名学生毕业。为了培养女性医护人员，1908年又在北京创办了女子医科学校。1915年学校有了较大的变化。那年6月，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专设中华医学基金，为该学校以20万美元购得东单三条胡同原豫王府房地产，并予以接管。成立了新的校董会，由13人组成，7人由洛氏基金会指派，原6个创办差会各有1个席位。在校学生一二三年级转入山东齐鲁医学院，四五年级继续读至毕业。学校又投资500万美元兴建一组中国建筑造型、西式建筑结构的新楼群。学校正式命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此后6年间聘请教职员151名，其中外籍教员126名，中国教员28名(其中25人曾在外国留过学)。学校完全按美国医学院模式创办，校长由纽约洛氏医学研究所医师马克麟担任。1921年学校兴建完工，9月15日举行新校开学典礼，定本科为5年学制，加上预科3年，共为8年。常年招生25人，最多时不超过50人，淘汰率占入学总人数的近一半。该校用英语教学，注重教学、科研、临床实习的结合，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因而造就了许多第一流的医学人才和骨干。1929年更名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1930年呈准立案。解放后北京协和医学院发展成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

燕京大学 该校成立于 1916 年。它是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妇女会、公理会和英国的伦敦会所合办，由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华北协和神学院四校合并而组成的。1916 年在纽约和北京分别成立“托事会”与董事会，因此一般都以这一年为创校年份。当时学校分男女两部，男部在北京崇内盔甲厂，女部在灯市口佟府夹道。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 1919 年 1 月 31 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他到任后，立即着手选择新校址筹建新校舍。1920 年他以 4 万元的低价从陕西军阀陈树藩处买下北京西郊海淀一带 243 亩土地，在美国霍尔铝业集团、洛克菲勒财团、纽约托事部以及中外人士的大批捐助下，开始了新校址的兴建，1925 年建成。男女部全都搬到了海淀。学校后又扩建，形成占地 700 多亩，有大小宫殿式建筑物群 88 座的美丽校园。到 30 年代该校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也成了名噪一时的教会教育家。学校成立时设文、理两科，未分学系，后经发展，成为文学、自然科学（又称理学）、应用社会学三院（后称法学系），分设国文、英文、欧洲文、历史、哲学、心理、教育、音乐、宗教（后裁去）、新闻、体育（后裁去）、化学、生物、物理、地理、地质（后裁去）、数学、家事、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系。又增设研究院、宗教学院及附属学校。其中以新闻系、社会学系最闻名。新闻系是由 1924 年开设的新闻科发展起来的，和美国最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挂上了钩，聘了一些有名的新闻学教授到校执教。著名的中国人民之友埃德加·斯诺曾应聘于 1934 年—1936 年在该系任教。负责人是伏龙·纳什，后由梁士纯接替。该系还设立了燕京通讯社，独立发稿，出版《燕京新闻》、《平西报》等。毕业生都被介绍到国内许多重要新闻机构任职。社会学系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挂钩，系主任是美国人甘博。他是美国“象牙”肥皂公司的老板，后来到中国，在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从事中国社会调查活动。1928 年该系在北京清河开设

农村试验站，训练学生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国文系也颇有影响，1928年与哈佛大学联合设立了哈佛燕京学社，招收研究生，进行汉学研究，并在中美用中英文分别出版《燕京学报》和《哈佛亚洲学报》。1930年又增设引得编纂处，编印《汉学引得丛刊》等。1929年该校聘请清翰林吴雷川任校长，司徒雷登以校务长名义，仍掌实权。燕京大学1931年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注册。1934年有正副教授111名，其中外籍教授44名。1917年至1936年间共有毕业生1700名。其中进入教育界的40%，宗教界占13%，商界占8.5%，新闻界占3%，出国留学或工作的占2%，从政者逐年上升，20年代约占9%，30年代增至16%。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遭日军封闭，部分师生流亡至成都建校。1945年10月在北京复校。解放后该校由中国政府接管。1952年在院校调整中，其有关各系、所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学院等院校。原校园由北京大学迁入。

辅仁大学 建于1925年，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创建，是天主教在北京地区创办的惟一大学。1912年7月，天主教徒英敛之和马相伯上书罗马教皇庇护十世倡议在北京创办教会大学。1914年英敛之建立辅仁社，位于北京西郊香山静宜园。取《论语》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辅仁”二字作为名称。这是为建大学而作的准备。1918年因经济困难暂时停办。1922年12月罗马教廷传信部长王芳松转谕委托美国本笃会在华创办公教大学。1925年3月，用罗马教廷的拨款10万元(意大利币)和美国密尔瓦基天主教妇女会及个人的捐款共20万美元，购买了北京西城定阜街1号清室皇族载涛的府第为校址，占地60余亩，重建辅仁社。该社先后由英敛之、陈垣为社长，招一班学生，为升入大学作预备。1927年以辅仁大学之名备案，招收本科学生。同年9月26日，大学部举行开学典礼，以奥图尔任校长，陈垣为副校长。当时学校仅有中文、英文、历史、哲学四个系的文科。1929年聘请马相伯、张继、胡适、陈垣、沈兼士、傅增湘为董事，改组了董事会，

以陈垣为校长，并向中国政府教育部立案。学校规模扩大了，改文科为文学院，并增设理学院及教育学院。共有 3 个学院 11 个系，及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人种学等研究所。另设医学先修科及美术专修科。实行预科 3 年制，本科 4 年制。后又停办预科，改为附属男子中学。1930 年新校舍竣工后以新校舍为大学部，原校舍为男子中学校舍，另在太平仓购地开办女子中学。1937 年购得恭王府地，扩建校舍，1938 年招收女生，设女部。抗战胜利后，该校有文、理、教育、农 4 个学院 15 个系。1947 年在校学生有 2383 人。1951 年 10 月学校由中国政府接管，1952 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1960 年，此校又以“台湾辅仁大学”名义在中国的台湾成立，校址在台北县新庄镇。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乃基督教新教差会公理会、伦敦会、美以美会、北长老会联合设立的高等神学院校。由汇文大学神学馆和华北协和道学馆等机构合并而成。1919 年称燕京大学神学科。1926 年改称宗教学院，招收大学毕业生为学生。院址设在燕京大学宁德楼。所开课程多为宗教类的，学院发行《真理与生命》、《紫晶》等刊物。刘廷芳、李荣芳、赵紫宸先后任院长。抗日战争时期该院停办。抗战胜利后，该院复校。1953 年 4 月与北京神学院、华北联合圣道女子学院等合并为燕京协和神学院，院址自燕京大学院内迁出，迁至东城区府学胡同，王梓仲为院长。1958 年停办。1961 年部分教师和学生合并到南京金陵神学院，北京保留一研究室。1981 年，燕京神学院恢复，院址在米市大街，院长为殷继增牧师。

### 三、基督教会医院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一些新教传教士的工作日益世俗化，开诊所、施医药，以扩大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的影响。他们先后在北京办的医院有：

北京双旗杆医院 在英国伦敦会的支持下，于 1864 年由英国医生德捷在英国驻华使馆内开了一间诊所，不久又在东城米市大街买下寺院的一所房子正式建立医院。因门前树有两竿高大的旗杆，故而称之为“双旗杆医院”。此为基督教在北京地区建立最早的医院。该院规模小，解放前已停办。

北京妇婴医院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 1901 年在北京安定门内大二条设立了这所医院，主要收治妇幼病人。该院由长老会委派美籍人员为院方负责人，资金除部分自筹外，由教会津贴。1904 年，在院内创办护士学校。1917 年该院与安定医院合并更名为道济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 美国新教美以美会于 1886 年在北京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创办了同仁医院。当时规模很小，只有 10 余张床位。1903 年扩建，在崇文门内东交民巷东口新址建了西式建筑楼群，医疗力量加强。该院除接诊病人外，还提供条件帮助协和医学堂的学生进行医疗实习，直至协和医院成立为止。长期担任该院院长的美国人贺庆为著名眼科专家，使该院以诊治眼科病而见长，曾专设一新楼为眼科专用。1917 年眼科楼成立耳鼻喉科。1913 年在西山建起一所肺病疗养院，专门医治肺病病患者。1918 年又增开护士学校（只招男生）。1942 年被侵华日军占据，改称北京第二医院，不久日本人又将其改称“开发医务组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美国教会重新收回管理权。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一家综合医院。

北京安定医院 1901 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北京交道口设的医院。该院由教会派出院方的负责人和主要医师，资金由医院自筹和教会资助。1917 年该院与北京妇婴医院合并，组成道济医院。

北京万生医院 法国天主教会于 1902 年在北京平安里前毛家湾建立的医疗机构，初名万森医院。该院规模较小，仅设内、外、五官等科。人员配备和资金来源主要靠教会。1952 年人民政府接



管,改为北京第七医院。1958年迁到西什库后院,称平安医院,归属北京医学院领导。

**北京协和医院** 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一座临床各科齐全的综合性医院。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购得东单三条胡同原豫王府的全部房地产后,在此兴建了北京协和医院。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的兴建工程全部完成。14座中西合璧现代建筑成为北京最重要的医、教、研相结合的中心。协和医院从基建到医院内部设计、医疗设施、医生培养和医疗管理等全部按照当时美国医院的水平制定。医院规模大,有行政楼、门诊楼、病房楼等。院内设有病床250张,设备齐全先进,有内科(包括儿科、神经精神科、皮科)、外科(包括骨科、泌尿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眼科、妇产科、放射科等各科齐全。该院医疗、教学、科研并重。医院临床各科设有专门实验研究室,临床各科的主任为各科的教授,主治医师为各科的副教授、讲师等。他们在完成临床和教学任务的同时,安排时间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该院从教学用书到病历、处方、化验单全部都用英文。医院还附设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医院制度严格,实行“住院医”制度(初次受聘,年资较低的医生,头三年必须住在医院之内,实行“每日24小时制”随叫随到),还有严格的大巡查和会诊制度等。早年的协和在学术上有许多重要贡献,尤其是钙磷代谢等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日军攻占北京后,该院一度被改名为日本陆军医院。1946年继续由教会和洛氏基金会接管。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办。

**北京道济医院** 1917年由北京妇婴医院和安定医院合并组成,属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华设立的医疗机构。院址在北京安定门内大二条。该院由教会委派的美国人任院长,初期设有病床70张。院内设内、外、妇、儿等科,其中妇产科和外科享有盛名。并设有护士学校。1933年成立董事会,吸收中国人参加。1940年开始由中国人任董事长。日军攻占北京后,护校停止招生,医院

改名为北京市第三医院。日本投降后长老会收回医院，恢复了道济医院名称，又将北京卫黎癆病医院并入，重派美籍人员管理医院。解放后改为北京第六医院，护校更名为第六医院护校。

#### 四、基督教与北京文化教育近代化

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在北京展开了多方位的文化活动，在京城创建了许多学校、医院，并出版了不少著作和刊物。对此应如何评价呢？

应该说，一方面教会和某些为首的传教士们从事文化事业是以文化扩张和奴化教育为特征，是一种文化侵略；另一方面，它确实又在北京传播了科学、医学、哲学、教育等各方面的知识，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和推动北京近代化过程中，客观上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传教士在北京活动的主要职能是企图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传教是教会在中国发展的目的，他们始终未忘要用十字架与圣经和平地征服世界。明恩溥有一段很好的自白，他说：“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得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sup>①</sup>在北京的基督教其最高主旨还是宣扬对上帝的膜拜，宣传忍让与服从来世和天堂。这一切，实质上是与列强的侵略相协调和呼应的。在“基督教占领中国”、“西学优于中学”的旗帜下，传教士们附带地传播了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因为近代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使他们很快就悟出

<sup>①</sup> 明恩溥：《今日之美国与中国》，第 236 页（英文版）。

了一个道理，异教徒的国家中很少有像在中国那样，文化与国家生活如此紧密相关。所以他们必须调整“向河中洒种”，以便于争取下层群众的战略，而把传教的目标转向中国上层，他们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教会中不少人也深知，中国总有一天要掌握西方科学、发展自己的新式教育系统的，如果教会不捷足先登，以基督圣经来培养至少是亲基督教会中国知识分子，从而“控制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教会“过去的敌人是儒教，而未来的敌人就将出自理性科学的怀疑主义”。<sup>①</sup>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院长顾林说：“以一百元美金办学校，比用两百万美元帮助军队的效力更大，军队可以叛变，学生忠诚不变”。<sup>②</sup>美国伊里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更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们在中国进行文化教育活动的目的。他说道：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年青的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将由于这一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收获。所以传教士们也重视文教事业，并把它作为传教的手段。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侵略是其主流。因为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始终笼罩在外国列强侵略中国这一巨大的历史阴影之中，无论是他们办的学校或设立的机构都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之下，超出了中国政府的管理范围，对中国的主权构成严重的侵损；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进行无所不及的渗透、干预和操纵控制，从而猛烈地排斥和冲击了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助长了崇洋媚外等恶劣的社会心态和奴化心理，加快了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传教士们加强在华的文教、医务和出版事业，作为传教和对中国社会精神空隙渗透的手段，所以从 19 世纪 60 年代直至本世

<sup>①</sup>刘广京编：《美国教士在华言论》，第 58 页。

<sup>②</sup>《国际宣传评论》第 37 卷，第 488 页，转引自《基督教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存稿，第 41 页。

纪 40 年代，各传教团体不断扩大在北京的文化教育和医务事业。对此，我们除看到其文化侵略的主流性质外，同时也不可否认它对中西文化交流起着积极作用的方面。一些传教士曾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基督教教育与基督教在北京的传播几乎是同步进行，教育作为提高教会形象的手段而被列强所重视。经过七八十年的漫长岁月，基督教在北京的学校逐渐由小到大，由低变高，由普通到专业，最终成为了在北京文化事业的主体。基督教在北京高等教育事业的出现，无疑为基督教在北京传教活动开辟了新的领域。教会大学是殖民侵略在文教领域加深的标志，它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移植，是出于西方列强试图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模式，从而成为西方文化附庸的需要。这种文化不仅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组成部分，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而且造成了中国民族心理上的创伤。传教士们认为教会大学是接近中国上层的途径，并且能培养为其所用的知识分子和人才来取代封建士大夫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他们相信教会大学将造就中国的宗教领袖和教会职业人员，在传教方面“可以做大多数外国人不能做到的事”。<sup>①</sup>但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基督教教育与传教两者的区别，特别是办大学。教会是维护非理性意识的堡垒，大学则是宣传理性主义的阵地，是传播科学知识的场所。在北京的教会大学并没有被办成传教士自我封闭的神学阵地。教会为了传教借助于教育，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因为教会大学是基督教理性和世俗化过程中的产物，它不仅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在北京的出现和发展，在当时中国教育极其落后的状况下，曲折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教会教育使西方的教育体制、教育制度以及文化、观

<sup>①</sup>刘广京：《美国教士在华言行论丛》，第 57 页。

念、习俗等传入中国，从而冲击了中国旧式的教育制度，使旧式的学塾和书院逐渐让位于新式的学校。通过教会办学，使资本主义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传播到北京，在北京也开了男女同校上课的先河。特别是教会所办的女子学校的出现，则更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鸦片战前中国不曾有过专门的女子学校，以往的女子教育无非是以《内则》、《女诫》、《女孝经》等所说的封建社会遗规，由富贵之家在家庭中对女子实施训导，以养成合乎封建礼教的贤妻良女，而绝大多数劳动妇女则终身受不到文化知识的教育。其次，教会学校带来了西方的教育思想、知识结构和科学的系统，反映了新兴工业社会的要求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史无前例的挑战，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儒家的一贯重道轻器观念。在中国，重功利的经世之学随之而兴起，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观念的传播也冲击了封建的伦常观。新的知识启发着中国人去重新认识外部世界，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必然要引起深刻的思想变革。再次，教会大学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的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技术和文化骨干。教会大学开设了文、理、医、工、农等各科，打破了中国封建学塾制度的狭隘性、片面性和神秘性，适应了社会的发展要求，造就了新型人才。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都教育、培养出了不少全中国第一流的人才，对学术界、科学界和宗教界、医学界，对国家和社会的建设都做出了贡献。第四，女子教育和女子大学的出现，在女界培养了人才，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女界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思想解放。教会女校对中国的陋俗的改变也有一定的作用。如 1872 年在北京负责教会女校的波特和柏诺就将不缠足作为学生入学的条件。第五，教会教育是促进北京乃至全国变革的催化剂之一。早期北京的教会学校，是北京青年接触、了解西方文明的场所，它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动摇，从而迟早会削弱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某种意义上推动了社会变革。



教会还在北京办了不少医院，此乃基督教在北京传教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些医院除创办资金、购置医疗设备等项外，教会医院的日常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国。一半来自医药费收入，另一半来自就地募捐。医院对中国富裕的人收取高额费用，但对贫苦教徒减免医药费，以获取好感。这些医院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和近代医院制度、医学（包括护理）教育引入到中国，也训练了一大批西医和护士。

在北京的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大批的西学著作和创办了报刊杂志，广泛传播了西方的民主意识和科技知识，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着积极的作用。

传教士在北京开办的学校、医院和出版机构等，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用人精干、办事效率高、建筑设备新颖实用，这些为北京乃至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都提供了借鉴。

但是同时还必须指出的，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能作脱离实际地过高的估价。近代中国由于人才的匮乏使传教士得以跻身于西学东渐的潮流之中，使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但 19 世纪末以前来华的传教士中，受西方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数并不多，他们并不都是学有专长者，在介绍西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偏差。在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的科学技术时，常常有意加入反科学的内容，将科学歪曲为上帝的旨意，同时也忽略了对盛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介绍。到 20 世纪上半叶时，传教士在北京办的文教医疗事业的规模虽已远远超过了 19 世纪，但这时，在西方不属于宗教团体的文化人相继来华和大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已逐渐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教会和传教士已不能一统天下了。再者，必须指出：传教士在办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等事业中，都得到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协助、支持、参与和合作。如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重金礼聘一批中国籍教授到该校执教。吴雷川、刘廷芳、陈垣、顾颉刚、冯友兰、许地山、

张星焯、郭绍虞、梁士纯等学者，都在“燕大”任过教。协和医院的大部分医疗和护理工作也是由中国籍医务人员来担任。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贡献，也需充分肯定而不能忽略。

## 第五章

### 东正教在北京

东正教是基督教中的一派，与天主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主要派别。公元 395 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后，基督教亦随之分化为东、西两大派。1054 年，东、西两派教会大分裂以后，东部教会以“正宗”“正统”自居，自称“Orthodoxia”（即“正宗”“正教”意）。因东部为希腊语地区，最初在宗教仪式中主要用希腊语，故又称东正教、希腊正教。东正教以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为最高教首，不承认罗马教皇的至尊地位。其教义、圣事等，同天主教亦略有分歧。在中世纪，东正教长期受拜占廷帝国控制，教权从属于皇权。10 世纪，正教传入俄罗斯，并被立为国教。12 世纪后，莫斯科公国逐渐强大，每次对外扩张或抗击异族侵略中都以东正教为号召，乃逐渐形成了使用古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1453 年拜占廷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后，东正教普世牧首座堂——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16 世纪后，东正教会的历史是由各自主教会的历史所构成。俄罗斯正教会成为东正教中最大的自主教会，随着俄罗斯帝国版图的扩大，俄罗斯正教会传教士们的活动区域也从欧洲向亚洲和北美发展，逐渐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为中心的希腊正教并列。因此改变了人们习惯上称东正教为希腊正教的概念。自 16 世纪末起，设置了莫斯科大教长区，从此俄罗斯正教会真正成为东正教中最大的教会。

东正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力，同天主教相比，它有本身的特点，即：1. 东正教在得救之道上，强调“道成肉身”，认

为人之得救在于把有罪必死之人变成神的永远不死的生命，不同意天主教的“救赎论”。2. 强调信守公元 325 年—387 年间所召开的七次主教公会议的决议，不承认嗣后天主教会所举行的历次主教公会议。3. 不同意奥古斯丁主义的“预定论”，强调世人只有选择善行，重视讲道，才能取得天主赐予的恩典。有自己单独的宗教仪式。4. 除主教外，一般教士可以结婚。再则，东正教各自主教会除继承东派教会传统外，不同的民族教会保有各自的习俗。各个教会独立性强，这与天主教会都集权于罗马教皇一身有别。

在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曾对俄罗斯正教进行了改革。1721 年，他颁布敕令，废除俄罗斯正教的牧首制，建立由政府管辖的“俄罗斯正教宗务会议”（开始称宗教部，后称圣务院、正教院），机构首脑由沙皇直接任命世俗官员担任，自此教会实际上成为国家的一个行政机构。一些教会史中，把 1721 年视作俄罗斯正教成为沙皇国教的开始年。俄罗斯正教成为了沙俄对内加强统治和对外侵略的工具。从公元 17 世纪末起，它利用传教等方式，向中国、北美、日本派出传教团，进行各种活动。东正教对中国的传教，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的活动特点。

## 一、东正教的开始传入中国

17 世纪中叶，中国明、清两朝交替，清军主力入关，沙俄边境的一些武装人员和盗匪趁机不断侵扰中国边境的城镇。1665 年，沙俄的一个原流放犯，当时担任一个盐场的管事切尔尼戈夫斯基，他在杀人劫物后，为躲避俄国当局的查处，纠集了伊利姆斯克堡修道院长叶尔莫根等 84 人，窜入中国境内的雅克萨（阿尔巴津），公开侵占此地并建堡垒，设粮仓和弹药库。于是俄国的一些强盗、流亡者不断流入到雅克萨。切尔尼戈夫斯基等入侵者甚至反而向中国的当地居民强征各种捐税。1671 年，叶尔莫根在该地建立了一座“基督复活”教堂，五年后，又在距雅克萨不远的

磨刀石山，建立了“仁慈救世主”修道院。这是东正教进入中国之始。

1685年，由于“罗刹复肆扰”<sup>①</sup>，中国康熙皇帝乃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通过自卫反击战收复了雅克萨城。在对俄入侵者的历次战争中，俘虏了几批战俘。<sup>②</sup> 1681年俘31人，1684年俘22人，1685年又俘46人。前两批战俘都送往北京交户部处理，后一批中40人遣送盛京，仅6人押送北京。在送到北京的59名<sup>③</sup>俄国战俘中，有一个名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的东正教修士<sup>④</sup>。清政府根据处理战俘的惯例，对俄俘妥予安置，将他们编入保卫京畿的八旗兵中的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之内，驻在北京城东北角东直门的胡家圈胡同中<sup>⑤</sup>。对俘虏中的军官分别赐予正四品到正七品的官衔，还赐给上地、房屋等，并定期发放津贴。清政府为了照顾战俘的宗教生活，还将胡家圈胡同中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临时祈祷所，在其原址的基础上改建为东正教教堂。北京人俗称其为“罗刹庙”<sup>⑥</sup>，也称俄罗斯北馆。因这座教堂中有一幅由战俘从雅克萨（阿尔巴津）带来的“显圣者尼古拉”的圣像，而俄国人特别崇拜尼古拉圣像，故此教堂又被称为“圣尼古拉”教堂。从此，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便开始在北京传教。中国清朝政府尊重俄国战俘宗教信仰的信息传回到俄国后，引起俄国正教会的特别关切。

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俄国西伯利亚行政中心托博尔斯克东正教区的都主教伊格那提根据沙皇彼得一世的旨意，专门托

①《清史稿》，第153卷，第4482页。

②除被俘者外，也有招降来的或主动投诚的，俄史籍中称他们是“阿尔巴津人”。

③一说近100名，见：李淑兰：《北京史稿》1994年10月，学苑出版社版，第221页。

④北京人称他为司祭，“达喇嘛”。

⑤俄国人称其为“七只街”。

⑥梵文译音，“恶鬼”意。



来华的商队，给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修士捎来一份教会证书，正式承认北京的东正教教堂，并将此教堂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sup>①</sup>伊格那提在信中指示说：“你（指列昂节夫修士）被俘虏，这对神圣事业有利，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要依靠你们来加以传播。你“不仅要为沙皇祈祷，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的立足点”。列昂节夫在北京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后，不久便受到沙皇彼得一世的重视。1698年，当彼得一世带着“使团”访问维也纳时，突然收到了西伯利亚衙门长官维尼乌斯的关于“北京俄罗斯正教堂举行祝圣仪式”的奏折，他立即复函批示道：“此举甚佳。为了上帝，行事宜谨慎，切勿鲁莽，以免结怨于中国官员及在当地安营扎寨多年的耶稣会士。为此，我们应当在那里有一些不是过于博学，而是机智、谄于世故的司祭，避免因过度骄傲而使这一神圣事业像在日本那样遭到毁灭和失败”。彼得一世还一再强调：“必须占有对俄国未来发展异常重要的黑龙江口”。

公元1700年6月29日，当时正是彼得一世准备对瑞典发动进攻、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北方战争”的前夜，彼得一世并未忘记通过东正教的传播，以便扩大俄国对中国的影响。他发布“特谕”，提出“要认真物色西伯利亚都主教人选”。并要俄罗斯正教会把“研习和通晓汉、蒙语言”以及“调查中国情况”，“提到国家利益的高度”。他要求教区向中国加派传教士：“逐步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愚昧无知、执迷不悟的生灵，皈依真正的“上帝”，以便使“中国皇帝及其臣民从罪恶的黑暗中走向正教信仰的光明”。此后，俄国传教士们多次随商队同来北京。

彼得一世并不限于关心俄国战俘在北京的宗教生活，为了其向远东扩张的战略目标，他亲自抓紧了东正教传入中国的活动。彼得一世利用当时中国康熙皇帝准备派遣太子侍读殷扎纳、郎中那

<sup>①</sup>当时北京人俗称其为“罗刹庙”，罗刹乃梵文译音，“恶魔”之意。即俄国“北馆”。此教堂后来改名为“圣母安思院”、“圣母安思修道院”。

彦和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人，经过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流域访问流落在那里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一事，在 1711 年派胡佳科夫率领俄国商队前来北京。胡佳科夫利用中国皇帝急于遣使去土尔扈特蒙古部落的心理，提出了请中国允准俄国遣修士大司祭来北京接替列昂节夫司祭的神职工作，作为同意中国使者进入俄国境内的交换条件，康熙皇帝答应了这个要求。1711 年，沙俄正式决定委派雅库茨克的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接替了原战俘、修士列昂节夫的工作。

公元 1714 年（康熙五十三年），当中国的使者殷扎纳、图理琛等人完成使命自俄启程回国之际，彼得一世派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率领由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修士辅祭菲利蒙、教堂辅助人员阿法纳耶夫等 10 人组成的一个传教士团，同殷扎纳等一路同行前来中国。这便是历史上第一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他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公元 1715 年 4 月 30 日，即康熙五十四年 3 月 27 日。

由依腊离宛率领的传道团到北京后，受到清政府的隆重礼遇，清朝的一些王公官吏并无戒心地同他们相处。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住在圣尼古拉教堂，这里便以俄罗斯“北馆”而闻名。自此，“中国东正教会”便正式成立了。康熙皇帝封修道院长依腊离宛为五品官，封教士和司祭为七品官。清政府给他们以经济上的优厚待遇。发给依腊离宛银子 800 两，发给其他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 600 两，教堂执事人员每人 200 两，让他们用来购置自己的房产。同时又发给依腊离宛银子 700 两，给修士和辅祭每人 500 两，给教堂执事人员每人 150 两，让他们作为购买奴仆的费用。清政府理藩院还按月发给修士大司祭和其他神职人员以津贴，供应每天生活的零用。每隔 5 天送鸡、鸭、鹅、羊等各种食品一次，甚至包括烧柴等也由清政府负担。这种“天朝洪恩”的待遇，从 1715

年起，一直维持到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时。<sup>①</sup>

沙皇彼得一世的御医的养子瑞典籍工程师劳伦茨·郎格，是彼得一世的亲信，曾在沙皇资助下留学柏林。他在 1715 年~1736 年的 22 年间，以俄国商队驻办专员的身份六次来华，监护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活动。北京东正教会大司祭依腊离宛抵北京后没过几年便因酗酒过度而死去。彼得一世得知此讯后立即下谕，命“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物色一名“品德高尚”的人，授予他主教头衔后速派往北京，以便“引导中国皇帝赞助神圣事业”。俄国枢密院在致清朝理藩院的信中，要求清政府允许传道团的修士大司祭在北京有权自由居留，自由走访有俄国教徒居住的中国其它各地。

1727 年（雍正五年）7 月 18 日，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sup>②</sup>。根据此约，中国的东正教会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承认。该约第 5 条规定：“在京城之俄馆，嗣后仅准前来北京之俄人居住。俄使萨瓦请造庙宇一节，由中国办理俄事务大臣协助于俄馆内盖庙。现在住京喇嘛 1 人，按请求准再补派 3 人，俟其到达后，照先来喇嘛之例，供以膳食，安置于馆内，礼拜念经，不得阻止。再将萨瓦留于京城念书之 4 名学生及通晓俄文、拉丁文之两名成年人，亦准住此庙，并以官费养之。”<sup>③</sup> 根据此约，俄罗斯正教会取得了每隔一定时间定期向华派遣传教士的权利。此后，俄国每隔 10 年派传教士团来北京，其中包括神职人员 4 名，随行的“学生”6 名，均由清政府供应食宿。

俄罗斯正教会还取得了在北京建盖新教堂的权力。1727 年，清政府准建新馆，于 1732 年俄罗斯正教驻北京的传道团便正式成为了一个常设机构。他们的驻地也迁移了，从东直门的胡家圈胡

① 从 1715 年至 1860 年的 145 年间，沙俄先后共派遣了 13 届传教士团到北京。

② 恰克图乃中俄边境城邑名，原通商要埠，在此签约后，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归俄，于旧市街南另建新市街属中国。

③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9 页。

同迁到玉河桥西的东江米巷(即以后的东交民巷)。在新址建立的新教堂称为“奉献节教堂”，于是“显圣者尼古拉”的圣像也由“圣尼古拉”教堂，搬到新建的“奉献节教堂”之内。此即中国史书中所指的俄罗斯在北京的“南馆”<sup>①</sup>，后来又称为“马利亚教堂”。从此以后，这个“南馆”成为商馆、学馆和俄罗斯正教会驻北京传道团的“三位一体”相结合的地址。许多俄罗斯来华的使臣、商人、传教士们多半住在这里并在此过宗教生活。他们经商和在宗教掩护下进行搜集情报、资料等活动。

俄罗斯正教会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不完全是一个宗教组织。因为自 1720 年彼得一世对俄罗斯正教加以改革后设立了“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相当于“正教管理事务部”的建制)，其首脑称为“总监”，是沙皇的总代表，直接向沙皇负责，参加内阁会议。从这时起，俄罗斯正教实际具有了国教的地位。因此，“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派驻北京的传教士团，实质上成为沙俄政府派驻北京的一个官方代理机构，从事外交事务，执行沙俄的对华政策。每年由沙俄政府拨予 16 000 多卢布的活动经费。他们的使命主要不是宗教活动，而是搜集“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情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沙俄驻“北京的传教士团”接受俄国政府指示，经费由俄官方提供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东正教传教士团的这种官方身份，是同时期北京的其他天主教、新教传教士们并不具备的。

东正教以北京为中心，向各地传教活动的初期成效不大。因为俄国传教士和教徒的生活习俗同北京人差异很大。他们经常酗酒闹事，引起中国人极大反感。尤其是因为传教士的主要任务是窃取情报，调研中国情况，而且传道团来北京轮换的周期越来越短，因而影响了传教效果，中国人信奉东正教的甚少。据统计，迄

<sup>①</sup>原“北馆”仍长期保留。

1860年(咸丰十年),在整个北京城内,包括已定居的俄国籍的东正教徒在内,所有的东正教徒仅约有200人而已。<sup>①</sup>

18世纪初,在中国清朝康熙时代的晚期,由于罗马教皇及其特使铎罗、嘉乐等人的妄自尊大,一再干涉中国主权,甚至扬言教皇反对中国礼仪的禁令“不能更动一字一文”,因而中国在天主教问题上态度严峻,从1723年起,开始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实行禁教政策,但是当时对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性质和活动,却丧失警惕,未予重视和加以必要的管理。

## 二、1840年以前沙俄派驻北京的 历届俄罗斯正教传道团

在沙皇彼得一世的直接指挥和派遣下,第一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在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率领下在1715年抵达北京后,中国的康熙皇帝指派一名亲信大臣专门照料他们并给予许多特惠。这批人中,依腊离宛和修士司祭拉夫连季等都被康熙封官、赐银。传道团中教堂辅助人员卡尔马克和克柳索夫在教堂供职的同时,还被列入到清朝八旗编制之内,亦有武官头衔,又在北京结了婚。依腊离宛过的是呼奴唤婢,出则高车驷马,骄奢淫逸的生活,修道团放债,包揽诉讼,胡作非为。不久,由于依腊离宛侵吞修道团成员的月银,引起内讧,依腊离宛本人过度酗酒,而在1717年10月10日于北京去世时该团已瓦解。

隔12年之后,根据沙皇彼得一世的谕令,第二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在伊尔库茨克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的率领下,偕同修士辅祭约阿瑟夫等人于1729年6月17日抵达北京。上一届传道团成员、被康熙封为武官的拉夫连季继续留任。与这届传道团同来北京的还有卢卡·沃耶伊科夫等3名学生。

<sup>①</sup> 据《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00页。



1732年,实权人物劳伦茨·郎格<sup>①</sup>率商队来北京时,又有巴里什尼科夫等4名学生随行。他们抵北京后,对地震中已倒塌的“圣索菲亚”教堂(即“圣尼古拉”教堂)重新加以修建。由中国政府出资为俄国在东交民巷新址兴建的“奉献节”教堂在1736年建成。这时,由于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在任内挪用公款、诬陷别人,以及同劳伦茨·郎格争权,已被革职押送回俄。新教堂便在劳伦茨·郎格的主持下,成为了俄罗斯在北京的“南馆”。他们把“显圣者尼古拉”的圣像及大司祭的金线祭服、领带、教堂用的大钟、福音书等,均从“圣索菲亚”教堂迁入“奉献节”教堂之内。而原来“圣索菲亚”教堂此后习惯上称之为俄罗斯正教在北京的“北馆”。

第三届驻北京传道团(1736年—1744年),是以贝加尔湖东岸“主易圣容”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为首于1736年到达北京。同年12月20日,他在北京主持了“奉献节”教堂的祝圣仪式,还在此教堂的屋顶上安装了一个镀金铁质十字架。他在任期间其下属的学生弗拉迪金准尉曾向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控告说:“特鲁索夫身着女人装在修道院内游逛,甚至变卖教堂中的银质祭器,后由留任的修士辅祭约阿瑟夫赎回并带着银器找大司祭对质……”。特鲁索夫因酗酒无度患了癫痫病于1741年4月20日在北京去世。特鲁索夫死后,驻北京的传教团曾有一个过渡班子领导到1744年。

第四届驻北京传道团(1745年—1755年),由基辅的“米哈伊尔”金顶修道院副院长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晋升为修士大司祭后,任领队于1745年11月27日抵北京。他本人精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北京竭力结交并贿赂清政府官员和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他们搜集情报资料的工作,从情报的种类、内容和数量看,比以前几届传道团的成绩大得多。他本人于1755年返回俄国。

<sup>①</sup>即彼得一世御医的养子。

第五届驻北京传道团（1754年—1771年），由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亲自过问过这届传道团的组成。从这届起，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传道团的修士大司祭专门配备了两名教堂辅助人员，成为驻北京传道团的制度。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率团随同阿历克赛·弗拉迪金监护的商队于1754年12月25日到达北京。尤马托夫在北京继续拉拢、贿赂清政府的官员和耶稣会上。他明确地说：“住在北京的俄国修士必须利用耶稣会上，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探听到当地很多事”。这届修道团还栽种和出售花、木、果树等以扩大资金，获得各种情报。第五届传道团的十年任期届满时，因沙俄内部的原因没能及时派来下一届修道团，尤马托夫本人1771年在北京病逝。

第六届驻北京传道团（1772年—1780年）是著名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以后派出的。此团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原来是“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下属神学校的法语和德语教师。他在十四等文官伊古姆诺夫的护送之下，于1772年1月抵达北京。这时，俄罗斯的“南馆”、“北馆”已破烂不堪，大部东西被传道团中酒徒给变卖一空，茨维特在北京9年，没有“成绩”，回国后被降职处分。

第七届驻北京传道团（1781年—1799年）领队人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于1781年11月到北京。他们在启程前，收到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于1780年4月6日下达了“工作指示”，这是总结前六届驻北京修道团的各种经验，结合沙俄政府的战略目的而作出的。总的要求是必须按照彼得大帝1724年1月13日谕旨中的规定行事。计有：（一）对俄罗斯正教要笃信不渝；要勤奋，以身作则；（二）一到中国就要努力学会他们的语言、要修身、善于劝化别人；（三）接受新教徒要谨慎，及时上报；（四）遵循俄罗斯正教传统礼仪，举行奉献节等活动；（五）牢记沙皇皇室成员的各种纪念日；（六）尊重汉人和北京居民的习俗，处事谦和；（七）属下应绝对服从修士大司祭，对修道团成员应严

格管理；(八)修士司祭辅祭少外出、少惹事，免遭非难；(九)尽量把当地动态及时写材料上报；(十)同耶稣会士、天主教士勿深谈，不同他们争论信仰和教义；(十一)严防泄密。凡保密事，不准在私人信件中提及。以上这 11 条对以后各届驻北京传道团均有指导意义。

第八届传道团由出生于白俄罗斯的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率领，于 1794 年 11 月抵北京。索夫罗尼因扣发下属人员薪金及本人聚敛钱财、发放高利贷，而受到后任的告发。他在任 13 年，既不懂也不学汉语、满语，工作又无“建树”，但回俄后却领到了奖金。

随第一届至第八届俄罗斯驻北京传道团、由沙俄外交部派出来华的“学生”计 24 名。在 1738 年，第二届“学生”罗索欣从中国清朝理藩院中盗窃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转呈给沙俄枢密院后，他本人获得了准尉军衔和每年 150 卢布的赏金；1746 年，第三届的“学生”弗拉迪金和贝科夫回俄时带回不少机密情报，其中包括摹绘的《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全图》。传教士团声称由于有翻译在理藩院任职，故对华情况了若指掌。

自第九届传道团（1808 年—1821 年）起，沙俄政府将传道团从原归西伯利亚总督衙门管辖，改为直接归沙俄外交部领导，以便秘密地为其侵华政策服务。雅金甫·俾丘林修士大司祭由于受到当时率领代表团赴北京的戈洛夫金伯爵的赏识和推荐，而担任了第九届驻北京传道团的领队。他本人精通汉语、满语，在任期间，自称“何先生”。他被誉为俄国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他本人自诩“热爱中国”，标榜中国是他的第二祖国。他经常身穿满族绅宦服装出入北京大街小巷；或利用宗教身份到处奔走；或化装去郊区以“游览”为名蒐集情报；或借故到清政府理藩院办理公务而刺探内情。他曾结交清朝权贵和蒙藏贵族上层。1810 年秋，雅金甫向伊尔库茨克总督送去有极高价值的情报资料，其中包含清政府对俄、英等各国的外交方针，西欧天主教会

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以及中国广州等地的商贸、物价情况等，这些材料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制定与英、奥结盟，反拿破仑、以及俄国侵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817年，他根据实地测量，绘制成一幅“北京城廓平面图”，标明北京城墙高10.2米、上宽15.24米、下宽18.9米，又标出大街16条、小巷(胡同)共384条，桥梁370座，寺院700所。他将此图及中国各地的矿物标本也上交给伊尔库茨克总督。他本人回俄时，曾掠夺去我国大量文物和文化典籍，共达几吨重之多。他的译著和著作甚丰。曾译出：《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四书》等。还出版过《西藏记事》（1828年）、《蒙古札记》（1828年）、《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远古和现状记述》（1829年）、《成吉思汗前四汗本记》（1829年）和《北京记事》（附北京城廓《平面图》）等著作。雅金甫因其《西藏记事》和《蒙古札记》的学术价值而被俄国科学院选为东方学和生物学通讯院士。雅金甫因其《西藏青海史》（1833年）、《中华帝国详志》（1842年）和《中国国情与民风》（1848年）曾先后三次荣获沙俄科学院奖。

第十届传道团（1820年—1831年）由修士大司祭帕·伊·卡缅斯基率领，他在离俄前受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召见。沙皇钦赐他珍贵的十字架和二级圣安娜勋章各一枚，和一套精制的祭服、一顶贵重帽子以及大量图书。尼古拉一世还给予传道团所有修士司祭以尝佩方撝（将方形锦缎饰物斜佩于祭服外面股侧）之荣誉。传道团于1821年抵北京之后，所有成员不仅增薪，配备医生，而且都被授予了官衔。从此，传道团内受命成立了由修士大司祭主持的教务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卡缅斯基从北京回俄后亦受到沙俄政府的优厚待遇，获得200银卢布的奖金。

第十一届驻北京传道团（1831年—1840年）由维·莫拉契维奇修士大司祭率领。19世纪以来，沙俄传道团来北京轮换的周期缩短，团中非神职人员日益增多。本届随团监护官竟由沙俄参谋部的上校军官拉迪任斯基充任。大司祭利用团内画家和医生的特

长，为清朝官员画像和治病，从而利于广泛收集情报。随这届团来北京的还有俄国大学的专家、教授，任满回国时，所有成员都得到了奖赏。

迄 1840 年时，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活动，日益受到沙俄政府的重视和肯定。

### 三、1840 年—1860 年俄国正教驻北京 传道团直接参与沙俄的侵华活动

从 1840 年—1898 年，是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侵略、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最苦难的岁月。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从清朝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起，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频频加到了中国头上。沙俄是继英、法之后，又一个野心极大、疯狂侵华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

从 1715 年—1840 年之间，俄国正教向北京共派出了十一届传道团。俄国传教士根据沙俄的侵略方针，主要任务是：（一）建立和巩固在北京的传道团据点；（二）通过学会汉语、满语、“研究汉学”和结交清朝官员等主要手段，以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为主。这便是上一阶段东正教在华活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自 1840 年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鉴于鸦片战争后英国在华获得巨大权益，他下决心要完成老沙皇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扩张宿愿，实现“东方政策”，向东夺占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得到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由于沙俄在 1828 年—1829 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占领了克里米亚、多瑙河口和高加索的大片土地。沙俄为了进一步争夺黑海出海口和巴尔干，乃同土耳其、英、法之间剑拔弩张。封建农奴制的沙俄，无力同时在西、东两线大规模作战，沙皇乃制定了以对欧洲的扩张为主，同时加紧蚕食、并吞东方的侵略方针。

1847 年，穆拉维约夫任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后，制订了“以



最小代价取得最大利益”的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阿穆尔”地区）的侵略计划，即：（一）加紧侦察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及黑龙江边境的情报；（二）为了实现远侵，加紧准备军粮、经费及军需后勤供应；（三）筹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队和西伯利亚区舰队。沙皇尼古拉一世和穆拉维约夫都特别重视北京传道团提供的最直接的情报资料。1849年，根据尼古拉一世的诏令，在彼得堡成立了专门审议“阿穆尔事务问题的特别委员会”。

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在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活动中，直接投入侵略工作，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团（1849年—1858年）的领团人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于1849年抵中国赴任后，向沙皇政府不断提供“经常的、十分详尽的关于中国事态的情报”。穆拉维约夫在1852年当收到卡法罗夫的有关中国内部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重要情报时，他曾向沙皇尼古拉一世直接提出了系列的侵华方案。其中提到“应利用中国皇帝目前的困境”，致书清廷，表态乐于援助，以便诱使“中国皇帝在逃亡时，寻求俄国的庇护”等。卡法罗夫大司祭提供的情报很详尽。他甚至从北京茶庄中哪几种茶叶货源短缺的行情当中，判断出这些茶叶产地已为太平军所占领。从此例可以证明，卡法罗夫情报的细致程度。卡法罗夫大司祭的各种情报，促使穆拉维约夫加快了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步伐。

1853年，穆拉维约夫直接派兵到黑龙江下游奇集湖附近建立了马林斯克哨所。1854年2月，沙俄外交部公然通知中国道：俄国“将沿阿穆尔河（黑龙江）运送货物，并派穆拉维约夫同中国政府就划分阿穆尔河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1854年，沙俄侵略军准备进侵黑龙江之前，东正教士们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东正教堂上竟然挂起了这样的标语：

拿下阿穆尔，守住这边疆！

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

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的地方。<sup>①</sup>传教士们狂妄嚣张的气焰，由此可见一斑。

沙俄同英、法争夺巴尔干的克里米亚战争于 1856 年惨败。沙俄在近东的扩张企图受挫之后，乃在东方加紧侵略活动并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1856 年，俄国正教第十三届驻北京传道团的头子巴拉第·卡法罗夫大司祭向穆拉维约夫密报：“中国政府由于内乱四起，不得不对我国采取妥协政策”，此间中国政府“对有争议的黑龙江一线既明知难保，势必承认新边界这个事实，……根据中国的外交本性，当自然边界尚未按时效权变得无可争议之前，我们惟有巧妙地避免张扬，不动声色，从各方面加以掩盖”。<sup>②</sup>这个大司祭热衷于侵略扩张的本性从这一建议中昭然若揭。穆拉维约夫指示卡法罗夫“在北京尽力施加影响，使边界问题的解决对俄国有利。”<sup>③</sup>1857 年，卡法罗夫从北京又提出建议道：俄国应利用英、法对中国作战的有利时机（指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采取“坚决的行动”。卡法罗夫重申：“我对兼并黑龙江左岸已不再怀疑。……我意此事可以毫不声张地解决，但是要行动！”<sup>④</sup>果然，沙俄就是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在东正教使教士的鼓动和积极参与之下，侵占了我国黑龙江北岸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领土。

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扩大侵华之际，也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外交讹诈和瓜分活动。1858 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及 1860 年迫签的《中俄北京条约》都是老牌殖民主义沙俄血腥侵华的铁证。在这些奴役中华民族的不平等条约的酝酿、谈判甚至主要执笔的起草人中，便有沙俄传道团中的一些传教士积极参与的，他们犯下了令人发指

<sup>①</sup>（俄）巴尔苏科夫：《穆拉维也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1 卷，第 364 页～365 页。

<sup>②</sup>《太平天国起义时代的沙皇外交》，载《红档》第 21 卷。

<sup>③</sup>（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 3 卷，第 91 页。

的滔天罪行。

1858年4月，沙俄政府派普提雅廷为全权大使来到中国，以“谈判”为名，实则威逼中国割让大片神圣领土。在普提雅廷的随员中便有熟谙中国内情的第十一届驻北京传道团成员阿瓦库姆修士司祭、第十二届传道团的固里（即卡尔波夫）修士司祭及随团医生亚·阿·塔塔里诺夫担任“谈判”使团中的译员。普提雅廷要求清朝政府准许第十三届驻北京传道团头子巴拉第·卡波罗夫修士大司祭及随员到渤海湾同他会面。这时，清政府在致普提雅廷的回文中虽然同意派员护送大司祭同他们会面，却又愚蠢地提道：“至两国事有两国大臣商议，该喇嘛回京，毋令与闻其事，方与体制相合”。<sup>①</sup>这里充分暴露出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俄国正教驻北京修道团所干的早送情报的间谍任务并无察觉，对某些传教士明目张胆地参与侵华勾当是茫然而无知的。5月4日，卡法罗夫和医生米·达·赫拉波维茨基到达大沽，5月7日，在白沙口的俄国军舰上，直接向普提雅廷当面报告了清政府在大沽口的布防情况。卡法罗夫还提醒普提雅廷要留心“中国人惯用‘坚壁清野’的战术，如果中国在天津到北京之间运用这一战术，将会使外国军队在这个地区很难找到粮食和牲口。还有，中国军队可能会利用沿海平原低地，必要时决开渤海和海河堤坝以抵御和阻挡外国军队的进攻……”等。

普提雅廷令卡法罗夫向英国侵略军将领去报信，（1）因漕运切断，北京城内粮缺，清廷咸丰皇帝准备逃跑；（2）清政府在京、津之间部署约有1万名军队，在白河的几处地方已用木船和铁链阻塞河道用作防御……。与此同时，卡法罗夫又受命公开威逼清政府，倘中国人“不听忠告”，四天内不予答复，则从彼得堡调来战舰进攻云云。1858年5月，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在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在极不平等的《璦琿条约》上签了字。根据此约，

<sup>①</sup>《清文宗实录》卷248，咸丰八年三月甲午。

沙俄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还逼迫中国答应在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原属中国的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行“中俄共管”，同时还夺取了在乌苏里江上的自由航行权。恩格斯针对《璦琿条约》曾评述沙俄道：“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sup>①</sup> 在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中沙俄夺占中国的领土最多。沙俄表面上伪装为“朋友”，实际是最贪婪、最狡诈的侵略者之一。

《璦琿条约》签订后，俄国东正教的大主教英诺森·维尼敏诺夫立即随同俄国侵略军头目、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下的一批人沿黑龙江下驶，利用《璦琿条约》布置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广为移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酬谢俄罗斯正教会在侵华中的“功劳”，规定每个神职人员在新夺占中国的土地上可占地 90 俄亩，并先后建立了马林斯克教堂和扎依的“圣索菲亚”教堂。1859 年，又颁布了《阿穆尔地区保障与安顿神职人员生活条例草案》，规定神职人员由“国库支付薪俸”，还拨给每个乡村司祭不超过 80 俄亩的可耕地作为庄园、菜园和割草场”等。

1858 年年底，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任命侍从武官伊格纳切夫少将以全权外交代表名义前往中国。目的是趁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侵中国、清政府无力抵御的困危时机，再度插手进一步瓜分中国版图。伊格纳切夫在 1859 年 6 月初抵北京后，便向清朝当局提出新的要求，要把在《璦琿条约》中规定为中俄共管的地区，全部划归俄国所有。遭到清朝拒绝后，沙俄继续进行各种侵略活动。1860 年 5 月，沙俄外交部通知伊格纳托夫，要他直接指挥新调派来停泊在天津海面的俄国特种分舰队，同英法协调行动。要他“竭力以调停人身份”，既要压清朝屈服再签新约，又要避免清朝的覆亡。因为万一中国汉人掌权取代满清王朝，将会摆脱俄国影

<sup>①</sup>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662 页。

响，中国的统治中心必然南移而沦入英国控制之下。这是沙俄之大忌。

俄国正教第十三届驻北京传道团的领团人巴拉第·卡法罗夫大司祭在 1858 年返俄后，其工作由第十四届传道团（1858 年—1865 年）领团人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原为第十二届传道团的修士司祭）继任。伊格纳切夫在中国一刻也没忘记发挥传道团的特殊作用。他交给固里·卡尔波夫一份详细指令道：“我的意图是必须坚持向中国政府提出那些要求。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则是尽快结束边界问题并同中国交换新的边界地图，我也提请你注意此事”。他要求固里应：（一）尽量搜集关于时局的情报”，密切注意与俄国有关的以及西方列强的情况”；（二）向中国政府说明，俄国将保持“中立地位”，尽力抵销英、法的影响；（三）竭力传播对我们有利的传闻和消息，并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解释”；（四）要“经常向彼得堡、东西伯利亚总督和我发送有关时局的情报”，如遇重要情况，教会应派专人带信或当面向我口头报告”。

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并不限于搜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宫廷情报。例如，第十三届传道团中的随员修士辅祭康·安·斯卡奇科夫（原在俄任过天文台主任）来中国先后住达 24 年之久。他仅在 1853 年一年之内便向俄国天文台提供过长达 231 页的中国气象情报。他长期致力于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活动并研讨中国沿海通商的权利占有问题。对“汉学”有成就，对中国的手工业、农业和地租、人口、习俗等亦注意研究，为沙俄侵华政策提供参考。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关键时刻，1860 年 9 月初，英法联军进攻通州。俄国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亲委波波夫前赴天津送信，向伊格纳切夫少将报告军事情报称，清朝的巨炮队已从北京调往通州，在北京及京津路上已布置有大量步兵。俄国北京传道团精心绘制的一幅北京城市平面图和从北塘至北京的交通图，通过伊格纳切夫转交给英法侵略军使用。英国军官奥勒古曾称赞道：“伊格纳切夫将军把一份我从未见过的最好的北京地图借给我们。



这张地图比我们的更好、更详尽。他还把有关北京的情报给了我们。”显然，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是英法联军侵华的直接帮凶和参与者。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后，俄国的伊格纳切夫也钻进北京，住在俄罗斯正教的“南馆”中。当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相继签订后，沙俄强迫清朝与之“谈判”。俄方“谈判”的主要代表便是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和塔塔林诺夫（第十二届传道团成员）。据清朝官员讲，这两个人“狡执异常，几乎一字不能更易”。<sup>①</sup>最后，清政府在1860年11月14日终于满足了沙俄的要求，签订了中俄的《续增条约》（亦称中俄北京条约）沙皇又霸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土，以及同英法国际强盗同样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加开了新疆的喀什噶尔等口岸。伊格纳切夫对俄国正教驻北京第十四届传道团人的赞誉，充分说明传道团在侵华中的“重大作用”和究竟传的是什么“道”？伊格纳切夫说道：“由于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对汉语、满语精通，不止一次地使我摆脱困难的处境。修士大司祭对于中国当局心理和政策的熟悉程度，使我的行动得以沿着真实的、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天主的保佑下和修士大司祭的建议下，……才有可能同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使俄国得到乌苏里江一带的广大地域和很多中国的特权”。可见，沙俄从中国侵吞去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很多特权”，俄国正教驻北京的传道团是直接参与这一罪恶行径的。

#### 四、1861年—1898年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政策上的一些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坐收“渔人之利”的沙俄，根据1860年11

<sup>①</sup>《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8卷，第14页。

月的中俄《北京条约》，沙俄外交部直接派公使进驻北京，从而取消了 1727 年中俄《恰克图条约》中有关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是俄中之间中介人的规定。本来从第九届传道团（1808 年—1821 年）起，传道团已直接受俄国外交部领导，而 1861 年后，驻北京传道团形式上又改为归俄国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管辖。但实际上仍受沙俄政府的控制，只是活动方式更加隐蔽了。此后，俄国正教的传教业务才开始有一定的进展。东正教北京布道团在城外扩大势力，在通州、房山、涿州、永平、古北口等地都设立东正教教堂，受洗的华人教徒增加。

1864 年，俄国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又起用第十三届驻北京传道团的领团人，对沙俄侵华的“功劳”至大的巴拉第·卡法罗夫率第十五届驻北京传道团（1864 年—1878 年）来华，卡法罗夫这次重来中国，一方面秉承沙俄重视和企图扩大在华势力范围的侵华方针，继续广泛和深入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另一方面，他在华也开展了著述和翻译工作。

1865 年，卡法罗夫开始对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进行实地考察。1870 年，他伙同俄国的地理学家纳赫瓦里哈沿中国东北从南至北（自沈阳至齐齐哈尔、海兰泡，又沿乌苏里江，在伯力、海参崴一带本属中国版图之内）进行地形测量。1871 年，他们又实地考察了太平洋沿岸的重要海港、海湾，广泛蒐集了大量有用的情报资料，写出《从北京经满洲到海兰泡旅行记》和《乌苏里地区历史概要》等书刊，还创办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刊物《汇报》。卡法罗夫在华期间著述、翻译了许多著作，如：《佛陀传》、《早期佛教史略》、《佛教神祇概述》、《汉俄大辞典》（后由帕·斯·波波夫继续完成）及译出《长春真人游记》（中国元朝的丘处机著）、《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等。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北京的俄罗斯南馆成为沙俄政府驻北京的外交使馆。因而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使迁回俄罗斯北馆。从 1863 年—1866 年，由俄国外交部出资，在原北馆处扩建

了一些房屋供第十五届传道团使用。原“圣索菲亚”教堂扩大，可容 200 人进行宗教活动。教堂的圣像，多数是第十五届传道团的成员画家伊夫·伊戈列夫的作品。教堂内门的上方挂着大幅《最后的晚餐》画，门上有《圣母领报》图和四福音的作者：马可、马太、路加及约翰的图像。教堂四壁是耶稣基督的圣像、圣母像、圣母升天像以及圣尼古拉像。教堂内各种器物、用品齐全。如修士大司祭的金冠，各种祭服 30 件，其中不少是沙俄赏赐的。传道团内附设有图书馆、天文馆。图书馆内有珍贵藏书 10 000 余册，搜罗了不少中国孤本古籍。在北馆内还修建了大司祭、司祭、神职和执事人员以及仆役等不同等级人们严格区别的住宅群。90 年代时，随传道团来华的俄籍学生也在馆内居住。1861 年—1898 年，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除南馆的“奉献节”教堂，北馆的“圣索菲亚”教堂外，又在北京安定门外东安定村建有“圣伊尔库茨基·英诺肯提乙”教堂。这些教堂辖有修道院并办了教会学校。

自 1860 年后，清政府理藩院不再定期供应俄国正教传道团的生活用费。俄国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每年批拨给传道团的 15 600 银卢布经费，大司祭和 3 名司祭的年俸占去 2/3，其余经费用途广，入不敷支。传道团内一般成员经费拮据。他们把来北京“传道”当成了“苦差使”，因而内部矛盾不少。

第十六届传道团（1878 年—1888 年），由俄国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派遣修士大司祭弗拉维昂·高连茨基于 1878 年到达北京。从这一届起，俄国正教传道团的政策有明显改变。主要重点从侵华活动转到传教事务上。他们除了把一些传教用的书籍译成汉文加以传播外，又把传教活动向北京城以外推广。此届在北京共 10 年。

第十七届传道团（1888 年—1898 年），由阿·罗托维诺夫修士大司祭率领。这一届传道团在北京也历时 10 年，直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

19 世纪末，俄国正教在北京的政策有了明显的转变，宗教活动亦有所加强。他们重视了基础性工作，主要是编、译《圣经》和

编、著各种神学著作，大体按出版时间的先后，计有：

1. 出版《新约》，这是第十四届传道团领团人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根据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里逊译的汉文《圣经·新约》译本的抄本校订后出版的。

2. 《简明旧约圣史》，亦是固里·卡尔波夫所编写的汉文旧约简史。

3. 《东教宗鉴》，原作者是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1830年时，修士大司祭丹尼尔将原著重译为汉文本，长期流传。

4. 《雅克萨战俘到达北京后的信仰和礼拜史》，亦固里·卡尔波夫编写，供传教用，未付印。

5. 《关于圣号 and 神父的降福仪式》，由固里·卡尔波夫译为汉文书。

6. 《赞美诗》，由第十三届、第十五届传道团领团人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由教会用的斯拉夫文译成汉文书。

7. 《教理问答》，原为第九届传道团（1808年—1821年）的修士大司祭雅金甫·俾丘林译出的汉文版本。1866年又经修士司祭伊萨伊雅修改后再版的。

8. 《福音义解》，乃第十六届传道团领团人修士大司祭弗拉维昂·高连茨基在巴拉第·卡法罗夫大司祭的指导下，用汉语编写的。

9. 《升天指南》，此书由英诺肯提乙都主教所著，为高连茨基译成中文。

10. 《正教祈祷仪式讲解》，亦是高连茨基所编写。

11. 《论正教的四大仪式：弥撒、斋戒、忏悔和圣体血礼》，亦在此时译为汉文出版。

12. 《六大训诫》，内容含：基督教信仰洗礼、忏悔、授经、正教徒的生活戒规、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与择友须知等。此书作者姓刘，原为俄籍抑或中国籍不详。

13. 《上帝耶稣基督的尘世生活》，原为天主教会出版的中文

书，校订后作为俄罗斯正教传教团传教的书。

14. 《新、旧约简明圣使》，乃修士司祭伊萨伊雅根据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创人：沙皇米哈伊尔之父费拉累特大主教所写的《基督教教义初解》一书译成汉文的。

15. 《正教和它的礼仪程序》，此书用汉文系统地介绍了俄罗斯正教的礼仪、圣事、礼仪程序、正教节日、斋戒日、颂歌、全年的日颂经文（含顺序）和赞美诗集等。

然而，同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的传教情况对比起来，俄国正教相差太远。这主要是因为俄国正教在北京长期以来，主要任务是在沙俄外交部指挥下，以刺探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况为己任，对传教兴趣不大。传道团的重心转入传教是在 1861 年之后，传教活动起步甚晚之故。据 1892 年，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登记的教徒名册来看，迄这时信仰俄罗斯正教的中国籍信徒总共只有 459 人，其中还包括阿尔巴津人的后裔 149 人，其余的 310 名中国籍信徒中，250 人住在北京城内，另 60 人住在北京安定门外东安定村内。俄国正教在北京传教活动开展不快，也与俄国神职人员太少，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不足以及素质低（经常酗酒闹事）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俄国正教没有注意结合中国的国情，不吸收不参考儒家文化在中国群众中的作用和影响，一直未开办更多的学校和慈善机构（如医院、孤儿院等），也没有重视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发展教徒，培养神职人员，以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东正教多为疏远。东正教传教士内部懂宗教的较少，传教能力差，衣着也未中国化，内部混乱，纪律松弛，给中国人印象很坏。这都是东正教比天主教、基督新教的传播大为逊色的重要缘故。

## 五、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东正教在北京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已面临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



危机。对中国下手最快、手法十分巧妙的是贪婪的沙俄。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沙俄一度成了清朝投降派官僚的“救星”和“以夷制夷”的依靠。1896年5月，沙俄趁李鸿章到彼得堡祝贺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际，诱迫李鸿章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中俄密约》，后来又签署了修筑“东清铁路”（中东铁路）的合同，规定在“平常无事”时，中国境内西从满洲里东迄绥芬河的铁路沿线，俄国的军队，粮饷军需均可自由通过。”1898年3月，俄又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从而侵占了辽东半岛绝大部分地区。沙俄成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面”的主人。随后，他们又得到了修筑中东铁路南部支线（从哈尔滨到大连的“南满铁路”）的特权。在1896年—1903年中东铁路修建及通车，沙俄日益“蚕食”中国东北各地之际，沙俄利用其特权大量向中国东北中东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移民，并在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东正教教堂，如哈尔滨的“喇嘛台”，在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一面坡、亚布力、横道河子，牡丹江、穆棱、绥芬河等地俄国东正教徒的人数迅速增加了。

1898年，在修士大司祭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的率领下，第十八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到达北京。

这时中国的形势是：戊戌维新运动已失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已从拳会斗争发展为义和团反帝运动。因为当时中国广大的小生产者——农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尚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初级阶段，因而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主要活动形式是反对外国传教士、反对来华的外国人、并袭击和焚毁教堂，特别是直接同明火执仗入侵的“洋鬼子”作战。“反洋”、“灭洋”是主要口号。1900年5月，义和团进入北京以后，大司祭英诺肯提乙率领一部分神职人员离开北馆，逃入俄国外交使团驻地的南馆中“避难”。

在北京的义和团，由于民族的仇恨心，曾将俄罗斯北馆的“圣索菲亚”教堂、图书馆以及附属传道团的学校、养老院等焚毁，

挖掘了北京东安定门外的俄国墓地，杀了一些传教士、教会执事人员和东正教徒。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9月，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中国向侵略者各列强的巨额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当中有29%是赔偿沙俄的。即使按照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显然有意夸大的1900年—1901年间俄国全部侵华战费和“损失”的数字算来，沙俄自己估计收支相抵之外，所掠取到的赔款还多出了1400多万卢布。

《辛丑条约》签订后初期，因北京俄罗斯北馆教堂尚未修复，英诺肯提乙曾暂居过北京的雍和宫。1902年，英诺肯提乙返俄向俄国正教最高宗务会议述职，因他“功劳”显著而被晋升为主教。他再度返华继续主持第十八届传道团的工作时，随他一起到北京的共有30多名修士司祭、修士辅祭及各种神职人员和一些技术人员、修士等。从此，北京传道团的人数和规模明显扩大。从1902年起，俄国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拨予驻北京传道团的经费也有所增加。英诺肯提乙大司祭从“庚子赔款”中得到1.8万两白银作为赔偿传道团损失的专款。同时在河北省献县等地，还得到“议以房屋地基抵价”的对俄国教堂的偿金。在“圣索菲亚”教堂修复期间，主教英诺肯提乙大司祭利用权势将比邻的房屋和地基都并入己手。在这些地产之上修建出了“英诺肯提乙”堂及“圣母”堂和“教众归天”堂、图书馆、男、女修道院、神学院以及钟楼、学堂等。另外，还设立了织布厂、工艺厂、面粉厂、牛奶场、养蜂场、果园、菜园……等许多生产部门。在俄国人的管理之下，许多中国人为了谋生而参加工作，并信仰了俄罗斯正教，20世纪初北京正教徒的数目有较多的增加。俄罗斯正教从北京渐向天津、上海、汉口及东北的哈尔滨、大连等地传播。

第十八届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领队人英诺肯提乙主教，是历年来俄国正教派赴北京传道团中神品最高的一个人。这届传道团在北京的时间较长，是俄国正教徒在华人数最多、传道团所

办生产类工场最多的阶段。英诺肯提乙大司祭在北京积累了大量财富，过着骄奢糜烂的生活，他的随员、仆役成群，他经常到北戴河等地避暑，肆意挥霍，但对传道团内的神职和执事人员，却克扣薪金，对在各类工场干活的信徒向来不发予工薪报酬，只在节日赏赐一些零用钱让他们维持贫苦的生计。

据 1905 年的统计材料看，这一年在北京俄罗斯正教教堂中作忏悔和圣事仪式的正教徒总共 540 人次，全年共举行过五次洗礼、八次葬礼，受洗者 78 人。这个数字大体说明了 20 世纪初东正教在北京城宗教活动的规模。北京传道团属下的气象站，不断测量北京地区的降雨量、温度、气流等气象资料，对当地的科学研究有一定价值。20 世纪初，驻北京传道团对北京以外的汉口，以及东北中东铁路沿线，甚至向新疆等地频频派去修士传教和修建教堂。

第十八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在英诺肯提乙领导下，传教水平有提高，活动也有一定的开展，传教士又活跃起来。1906 年里，驻北京传道团在团长以下，计有：修士大司祭 1 名、受过神学院高级班培训的司祭 2 名、司祭 4 名、修士辅祭 2 名、教职人员 13 名、辅祭 5 名、诵经士 6 名、修士 3 名、见习修士 3 名、修女 2 名（1 人是中国籍）见习修女 5 名。这时归传道团管辖的单位计有：一级修道院一座，传教点在满洲里有两处，中东铁路沿线教堂十所，在北京教堂三所，教会所办的男生小学六所，收中国籍的女生小学一所。传道团在彼得堡还有一处房产。1906 年这一年间，在驻北京传道团的主持下，在中东铁路沿线海拉尔站、在北京安定门外俄国墓地及满洲里教堂等四处开展过宗教活动。

据统计，20 世纪初在华的俄国正教徒约 3 万人。受洗的中国籍教徒 1906 年是 725 人，1907 年为 803 人；1908 年增为 1304 人。1907 年，根据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决定，原来由驻北京传道团管辖的北满中东铁路沿线从长春到绥芬河一带的东正教堂改山海参崴教区管辖，因而驻北京传道团向海参崴教区移交了十座

教堂，各教堂中的神职人员全部撤回北京，重新安排。

1908年时，俄罗斯驻北京传道团的人员状况有增无减，比1907年修士司祭从4名减为3名，修士辅祭由4名加为5名，还增加3名华人司祭。而传教点则比1907年增加了12个，在旅顺口、大连各建1座教堂，还增小教堂两座，教堂墓地5处，附属学校发展到14所，开始兴办了一些慈善机构、养老院等。

迄俄国十月革命以前(1916年)，沙俄在北京的东正教势力已扩展到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华东、华中各地。俄罗斯正教传道团在华共修建了教堂37座、神学院1所及男女宗教学校20多所。他们还出版发行了俄、汉、英三种文字的《中国福音报》(月刊)。中国教徒的总数达到5587人，其中仅北京的华人教徒已达1000人。属于俄罗斯正教在华企事业的资产总值达150万卢布。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1918年1月23日，俄国颁布了“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的法令，但在俄国以古洪牧首为首的俄国正教会抵制这个法令，号召教徒恢复帝制，维护教会特权，反抗苏维埃政府。十月革命后，大批俄罗斯正教的神职人员随沙俄的皇族、官吏、地主资本家们逃亡到中国东北等地，于是东正教新教堂在中国不少地方相继建立起来。一些流亡来华的官员脱下军装，穿上修士服，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掌握了一些地方教会的实权。1920年，一名俄国正教的修士大司祭把被苏维埃政府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近亲尸体从俄国偷运到北京，并交由英诺肯提乙大司祭保管，后来多数尸体都埋葬到北京安定门外东正教会的墓地中。

1922年，一些逃离俄国、敌视苏维埃的俄国正教教会人士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洛齐，成立了“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由安东尼主教任流亡教廷的牧首。1922年，中国的东正教会宣布断绝同十月革命后莫斯科俄罗斯正教的隶属关系，而归属于上述在塞尔维亚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的管辖。自1924年以后，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便正式改称为“中



国东正教会”，而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东正教会在北京设立总会，下辖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新疆等相对独立的教区。由原第十八届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团长修士大司祭英诺肯提乙·奥占洛夫斯基主教担任“中国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亦即东正教“北京总会”的总头目。英诺肯提乙这个人坚决反苏，当 1924 年 5 月，苏联政府要求凡属于俄国正教教堂的财产应移交给苏联时，他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这是东正教会的，与苏联政府毫无关系，苏联的要求是无理的。”1930 年，塞尔维亚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曾晋升反苏“有功”的英诺肯提乙为都主教。

英诺肯提乙在十月革命前效忠沙皇，他于 1914 年曾将驻北京传道团的大笔钱财购买了沙俄政府发行的战争公债，随着沙皇政府的覆灭，战争公债券全部成了废纸，因而“北京总会”经济破产，一再缩小人员编制。1931 年，英诺肯提乙都主教去世时，据清点“北京总会”的全部经费（不含不动产）仅有现洋 1.8 万元。

1931 年—1933 年，继英诺肯提乙之后，被“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任命为“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教区”大主教的是西蒙。此人 1902 年抵中国，曾在汉口等地传教。1924 年，晋任上海教区主教。他 1931 年—1933 年仍住沪，并未到北京。

1933 年，西蒙在上海病故后，“北京总会”的主持人由维克托尔大主教接任。维克托尔早年是旧军官，他曾在俄罗斯正教神学院学习过。十月革命以后，他在 1921 年经中亚逃到中国新疆和北京。历任修士辅祭、修士司祭，1923 年任天津教堂的修士司祭，后又晋升为“北京总堂”的修士大司祭。1931 年，他任上海教区主教。他到“北京总会”上任后，虽专心扩大财源，但始终未能改变北京教区在经济上的困苦局面。1933 年，他因忠于在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流亡教廷（“俄罗斯正教国外主教公会议”）被晋升为北京总会主教。1937 年—1945 年抗日战争期间，维克托尔大主教同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俄侨防共委员会”往来甚为密切。在北



京（当时称北平）的东正教总会内，由于维克托尔的特许，经常住有日特机关的秘书布采及白俄流亡政客。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克托尔认清了形势，立场有所变化，1946年初在他主持下的“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排除阻力，同当时迁移到慕尼黑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断绝了关系，决定归属苏联俄罗斯正教莫斯科牧首区管辖。当时国民党北京市政府社会局曾派人去东正教总会游说，劝其断绝与莫斯科的关系，遭到拒绝。从这一点看来，维克托夫主教后期的政治态度改变了。1946年，他为劝说上海教区亦归属苏联的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管辖，曾专程赴沪。他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关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中达10个月。二战后，在他的影响之下，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开始了认真的传教工作。

## 第六章

### 北京基督教的教堂及教徒生活习俗

#### 一、教堂、教义和教规

##### (一)教堂

基督教各派在北京建有不少教堂，到解放前共有教堂 65 座。在 1938 年前在城区属于天主教的有 5 座，即东、南、西、北四大教堂，和圣米厄尔教堂。郊区有教堂 8 座，即：通县后瞳教堂、大兴县的牛房教堂和西胡林村教堂、房山区立教村教堂、门头沟桑峪村教堂和张家铺教堂，以及丰台区长辛店教堂和海淀区白家疃村教堂，这些教堂均为西方建筑样式。

##### 南堂

南堂是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建于 1605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用中国明朝万历皇帝所赐土地，建于宣武门顺城街（今前门西大街）。1610 年，另建小教堂一所，提供给教徒过宗教生活。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于 1650 年在其旧址改建大堂，名“无玷始胎圣母堂”，又名“圣母无玷原罪堂”。除神父们的住房外，还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等。1690 年该堂成为耶稣会北京主教座堂。其后因建有北堂，此堂便被称为“南堂”。康熙、乾隆年间，屡经焚毁，一再重建。1838 年清政府关闭教堂并拆卖附设宅院。1860 年法国传教士向清政府索还，并重新开堂，但主教座堂已迁至北堂。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南堂又一次被毁，1902 年重建。建国以前，南堂有若瑟院和仁爱会管理的万生医院等慈善机构。建国后，人民政

府几次修葺南堂。1958年起南堂为北京主教座堂，直至今日。1966年，“文革”期间，南堂被砸，圣像圣物祭器等被损坏，但堂基本完整。1972年已恢复宗教生活。1978年正式开放。南堂西墙上高4米的铁十字架系明代旧堂遗物。南堂长40米，高15米。东西两院存有古碑，记载利玛窦、汤若望两人事迹及建堂历史。

### 东堂

东堂是北京城内第二座天主教教堂，从建堂至今已断断续续经历了300多年，1655年由利类思和安文思（国籍不详）神父创建。该堂规模不太大，奉圣若瑟为主保，地址在王府井大街74号，坐东朝西。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明末在四川传教，清初，他二人被清兵虏至北京，在肃王府当差。他们给府内人员讲道，其中不少人开始领洗认教。后他二人被允许在外传教并获得好名声，于是又被介绍到宫内做事。1655年（顺治十二年）清世祖福临赐给他俩一所宅所和一块空地，于是建成了这座教堂。1720年大地震，教堂被震塌，第二年又重修。1807年教会遭清洗，教堂岌岌可危，因火灾房屋书籍被毁，后东堂院被没收，拆除。堂内外籍教士被清政府迁居南堂。1860年清政府将东堂发还给教会，用作祈祷公所。1884年经田嘉璧主教向国外募捐，重建罗马式大堂，比南堂、北堂更加精致雄伟。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又被烧掉。1904年法国和爱尔兰两国用“庚子赔款”重新合建，即现在的东堂。教堂总占地面积近10000平方米，堂北设有“惠我女校”。东堂院内，中间为天主堂，坐落在青石基上，正面开三门，两侧还有旁门。堂内有18根直径为55厘米的圆形砖柱支撑，柱础为方形。大堂正门石柱上楹联为“庇民大德包中外，尚父宏勋冠古今，横额为“惠国东方”。堂内两侧挂着耶稣受难等多幅油画。堂顶立3座十字架，中间大，两旁小。该堂在“文革”期间，改做仓库。1982年12月修缮后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 北堂（西什库教堂）

北堂是天主教会在北京设立的四大重要教堂之一。现教堂地

址在西什库大街 33 号。北堂最初在中南海的中海西侧，地点在紫光阁之西，名为蚕池口之地方。清初，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人来到中国传教，1693 年康熙帝在皇城内赐给法国传教士广厦一所。康熙帝患疟疾，服用耶稣会传教士洪若轩和利应进奉的金鸡纳霜药痊愈，于是赠地酬谢，遂在 1703 年建成教堂于蚕池口。康熙帝还御题“万有真源”横匾及长联，命名该堂为“救世堂”。北堂长 25 米，宽 11 米，高 10 米，当时属宏伟建筑。另外，还建有天文台和图书馆。1827 年因禁教被清廷籍没，将大堂拆除，土地变卖。根据 1860 年《北京条约》规定，归还了“北堂”。1864 年北堂重新建成。新堂比原先的大堂更高大。堂长 50 米，宽 21.3 米，教堂钟楼高达 8.4 米。堂内附设博物馆一座，陈列珍禽标本 800 余种，亦称“百鸟堂”。1886 年对三海（南海、中海、北海）进行整修，欲将中海西的蚕池口北堂迁移到西安门的西什库内重建，因为教堂的钟楼可见皇家御苑。经多次交涉，北京法国教堂大司铎樊国梁同意在西什库内建新堂，并提出由清政府给银 35 万两以作迁堂之用。1887 年清政府将蚕池口教堂收回，北堂在西什库新址建成。该堂为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所属教民 40 000 余人，所属教堂 29 座。

北堂正中尖拱形大门上方，木匾上书“救建天主堂”。大堂建筑面积约 2200 平方米，高 16.5 米，钟楼塔尖高约 31 米。哥特式建筑，大堂平面呈十字架形状。大堂正门两旁有中国式建筑碑亭两座。亭内分别立天主堂迁建谕旨和满汉文天主堂碑。堂内有明柱 36 根，柱高 4.9 丈，堂正面上镶汉白玉一方，镌刻着耶稣善牧圣像。大堂正门内建有唱经楼。大堂主祭台的北边是苦难堂。苦难堂西墙上镶有樊国梁碑。北堂及所属建筑面积很大，东到东夹道，西至西黄城根，南邻西安门大街，北到北京医学院，包括修道院、图书馆、印刷厂、孤儿院。从 1860 年起，第一任主教是孟振声。百余年间，北堂共有主教 8 位，助理主教 4 位，均系外国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第一位中国主教是田耕莘。1900 年时，

该堂成为外国教会势力和教徒据守的重要据点，义和团与清兵攻62天未下。该堂“文革”期间关闭，1985年12月24日修缮后重新开放。

#### 西堂

西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路南，是北京四大堂中建成最晚的。1723年德理格神父在西直门内购地建天主教堂一座，即为西堂。1811年被毁，1867年重建。义和团运动中又被毁，1912年再重建，奉圣母圣衣为主保。西堂屋顶有尖形钟楼，四角也有四座尖形建筑。1966年起文革期间关闭后为工厂使用，现屋顶上钟楼拆除，礼拜堂尚存，1994年已腾空退还，教堂重新开放。

#### 圣米厄尔教堂

除东、南、西、北四大天主教堂外，还有1901年由法国高司铎创建，后又由法国人斩利国扩充的圣米厄尔天主教堂，又称东交民巷教堂。和四大教堂相比，其规模为最小。堂址在北京东交民巷大街14号，圣堂坐北朝南，为哥特式建筑。堂中供奉米厄尔，故名之。此堂综合了其它四堂的优点，在造型上别具特色，小巧玲珑。堂顶北端有两个高耸的尖塔。堂内装有清末从法国进口的彩色玻璃。该堂系天主教在北京修建最晚的一所天主教堂，未遭破坏。长期主持该堂的神父为法国传教士柯来盟，副堂神父为法国人贾廷堃。1958年教堂关闭，由东交民巷小学使用。“文革”后落实宗教政策，1986年小学迁出，整修了教堂，重新恢复宗教生活。

基督教在北京的教堂，到解放前有72座。早在1938年，仅在城区就有教堂12座。较主要的是亚斯立教堂和珠市口教堂。

#### 亚斯立教堂

1869年由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魏勒创建的，位于崇文门孝顺胡同的亚斯立教堂，是基督教新教在北京建立的第一所教堂。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毁，1901年重建，1903年落成。该堂是美以美会在华北地区的重要活动中心。曾在这里举行过华北美以美



会年议会 50 余次，封立牧师典礼 50 余次，共封牧师 400 余名。冯玉祥是该堂数千名教友中的一员。司徒雷登也曾在此布道。1958 年后，堂地曾一度由第十三女中（后改为一百二十五中学）借用，1982 年由教会方面收回，大修后更名崇文门堂重新开放。前美国总统布什曾在此参加过晨祷会。

#### 珠市口教堂

位于北京珠市口（今前门大街 129 号）的珠市口教堂是 1916 年由美国基督教新教卫理公会下属的美以美会等 4 个差会联合筹建的，于 1921 年建成。它隶属于美以美会华北教区，宣教范围侧重于北京市区，并附设一教会小学（“汇文二小”）。“文革”期间停止活动，1988 年重新复堂。

此外还有：

卫理公会的花市教堂，

公理会的灯市口教堂，

圣公会的佟麟阁路的救主堂，

长老会的安内二条教堂、鼓楼西大街教堂、缸瓦市教堂，

伦敦会的米市大街教堂，

安息日会的朝阳门内大街教堂，

救世军的王府大街中央堂，

远东宣教会的地安门东大街教堂。

这些都是北京市区内有正规教堂形式建筑，并有宗教活动的教堂。

东正教在北京的教堂有 2 座，即：圣尼古拉教堂和圣母堂

#### 圣尼古拉教堂

圣尼古拉教堂是东正教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教堂，又称圣母安息堂、圣母安息修道院、罗刹庙、北馆等。为东正教在北京的重要活动机构。圣尼古拉教堂正式成立于 1695 年。早在 1685 年雅克萨战役后，一部分被俘的哥萨克士兵及家属被安置在东直门内北官厅一带的胡家园胡同（该胡同近年已拆除盖了大楼）编入

镶黄旗。康熙皇帝特赐一座关帝庙给俄国东正教徒作为临时祈祷所，首任主持人为俄国东正教司祭马克西姆·列昂节夫。1695年获俄罗斯东正教会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的正式批准立堂。因一度供奉有“显圣者尼古拉”的圣像，故名之。又曾名圣索非亚教堂。第一届和第二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曾驻节于该堂。1730年地震中被毁，两年后重建。1860年后仍作为北京传道团的驻节座堂。以后又增益了许多建筑物，附有图书馆、天文馆等。义和团运动中该堂被焚毁，《辛丑条约》后，俄国利用赔款复建。重建后的教堂名为“致命堂”，被人们称为“北馆”。致命堂为典型的十字形东正教堂，堂顶上有5个带十字架的拱形堡，堂内装饰华丽。“北馆”扩建不久，俄国又在东交民巷俄国驻华领事馆内，建了一座教堂，名“奉献节教堂”，主要是方便领事馆内俄国人做祈祷。因地处南端，故又称“南馆”。

### 圣母堂

位于北京安定门外青年湖内东北隅的圣母堂，建于1918年前后，是俄国东正教教堂。该堂长期为东正教在北京地区设立的重要机构之一。教堂呈十字形建筑，堂顶有一半圆拱形堡，上带十字架。教堂由圣所和致圣所两部分组成。圣所在东部，是教堂内最神圣的场所，供奉有圣体、宝匣等。此外还有“代案”，为绢制，上下两层，上层为白绢，印有经文，下层为“圣躯”（指从圣地带回的圣物）。并设地下室，为停放灵柩的地方。堂西便是俄国坟地。1987年因城建需要，教堂拆除，俄国坟地亦已早不使用。

## （二）教义

基督教的许多教义、教规和礼仪等都是根据基督教各派的经书《新旧约全书》（即《圣经》）制定出来的。《圣经》是基督教宗教思想的核心和指南。它包括旧约和新约。《旧约》原来是犹太教的经典，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共39卷，为基督教全部接受并根据基督教观点作了解释。《新约》为基督教特有的

《圣经》,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启示录》,共 27 卷。新旧约的 66 卷著作构成了基督教的全部正统经典,另一些有争议的犹太教和基督教著作后来分别被列为次经。天主教和东正教认为次经是圣经的“第二正典”,新教教会则认为圣经只由正典组成,次经不具有圣经的权威,但可作为古代文献而受到尊重。

基督教教义是基督教维护所有信徒的统一信仰的指导思想。教义的内容主要是三位一体。首先,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为创造和管理天地万物之主。上帝是超乎万物之外,又贯乎万物之中,它是“灵”,无形、无体,但有位格。它是全智、全能、全善的。其次,耶稣基督为上帝的“独生子”,称为“圣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它是“道”借玛利亚(天主教、东正教尊为“圣母”)由圣灵感孕,降世为人,即“道成肉身”为世人赎罪、悔改、成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因为人生来就有罪(即所谓“原罪”,人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于是他们的后人全部有罪),而上帝又给人赎罪的机会。但人自己不能赎罪,得靠引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身,用自己的血为世人洗净了罪。再次,相信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它运行在世界和人类心中,使人知罪、悔改、成圣。基督教坚持一神论,“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既是三位又是一体。即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本体”之神的三个“位格”,上帝只有一个,是独一真神。

除教义外,教徒还应相信,教会是基督所建立,由上帝“选民”组成的团体,经使徒传下来。因此教会在世界上负有宣传福音的使命。

自基督教分裂之后,各派大都沿用了上述教义的内容,但也有些差别。比较完整和系统地阐述教义的应推天主教。

天主教的教义分两部分,即理性教义和启示教义。理性教义也叫自然教义,主要指以人的理智能力所推论出的教义;启示教义也叫超理性教义,是超过人的理智能力,由天主启示而得到的,

即所谓“信徒道理”、神学信条。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是教徒宗教生活的指南。它来源于圣经、圣传（指传说中的“先知”传教时教诲信徒的道理）和教皇的各种决定。

新教同天主教除了有前述共同的教义外，还有一些和天主教是针锋相对的理论。主要是：（1）因信称义。这是新教救法论的核心。新教认为得教的真谛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凭借信心，通过圣灵的工作，使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而天主教则规定信徒必须按教会要求履行某些功课和善行，如望弥撒、奉献、悔过、补赎等，表示自责，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在天主教内教会神职人员（神父、主教和教皇）成为垄断救恩的代理人。（2）信徒都可为祭司。新教既然认为只凭信心可得救，那么信徒都可为祭司。每个教徒都可直接与神相通，无须神职人员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因此，虽然新教的多数宗派仍保留教务专职人员（牧师等）的职称和封立仪式，但已不意味着具有颁赐恩典的特权了。（3）新教认为《圣经》具有最高权威。而天主教坚持《圣经》的解释权属于教会。它虽不否认《圣经》的权威，而实际上把有关宗教信仰的一切问题，包括教会传统的最高权威都集中在天主教会和教皇身上。

### （三）教规

教规，也称宗教法规。它是用以约束所有信徒在信仰、伦理、组织纪律等方面的法律条文。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戒律是《旧约》中摩西所传授的《十诫》。但彼此在编排上有所不同。《十诫》的主要内容是：崇拜惟一上帝而不可拜别的神；不可妄称上帝圣名发虚誓；须奉安息日（占礼日）为圣日；须孝敬父母；勿杀人；勿行邪淫；勿偷盗；勿妄证；勿贪恋别人的妻子；勿贪占别人财物。《新约》内，耶稣把它归纳为“爱神”与“爱人”两个方面。即“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

己”。<sup>①</sup>

天主教较其他派别严格。它根据教义和教规，又规定了罪与德的标准。七罪是骄傲、吝啬、迷色、忿怒、嫉妒、贪吃、懒惰。七德是谦逊、施舍、贞洁、含忍、仁爱、淡薄、辛勤。此外，教徒本身需具备有智、义、勇、节的道德，而对天主则要有信、望、爱三德。

天主教还规定所有神职人员都不准结婚，东正教规定大司祭以上的神职人员不准结婚，而新教没有这些规定。

#### （四）组织机构

基督教各派在组织机构和教阶上也不同。

天主教最高组织机构是天主教罗马教廷，教廷最高首脑是教皇。由教皇任命枢机主教（中国称“红衣主教”，因穿红衣），分管教廷各部，并掌握各重要教区领导权。罗马教廷下属若干个总主教区、教区、监牧区和代牧区，由总主教或主教负责。

天主教的教阶分为三级，即教皇、主教（分枢机主教、总主教或大主教、主教）和司铎。

东正教有牧首区和自治教会。它们各自独立，地位是同等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机构。其组织机构是牧首领导下的神父最高会议所管辖的教区制。

东正教的教阶分牧首、主教（督主教、总主教、大主教、主教）、大司祭（金冠修士大司祭、金冠大司祭、修士大司祭、大司祭）、司祭（修士司祭、司祭）、辅祭（大辅祭、辅祭）等五级。

新教因教派繁多，它的组织机构也不相同，大体分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三种。主教制以圣公会为主，把教牧人员分为主教，会长和会吏三个品级。长老制以加尔文宗派为主，长老是教会中从事非宗教职业（世俗的职业）的领袖，经由教会选举，接受

<sup>①</sup> 《马可福音》，12章30节～31节。



“长老”圣职，主管教会。公理制以公理会、浸礼会为主，主张各教堂都是独立的教会，不设隶属关系的教务行政性机构。

## 二、修会、差会和基督教青年会

### (一)天主教的修会

天主教修会是由罗马教皇批准设立的修士组织，近代天主教修会始于 13 世纪，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它被利用作为开拓殖民事业的工具。最早被派遣到中国来活动的修会是耶稣会，长期在北京、直隶省东南部和江南一带活动，随后又有方济各会。他们是在葡萄牙殖民势力支持下，以澳门为根据地从事对华传教事业的。到 19 世纪末，天主教主要修会或外方传教会先后来到中国活动。

这些修会及其来华时间是耶稣会（1552 年来华，1842 年重来）、奥斯定会（1574 年）、多明我会（1631 年）、方济各会（1633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1682 年）、遣使会（1765 年）、圣言会（1879 年）。女修会及其来华时间是仁爱会（1842 年）、圣衣会（1869 年）、方济各圣母传教会（1886 年）、多明我女修会等。

在北京的有圣约瑟修女会。该修女会于 1860 年创立于北京，是天主教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女修会之一。它主要从事慈善、救济、女子传道等方面的工作。解放前夕，该会有 266 名修女（主要是华籍修女），主要在北京等地的教会机构中工作。1966 年停办，1980 年又恢复修女院。

### (二)基督教的差会

基督教差会是基督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多为西欧、北美国家的基督教会所设立。它派遣传教士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设立教会、开办学校、报馆和举办慈善事业。基督教有很多宗派，而各宗派都有不少教派（即差会）。

几个主要大宗派及其差派来华的情况是:

路德宗(又称信义宗),是最早的主要宗派之一。来华的差会,最早来华的是荷兰礼贤会,其后又有巴色会、德国信义会、丹麦路德会、北美信义会、中美信义会、芬兰信义会、信义公理会、信义长老会、挪美遵道会、鄂豫信义会、瑞典信义会等都先后来华。1920年路德宗在华的各派举行联合会,成立中华信义会。

长老宗(又称加尔文宗),是16世纪由加尔文创立的。它最早派来中国的差会是北美长老会,其后有归正会、苏格兰福音会、英国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美国长老会、复初会、约老会、基督教同寅会等教派相继来华。1916年长老会在华各派组成中华长老联合会。不久又与伦教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会。

公理宗,是16世纪由罗伯特·勃朗创立于英国。最早来华的教派是伦敦会,其后有美部会、美普会、协同公会等差会先后到中国来。

圣公宗(又称安立甘派),16世纪产生于英国。其最早来华的是美国的圣公会,其后有英国圣公会、加拿大圣公会等来中国。1912年在华圣公宗各教派联合,组成了中华圣公会布道部。

浸礼宗,是17世纪前期产生于英国和荷兰的英国流亡者中。最早到中国的是美国浸礼会,其后相继来者为来复会、英国浸礼会、孟那福音会、新约教会、友爱会、瑞典浸信会、安息浸礼会等。

监理宗(又称卫斯理宗、循道宗),18世纪产生于英国。由英国人约翰·卫斯理创立。最早来华的是美以美会,其后到中国的有监理会、美福音会、循理会、美道会、循道会、美普会等。1939年在华的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三教派联合组成卫理公会。

内地会系统,是1865年由英国戴德生创立的一个跨宗派的差会组织。它的总部设在伦敦,上海设总办事处。属于内地会系统的有自由会、德女公会、女执事会、德华盟会、瑞圣洁会、挪威

会、北美瑞娜会、瑞华会等。从 1889 年开始，内地会改为国际性的差会。到 19 世纪末，已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最大差会。

### (三)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 1844 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斯为“提高青年灵性修养”而创立的一个以建立和开展社会福利为特点的基督教外围组织。最初成立于伦敦，是国际性的跨宗派的青年活动团体。所以参加者有不少是非教徒，活动内容主要不是宗教性的。1851 年传到北美后的发展比在英国还快。1855 年欧美各国青年会在巴黎开会，决定成立青年世界协会，会址在日内瓦。女青年会是金纳德夫人于 1855 年在伦敦创立的。1894 年在英国组成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其总部也设在日内瓦。

1876 年中国的上海有了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1885 年福州的英华书院和通州的潞河书院先后有了学校青年会（当时称基督教幼徒会，1901 年易名为基督教青年会）。第二年杭州育英书院也有了青年会团体。1890 年杭州泓道女校建立了第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它是从美国传入，发起人是司徒雷登的母亲。但这些早期青年会都互不联系，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亡。1895 年出生在中国，在美国国内从事过学生会工作的来会理牧师被派来中国，在天津创立城市青年会。1896 年，北美青年会的学生干事兼当时新成立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总干事穆德来华在学生中布道，直到 1828 年，他曾 6 次来华，宣传青年会的宗旨。1896 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青年会全国大会，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中华基督教学塾青年会。进入 20 世纪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在中国逐渐产生了不同于旧式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基督教青年会以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加强工作，企图控制之。穆德对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抱有极大的希望。他认为“世界上有四万万人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个国家进入现代的新潮流，也只有这第一批人。这第一批人受着现代教育的学生，将来

便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们要设立新的标准，并且走入新的途径。我以为，这些人受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在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常常有这样的渴望，因为恐怕我们失去这种卓绝的机会”。<sup>①</sup>1900年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成，1901年全国有市会3处，校会40处。1902年基督教第四次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

1907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会址设在东单米市大街。它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下属城市会之一。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特别密切的关系，由该校负责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外国干事。该会宣称以“协助青年，本其自动的精神，兴趣的所在，以增进其人格的修养与服务的能力”为宗旨。以布道、青年介绍、求学指导、职业介绍等方式在城市青年中进行工作，传播基督教，发展会友。会内机构有：会务部、事务部、智育部、学生部等。该会还附设三基中学、两城英文专校、宗教研究班等，出版了《北京青年周刊》、《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特刊》等刊物。

1912年12月，在北京举行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全国会议，会议决定将总部名称确定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得到北京政府的承认。1922年时，基督教青年会在华的发展达到鼎盛，全国有市会40处，会员5380余人；校会200处，会员2400余人。女青年会也已有市会12处，会员3000人；校会80处，会员近6000人。30年代前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重点都转到“社会服务”方面，在城市加强劳工工作，在农村搞农村事业实验点。九·一八事变后，还在东北、北京、上海等地开展难民服务工作。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人事、经济上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关系密切。该会标榜“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会训是“非以役人，

<sup>①</sup>马泰士（张仕章译：《德传》，第364页。Mott to A. encssett, 1909年11月7日。

乃役于人”，组织上分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两大系统，以青年为对象开展各类社会活动。

基督教青年会以服务社会为口号，以提倡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德育主要欲宣传和培养基督教信仰，有查经班和宗教讨论会之类。智育以介绍新知识为内容。体育方面青年会对提倡体育运动有特殊贡献。群学主要是介绍、参观、旅游之类，寓教于乐的活功。青年会还办了面向平民劳工的福利事业，如设立有各种补习班和夜校。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性质和活动内容与青年会相仿。

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原来都是西方基督教企图通过社会活动形式，吸引青年参加宗教活动的机构。在我国，这两个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都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并且开展了一些有益于青年职工和学生的活动，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特别在体育方面，曾向中国介绍了当时已经流行于欧美的一些现代体育项目，培养了一批体育师资和裁判员、教练员。

民国成立以来，青年会与政界中的基督教又有各种关系。如青年会全国协会首任华人总干事王正廷早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离会到京任国会参议院副议长。青年会的民主进步形象吸引了一批优秀青年学生加入了教会。当年北京税务学堂的“三杰”徐宝谦、吴耀宗、张钦士都在那段时期，因青年会的学生工作而加入教会。

### 三、教徒的节日及生活习俗

#### (一) 节日

基督教三大派别的宗教节日基本相同，但名称、时间以及举行的活动形式却各有所异。

天主教的宗教节日，一般称瞻礼，分活期和定期。活期以耶稣复活的复活节（每年春分月圆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为标准，复



活节后 40 天是耶稣升天节，第 50 天是圣神降临节等。定期占礼是指专定的节日，为 12 月 25 日是耶稣圣诞，8 月 15 日是圣母升天。共有 12 个占礼，有大小之分，大者有 4，即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还有三王来朝、耶稣升天等 8 小占礼。

东正教的节日有 12 个。即：主降生节（圣诞节）、主领洗节、主进堂节、主升天节、圣神降临节、主易圣容节、圣母安息节、圣母圣诞节、举荣圣架节、圣母进堂节。

基督教的节日和天主教基本相同，主要是圣诞节和复活节，也纪念其他节日。在这两个大节日里，教堂里都举行特别隆重的礼拜。尤其是圣诞节，各教堂张灯结彩。除庆祝礼拜外，还举行音乐崇拜、演圣剧、聚餐联欢、化装圣诞老人、交换礼物等活动。

## （二）教徒的宗教生活与习俗

天主教的礼仪分两部分，即“圣事”和“祈祷”。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承认圣事有 7 件：（1）洗礼（入教仪式，洗礼用水，表明靠耶稣洗去一身罪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点水礼，即浇水受礼者的额上；另一种是浸礼，即受洗者全身浸入水中），（2）坚振礼（到一定时候举行坚定宗教信仰的礼仪），（3）忏悔礼（教徒向教会彻底交待自己所作“不合神道”的一些事情），（4）婚礼（教徒结婚须有神父作证），（5）终付（神父为临死者进行的一种仪式），（6）神品授予礼（为神职人员晋升所设的仪式），（7）圣餐礼（为纪念耶稣受难日而举行的仪式）。祈祷也称念经。所念的经有圣号经、天主经、圣母经、信经、悔罪经、望德经和爱德经等。教派有别，经文也有所不同。

中国天主教徒较普遍的宗教生活是：（1）望弥撒。教徒不能自己“做弥撒”，而只能在神父“做弥撒”时看着。神父是早晨在教堂内举行“弥撒”。教徒不必天天望弥撒，一般是星期天“望弥撒”的人较多。中国天主教的神父“做弥撒”都沿用拉丁文。

（2）“办神工”，即忏悔。这是教徒把自己所办的天主教教义中所

称的“罪”向神父“告明”，表示要“悔改”。神父诵念“赦罪经”，这样教徒所犯的罪可以获得“赦免”，死后不入“地狱”，而升入“天堂”。(3)“领圣体”，即举行圣餐礼。就是在“弥撒”中神父把一种特制的小面饼和葡萄酒作为耶稣的肉和血“祝圣”，教徒向神忏悔后，领圣体，把面饼吃下去。这样就能和耶稣溶为一体，得到天主的恩宠。(4)念经。一般是诵念“早课”、“晚课”和玫瑰经。这些经文许多教徒都能背诵。早课是在早晨诵念，晚课是在晚上进行，时间都很短。玫瑰经是为敬礼“圣母”玛利亚而念的，须手持“念珠”。

天主教还有斋期，每星期五守小斋，在有些规定的日期守“大斋”。“小斋”不食热血动物，“大斋”不仅不吃热血动物，而且减食。若经教会许可，斋可以免守。

基督教的礼仪主要有 5 种。最主要是洗礼和圣餐礼，其次是圣职礼（教牧人员晋升）、婚礼和葬礼。此外还有些其他礼仪，最主要的是每星期日举行礼拜。

基督教徒个人在家庭内的宗教生活，要求在早晨和晚上有“灵修”，即读《圣经》、祈祷，还有的唱赞美诗。教徒有时也检查自己的言行，目的是求神保佑引导。在每日三餐吃饭前要做简短的“谢饭祷告”。

集体的宗教生活主要是每星期到教堂做一次“礼拜”。教会一般定在星期日举行（也称主日，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其主要内容是：共同唱赞美诗、祈祷，牧师讲道等。有的教堂的礼拜中还有读“启应经文”（一般经文由主礼人与参加者轮流诵读），也有共同背诵《主祷文》等仪式。城市的教堂内常有“唱诗班”的组织。“礼拜”有时亦有特定的主题，如为祈求世界和平、为神学院校祈祷捐款等。

教会还根据教徒的要求，为他们举行宗教仪式如生日举行感恩礼拜，为新婚夫妇举行结婚礼拜，为去世教徒举行追思礼拜等。

## 大事记

公元 1 世纪中叶	基督教产生。
313 年	颁布“米兰敕令”(“宽容敕令”)。
392 年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395 年	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
428 年—431 年	景教创始人聂斯托利(380 年—451 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
445 年	罗马主教利奥一世自称教皇，罗马教皇制开始出现。
448 年	聂斯托利派脱离拜占廷教会，组成独立的东方教会(亦称聂斯托利派教会)在波斯等地活动。
476 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
540 年	东方教会改革后向中国等地传教。
618 年	唐高祖李渊即帝位，国号唐，唐朝开始。
627 年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贞观元年。
631 年	唐太宗敕令在长安崇安坊建立祇教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635 年	大秦国(东罗马帝国)僧侣阿罗本抵唐都长安。景教传入中国。
638 年	唐太宗下诏准许景教传教。
651 年	中国与阿拉伯建交，伊斯兰教正式传进中国。
675 年	波斯摩尼教(又称牟尼教、明教等)传入中国。
677 年	洛阳等地已建置景教寺院。
683 年—712 年	武则天当政和唐睿宗时景教受打击而衰落。
744 年	大秦国景教大德僧信和来华。
745 年	唐玄宗为景教寺题写匾额。景教寺改为大秦寺。
781 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立。
845 年	唐武宗颁诏灭佛，景教亦遭禁。
1062 年	苏东坡游长安南山曾作诗题为《大秦寺》。

- 1206 年**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家。
- 1253 年** 法国方济各会会士卢白鲁克(即吉尧姆)抵和林,在中国北部游历两年后,著有《东行记》。
- 1271 年** 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号为“元”。
- 1275 年** 马可·波罗等抵达中国大都。
- 1279 年** 元灭南宋,统一中国。
- 1280 年** 景教宗主教马屯哈任命马可为契丹大主教,任命巴尔扫马为巡察总监。
- 1281 年** 马屯哈逝世。11 月,马可升任景教宗主教。
- 1282 年** 元世祖诏敕也里可温教士可食官禄,有些地区也免纳赋税。
- 1287 年** 巴尔扫马出使欧洲,先后拜谒东罗马皇帝、法三腓力四世及英王爱德华一世,又晋见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
- 1289 年** 景教徒宗上乃颜起兵反叛忽必烈结果失败。战旗上加有十字架符号。
- 1289 年** 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任命方济各会会士意大利人孟高维诺前往东方中国传教。
- 1294 年** 孟高维诺抵达汗八里(元大都,即北京)
- 1295 年** 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 17 年后,返抵威尼斯。后来问世的《马可波罗游记》影响巨大。
- 1309 年** 因孟高维诺在元大都建教堂,传教活动成绩显著,被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封为汗八里总主教兼东方宗总主教。
- 1313 年** 中国南方当时最大商埠刺桐(今泉州)创设天主教主教区。在华传教活动进一步扩大。
- 1313 年** 泉州新建成华丽的天主教主教座堂。
- 1315 年** 元朝全国也里可温掌教司(教堂)并为 72 所。
- 1325 年** 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抵大都并谒见元泰定帝。
- 1333 年** 教皇委派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任汗八里(大都)总主教。

- 1342年 教皇委派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马黎诺里等 4 人为专门使团抵大都，受到元朝隆重欢迎。
- 1368年 中国元朝灭亡，元顺帝出逃漠北。明朝开始。
- 1421年 明成祖将首都自南京迁至北京。
- 1494年 6月 7日 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签订托尔德西里雅条约，定出“教皇子午线”，划定西、葡“发现”新土地归属的范围。
- 1529年 西、葡又补订萨拉哥撒新条约。
- 1540年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成立耶稣会。
- 1540年 沙勿略受葡萄牙国王派遣，以教皇宗座钦使的名义前往东方传教。
- 1557年 中国领土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侵占。
- 1575年 耶稣会上范礼安任耶稣会远东巡视员。
- 1578年 3月 24日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离里斯本启程前往东方，同年 9月抵果阿，居 4年后，1582年 8月 7日抵澳门。
- 1598年 9月 利玛窦第一次抵北京。
- 1599年 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来华。
- 1601年 1月 24日 利玛窦一行 8人抵北京。三天后，万历神宗帝谒见，利氏进献西洋方物，圣像及自鸣钟共 19物 31件。神宗欣赏自鸣钟，为便于修理，特允利氏长居北京。
- 1603年 利玛窦的《天学实义》(又名《天主实义》)在北京刻印成书，广为传播。
- 1605年 北京天主教南堂建成。
- 1606年 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来华居北京。
- 1609年 创立北京天主会。
- 1609年 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抵北京。
- 1610年 5月 11日 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 58岁。
- 1611年 熊三拔著：《简平仪说》刻本问世；又著《泰西水法》(六卷本)1612年成书；《表度说》1614年成书。
- 1613年 李之藻上奏《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申请全面输入西学。



- 1614年 庞迪我著《七克》。
- 1615年 金尼阁在罗马将利玛窦著《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加以整理又增加两章后译为拉丁文出版。
- 1616年 “南京教案”爆发。
- 1620年 7月 金尼阁偕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等传教士兼学问家抵达澳门。
- 1621年 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往北京（他1610年来华）。
- 1621年 沈澹勾结魏忠贤等第二次发起“南京教难”。
- 1623年 艾儒略完成《职方外纪》六卷，前冠《万国全图》。
- 1626年 龙华民著《地震解》一书刊行。
- 1627年 邓玉函与王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三卷。
- 1628年 徐光启名著《农政全书》自1621年—1628年完成初稿。徐逝后1639年公开刊出问世。
- 1629年 在北京宣武门内首善书院旧址设历局，由徐光启统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先后参与工作。
- 1630年 汤若望出书《远镜图说》，对望远镜的构造、使用方法及原理加以说明。
- 1633年 徐光启等完成《崇祯历书》。
- 1633年 罗马教皇允许多明我会教士等其他修士与耶稣会同享在华布教之权。
- 1636年 汤若望受明崇祯皇帝之命督造出“无间大将军”炮20门。
- 1640年 汤若望等译完《矿冶全书》（亦称《坤舆格致》）12卷本。
- 1643年 汤若望完成《火攻挈要》又称《火攻揭要》、《则克录》分三卷。
- 1644年 清朝建立。
- 1645年 汤若望被清世祖敕封为钦天监监正。
- 1653年 汤若望被清世祖赐号“通玄教师”。

- 1654 年 意大利耶稣会上卫匡国出版《新世界图》和《中华帝国图》，卫匡国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学之父”。
- 1654 年 清世祖赏赐汤若望地亩田产。
- 1655 年 北京东堂由利类思和安文思创建。
- 1658 年 罗马教廷在中国推行宗座代牧制，扶持巴黎外方传教会（1653年成立，任宗座代牧）。
- 1658 年 清世祖封汤若望为光禄大夫、一级正品高官。
- 1660 年 南怀仁至北京，任汤若望助理。
- 1664 年 7 月 杨光先具《请诛邪教疏》，诬陷汤若望，发动教案。
- 1666 年 7 月 5 日 汤若望病故于北京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
- 1668 年 康熙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领导钦天监。
- 1669 年 康熙亲为汤若望平反，在祭文中称汤若望为“鞠躬尽瘁的臣子”。允许天主教在北京南、东两个教堂恢复宗教生活。
- 1674 年 南怀仁制成观象台天文仪器共 6 件，还撰写出《新制灵台仪象志》（14 卷）。
- 1674 年 南怀仁升任钦天监监正，加封太常寺少卿衔。
- 1678 年 南怀仁著成《康熙永年历法》32 卷。被授予通政使司通政使衔。
- 1682 年 康熙加封南怀仁为二品工部右侍郎衔。
- 1687 年 法国派耶稣会士、科学家张诚、白晋、李明、洪若翰、刘应等 5 人来华传教。
- 1688 年 南怀仁病逝于北京。
- 1689 年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教士张诚、徐日昇奉旨随行。
- 1690 年 康熙因对传教士的信任，曾题写“西洋人心最实，皆对学问有根也。”后来又题过“万有真原”、“敬天”匾额。
- 1692 年 康熙颁“保教令”。

- 1693 年 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阎璋继蒞万济任越南宗座代牧并署理中国部分地区教务。他对耶稣会抨击最烈。
- 1695 年 东正教的圣尼古拉教堂在北京建成。
- 1696 年 罗马教廷下令调整教区，加强对传教士的规定和仪式的控制。
- 1697 年 康熙命传教士白晋出使法国，招聘博学教士来华。
- 1698 年 康熙郑重作出“中国礼仪不是宗教迷信”的重要批示。
- 1699 年 白晋带领法工进华的雷孝思、马若瑟等 10 名传教士兼科学家抵京。
- 1699 年 耶稣会士徐日昇、张诚等上疏请康熙训谕有关中国礼仪之真解。
- 1700 年 11 月 30 日 康熙明确指出“敬天及事右亲、敬师长者係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维护了中国的礼仪。
- 1703 年 北京天主教北堂最初建成。
- 1704 年 罗马教皇克莱蒙特十一世继派铎罗（图诺）为特使来华之后，又颁布禁令七条，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 1706 年 教皇特使铎罗离北京去南京。
- 1707 年 铎罗在南京发函不准中国教徒祭孔拜祖，违者开除教籍。
- 1710 年 铎罗病故于澳门。
- 1715 年 以依腊离宛等为首的第一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达北京。
- 1715 年 教皇发布《白登极之日》通谕，不准教徒重提中国礼仪问题，违者与异端同罪。
- 1715 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抵北京，此后在宫廷如意馆中作画 40 余年，雍正时期完成《聚瑞图》和《百骏图》，还与人合作绘《乾隆战功图》等，名噪中外。他后来曾几次恳请乾隆开教禁。
- 1717 年 康熙降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

1720 年	教皇新特使嘉乐抵京。
1720 年	俄罗斯正教改革后，取消“牧首制”。
1720 年	康熙作出重要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1721 年	俄罗斯正教以这一年为沙皇国教的开始年。
1722 年 11 月	康熙逝世。
1723 年	北京天主教西堂初建。
1724 年	清世宗（雍正）下令禁教，限各省传教士在半年内离境。
1725 年	德国传教士戴进贤任钦天监监正，1731 年加二品礼部侍郎衔。
1727 年	雍正下谕：“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
1727 年	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
1729 年	在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率领下，第二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北京。
1732 年	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驻地从东直门的胡家园胡同迁至新建的位于东交民巷的“奉献节”教堂之内，此即俄在北京的“南馆”。
1736 年	以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为首的第三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北京。
1738 年	戴进贤任耶稣会中国省区副会长。
1745 年	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任领队第四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到达北京。
1754 年	阿姆夫罗西·龙马托夫领导下，第五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北京。
1772 年	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率领下第六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北京。
1773 年 7 月 21 日	教皇克莱蒙特十四世颁令解散耶稣会。
1781 年	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为首的第七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北京。
1783 年	罗马教廷派法国遣使会来华接替原耶稣会工作。

- 1794 年 生于白俄罗斯的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率领下，第八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北京。
- 1807 年 9 月 马礼逊受英国伦敦浸礼会教会的派遣来华传教。
- 1808 年 俄外交部领导下，大司祭雅金甫·俾丘林任领队，第九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北京。
- 1821 年 沙皇尼古拉一世召见后，帕·伊·卡缅斯基率领下，第十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北京。
- 1831 年 维·莫拉契维奇率领第十一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驻京。
- 1838 年 罗马教廷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抵北京。
- 1843 年 教皇庇护九世任命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取代原葡萄牙主教。
- 1844 年 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其中第 17 款规定：合众国人均准在五港口“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
- 1844 年 法国通过《黄埔条约》亦取得同样的权利，同时还补充了新的内容：“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 1847 年 瑞典、挪威亦通过条约取得习教权。
- 1849 年 第十三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领队人巴拉第·法罗夫卸任后，不断为沙俄政府提供中国重要情报并提出侵华建议。
- 1855 年 各国青年会决定成立青年世界协会，会址在日内瓦。
- 1858 年 俄、美、英、法 4 国与中国所订《天津条约》，均有传教特权的条款，但各有不同。俄、法两国所订条约，均规定了进入内地传教的特权，其中法国所订更为详细、完备。该约第 13 款载：“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估身家，……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 1859 年 设莫斯科大主教(牧首)，此后俄罗斯正教会成为东正教中最大的教会。
- 1860 年 中俄订《北京条约》。



- 1860年** 中法在订立《北京条约》时，法国迫使清政府将1846年上谕中关于归还教产，以及“滥行查拿”教徒的地方官员予以处分的内容，规定于该约第6款。在条约的中文本上，法国翻译偷偷在该约末加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 1860年** 圣约瑟修女会在京创立。
- 1861年** 贵阳教案。
- 1862年** 丁懋良抵北京开辟传教基地，设长老传道会。
- 1862年** 京师同文馆正式在京成立。
- 1863年** 傅兰雅接受同文馆邀请，当教习。
- 1864年** 公理会总部创立于北京。
- 1864年**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北京创办育英中学，是基督教在北京办的最早一所中学。
- 1864年** 美国公理会在京设贝满女子学堂。
- 1864年** 英国伦敦支持下北京双旗杆医院开设。
- 1865年** 法国公使柏德美与清政府商定法国传教士在内地置买房地产一事，总理衙门以照会形式予以确认，即所谓“柏德美协定”。
- 1865年** 丁懋良受聘于同文馆，任英文教习。同年他又创“崇实馆”（后改为崇实中学）。
- 1865年** 原第十三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头子巴拉第·卡法罗夫因侵略“有功”，又率第十五届传道团来华。从1865年起，卡法罗夫对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蒐集大量情报。
- 1867年**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娄戴德在北京设立蒙学馆（汇文中学的前身）。
- 1869年** 美国传教士谢卫楼来华。在通州（通州区）传教。
- 1869年** 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创造亚斯立教堂。此为基督教在北京建立的第一所教堂。
- 1869年** 丁懋良升任同文馆总教习，在任直到1894年。

- 1870年 清政府刑部删去了《大清律例》中关于传教治罪的条文，增加了保护传教和信教的新律。
- 1870年 天津教案。
- 1870年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受浸礼教会的派遣来华传教。
- 1872年 美国美以美会在京办北京慕贞女校。
- 1872年 教会办的《中西见闻录》在北京创刊，这是教会在北京创办的最早的中文期刊。
- 1875年 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北京办圣经学校。
- 1876年 司徒雷登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家庭里。
- 1876年 上海诞生了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
- 1878年 大司祭弗拉维昂·高连茨基率第十六届俄正教传道团（1878年—1888年）抵京。
- 1882年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先在烟台、济南一带传教。
- 1884年 振华书局创办，引进西方石印和铅印技术。
- 1885年 福州的英华书院和通州的潞河书院先后有了学生青年会。
- 1885年 丁韪良被清政府赐予三品顶带官衔，丁韪良编写的《中国古代万国公法》出版。
- 1886年 北京同仁医院开设。
- 1888年 意、德分别与清政府互换照会，清政府承认它们的传教士脱离法区的保护，由本国公使发给护照，处理教案。
- 1888年 曲阿·罗托维诺夫大司祭率领第十七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1888年—1898年）抵京。
- 1889年 美国传教士谢卫楼出版《教会史记》。
- 1890年 杭州温道女校建立第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
- 1890年 汇文大学在京成立，是北京最早的教会大学。
- 1890年 宜昌教案发生。
- 1890年 李提摩太受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委派到天津任英国人办的报纸《时报》主笔。

1891 年	李提摩太继任上海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总干事，他主持广学会工作达 25 年之久。
1891 年 6 月~7 月	长江上下游教案迭出。
1894 年	李佳白抵北京。
1895 年	在穆德领导下，成立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他任主席。
1895 年	李提摩太呈递《永息教案折》，求见帝党首领。
1896 年	在上海举行第一次青年会的全国会议。
1897 年	山东发生巨野教案。
1897 年	李佳白等在北京成立尚贤堂。
1898 年	丁懋燮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直到 1900 年。他被清廷升为二品顶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于 1899 年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898 年	大司祭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率第十八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抵北京。
1899 年	山东义和团、大刀会起义。
1900 年	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成。
1900 年 1 月	各国公使请查禁义和团、大刀会等团体。
1900 年 6 月	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
1900 年 6 月 6 日	义和团民与侵略军战于天津郊区。
1900 年 6 月 13 日	天津和界联军炮击车站团民，团民出动大队进攻租界。义和团进入北京。
1900 年 6 月 16 日	北京义和团民进攻北堂。
1900 年 6 月 18 日	董福祥军和团民败西摩尔侵略军于廊坊。
1900 年 6 月 21 日	清政府宣布宣战谕旨。清廷又令团民和官军进攻使馆。
1900 年	李佳白任八国联军翻译，参与镇压义和团。
1900 年 7 月 14 日	天津失陷。
1900 年 7 月 17 日	大沽失陷。
1900 年 7 月	李提摩太印发《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意见书》给各国政府，要求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1900 年 8 月 2 日	八国联军自天津向北京大举进犯。
1900 年 8 月 14 日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挟光绪帝逃离北京。

- 1901 年**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北京开设北京安定医院。
- 1901 年**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北京设立北京妇婴医院。
- 1901 年 5 月** 李鸿章邀请李提摩太进京会议“教案”的善后事宜。李提摩太向李鸿章上了一个条陈(即:《上合肥傅相书》),同时草拟了一个《办理山西教案章程》。
- 1901 年 9 月 7 日** 《辛丑条约》签订。
- 1901 年** 李佳白在美国《论坛》杂志上撰文《抢劫伦理学》,公开为镇压义和团后侵略军的抢劫作辩护。
- 1902 年** 按照李提摩太在《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中的意见,用中国因教案而被罚的款项,办起了山西大学堂。
- 1902 年** 俄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用“庚子赔款”等,拨给驻北京传道团,故其经费有所增加。
- 1902 年** 法国天主教会在北京设北京万生医院。
- 1902 年**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关于教案处理办法,提出了一个笼统的原则。同年,两广总督与美、法领事商定了《广东教务章程》,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
- 1903 年** 李佳白在上海重建尚贤堂。
- 1904 年** 潞河书院改为华北协和大学,谢卫楼任校长。
- 1905 年** 由基督教华北教育联合会与贝满女校联合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 1905 年正式命名。
- 1905 年** 华北协和圣经学院成立。
- 1907 年**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 1907 年** 谢卫楼出版《心灵学》和《是非要义》(即伦理学)。
- 1908 年** 李佳白撰出《予筹中国十二年新政策》向清廷皇太后、皇上献策。
- 1908 年** 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人数和教产均有增加。
- 1910 年** 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北京设立崇德中学。
- 1911 年** 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成立,培养留美预备生。
- 1912 年** 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 1912 年** 在华圣公宗各教派联合,组成了中华圣公会布道部。
- 1913 年** 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在北京成立。

- 1913年 谢卫楼逝世，遗体葬于通州。
- 1914年 协和女子传道学校在北京建立。
- 1914年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购得房地产，开始兴建北京协和医院。
- 1915年 在1896年成立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于1915年正式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
- 1916年 燕京大学成立。
- 1916年 珠市口教堂在北京建成。
- 1916年 长老会在华各派组成中华长老联合会。
- 1916年 公理宗在华各教派并入中华基督教会。
- 1916年 李提摩太在伦敦出版了《留华四十五年记》。
- 1916年 12月 丁黉良患肺炎逝于北京。
- 1917年 李佳白接办法国人在北京办的《北京晚报》，任社长。
- 1917年 由北京妇孺医院和安定医院合并组成北京道济医院。
- 1918年 十月革命后，俄颁布“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法令，大批俄神职人员逃亡中国东北，纷纷建立东正教堂。
- 1918年 东正教的圣母堂在北京建立。
- 1918年 司徒雷登到北京的燕京大学工作，1919年1月任校长。
-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
- 1920年 路德宗在华各派举行联合，成立中华信义会。
- 1920年 北京青年基督徒组成“生命社”，出版《生命》。
- 1921年 北京协和医院建成。
- 1922年 4月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十一届（扩大）会议。
- 1922年 3月 北京大学学生中掀起非宗教运动。
- 1922年 李佳白创刊《国际公报》。



1922年	敌视十月革命的东正教人士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洛齐成立了“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会议”。中国东正教宣布脱离俄正教。此后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改称为“中国东正教会”。
1923年	吴耀宗、吴雷川和刘廷芳等成立了“真理社”，创立了《真理》周刊。
1924年8月	上海教会学校和公私立学校的爱国学生发起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
1925年	辅仁大学成立，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创建。
1926年	李佳白将尚贤堂从北京搬到上海。
1927年9月	李佳白逝于上海。
1927年	司徒雷登经孔祥熙介绍和蒋介石见面。
1928年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
1928年12月	清华学堂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1年	坚决反苏的“中国东正教会”大主教（“北京总会”总头目）英诺肯提乙逝世。西蒙继任。
1933年	东正教“北京总会”大主教维克托尔接任。
1939年	在华美以美会、循道会、美普会三教派联合组成卫理公会。
1942年8月	司徒雷登被送进日军集中营达3年8个月。
1946年	司徒雷登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任为美驻华大使，直到1949年8月，支持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1946年	在维克托尔主持下，中国东正教“北京总会”决定归属苏联俄罗斯正教莫斯科牧首区管辖。
1947年	意大利籍神父马迪诺充当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为其搜集情报。
1949年1月	北京市和平解放。
1954年	司徒雷登在美国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

## 后 记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一本书稿，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研究项目之一，这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学术著作。我们是根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八五”研究项目的选题而中标立项的。这个题目资料缺、难度大，迄今国内尚无有关此题的专门论著可为之借鉴。因此，只能汲取国内外有关著述的一些成果和在北京市内调研与查阅档案相结合而进行写作。我们期望的是，能以质朴、简明的笔触，按照史实的顺序，以评介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方正教各教派）在北京初传、盛行和发展嬗变的基本过程为重点，提供出在北京自古以来至近代，对十字架的膜拜和传播的概括图景。简而言之，本书主要是勾画了一个粗线条，试探着填补一下空白。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塑造着文明；文明衬映了时代。历史上，宗教曾起过文明交流的媒体作用。

目前，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日趋复杂、竞争加剧的重要时代。20世纪末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一日千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下，我国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和人生观念。对宗教及其作用的辨析亦日益深化。宗教问题是当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我国并不例外。迄今，我们尚未发现有哪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历史上或现实当中完全没有过宗教的。研究宗教，我们认为：正确的视角和理念是：要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能以宗教去说明和解释历史。毫无疑问，宗教将会跨世纪地存在和发展下去。正确地认识和评析宗教，特别是在世界范围中对影响广、信徒多的基督教，究竟是怎样传入北京的来

龙去脉，对北京基督教发展的格局和特点加以归纳与探研，这是北京地方史的重要任务之一。

近几年我们在欧美和港澳开会或讲学时，发现境外关于文化史、宗教史的著述，真是汗牛充栋。对比之下，我国这方面的著作实在太缺。面对文化领域的挑战，我们不能总是翻译人家的著作。我们很有必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逐步开展国内文化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大力弥补薄弱环节。前几年《上海基督教史》、《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等著作的相继面世，乃是史学界的幸事。今天，我们不揣浅陋，献上这本小书，愿为基督教会史和北京地方史的拓宽建设，添加一粒铺路的石子。

在这里，特别应着重感谢和说明的是，原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姜立勋同志对本书的支持、肯定和指导。他在非常仔细审阅本书全部文稿后的评审意见中写道：“此书稿对基督教如何传入中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传播情况、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写得层次分明，观点明确，资料丰富、叙事有据，是一部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好书。同时也是一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研究成果填补了系统论述北京天主教发展过程的空白。很有阅读价值，应予出版。……”姜立勋同志宗教知识渊博，又有领导工作的实践经验，对这本书稿的修改意见，从内容取舍、史实资料到字句斟酌，共提出 18 条之多，非常可贵和中肯。我们都一一采纳了。为了确保和提高本书的质量，近一年多以来，我们又对照《北京市志稿》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北京通史》（十卷本）等新出版的各种书刊，对本书的许多部分都作了订正、修改、增删或重写。

有些学者希望我们把 1949 年 10 月建国以后北京市基督教的发展变化和现状，也补进本书之中。我们考虑到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同志编著的《北京的宗教》（33 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等著作已公开发行，这类书中对我国建国以后首都北京的宗教情况和宗教工作叙述较详，为了避免重复，我们这本书则不

涉及建国后的宗教史，本书下限写至 1949 年北京解放以前为止。

当前，我国学术著作的出版，困难较多。我们特别感激首都师大历史系戚老国淦教授对我们写作与出版本书的热情帮助和推荐。首都师大出版社白光洁社长等同志为了促进北京市与各地的学术交流，毅然出版本书，并对本书的审阅、校核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谨在此向首都师大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深感对北京市基督教会和各教堂内部事务及其历史轨迹了解和研究得不够，因而本书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粗疏漏误和欠周之处，在本书即将付梓接受读者检验之际，我们诚恳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陈月清 刘明翰

1997 年 12 月于北京万寿寺